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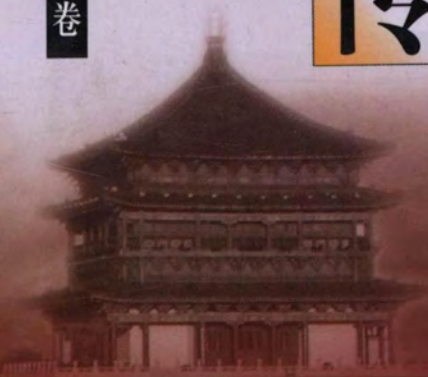
中共陕西历史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人物

第三卷

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第三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吴崇信 梁星亮

副主编 许发宏

责任编辑 许发宏

责任校对 张春梅

审 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编辑说明

一、随着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陕西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大多党的历史人物革命活动经历也基本清楚。为了真实系统地记述革命和建设时期陕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和有关重要人物的活动史实,弘扬他们为党、为国、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奋斗、忘我工作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们编辑出版《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丛书。这既是党史研究领域内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本丛书收录的范围和标准,大体包括:(1)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党团组织的创建人和组织成员、群众团体组织的主要成员、其他知名人士和著名活动家。(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地区特(地)委以上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的创建人或主要领导人;其他重要独立武装的军政指挥者;有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烈士。(3)抗日战争时期省级和省级以上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烈士;著名英雄劳模、爱国华侨

和国际友人。(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解放区、国统区和陕南解放区省级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负责人；著名战役、战斗或重大军事行动的最高军政指挥员；著名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革命烈士。(5)全国解放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以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军区正副职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著名革命烈士。

三、传记内容，以传主在陕西的活动为主，以传主与党有联系的活动为主。

四、本丛书暂收入已经去世的人物传稿。丛书传稿的编排大体上以成稿先后排序，各卷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本丛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共同编写，并以多卷本陆续编辑出版，公开发行。

目 录

廖乾五	(1)
雷晋笙	(37)
包 森	(55)
吉国楨	(74)
秋步月	(87)
张含辉	(120)
于右任	(135)
杨 森	(151)
邹 均	(162)
张仲良	(171)
赵寿山	(208)
宣侠父	(242)
耿炳光	(279)
曹力如	(293)
王炳南	(311)
杨明轩	(355)

时逸之·····	(407)
孟用潜·····	(415)

廖乾五 (1886—1930)

廖乾五,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号乾五。陕西省平利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汉口江岸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4年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历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孙中山建国大元帅铁甲车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筹划并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统

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为创建人民军队及开创政治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9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军委工作时,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沙。

工运浪潮的斗士

廖乾五出身于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跟教私塾的大哥学得满腹经纶。他和两个哥哥因才学出众,被誉为“平利三支笔”,“三支笔”中以他的文才最佳。

1906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使幻想在考场上“一展宏图”的廖乾五甚感失落。这年腊月,他告别新婚妻子,顶风冒雪,徒步翻越大巴山,欲到武汉去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二哥廖华鼎,不料路费用尽,身患重病,困羁途中,只得以教学谋生。在十几年的

颠沛流离中，廖乾五广泛接触了劳苦大众，体会到了社会的弊端和不平，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索，在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他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1921年8月，他经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同施洋等人参加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次年在武汉加入了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①在武汉党组织领导下，他经常到工人、店员、学生中宣传、采访、写稿、组织活动，有时忙得彻夜不归。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被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派军警强行制止。总工会不怕威吓，宣布总工会成立，喊出“为人权而战，为自由而战”的口号，下令全线工人于2月4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同时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项英、陈潭秋、施洋、许白昊、李之龙等共产党员领导汉口江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廖乾五也参与领导工作。^②2月7日，1万余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并冲进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派军警包围江岸分会，悍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当场打死36人，伤200余人，被抓捕1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均为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廖乾五在敌人疯狂屠杀时侥幸跑出，隐蔽在一个小鸦片馆里，直到天色昏黑，才和项英一起坐船到汉口，回到了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了铁路工会秘密联络处，紧急调查工人死难、被捕情况，抚恤死伤者家属并营

^① 李婉霞、张志善：《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概况》，载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楚晖》第三辑；《中国共产党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史资料》1991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第27、29页。

^②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395页。

救被捕工友，与各分会积极进行联系。

12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必须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改组其组织，没有组织的地方我党为之创设”的指示精神，廖乾五同项英、刘芬等人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汉口党部筹备处，廖乾五任副主任。^①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乾五、李立三以汉口特别区选派的代表资格，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闭幕后，廖乾五回到汉口，协助林伯渠建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并代理宣传部工作（宣传部长张知本未到职）。3月中旬，他和刘芬、李立三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词弹劾国民党右派覃振派回汉口的雷大同、郭聘伯等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受到这些分子的攻讦。雷、郭等打着“武汉国民党员”的旗号，在《为本党改组事上总理书》中写道：“顷据此间调查所得，刘芬、李隆郅（立三）、廖乾五三人均系江（亢虎）、陈（独秀）党徒……凭藉吾党名称，实行破坏计划”。

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武汉地委，设立汉口、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中央直接指导。改选后的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包惠僧，委员有许白昊、项英、刘伯垂、廖乾五，辖6个党小组。机关秘密设在汉口德润里23号，租住楼上二层的5间房子。

5月16日下午2时许，由于工贼告密，地委机关突然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搜查。包惠僧适逢到上海参加党的会议未返，廖乾五、项英外出工作，得以幸免；许白昊与工人杨德甫等被捕。5时许，廖乾五从外面回来，当他走到离机关不远的巷口买香烟时，听见摆香烟摊的小贩说，23号方才被查封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① 《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8页。

廖乾五察觉有变，机警地拔脚便走，但已被守候的便衣侦探窥见，急步追来。廖乾五向英租界跑去，一个便衣紧追不舍，距离越来越近，眼看难以脱身，廖乾五急中生智，闪身躲入了路边一个隐蔽的拐角里，待到那个便探的脚步迫近，冷不防猛然跃出，飞起一脚，向对方横踢过去，将猝不及防的敌探踢倒在地，趁此时机，他继续向英租界疾跑。租界的铁闸门通常是关闭的，此时凑巧有列火车快要开到，铁门豁然畅开，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而入，刹那间，气笛长鸣，火车已经驶到，那敌探望着滚滚铁轮，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归。

支援广宁农民运动

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后，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1924年5月，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

8月下旬，孙中山创建“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这是一支国共合作的革命武装。孙中山大本营任命国民党员卢振柳任队长，中共党组织选派廖乾五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兼政治教官，军事顾问是苏联红军军官罗嘉觉夫。

创建初期的铁甲车队有铁甲车4列，队员不足百人，隶属航空局管辖，但直接由孙中山大本营指挥。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大元帅大本营，维护广九、粤汉两条铁路的安全。铁甲车队成立后，在卢振柳、廖乾五的指挥下，曾护卫孙中山大本营专列赴韶关督师北伐，押运苏联政府支援的几千支步枪到韶关，参与平息广州商团叛乱等，取得了一定战绩。

同年11月底，经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并经广东革

命政府同意,决定改组铁甲车队,易名为“建国军大元帅铁甲车队”。队长仍由卫士队队长卢振柳兼任,廖乾五任党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选调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区委干部曹汝谦(均系中共党员)分别担任连长、政治教官。周恩来还从黄埔军校选调第一期毕业生赵自选(中共党员)、周士第协助廖、徐负责改组工作。队中建有中共党小组,由廖乾五任组长,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全队队员共约150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或各地工会、农会介绍来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分别编入3个排。铁甲车队名义在大元帅府的编制内,实际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部队的主要活动、训练等问题,都由廖乾五、徐成章等向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请示。

改组初期,只有廖乾五等数名共产党员,随着铁甲车队的发展,又先后吸收见习官周士第,排长莫奇标、高超、李海涛,班长周子昆,队员魏鉴贤等入党,形成了20多人的共产党员核心,这就保证了共产党员是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把枪杆子牢牢抓在共产党手中。尽管当时的工作和训练十分紧张、繁重,但廖乾五、徐成章对党员教育抓得很紧,坚持每周开一次党小组生活会,汇报思想,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经常带领党员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党团活动,听陈延年、肖楚女等作报告,充分发挥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使铁甲车队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一支正规军队”。^①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注释》(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第82页。

在廖乾五、徐成章领导下，把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成为铁甲车队区别于其他部队的一个特征。车队规定，每天上午或下午安排两个小时的政治课，由廖乾五、曹汝谦等分别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国内外形势等，结合具体事例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地主的罪恶，有时还请工农运动的领导者如彭湃等宣讲工农运动开展情况。每天晚上，廖乾五都规定了政治讨论时间，官兵们在一起谈体会，提问题，争论、解答问题。形式生动，气氛热烈。他还经常找队员谈心，了解工作、思想、家庭情况，帮助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业余时间，官兵同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和《国民革命歌》。车队还排演文艺节目，阅读中共中央办的《向导》，共青团中央办的《少年先锋》、《中国青年》等刊物。通过这些政治活动，铁甲车队的官兵树立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铁甲车队改组不久，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彭湃就请求开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除第三排留守广州外，其余 80 余名官兵在廖乾五、徐成章率领下，于 12 月 8 日开赴广宁县。广宁县在彭湃和周其鉴（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中共党员）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广宁支部和县农会。中共广宁支部是我国农村最早的基层党支部。他们领导的农民减租运动蓬勃开展，但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12 月 12 日，刚到广宁县社岗的第二天，廖乾五、彭湃、徐成章等指挥农民自卫军、铁甲车队，击溃反动地主江淮英民团，残敌退守江姓炮楼。这个炮楼，高 5 层，构筑坚固，配有大炮、土炮等火力，易守难攻。铁甲车队排长张宏远在战斗中负重伤，送回广州后牺牲。时在北京的孙中山于 1925 年 1 月 9 日指令卢振柳：“准予该队少尉张宏远附葬陆军忠烈祠坟地”。彭湃等见力攻不下，遂派

廖乾五回广州报告并求援。

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凯听取了廖乾五的汇报后，为孙中山手拟大元帅令，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发出“铣电”，指示由蔡鹤鹏（广宁县长）、彭湃、廖乾五和第三师高级副官等4人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12月26日，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在县城开预备会时，廖乾五、彭湃首先提出惩办祸首、解除反动地主武装、实行减租、赔偿农民损失、恢复农民协会等5项提案。

广宁县县长蔡鹤鹏是国民党右派，他口头同意两项提案，但一项也不肯执行。12月29日，广宁县团保总局头子谭侣松通过县署号房送来一张请帖，邀请铁甲车队全体军官和彭湃出席宴会，企图进行拉拢。

晚上8时许，廖、徐、彭带卫士准时应约赴宴。席间，廖乾五突然拔枪在手，以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谭侣松的罪状，将其逮捕，押回县农协会驻地。当晚，廖乾五派见习官赵自选回广州报告情况及请求援助重火器。周恩来听取赵自选汇报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的情况后，经同廖仲凯等商量，指派大元帅大本营卫士队携重武器前往广宁援助。^①1月9日，卫士队队长兼铁甲车队队长卢振柳将军率卫士队抵达埗，连续两日用大炮轰击未击毁江姓炮楼，遂建议停战议和。廖乾五严肃向卢指出，用和平办法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1月18日，卢振柳竟下令“农军一律收回步枪，不得荷枪游行道路及市场”，卫士队士兵如有擅自开枪者“以军法从事”。此时，荷木咀农会被反动民团攻占捣毁。在这种情况下，彭湃、廖乾五等一方面书面向广东革命政府报告并以县农民协

^①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1页。

会的名义通电全国,控诉卢振柳的罪行,要求撤换其职务;一方面派彭湃回广州请示报告。

1月19日,廖仲凯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出了4通命令,将卢振柳调回省城,令卫士队第一连连长谢升继代理卫士队前方队长,廖乾五兼任卫士队党代表,由廖乾五、彭湃、谢升继共同组成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

2月1日,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发出围攻匪楼的命令,廖乾五、彭湃指挥铁甲车队、卫士队、农民自卫军围攻潭埭江、黄两家反动地主炮楼。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黄姓地主炮楼表示愿意投降,但又不肯放下武器。廖乾五等决定改变打法,先是采用挖隧道用炸药爆破,后又动员农民堆积柴草,准备火攻。社岗的农妇“毒恨江楼,担柴之际,枪声齐响,毫无惧色,而以得参与烧楼为快”。黄、江炮楼见外援无望、内无饮水,先后缴械投降。

2月16日,省方电促卫士队、铁甲车队即回广州。廖乾五等遂派徐成章、赵自选率铁甲车队、卫士队、农民自卫军各一部,又拔掉了茶坪岗两个反动地主炮楼,收复了五区农协会所。

廖乾五等率队在广宁支援农运70余天,击溃反动民团数千人,歼灭1000余人,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1000余支,将全县反动武装一举荡平。2月19日,廖乾五等率队返回广州。广宁人民依依难舍,夹道欢送。广州各界于当月23日召开数万人的大会,为铁甲车队庆功祝捷。1926年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将周其鉴撰写的记叙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事迹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编为“农民问题丛刊”第20期出版,毛泽东为该刊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套丛刊是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和教材。

支援省港大罢工

铁甲车队从广宁回到广州后，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分别升任车队正副队长和军事教官。全队人数经常保持在150人左右，成为中共早期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一个基地。1925年3、4月间，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改造航空局飞机掩护队，以扩大革命力量，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派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遵照广东区委的指示，廖乾五专门召开党小组会议，研究和平安改编的办法。经过周士第、赵自选的努力，这支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支革命武装。

6月初，正当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军在潮州、梅县地区围歼军阀陈炯明主力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广州兵力空虚，发动反革命叛乱。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与弟兄部队一起，驻守大沙头，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南渡珠江，安全转移。6月12日晨，铁甲车队在陈延年、廖乾五、徐成章的指挥下，协同黄埔军校部队，从猎德强渡珠江，迅速插入敌军纵深，从侧后向盘据在石牌、瘦狗岭方向的敌军发起了进攻，收复了石牌车站和沙河，攻下制高点观音山，切断了龙眼洞和市区敌军之间的联系，配合主力收复了广州。当天下午，敌军一个师突然从北面向广州扑来。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广州军民猝不及防，形势顿转危急。这时，正带队返回防地的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当机立断，立即率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为上级调配兵力歼灭进犯之敌赢得了时间。仅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激战，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就毙伤俘敌数百名，缴枪几百支。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发动了省港大罢工。6月23日,广州10万工农兵走上街头,举行反英大示威。廖乾五、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参加了这次游行。当游行队伍经沙面对面的沙基路时,遭到预先埋伏的英国、法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和英、法军舰的炮击,当场死伤200多人。廖乾五等怒火中烧,指挥本队官兵,奋不顾身地在弹雨中疏散抢救群众。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全面封锁香港。此时,铁甲车队改称“国民政府铁甲车队”,徐成章已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调任飞机掩护队队长兼党代表,曹汝谦调任何成浚军政治部主任,铁甲车队的重担落在廖乾五、周士第2人肩上。遵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廖乾五、周士第又从本队挑选了30余名官兵帮助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训练工人武装,分别担任教练或基层队长。

10月30日,粤军残部邓文烈、罗坤部,悍然在沙鱼涌绑架工人纠察队员10余名。铁甲车队闻讯后,即由廖乾五、周士第率领50余名队员前往救援。廖乾五一面委托当地商会代为营救,一面命令部队修筑工事,严阵以待。

11月4日凌晨5时许,1000余名敌军和民团团丁趁着夜色从东、南、北三面向铁甲车队的驻地偷袭。廖乾五、周士第立即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共80余人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亮时,发现三面山头布满敌兵,又有两艘英国海军舰艇拖着4条民船,满载敌军强行登陆。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廖乾五下定牺牲决心,和周士第沉着指挥,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次将敌军击退。这时,一艘英国大军舰从香港驶来,用机枪向铁甲车队据守的山头猛烈扫射,同时,一架英军飞机也俯

冲扫射，掩护地面敌军进攻。廖乾五、周士第指挥士兵和纠察队员英勇进行反击。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至上午7时许，沙鱼涌附近所有高地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廖乾五、周士第决定突围。周士第在前，廖乾五和纠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断后，向敌军猛冲猛杀，将守卫沙鱼涌街口的敌军一个排打垮，杀开一条血路。

突围后，廖乾五清点人数，仅剩17人（铁甲车队15人，纠察队2人），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这时，已经3昼夜没有很好休息，20多个小时滴水粒米未进，不少同志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廖乾五找来当地一位农民，请他散布“黄埔军校从淡水打过来了”的假情报，这位农民欣然接受了任务。当敌人听说黄埔军校的队伍到来的消息时，吓得丢下没有煮熟的饭，急忙溃逃，使铁甲车队和纠察队一些负伤、被俘或躲藏起来的同志，得以乘机脱险。

最早突围的同志于当日上午回到深圳，见廖乾五等没有回来，以为他们已全部牺牲。省港罢工委员会沉痛地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廖党代表乾五等殉难”的消息。原来，廖乾五、周士第等突围后，因敌人沿路堵截，在农民引导下绕道100多里，于11月5日下午才返抵深圳。6日晚，廖乾五赶回广州，向省港罢工委员会详细汇报了这次战斗的经过。人们立即转悲为喜，前来慰问的各地工农代表络绎不绝。省港罢工代表大会决议派慰劳委员会干事局“主办其事”。

在沙鱼涌战斗中，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以不足百人的兵力，英勇抗击了港英当局飞机、军舰支援下的千余名匪徒的进攻。以伤亡30余人的小代价，毙伤匪徒200余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我党早期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中共广东区委、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热情赞扬廖

乾五、周士第等率领的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所表现的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中共广东区委主席团成员、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概观》一书中，充分肯定了他们“不惜牺牲而忠于职务，前者仆，后者继”的革命精神；后来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对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封锁香港等斗争中所取得的战绩，给予很高的评价。^①

参加统一广东的斗争

1925年11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从多方努力，并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该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北伐前夕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任命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廖乾五升任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上校级）。廖乾五勉励原铁甲车队全体官兵继续保持铁甲车队的革命精神，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新的部队里做出更大的贡献。北伐军入湘后，他多次到独立团指导工作，帮助叶挺解决部队的棘手问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11月下旬，廖乾五率10余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台山第十二师师部报到，受到副师长张发奎（师长陈可钰因病留在广州）的欢迎。到任不久，他即和张发奎部随第四军讨伐广东省南路军阀邓本殷。邓本殷盘据在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他既和帝国主义勾结，又与北洋军阀呼应，拥兵两万，觊觎广州，是个危险的祸患。

^①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第37页。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里，许多军事长官看不起政治部，把它当做时髦的摆设，政治部人员少，权力小，工作很难开展。但在南征过程中，廖乾五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胆略，在十二师大刀阔斧地开展政治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刚到台山，他首先从改善军民关系入手，根据周恩来在东征期间创造的政治工作经验，建议南征中不拉夫，不筹饷，不扰民。张发奎非常赞赏，并把这三条纪律飭令部队立即执行。廖乾五带领政治部率先垂范。部队从阳江出发时，政治部的宣传品和行李较多，廖乾五指示部属：“宁可把不必要的行李丢掉，亦要坚持执行不拉夫的规定！”由于政治部带头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对部队影响很大，使纪律得以顺利贯彻。针对官兵政治素质较差等情况，部队初驻阳江时，他即演讲政治工作之重要性、作用及内容。12月底，又同苏联顾问波罗等，向全体官兵演讲“纪律与政治工作，联俄政策，军人应注意之点，解释中国革命与俄国之关系”。对部队进行常识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到民众中去，是廖乾五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据当时的报纸报道，1926年1月3日，当沈塘、北罗剿匪战斗打响后，“张副师长亲往指挥，政治部廖主任率领全体职员在沈塘、北罗及附近平叶、秀山、北里、柴马诸村宣传，照料抚慰居民”。

除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在南征中，廖乾五还以极大的热情开展群众教育。部队每到一地，他首先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召开讲演大会、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据聂荣臻主编的《军事政治月刊》第6期载：“该部主任廖乾五暨全体职员，极肯努力工作。此次随军出发，沿途向民众宣传，无微不至，随处与民众谈话”。由于“该部之努力宣传，致使人民之疑惧尽释，由惊避怨恨，而欢迎欢送。宣传之功，实在不小也。”廖乾五还命人制作3尺见方的蓝色布旗10余面，上书醒目的

白色标语,让政治部宣传队高擎于部队之前,“此种宣传办法,很有效果,人民一见,即能认识革命军之态度”,所经之处,老壮妇孺莫不空巷来迎,夹道欢呼。其离大道稍远之村落,望见旌旗,即汲水置于道左,以代壶浆。”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廖乾五更加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教育士兵宿营时不许强占民房,要主动帮助群众担水、劈柴、扫院,借东西必须归还。出发前,他亲自带人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并征求当地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对军官,他也通过张发奎严格要求军纪,反对体罚士兵,不许随意拆老百姓的门板搭铺,不准酗酒、赌博、进妓院。在廖乾五及其领导的政治部的努力下,十二师的官兵进一步明白了扛枪打仗的目的和必须依靠、爱护群众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在军容风纪、战斗力各方面,都跃居整个国民革命军首位。

南征途中,廖乾五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同徒步行军,和士兵边走边谈,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在他的行动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推动下,部队坚持不拉夫、不筹饷、不征粮、不占民房、买卖公平,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美谈。军队对人民的爱护,激起人民的拥军热情,沿途“人民担任向导,报告敌情,传递消息,率民团追击敌人者亦有多起”。在短短一个月内,由于政治工作密切配合,促进了军事行动,南征军很快地将雷州半岛敌军肃清。在此期间,廖乾五还协助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张善铭(中共党员),先后建立了廉江中学学生会、阳江中学学生军、高州学联会、雷州除盗安民会、遂溪县农民协会、雷州各行业工会等。十二师政治部的工作实绩使代师长张发奎很满意,他很敬佩廖乾五,也逐渐重视政治部的工作。师政治部从初设的十几人增加到30余人,各团也设立了政治指导员一职。政治部不但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而且树立了威信,

许多解决不了的难题，都请求政治部出面解决。

1926年1月，南征渡海作战前夕，张善铭、廖乾五等发表《敬告琼崖同胞书》，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帮助革命军肃清邓匪”，高呼“军民合作万岁！”1月17日，十二师用两艘小轮船和200多条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进攻海南岛。在开船前，张发奎因未见廖乾五而派人四下寻找。廖正在一条木船上向士兵作战前动员，并坚持要和士兵同船渡海作战。经张发奎再三坚请，他只好上了小轮船。十二师在海南岛新榄港登陆成功后，立即向铺前墟推进。张发奎劝廖乾五留在后卫部队，廖回绝说：“越是战斗激烈、越是危险，越需要做好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他不听劝阻，和张发奎乘一辆指挥车前进。官兵们看见师长、政治部主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深受鼓舞，一鼓作气攻下铺前墟，乘胜向文昌、琼山、三江方向发展。

1月22日，十二师攻占海口后，廖乾五立即以师政治部名义，责成各机关未逃走的职员，暂时维持秩序。次日，他主持召开各界代表推举琼山县临时县长，以定稳人心，维护社会治安。接着，廖乾五叫政治部科员魏鉴贤请当地师范学校的几位学生来座谈。学生们听说和革命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见面，一下子涌来几十个人，廖乾五非常高兴，热情欢迎，亲切接待。在毫不拘束的交谈中，他了解到许多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况，同时，也对青年学生们进行了启发和教育。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廖乾五及政治部工作人员，还指导协助地方建立了国民党琼山县党部、各区分部，协助当地共产党组织恢复了琼崖总工会，成立了琼崖船艇工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琼崖分会、汽车工会、铜铁机器工人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并创办了《琼崖民国日报》（不久移交当地中共党员接办）。

廖乾五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二师开展的重要活动，一般是通过向张发奎提出建议而实施的。他多次向张发奎提出废除对士

兵的体罚等建议。4月22日,十二师党部召开会议终于通过了由张发奎提出的“长官对士兵禁用体罚”、“部队财务公开”等议案。这对于改造旧军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4月24日,十二师党部会议,一致推举廖乾五为《十二师周刊》社社长。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二师又取得了一块宣传三大政策的重要阵地。

南征战斗中,由于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南征主力军十二师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和友军一起,经过短短两个月战斗,邓本殷军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邓乘小船逃往国外。至此,广东南部全部获得解放,全省统一,南征取得完全胜利。5月26日,在琼崖人民的热情欢送下,张发奎、廖乾五率部队离开海南岛,凯旋广州,准备踏上北伐的征途。

“铁军”政治部主任

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在两天的会议期间,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如何解放农民问题。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发言最多。当一位同志与建议在北伐过程中先做些调查,然后再制定工作计划时,廖乾五急不可待地反驳说:“我们如果单是做调查工作,什么时候才可能解放农民呀?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现有材料、针对现在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工作呢?其实,今天的农村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不需要再进行调查,就可以定出计划去做!”表现了他对农民翻身解放的迫切心情。

1926年5月,战斗力最强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出兵入湘。6月初,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6团之众,在湘南站稳了脚跟。6月中旬,陈铭枢和张发奎、廖乾五分别率第十、十二师从

广州出发，于7月初抵达攸县，与叶挺独立团会合。因十二师的三十四团留守海南岛，将独立团拨归十二师指挥。7月10日，独立团在十、十二师的配合下攻占湘东重镇醴陵。次日第八军占领长沙。7月12日，醴陵各界群众隆重举行欢迎第四军大会，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叶挺等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各界团体推举廖乾五任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地方政治建设，廖乾五一向很重视。南征时，他就在第十二师政治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通电》中指出：“军阀已入崩溃之时期，即为人民进而夺取政权之绝好机会”，他期望“产生人民之政府”。抵琼后，由于战事倥偬，他主持的地方人士会议，误推举一个“鱼肉乡民”的绅士为县长，对此，他懊悔万分。这次，湖南人民推举他为县行政委员长，他欣然就任，直到新县长到任后方才卸职。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湘潭、醴陵、衡山等县“推翻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的新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北伐军占领醴陵、长沙后，吴佩孚将主力集中于汨罗江一线，阻止北伐军北进。8月17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召开军事会议，决定19日拂晓攻取平江。平江位于汨罗江北岸，四周高山耸立，有所谓“平江失，则岳阳不保，武汉亦危”之说。敌军有6个团的兵力扼守。十二师出发前，廖乾五在师团军官会议上作战前动员，指出：“敌人镇守平江城的是军阀吴佩孚的得力悍将、平通防御司令陆汭。敌军在该城四周构筑了坚固工事，号称平江固若金汤，是攻不破的城池。我们要发扬叶挺独立团攻下攸县、醴陵的英勇作战精神，猛攻猛打猛冲，善攻善打善冲，灵活机动，攻下平江，为北伐战争统一祖国立战功。即使受伤残废了，牺牲了，垂光祖国，也是光荣的。”简短的几句话，给到会官兵以极大的鼓舞。19

日拂晓,在第十师策应下,张发奎、廖乾五指挥所部,以三十五团担任佯攻,以独立团和三十六团担任正面进攻,不到10小时,攻占了平江城。守城主将陆运自如不能逃脱,举枪自戕毙命。是役,俘敌1000余名,缴获大炮11门、各种枪支1000余支。廖乾五和苏联军事顾问波罗先后赶到平江城,向部分俘虏训话,讲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目的,讲明北伐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百余名士兵中,竟有数十名自愿报名参加了革命军”,其余一律遣散返乡。平江城的攻克和汨罗江防线的突破,为北伐军攻取岳阳扫清了道路。当天,廖乾五致电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麦朝枢,报告了平江战况,对当地“人民组织长矛队,加入作战,更实现军民合作之旨”充分肯定。这次入湘作战,他看到了蓬勃高涨的湖南农民运动,深感武装农工的重要性。9月间,他主持的师政治部,提出“扩大农工武装及训练”等6项提案,提交后方总政治部审议。

在北伐战争时,军队的政治部主任是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力的。但是,廖乾五由于过去久居楚地,留心当地地理环境,善于谋略,为了“以达到农民和工人之利益”,他主动参与筹划和指挥了第四军在两湖的重要战斗。第四、八军的汨罗江会战大捷,把北伐战场推进到湖北境内。这时,吴佩孚亲率主力南下,以各路退兵万余人固守汀泗、咸宁一带阵地,并由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率4个团驰援汀泗桥,另以刘玉春第八师进至贺胜桥一带构筑坚固阵地。8月23日,陈可钰在通城召开军事会议,与会军官一致主张迅速切断粤汉路,消灭由岳阳方向退逃之敌,并乘吴佩孚大军未到之前攻占汀泗桥。廖乾五提出先占领中伙铺车站,陈可钰赞成这个意见。接着连问几次哪个部队去担当此任?各团团长顾虑到孤军深入且有一场恶战,都默不作声。陈可钰望着廖乾五问:“哪个部队去好?”廖乾五说:“还是要独立团去吧!”叶挺立即回答:“好!”叶挺

独立团不负众望，一天一夜急行军一百五六十里，于25日天亮时赶到中伙铺车站，歼灭了从平江北退的敌李金门团400余人。奇袭中伙铺车站的成功，将吴佩孚军拦腰截为两段，既控制了粤汉铁路，断绝了岳阳敌人的退路，又为北伐军攻取汀泗桥取得了前进阵地。

25日晚，陈可钰下达了次日凌晨进攻汀泗桥的命令。26日，第四军十二师以三十五团为前锋，独立团为预备队，从中伙铺出发，沿铁路北进，向汀泗桥作正面进攻。部队出发前，廖乾五对所部进行战前动员，指出，汀泗桥自古以来号称天险，粤汉铁路直线贯穿桥上，南北西三面是河流，东面群山重叠，历来被称为易守难攻的关隘。我军无重炮，吴佩孚妄图坚守这个军事要隘，等待孙传芳后援。为此，我们参战的各团既要机智，又要勇敢，务必攻下这个天险。26日上午10时许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冒着弹雨奋力冲杀，敌军集中所有大炮，掩护1000余名精锐步兵疯狂反扑，一直打到四军军部和十二师师部附近。军部急调担任预备队的独立团投入战斗，将敌击退。第四军各部与敌苦战一天，进展困难，战况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当晚，陈可钰、张发奎、廖乾五正在筹划战事时，三十六团团团长黄琪翔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之高山阵地，以挽危局；叶挺通过访问农民后，提出绕道汀泗桥东北之古塘角攻敌后背之策。陈可钰、张发奎、廖乾五当即批准了两人的建议。夜12时，三十六团在二十九团的协同下，突破敌军中央阵地一部。27日晨，四军发起全线攻击。三十五团乘机强攻突破汀泗桥。这时，叶挺独立团在农民带领下，绕道古塘角，从敌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在独立团友军腹背夹攻下，敌军全线崩溃，汀泗桥终于被北伐军占领。独立团乘胜占领咸宁城。是役，第四军毙敌1000余人，俘敌官兵2400余人。

8月29日,根据北伐军前敌指挥部制定的进攻贺胜桥作战计划,第四军以十二师和独立团为主攻部队,第十师为预备队,是日傍晚从咸宁出发,进攻贺胜桥。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集中其主力第八师、第二十五师以及从汀泗桥、咸宁溃退下来的残部总计兵力2万余人固守贺胜桥。张发奎、廖乾五率十二师和独立团,在第十师和第七军协同下,连续突破吴军两道防线。吴佩孚恼恨至极,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悬首级于贺胜桥上。然而,败势已定,无可挽救,敌军如潮水般溃退,数以千计的士兵被挤入水中。吴佩孚见危局无法收拾,抢先爬上火车,逃回武汉。30日上午10时许,贺胜桥遂由十二师三十五团和独立团控制。是役,第四军俘敌官兵2000余名,夺获大炮20门。

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的胜利为北伐军扫清了通往武汉的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两湖的工农运动。从而使第四军在民众中赢得了“铁军”的称誉。

8月31日下午,第十师进抵武昌东南郊洪山。此时,武昌城内敌军正处于攻守无备、乱作一团之际,北伐军本可一鼓作气攻下武昌,但由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为了同蒋介石争夺武汉地盘,不愿让第四军首先占有武昌,命令第四军休整几日。这样,贻误了战机。9月3日凌晨,北伐军第一次攻城,战至天亮未克。是役,第十二师为攻城总预备队,没有伤亡。当晚,蒋介石到达武昌余家湾车站,未及细致分析敌情,便主观武断地下令:“武昌限于48小时内攻下!”参加第二次攻城的部队有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七军。每师选出三四百名官兵,组成若干奋勇队(敢死队)。第四军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担任主攻通湘门至宾阳门一线,当张发奎、廖乾五挑选敢死队时,“各团长和营长说,每一个革命军人都是敢死队,因为我们是为主义而战,所以用不着挑选”。于是各团

的奋勇队由各团长指定。9月5日凌晨,第二次武昌攻城开始,“四军第十二师的部队曾5次登上城头,但都被敌人的火力击退,由于敌军防范严密,北伐军的攻坚重武器不足,冒险强攻,遭致整排整连的牺牲。叶挺独立团官兵伤亡130余人。对于是役,苏联军事顾问后来回忆道:“第一军第二师损失了200人,第四军损失500人,第七军损失约100人。从各个攻城部队所受损失的情况,可以看出各部队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所作出的贡献。”中午,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加伦的建议,暂时停止攻城。下午,蒋介石等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武昌采取封锁包围之策,由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进行围困,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武昌攻城司令。次日,第八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

9月中旬,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由廖乾五代理。由于四军伤亡过大,减员很多,廖乾五命令十二师政治部驻汉口办事处在两湖地区招考“彻底从事革命”的军事人才。中共湖南党组织积极支持。长沙《大公报》登出十二师招募军事人才的简章。中共湖北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道:“将来的第四军在国民革命中要算很有力量的军队”。

武昌城下,攻城司令部决定挖掘地下坑道,实行爆破攻城,并从广州调来一列铁甲车,由独立团“挑选能手”,掩护安源矿工在通湘门一带作业。工程进展很迅速。敌守城司令刘玉春得知孙传芳的马登瀛旅已至大冶策应武昌的守军突围的消息后,于10月1日凌晨5时许,在炮火的掩护下,亲自指挥2000精兵突围。其中千余敌兵在通湘门一带冲出,“竟将铁甲车夺去”。叶挺、廖乾五亲临火线,指挥独立团“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战至上午10时许,遂将出城之敌人,歼灭殆尽,其得退入城者,仅少许残卒,并将铁甲车夺回。”另一路的千余敌兵,在三十五、三十六团阵地前也遭到同样命

运。此次阻击战，给守城之敌以沉重打击。这次战斗，独立团与敌兵白刃搏斗中伤亡达 200 余人，事后廖乾五在致广州第四军军部的信中，高度赞扬了独立团“如山屹立，毫不动摇”的革命气概，并写道：“叶团长及余（我）均在火线上指挥作战，幸未受伤。”

攻克武昌前夕，廖乾五以全部精力投入攻城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8日夜，廖乾五派军政治部宣传队员数人爬墙进入城内，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敌军献城投降并宣传安抚城中群众。9日夜，陈可钰、廖乾五分别发出《攻城司令部通告》、《第四军政治部通告》。10月10日凌晨2时许，陈可钰、廖乾五督率第四军，会同第八军猛攻武昌城。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第十师由保安门入城，十二师由通湘门入城，敌酋刘玉春为十二师三十五团捕获。至上午8时，武昌城为第四、八军克复。廖乾五一面令政治部工作人员领导原武昌警察维持秩序、救济灾民；一面向广州国民政府等发电报捷“武昌之围，已经阅月。本日上午2时，攻城司令陈副军长督率四、八两军奋勇攻城。刘逆玉春尚做最后抵抗，经激战至上午8时，武昌城被我军完全克复，所有逆军概就俘获。刘逆玉春，为我十二师生擒，城中人民欢声雷动。现正筹划善后，拯救灾民。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代主任廖乾五叩灰未”。

第四军，尤其是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是和中国共产党在四军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廖乾五在四军出色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以第四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四军共有官兵6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共产党员有2500至3000多名。尽管当时国共两党不允许公开在军中建立中共党组织，但廖乾五很注意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四军各师团主要政治干部，一般由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担任。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原先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李笠

农,10月中旬廖乾五正式任军政治部主任(少将级)后,调整为共产党员徐名鸿担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由廖乾五兼任。所属3个团,即三十四团(克复武昌后归还建制)、三十五团、三十六团的政治指导员,分别由共产党员伍锋、胡允恭、魏鉴贤担任。由第十二师指挥的叶挺独立团、三十五团均建有秘密的中共党组织。时任三十六团团长的、后任十二师师长、四军军长的黄琪翔曾回忆,在第四军担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队中是深入人心的,他们平时做训练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战时则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受到了官兵们爱戴。”“第四军的成绩和他们的成绩分不开”。1926年9月2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十二师自出师北伐以来,师政治部“对官兵完全纪律化、革命化,只知为主义牺牲,为民众利益牺牲,不仅不怕死,且不知死。”

国共两党和苏联军事顾问,对廖乾五在四军的政治工作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得知武昌克复后,他赞扬说:“这许多政治部,以第四军政治部成绩最好。”当时第四军的苏联顾问戈列夫在报告中写道:“作战方面最可靠的那些军恰恰是政治工作特别强的那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十二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陕西人,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很善于在第十二师中组织政治工作,以致在该师的政治工作人员被当作军队大家庭的成员。第十二师政治部无论在本师对战士的教育方面,或在居民中间成立各种社会组织方面,都真正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第十二师里,战士们不是表面上而是实际上懂得了为什么作战。第十二师所到之处,群众都组织了起来。第十二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前线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愧为国民革命军的政工人员”。

参与筹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包惠僧,在一次谈话中问

张发奎：“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作用如何？廖乾五主任的工作情况怎样？”张发奎说：“很奇怪！一个老头子，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的生活和动作一切都不老了。廖主任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在复电廖乾五时深有感慨地说：“此兄等政治工作之明效，无怪敌称我军以宣传而战胜也。”

廖乾五很佩服和尊重张发奎等国民党左派将领，与之相处甚笃，但在原则问题上则不让步。武昌之役，叶挺独立团牺牲了191名官兵。在烈士遗体收殓停当，准备在洪山安葬立碑时，副军长陈可钰和师长张发奎不同意在碑文上刻“为无产阶级牺牲者”等词句。中共独立团支部将此事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上级党组织支持照原文镌刻。于是党支部决定，由廖乾五、叶挺2人出面和陈、张交涉。他俩先找到陈可钰，廖乾五说：“独立团全体官兵都要求在烈士墓碑上写无产阶级牺牲者这句话，这是既安慰了烈士又教育了群众的一句很好的话，政治部已经同意了，军部也应该同意。”陈可钰不悦地说：“这句话太红了！”叶挺立即反驳道：“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要红才能打胜仗，现在不是得到证明了吗？！”在廖乾五、叶挺据理力争之下，陈可钰不得不同意了。接着两人又去找张发奎，一连谈了几次，出于廖、叶在四军中的威望以及独立团的显赫战功，张发奎只好点头认可。建国后，周恩来两次对周士第说，要保护好叶挺独立团烈士墓，以便对青少年加强

思想教育,以便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①至今,刻有“为无产阶级牺牲者”的墓碑仍庄严地屹在武昌洪山。

10月20日,第四军仅休整了一个多星期,即由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四军主力4个团从武昌出发入赣作战。廖乾五没有随军同行,他奉命与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等于31日赴鄂东第八军督战。11月2日上午,第四军主力与敌主力激战于德安以北之马回岭,友军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却隔岸观火,见危不救。“铁军”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血战一昼夜,终于转败为胜,并攻入敌上官云相的旅司令部,占领了马回岭车站。这时,廖乾五赶到十二师司令部,迅速了解前线的战况后,即与张发奎等商议,决定“拟乘胜攻取九江”,并上书左翼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李将此任交独立第二师贺耀祖。5日,独二师轻取九江。此前,敌主力卢香亭部反攻德安九仙岭之第七军部队,李宗仁下令四军驰援将敌正面冲破,敌全线摇动大崩溃”。后追残敌至距建昌约10里之处。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两湖、江西城乡工农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的新事物。但是,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正确认识,始终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立场,并连续发出许多指示,严厉地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的正确做法。192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限令九江、永修等县任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权工作”。^②11月6日,张发奎、廖乾五率四军主力抵达九江。经中共九江地委决定,由共

^① 周士第:《叶挺同志革命斗争片断》(何锦洲记录整理)。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62页。

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九江特别党部推荐，廖乾五以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任命帅古隆（共产党员）为九江县县长。他和九江地委的做法，无疑是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是廖乾五梦寐以求的愿望。他在比较北伐战争和辛亥革命时曾说：“辛亥革命似为一种无组织的暴动，幸而成功，故不彻底。”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第四军政治部发起召开九江4万军民联欢大会。大会由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执行委员曾延生主持。据11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军界领袖”“廖乾五高诵总理遗嘱，声达40余米，听者感动”。廖乾五、黄琪翔等的演说，“皆说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廖主任、黄团长为最动听，鼓掌之声雷动，一时革命空气，布发全场。”

廖乾五在主持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期间，对四军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和党部进行了3次整顿。通过不断整顿，较大程度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官兵们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信心。

在此期间，廖乾五还积极组织和支持四军官兵参加军民联欢会、反帝示威游行、追悼阵亡烈士等活动。1926年8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1927年1月，又在汉口制造“一三惨案”。1月5日在共产党员李立三的命令下，武汉各界30万人民在汉口举行反英示威游行。经第四军军部和廖乾五批准，派出部分官兵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在廖乾五主持下，四军先后以军政治部和全体官兵的名义发出通电，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制造一系列流血惨案，声援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爱国行动。1月15日，廖乾五主持召开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大会。武汉各界人民为了感谢和表彰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卓著功勋，特地赶制了一面刻有“铁

军”两个红字的铁质盾牌，背面写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遐迩。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如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市民排着队伍，敲锣打鼓送往会场。陈可钰、廖乾五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接受了这件有特殊意义的赠礼。从此，“铁军”的威名传遍了天南海北。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激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那时，张发奎表现得很革命，也主张“东征讨蒋”。4月15日，廖乾五、张发奎等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一致决议“本军全体同志，誓为前锋”，讨伐叛党军人蒋介石。同时，第四军军部特别党部、政治部分别发出《通电》、《宣言》，历数蒋介石从策动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一年多之罪恶，要求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即将蒋介石停职查办，并永远开除党籍”，并呼吁全国民众“一致声讨帝国主义最新式最得力之工具蒋介石，以挽救革命危机”。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蒋介石叛变后，据有江南大部分地区，但他拥有的主力部队不多，战斗力不强，难以对武汉政府发动进攻。此时，奉系部队的主力占领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解除奉军对武汉的威胁和接应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出河南，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为二次北伐的主力，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及贺

龙独立第十五师任右翼。出发前，邓演达特意指定廖乾五负责指导十一军政治部和独立十五师政治部在前方的工作。

4月24日，廖乾五率四军政治部乘火车北上，抵达豫南重镇驻马店后，协助地方成立工、商、学群众组织。还成立了图画宣传委员会，绘制和书写大批宣传画、标语、壁报，四处张贴，老百姓争相围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廖乾五还把政治部宣传队分为7个小队，深入农村，向农民和红枪会成员进行宣传和讲演。由于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和军纪严整，四军官兵宿营时坚持露宿空场，不占民房，遇到下雨群众腾房来请也谢而不进；民众设“茶水站说明不要钱，士兵喝水后仍投一枚铜元方去”。老百姓高兴地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招待革命军如新女婿”。

5月中旬至下旬，北伐主力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颖一带，以伤亡1.4万余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

5月14日下午，四军在十一军协同下，在上蔡县东、西洪桥与奉军的王牌部队——镇威十一军展开激战。敌军顽固抵抗，不断增援、反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廖乾五率领政工人员连续3昼夜在战壕里进行宣传鼓动，运送弹药给养，抢救伤员。红枪会和农民也踊跃参战支前，大鼓官兵士气。战至17日上午10时，困守上蔡城之敌十一军副军长富双英率部投降，残敌不支，向逍遥镇溃退。上蔡战役，毙伤敌军3000余人，四军共计伤亡官兵2700余人。“其牺牲之巨，为素来所未见”，而且“此次政治工作人员，随同部队作战，均能身先士卒，陷阵冲锋，故死伤亦甚多”。上蔡战役结束后，黄琪翔（时任四军副军长）、廖乾五亲临前线，督率十二师和独立十五师乘胜北上。5月24日，独立十五师在十二师的配合下，首先攻占逍遥镇。5月27日，北伐军主力向临颖开进。奉军集中六七万人的兵力在此与北伐军决战。黄琪翔、廖乾五率十二师在

临颖城东进攻，部队伤亡达 8000 人以上。5 月 28 日，十一军十师发起猛攻，敌全线崩溃。是役，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第十一军伤亡过半，歼灭了奉军在豫主力，为攻占郑州、开封铺平了道路。

在二次北伐中，廖乾五领导和指导第四军、十一军和独立十五师的前方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5 月 18 日，第四军、十一军召开将领会议，一致赞扬铁军士兵们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下，仍奋勇冲锋；伤兵精神极好，轻伤者不愿进医院仍赴前线战斗；由于士兵过于奋勇，致有时追敌过远而受损失；政治工作人员与军事指挥员同上火线，当军事指挥员伤亡后，政治指导员主动指挥作战。铁军将领会议一致认为，“此次战事，尤足证明政治工作之效力甚大”。张发奎因事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工作非常满意。他把政治部的工作比喻为“垦荒田”，说：“本来是不能生产的荒地，经过不辞辛劳的努力以后，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获。”5 月 25 日，邓演达亲临逍遥镇，对四军的政治工作备加赞赏，并说：“像这样的不辞劳瘁的努力，虽苏联红军政治工作亦不多让。”在这次北伐中，廖乾五还结识了北伐名将、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1932 年冬，贺龙曾率红三军取道陕南，经廖乾五的家乡平利县入鄂川。建国后，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战史时说：“这条路线我是在大革命时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五）说的，他是陕南人。”

武汉北伐军同冯玉祥部在郑州会合后，根据郑州会议决定，武汉政府所辖各军奉命回鄂。廖乾五怀着“直捣幽燕，痛饮黄龙”的壮志未酬的遗憾的心情，于 6 月 17 日返抵武汉。

这时，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7 月 2 日，张发奎发起召开第四军一纵队北伐阵亡追悼大会。大会所用的宣传大纲，事先由第

四军政治部起草并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当晚，汪精卫在张发奎公馆以宣传大纲只提拥护三大政策未提拥护三民主义为借口，对四军政治部横加指责，并攻击共产党。廖乾五当场予以驳斥说：“这宣传大纲虽然没有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但全篇精神是拥护三民主义的！”

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准备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争取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旬，周恩来在武昌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部署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到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返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廖乾五年纪较大，身体不好，准备留下另行安排工作，廖乾五一再表示“坚决要去”，周恩来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

7月22日晚，廖乾五与恽代英先后登上四军军部从武汉开往九江的小轮船。两个亲密战友在此重逢，心情异常悲愤。廖乾五一面抽烟一面愤恨地骂：“他妈的！我们辛苦经营的武汉现在完了，真叫人痛心！”午夜时分，小轮船启航，他们踏上了新的征途。

参加南昌起义

7月23日下午，廖乾五和恽代英到达九江后，受到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欢迎。廖乾五和恽代英住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第四军军部。在此前后，高语罕、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彭湃等共产党员也先后到达九江。

7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与此同时，

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在军队中的“清共”活动。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名义通知叶挺、贺龙立即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叶、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叶、贺部队，迫使缴械整编。然而，他们没有料到，这个阴谋被他们身边工作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察觉了。叶剑英是7月上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当时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极其保密，但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秘书长高语罕、廖乾五等也有交往。军令急如火，叶剑英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告诉了他。两人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五和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7月24日，在甘棠湖上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将他在山上听到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大家。“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沉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解的内情合盘端出。叶挺听后问贺军长上不上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廖乾五、高语罕支持叶、贺的意见。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甘棠湖上的这次秘密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挫败了汪

精卫的阴谋，为发动南昌起义作了很重要的工作。”^①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到达南昌，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同时，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到达九江，召集负责同志会议，提出要重新“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企图拖延南昌起义，遭到恽代英、廖乾五等一致反对。贺龙、高语罕、廖乾五斩钉截铁地说：“再无讨论之余地！”给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有力回击。正如萧克将军所说：“廖乾五是南昌起义诸多的筹划者之一。”

7月29日，汪精卫、孙科等到九江，廖乾五“又当着第四军高级将领的面大批汪精卫”。在中国革命史上，廖乾五是面对面公开痛斥国民党右派领袖汪精卫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汪精卫等在庐山召开“清共”会议时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朱其华4人。次日，参加这次会议的叶剑英自庐山返九江，“带了一封信给廖乾五”，将庐山“清共”会议的内容告知廖乾五、高语罕，并说：“老张（发奎）靠不住了”，“他们已决定解决叶、贺。”党组织听取廖、高从叶剑英处得到的重要情报后，决定他俩即赴南昌。当晚廖、高回到四军军部，将党组织的决定告诉叶剑英。叶剑英诚恳地说：“你们走了也好，因为庐山会议对你俩已经有了问题。”廖乾五将军政治部工作移交军部秘书阳翰笙（中共党员）后，命勤务兵携带军政治部配发的26枝驳壳枪，连夜转移到火车站对面的大东旅社。7月31日晨，他与几名随员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中途，他在黄老门车站下车，向驻扎在这里的四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团长周士第通报了敌情，要他提高警惕，随时准备

^① 胡耀邦：《在叶剑英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行动(该团于8月1日下午根据中共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

廖乾五等到达南昌已是午夜,他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往设在百花洲心远中学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指挥部,协助师长叶挺指挥部队行动。8月1日凌晨2时许,起义的时刻到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廖乾五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对一个原四军政治部的下属说:“嘿!巴黎公社式的政府组织起来了,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廖乾五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①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离开南昌,准备由赣南经寻乌直趋农运基础较好的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廖乾五即派原四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叶古衣先行回汕头,发动工农,策应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途中,正值三伏炎夏,酷热难当,加之医药匮乏,中暑死亡及掉队逃走者日渐增多,但廖乾五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履行职守,一路上讲故事、说笑话,勉励青年同志,领导宣传队张贴宣传品,书写“打倒新旧军阀”等标语、口号。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谭平山、方维夏等8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每天跟随部队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徒步行军。精神焕发,坚持不懈,被同志们誉为“八仙”。

8月25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与敌钱大钧部遭遇,激战一夜,击溃敌两个团。30日会昌之战,又歼钱大钧部4个团,起义军重返瑞金。但自己也有较大伤亡。9月初,廖乾五和周逸群在瑞金锦江边一所小学校里介绍二十军军长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贺龙入党后编入中央特别小

^① 《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587、589页。

组,成员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五、刘伯承、周逸群等。此间,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任命廖乾五兼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二十军辖3个师,方维夏、陈恭、徐特立分别任第一、二、三师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是留任的旧军官,廖乾五特意叮嘱陈恭:“党把带好这个师的重担交给你了!”陈恭坚定地表示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在瑞金的短暂休整期间,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闽西敌军力量较为薄弱,又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等情况,决定改道由闽入粤。9月2日,贺龙和廖乾五率二十军为前锋,由瑞金向汀州进军,再由汀江乘木筏和船只,顺流而下抵上杭。因汀江下游水急滩险,致使一些船倾筏翻,牺牲了一些同志,贺龙和廖乾五异常痛心。

9月18日,起义军进抵广东大埔,继而在汕头工农群众配合下,攻占了潮州、汕头地区。此时,敌军1.5万余众集结于丰顺县之汤坑,对起义军进行阻击。贺龙、廖乾五、叶挺等率部与敌展开激战。由于地形不利,敌情不明,加之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从9月27日鏖战到29日,5000余名起义军伤亡过半。不久,汕头、潮州均入敌手,起义军渡过榕江,陆续到达普宁县流沙镇。

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10月3日下午2时左右,周恩来抱病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负责干部联席会议,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彭湃、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五、贺昌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宣布今后要打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起义部队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分赴香港或上海。还宣布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五等立即离开部队,由香港绕道上海,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午后,会议刚开完,起义军就在乌石地区遭敌伏击,指挥机关和部队被打散。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五等

带二三百名战士冲出重围后，到达神泉港附近一个村庄。10月7日，彭湃找到关系，让贺龙、廖乾五等换上借来的便服，租了一条大渔船，在海上漂流了三四天到达香港。进港前，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五、吴玉章等分为5路，廖乾五带徐以新及卫士为一路，廖乾五化妆成从南洋归国的商人，徐以新扮作他的“儿子”，卫士扮作“佣人”。他们换乘小船，陆续上岸。

廖乾五带徐以新及卫士抵达香港后，住在皇后大道的南京饭店，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头。10月中旬，廖乾五等安全抵达上海，与贺龙、周逸群一起住在新大沽路，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慷慨就义

1927年10月下旬，廖乾五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小组组长，任务是接待和组织全国各地到中央报到、等待分配工作的党员学习文件，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随后，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事部（一度改为中央组织部军事科）工作。由于他在北伐战争中名声大，认识他的人很多，不宜外出活动，因此他主要搞机关内部工作。这一阶段，他抓紧时间读了不少书，回顾总结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经常和一起工作的同志交谈，教导青年同志从事地下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虽然年纪大、资格老、威信高，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说话幽默风趣，而且为人慷慨大方，喜欢帮助别人，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深受同志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很关心廖乾五的工作和生活，曾多次晚上化妆到承德路一条小巷廖的住处去看望他。

1928年春，中共中央派廖乾五到北方工作。他到北平后，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被迫一日数迁，无法开展活动。在高文

灏(又名高幼湘,是廖在武汉时教过的学生,时在北京大学上学)资助下,他化妆秘密离开北平,到密云县暂时隐蔽。当时密云县城驻扎着军阀的部队,找不到党的关系,难以活动和立足,他只得仍回上海,到中央军委工作。

1929年,中共中央又派廖乾五到中共湖南省委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廖乾五在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任职,^①负责对敌军的兵运工作。不久,即不幸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逮捕,作为“要犯”羁押入狱。

廖乾五投身革命多年,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忧国而忘家,早已把个人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因而被捕后,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横眉冷对,沉静坦然,绝口不谈党和军队的任何机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惧于廖乾五在军界和民众中崇高的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审讯,遂下令将他于1930年9月3日在长沙市郊秘密杀害。廖乾五牺牲时,44岁。他没有子女,没有留下遗物,也没有留下遗言。他自1921年起就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1927年春,他在筹备铁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启事中写道:“革命的流血本来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因为没有流血的牺牲便换不到革命胜利的代价,我们后死者对于这个看得十分明白。”他的这段赤诚而豪迈的肺腑之言可算作烈士的不朽遗言。

(张守宪 陈平 宋登)

^① 有数位老同志回忆廖乾五牺牲前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鉴于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史资料尚未确认,本传暂取“任职”而不写具体职务。

雷 晋 笙

(1898—1931)

雷晋笙,又名凤仪(凤翼)。陕西西安市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办《新时代》周刊。1924年回陕西从事建党建团工作。1925年任陕西省工会筹委会书记,中共西安特支委员。1926年创办陕西《国民日报》,任社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后曾被捕入狱。1929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省委工作。1930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在济南就义。

雷晋笙,1898年9月17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三桥镇(现归西安市未央区)一个贫苦农家。他周岁那年,父亲积劳病故,靠母亲纺织、做针线维持家计,上学之年,因交不起学费,被拒于校门之外。后来,伯父和堂兄凤岐、凤翥给人扛长工、打短工、做小买卖,才凑足学费,使11岁的晋笙得以进入本镇的私塾。他读书用功,颇得师友称赞。雷晋笙少年时期,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深重,清朝统治腐败不堪,民生凋蔽。辛亥革命那年,他剃掉辫子,表示坚决拥护共和。1913年,雷晋笙考入长安西关高等小

学,离家20里,三天步行回家一次,背干粮去读书。他深知穷人读书不易,更加刻苦勤学,学业十分优异。1915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自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陕西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半工半读,习蚕桑专业。

二

1919年初,雷晋笙考取陕西省教育厅公费生,入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法政科。这所学校宗教气氛十分浓厚,教室里悬挂着耶稣十字架之类的“圣物”,执教的多是手捧《圣经》的神父。他对此极为不满,不肯作礼拜,不肯读圣经,对《罗马法典》、《大清律例》之类的课程,也一概不感兴趣,更讨厌教会对学生思想的束缚。他喜爱法语,在掌握了这门外语以后,得以阅读了大量的法文书籍,读的最多的是莫泊桑、左拉及大仲马、小仲马等的作品。这些19世纪的法国文学,揭露普鲁士的残暴野蛮,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及道德的堕落,描绘矿工在惨重剥削下的极端贫困以及奋起罢工、暴动的情景,使置身教会学校而具有叛逆性格的雷晋笙为之称赏。他联系自己亲身感受,激发了反封建和反帝的思想。他还阅读了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等的著作,因而,积极地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写标语,参加文艺演出,编印小报刊,参加集会等,寻求革命的道路。

1919年夏秋之交,雷晋笙在陕西旅沪学生会与同乡严信民结成好友。两人经常往来,课余饭后常在吕班路树荫下散步谈心,交换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心得,讨论《新青年》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春,他们共同负责编辑陕西旅沪学生会的刊物《秦铎》。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主要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它不仅在上海发行,还寄回陕西,把爱国、民主思想带给当时还相当闭塞的故乡。

1920年夏,雷晋笙和严信民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到留法学生会联系未成,却结识了湖南旅沪学生李启汉。经李介绍,又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陈独秀创办的外国语学校,结识了在这里教俄语的杨明斋和教法语的李汉俊,从而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更多地阅读了进步书刊,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入门》等。由于李启汉的引导,他们还一起到附近的纱厂去组织工会、工人游艺会,又在闸北麦根路东带角锦绣里6号办了一所劳工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在工余时间学习,向工人宣传俄国革命和工人斗争的情况。他们曾举办报告会,邀请陈独秀、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去演讲。在此期间,他们还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组织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先进人物的指导和熏陶之下,雷晋笙逐步识别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到中国要解放,要富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秋后,经李启汉和严信民介绍,雷晋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积极参加团组织的活动,经常深入到工厂进行宣传鼓动。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放弃了《秦铎》的编辑工作,和严信民创办了《新时代》旬刊,主张用劳工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新时代》共出版10期,因经费困难,停刊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雷晋笙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宣传活动。学校当局发现他的进步活动,于次年冬,串通陕西省教育厅,停止了他的公费待遇,使他在经济上陷于困境。雷晋笙为继续学业、给党做工作,靠自己创作和翻译所得稿费来维持生活。创作了《商埠》等小说,翻译了法国莫泊桑等人的《可可特小姐》、《书信》、

《传令兵》、《圣诞前夜》、《漂亮朋友》等数十篇作品，得到郑振铎和沈雁冰的重视，有的在《小说月报》发表，有的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上发表。1979年，沈雁冰在回忆50多年前的往事时，对雷晋笙的印象仍然很深，他说：“晋笙是个有为青年，给党做了不少工作。他仍然喜爱莫泊桑的自然主义作品，翻译了不少，译笔流畅。1921年到1924年之间，我和他不在一个党小组，我住闸北，他住法租界，但我们常有交往。他和我的弟弟沈泽民来往甚密。”1923年7月，雷晋笙和林伯渠等被党的上海地方委员会编为第三组。他们按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发动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进步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并通过办劳工学校等方式开展工人运动。雷晋笙既要做党的工作，又要维持学业，生活更加清苦。他冬天穿件从旧货摊上买的长袍，夏天穿件短衫，吃饭是到学校大门外吕班路边的小饭摊上买，经常是“阳春面”或菜汤泡饭，有时连饭钱也付不起，只好赊欠，但总要省下点钱来买书报。由于生活条件很差，加上工作学习劳累，他感染了肺病，眼睛高度近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雷晋笙经常惦念家乡的情况。1923年5月8日，他在致学友李应良的信中曾这样写到：“我今天高兴极了。高兴什么呢？高兴在我们的陕西竟然有一种学生自己办的周报出现了，这是怎样的可喜呀？陕西的黑暗，在现在的中国，可算是有一无二了……但是空谈也是无益，不得不想补救的法子。提起补救的法子，可是再没有报纸的力量大了……现在你们办一种周报，叫我怎么不喜欢呢？因此，对于提倡新文化，讨论学生应兴与应革之弊的周报，是要紧中之要紧，老实是应该先办的”。他在信中还答应为这个刊物写稿。每年暑假，他回陕西省亲，总要趁访贫问苦，宣传缠足和买卖

婚姻的害处。他常说：劳苦大众要打碎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只有自己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三

1924年末，雷晋笙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西安，宣传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党团组织。他担任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教育月刊》的编辑，推动这个月刊的主编王授金，把刊物变成宣传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阵地，通过它团结知识分子。为了接近群众，他在敬业中学、省立一中、三中等校兼课，讲授国文、中国新文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课题。他讲课内容新颖，深入浅出，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学生喜欢和他接近。他组织学生读书会，推荐进步文学作品，并向学生讲解十月革命情况，介绍《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鼓舞大家同封建军阀、豪绅作斗争。

暑假期间，雷晋笙组织武止戈发展的张秉仁、康少韩、杨超雄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吸收进步青年米哲沉、金鸿图等十多人参加，在西安梁家牌楼康少韩的家里，举办了讲习会，他讲解了《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在讲习会前，还发展了一批新团员。7月间，武止戈离陕去苏联学习，由雷晋笙联络吕佑乾、崔孟博等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西北青年社，出版了《西北青年周刊》。12月间，又在康少韩家里成立了西北晨钟社，出版了《西北晨钟》旬刊。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张秉仁、米哲沉、金鸿图、王观政等三四十人。这些刊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宣传了新思想。雷晋笙在为《西北晨钟》创刊号起草的《宣言》中指出：“贫而且弱的中国，到如今这种样子，真叫人伤心惨目，哭不成声。那末，寻求贫弱的原因，筹划解救的方法，想是我国

人当务之急。”公开提出“提倡移风易俗”，“推翻腐败政治”的主张。

年底，雷晋笙、王授金等筹建了西安教师联合会，与魏野畴领导的西安学生会相配合，组织读书会、学术研究会，开展教育改革等活动。

1925年初，雷晋笙等按照党的指示，组织群众积极响应声援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联络西安各界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通过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促成会的电文，指出：“民国成立后战乱频繁，人民颠连困苦，是列强扶植和挑唆政客而从中渔利的结果”。公开号召“打倒帝国主义，根本铲除军阀政权，拥护国民会议”。陕西督军兼省长军阀刘镇华，极端仇视民族、民主的群众运动，支持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雷晋笙等领导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等进步团体，同刘镇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举办演讲会，散发传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揭露了刘镇华的罪恶阴谋。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到陕西，雷晋笙与吕佑乾、刘含初、王授金等共产党人发起，以国民促成会的名义，于4月15日在莲花池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号召群众团结一致，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刘镇华。陕西的三原、耀县、渭南等县相继响应，把反对军阀的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刘镇华后因慑于群众的威力，借口东征，率兵出了潼关。

接替刘镇华统治陕西的军阀吴新田，压榨盘剥日甚一日，群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5月4日，吴新田的第七师所部，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因踢足球发生冲突，军人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因而引起西安各中、小学职工和学生的公愤，纷纷罢课、请愿，要求严

惩凶手，保障人身安全。雷晋笙等共产党人以陕西省教师联合会为核心，组织教育界人士，站出来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公开提出必须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陕西的走狗吴新田赶出陕西。

在驱吴运动中，雷晋笙组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广泛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了公开斗争，他以西安印刷工会为主干，发起组建了陕西省工会筹备会，被选为书记，通过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与陕西省学生联合会、陕西省教师联合会互相密切配合，发动工人、学生、教师“到农村去”、“到部队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把农民和士兵也团结到驱吴斗争中来。1925年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群众义愤填膺。雷晋笙被省各界团体雪耻会推选为主要领导人。他把雪耻会发展成为以“驱吴”为主要目标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军阀与中国人民，都是势不两立，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除陕西的军阀吴新田”，“严惩枪杀学生的刽子手”；一方面利用《西安晨钟》、《教育月刊》、《新秦日报》，编印《雪耻特刊》、《雪耻》、《沸血》周刊，大力宣传，大造舆论，广泛成立雪耻会的分支组织，使其遍及全省各团体、各县，并且把党、团及学生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分十三路奔赴陕西各地五十多个县，宣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粮运动。同时，他还亲自动员商会和各界人士，募集捐款2800元，汇寄上海，援助上海工人斗争。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使反动军阀吴新田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时，杨虎城的部队站在群众一边，与民众同心协力，终于把吴新田赶出关中。

在陕西国民革命和驱吴运动中，西安共青团的组织有了进一

步发展。但是,当时有两个团支部,一为雷晋笙领导的,一为魏野畴领导的。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1925年9月间,团中央派吴化之以团的陕西特派员、全国学联的陕甘特派员身份,到西安整顿团组织。期间,中共北京区委派安存真也到西安整顿团组织、筹建党组织。雷晋笙积极协助安、吴对团员顺利地进行了重新登记,成立了团的西安特支,并向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作了报告。是年冬,根据豫陕区委的指示,将团的西安特支改为地委,吴化之任书记。

在整顿团组织的同时,安存真、吴化之将符合党员条件的一批团员转为党员,又以党员雷晋笙、魏野畴、刘含初等为骨干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存真为书记,雷晋笙等为委员。这是西安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属党的豫陕区委领导。年底,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陕,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共西安地委,黄平万任书记,雷晋笙被选为领导成员,成为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军阀吴新田被赶出潼关以后,陕西成为国民军的控制地区。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卷土重来,以号称10万的兵力逼临西安城下,企图重新控制这个西北重镇。中共西安地委积极投入了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的斗争。在守城中,雷晋笙按照党的安排,把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筹备会等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宣传。他与王授金等发起,召开了西安五九雪耻大会和西安各界五卅周年纪念会,连续组织学生宣传队,演街头戏,印刷各种宣传材料,并利用多种报纸,出《雪耻》专刊,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支援守城部队,还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组织的《反赤大同盟》进行批判。雷晋笙为《雪耻》专刊第四期所写的文章,深刻揭露了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贩卖祖国

和民族利益的丑恶行径，联系“五卅”惨案，指出：“在这次事件中，认清了我国各阶级的分化，并证明了工人、学生是民族斗争前线的主力军”；“帝国主义到了张皇失措的时候，就用向来惯用的‘过激’、‘赤化’一些名词恐吓中国民众，破坏民众联合阵线，可是开枪杀人是事实，‘过激’、‘赤化’是谣言。民众在这次事变中，认识得很清楚，从此，把帝国主义者阴险伎俩看透了。”雷晋笙的这次宣传，对于打击敌人，鼓舞群众，起了重要作用。

在被包围的西安城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暑假期间，由于与外地交通中断，学生大多不能回家，但各学校照例都要放假。党组织为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决定由雷晋笙负责，以陕西学联和西安青年联合会的名义，开办西安暑期学校。暑期学校的校址，设在城隍庙后街省立一中，先后报名的入学者有西北大学、省一师、女中、一中、三中等学校的学生千余人，也有不少进步教师和其他人员参加。暑期学校分设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艺三系。社会科学系的学生最多，讲的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初步》等。雷晋笙担任行政工作，还亲自授课。他在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唯物史观》时，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常引用实例说明理论，深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连窗外都挤满了听众。他还耐心地解答问题。这所学校虽只办了两个多月，但对宣传革命理论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在学校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西安守城到最后阶段，城内的口粮与燃料愈缺，天天有人饿死，出现了军民争粮的现象；少数地痞、坏分子乘机敲诈勒索，闹得人心惶惶不安；一些豪绅组成“和平期成会”策动投降。面对这种

情况,雷晋笙与黄平万、吴化之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要求守军清除投降分子,主动出击,与援军策应。雷晋笙曾联络各方,在南院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居民大会,揭露“和平期成会”的投降阴谋,提出要求守军向城外主动出击,迎接外援力量;禁止人民宅搜粮,以安人心;镇压策动投降的反动分子。会后,他们还组织群众连续五六天向守城军部请愿。杨虎城接受了要求,镇压了“和平期成会”的为首分子劣绅褚小崧,使人心为之大快。这时,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策动下,国民军冯玉祥部在五原誓师后挥师南下,前锋逼近西安。为了内外呼应,雷晋笙动员挚友、国民党左派人士孟园悟,由孟代表民众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化装出城,迎解围部队于三桥以西的后围寨。国民军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迫使刘镇华的镇嵩军撤离西安。11月28日,西安城解围。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直系军阀,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是陕西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大重要贡献,雷晋笙为之呕心沥血,发挥了共产党员的中坚作用。

西安解围以后,陕西革命形势高涨起来。党组织为宣传革命理论,动员群众,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决定由雷晋笙负责,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创办陕西《国民日报》。由于雷晋笙曾担任过陕西省工会筹委会的书记,与印刷工会及工人有密切联系,因此,印刷工人得知要办报都积极给予支持,使筹备工作很快就绪。陕西《国民日报》是共产党控制的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具。报社设在西安九府街陕西省印刷局内(即现青年路市第二印刷厂),由雷晋笙担任社长,聘请孟园悟为总编辑,共产党员金鸿图等为编辑,12月21日正式出版。雷晋笙除担负报社的领导工作外,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国民革命。他在1927年1月份先后发表的《为什么要纪念列宁》和《听了乌斯

曼诺夫的讲话以后》两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按照列宁制定的革命原则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进行。针对国民党组织上的涣散和党员政治上的无知，他指出，党要有铁的纪律，党员要有政治的训练，党员要具备政治知识和革命知识，这是中国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的。接着，他又发表了《对（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的希望》一文，指出，要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半途而废，国民党必须革命化，在打倒老军阀之后，还要继续解决封建的土地关系。他强调，国民革命彻底的进行是建立在农民革命基础上的，希望国民党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到底。雷晋笙对军队的革命化和劳苦大众的利益十分关心。为此，他发表了《军队为何要施行政治训练》、《粮秣征发与人民利益》等文。此外，他还发表了警告英帝国主义干涉北伐胜利进军的文章——《准备应付英帝国主义者》等等。雷晋笙为办好陕西《国民日报》竭尽全力，从组稿、审稿、编排，到印刷、校对、发行，无不亲自过问。这份报纸反映了大革命风暴的现实，确实起到了抨击时弊、打击敌人、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192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派耿炳光任书记。遵照党的指示，雷晋笙于2月8日调任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报纸由刘天章、杨慰祖、白超然等共产党员接办。按照陕西省教育厅的决定，雷晋笙把原陕西省立一中和三中合并，组建为新的省立一中，校址选定在早慈巷。他聘请共产党员吕佑乾为教务主任，建立秘密的共产党支部作为学校领导核心，以进步教师为骨干，在开学之前，对教具、图书以及师生的食宿等作了周密准备。学生进校后，首先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并成立学生会，活跃民主生活。由于领导有方，教师得力，开学不到一月，学校即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1927年3月9日的陕西《国民日

报》上,报道了省立一中的新貌:“一、三中合并,委雷晋笙为该校校长,整理诸务,力求刷新……教育主任吕佑乾与校长按日与学生讲演,作政治报告,并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讨论。”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办学新风。

雷晋笙主持省立一中校务时,正值陕西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他把这所学校办成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府,办成宣传革命思想,响应党的各项号召,站在斗争前列的红色阵地,办成发展党、团组织的据点。如在领导旬邑暴动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吕凤岐,以及共产党员张培元、郭肇基、李天笃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1927年上半年,革命浪潮席卷陕西,宣传革命理论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雷晋笙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和陕西教育厅等组成的编撰委员会选为编委,参加编写《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与中国》等十几种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他还担任教育厅的编审委员,参与编写《中山主义教本》。他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工作,在审定各种中、小学教科书时,剔除了封建思想糟粕,增添了革命思想内容。

为了支持工农运动,雷晋笙曾经到共产党员丁世丰组织的长安县鱼化乡和三桥乡的农会,向农民讲武装革命的道理。他还经常出席各种群众会议,如陕西学联和陕西青年社的代表会议,作为特邀讲演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陕西各界于5月5日在大莲花池召开各阶层民众数十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雷晋笙即席讲演,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5月16日,雷晋笙在主持一中追悼李大钊大会上慷慨陈辞,指出:新老军阀南北配合,扑灭革命,屠杀革命志士,证明张作霖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号召继承烈士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当时,敌人曾暗中恐

吓,要他保持缄默。他愤然地回答说,共产党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向群众讲真理!6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的消息传来,陕西的革命形势骤变。7月上旬,陕西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陕西改组了《国民日报》,使各方震惊。但雷晋笙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7月11日,他还组织陕西教育界人士在省立一中举行了学习会,并公开发表讲演,痛斥蒋介石张作霖新老军阀的反革命罪行,勉励教育界人士沿着国民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1927年7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陕西“清党”,胁迫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公开登报,声明退党。中共陕西省委(由陕甘区委改组而成)迅速采取应变措施,党的组织转入地下。雷晋笙是国民党反动派列在名单上的首要分子。7月24日晚,当他得悉敌人将要立即逮捕他的消息以后,即与爱人李馥清等共十余人潜出西安,决定到武汉去找党中央。那时,陇海铁路只通车到豫西灵宝,从西安出潼关到灵宝,三百来里的旅程靠搭乘马车。他们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警人员和特务的盘查,巧装为行商。在艰辛的旅途上,雷晋笙对革命充满信心,常向革命同志吟咏好友徐蔚南的赠诗以相勉励:

头颅赌博贯年年,
结慧凌霄交大干;
那堪澎湃英雄血,
杀向天涯染杜鹃。

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染红那憧憬中的象征着革命胜利的杜鹃花。雷晋笙就是这样鼓舞同志,排除

万险,为革命勇往直前。

四

1927年10月,雷晋笙被党中央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他和李馥清从武汉到达开封,与地下省委组织接上了头。这时省委书记周以栗(化名岳易云)、组织部长任作民和其他同志,正在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雷晋笙协助周以栗工作,批判了原河南省委的右倾错误,分析革命形势,决定在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的确山、信阳、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组织暴动。

1927年1月16日,中共河南省委为了使宣传工作赶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作出了关于加强省委机关报——《猛攻》的决定,由岳易云、汪厚之和雷晋笙等16人组成党报委员会。此后,雷晋笙为《猛攻》的《短刀》(副刊)写了不少通俗而短小的文章,对组织和指导革命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

1928年2月,河南省委在领导了确山暴动之后,正在布置汝南、商城、固始的暴动。一天,雷晋笙到开封火车站附近旅馆,与暴动地方派来的联络人金鸿图接头,不意金前夜被捕,特务在旅馆潜伏。雷晋笙遂被当场抓去。敌人将他押到军法处,捆住一脚一手,吊在梁上,轮番审问,直到天亮。特务们把已经昏迷过去的雷晋笙从梁上放下来,用冷水泼醒,又扒去衣服,用皮鞭、钢丝鞭打得他皮开肉绽。他始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假口供回答。敌人一无所获,把他押到开封第一监狱。不久,李馥清也被抓去。到了4月间,省委书记岳易云、组织部长任作民和省委交通安子文先后被捕,都与雷晋笙押在同一监狱。

雷晋笙在敌人的监狱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敌斗争和自己的

学习。他和自己周围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在狱中组织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担任了支部书记，做了许多工作。如用暗语传递政治消息，进行内部教育；统一计划，管理在牢中同志们的存款，分配支用；对病号给以补贴；建立通讯员进行狱内联络；和狱外的党组织联系，向党组织请示和汇报工作；组织集体创作，等等。他们在狱中还组织过绝食斗争，也组织过用请愿的方式反对侮辱，要求放风，要求准许给家属、朋友写信，准许自由接见、自由看书报，以及改善伙食等，都起到了相当效果。雷晋笙等10人写出了3万多字的《狱中生活》，转递出监狱，交给了党领导的救济狱中难友及其家属的济难会。

1928年底，由于党组织营救，在敌内部工作的南汉宸利用当时主持河南军政的韩复榘清理监狱的机会，建议韩复榘把押在开封监狱的罪犯重新加以审问，凡罪证不足的，可以找“保”释放。不到一个月，共开释一百五六十人，雷晋笙因而得以获释。

雷晋笙出狱后，仍留在河南省委，负责济难会，专门做营救仍被押在狱中的难友的工作。他于1929年1月18日，就当时河南党内争论的狱中是否应有党组织的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共产党在任何有三个同志的地方都应该组织起来，狱中有很多同志还需要受训练，所以有条件时在狱中建立党组织是需要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要说服动摇的、悲观的同志，也只有以党的组织才好来训练他。不能因为怕被敌人发觉而不成立或取消（党支部）”。他还就党在狱中应该怎样组织党支部以及狱中各种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举例说，他在狱中曾用都、来、米、法、索、拉、西写出形似乐谱实为密码的通讯，用唱歌谱的方法在狱中互相通话、送情报，致使“敌人毫无办法”。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决定调雷晋笙到山东省委工作。雷晋笙和李馥清带着简单的行装,先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举办的训练班。12月间,中央组织部任命雷晋笙为山东省委书记。他肩负重建省委的重担前往赴任。山东省委于1928年下半年因叛徒出卖而连遭破坏,刚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吴丽石又已经暴露,中央决定调离吴丽石,由雷晋笙接替。雷晋笙明知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因党的需要,就欣然受命。月底,他偕同李馥清到了青岛,未接上组织关系。随后,他们知道预定接头的机关破坏了,发现情况异常,在青岛未多停留,又返回上海。当中央负责同志跟雷晋笙谈到重建省委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时,雷晋笙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表示愿意马上重返山东。这时,负责中央交通工作的吴德峰接通了济南的联络地点和信号,又作了周密的准备,雷晋笙化名为李克平,同李馥清于1930年1月29日到了济南。

这一天是旧年除夕。雷晋笙夫妇来到济南,已是街头万家灯火,人们共话新春的时候了。他们找省委交通员王某接上了关系,行装甫卸,未及歇缓,就投入紧张战斗。雷晋笙充分估量了严峻的形势:党的组织破坏殆尽,残酷的镇压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斗争的信心,敌特象野猫子一样盯视着党的地下工作的动静……他镇静自若,深思熟虑地草拟了斗争方案,把立定脚跟重建省委机关作为第一步。为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神速地奔波于街头巷尾、纱厂、学校和千佛山下、大明湖边,常为躲避敌人的盯梢,一日数次迁居,有时就宿于工人群众的小棚。就在新的省委机关积极筹建,并与青岛、德州、泰安、章邱、淄博等地的组织建立了联系,部署了斗争任务之时,早已叛变的省委交通王某向敌人告了密,使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尚未离去的原任省委书记吴丽石和团委书记李志英

以及雷晋笙、李馥清等先后均被逮捕。

敌人知道雷晋笙是不久刚从上海派来的，妄图从他嘴里知道更多的党内机密，因此施用了种种刑具逼供，压杠子、下竹签、坐老虎凳、踩烧红的铁链子、向鼻孔灌辣椒水等等。但毒刑始终没有使他吐露实情。在叛徒卢成锐、李远大和王某等当堂与他质证时，他只承认自己名叫李克平，河南开封人。在敌人的审判厅上，他大义凛然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愤怒地斥责叛徒是“毫无廉耻的狗东西”。对敌人的利诱软化，他更是嗤之以鼻，说：“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敌人判处他无期徒刑。

1930年2月，雷晋笙被押于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入狱不久，因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他肺病复发，长夜咳嗽不能入睡，生命岌岌可危，幸得狱内同志的帮助，才转危为安。李馥清被捕后，因无犯罪证据，不久被释放。她出狱后，给雷晋笙买了药物，使雷晋笙的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狱中难友有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前几任的省委书记），还有陕西同乡党维榕等。雷晋笙主动地和难友们联系，用约定的密码和暗语传递消息，和难友们一起要求监狱改善伙食，准许治病、放风、接见亲友、阅读报刊等，还设法同狱外的同志建立联系。敌人知道雷晋笙是首要分子，给他加了重镣，单号看管。但是，这些迫害并未使他松懈斗志。他在通过狱卒寄给李馥清的信中，嘱咐她要更好地为党工作，更满怀信心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设法营救山东被捕同志，并曾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李馥清在济南，由于敌特盯梢，处境十分困难，遂回上海。她为了营救雷晋笙，找到沈雁冰、郑振铎，由他们帮助，把雷晋笙翻译的莫泊桑长篇小说《漂亮朋友》的版权卖给商务印书馆，得款500元。正在筹划营救办法，却传来了雷晋笙等壮烈牺牲的消息。

还在1931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的剑子手韩复榘和省党部书记张苇密谋策划，妄图迫使被押在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屈膝投降。他们亲自出马提审一些共产党人，采用软硬兼施、威吓利诱的办法，说什么只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就可以获得“自由”并被擢升重用。这些共产党人投之以蔑笑。敌人恼羞成怒，露出狰狞面目，当场枪杀了女共产党员郭隆真。雷晋笙等对于敌人的恐吓置之不理。韩复榘黔驴计穷，向蒋介石打报告，要把22名共产党人一次枪决。

1931年4月5日，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在省高等法院开庭，以雷晋笙“供认加入红匪，担任工作”的罪名，判处死刑。凌晨6时，雷晋笙与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22位同志，就义于济南纬八路东南角草地上。在临刑前，他们慷慨激昂地连续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雷晋笙等共产党人的鲜血，浇灌了齐鲁大地的革命之花。4月14日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山东红旗报》报道了雷晋笙等22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的消息，号召广大工农一致起来反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为了纪念雷晋笙烈士，沈雁冰、郑振铎将他和徐蔚南翻译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合编为《莫泊桑小说集》，于1932年由中国新文化书店出版发行。党中央编刊的《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了雷晋笙的革命事迹。

(张钧华 雷友声)

包 森

(1911—1942)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省蒲城县人。1930年在三原省立第三中学上学时积极参加学生进步社团活动,秘密进入渭北苏区——三原县武字区,接受革命熏陶,进行抗日募捐,与学校反动势力作斗争。193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三原新字区区委委员。1933年7月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在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耀县起义部队中开展

政治工作,这年秋在西安参加重组陕西省委时被捕入狱。西安事变时出狱,被党组织派往延安,七七事变后被派往晋察冀根据地独立一师,任邓华部33大队党总支支部书记。后坚持冀东抗战,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开辟盘山根据地斗争中勇敢善战,被誉为“包司令”。1942年2月16日在战斗中牺牲。

血气方刚青少年

1911年7月21日,包森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赵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赵连登勤劳、正直;母亲万彩娃忠厚、善良。兄弟六人,包森排行老三。全家八口人,仅有几十亩瘠薄的山坡沟壑地。那时,由于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土匪民团的滋扰,遇到荒时暴月,生活越法难过。无奈,父母只好忍痛把包森的兄弟给了人

家。遂与村人在义龙王家村头“张王庙”里开染房。不久染房被暴雨冲淹倒闭。以后就靠租种土地和亲朋资助勉强维持生计。

1918年,包森入本村私塾读书。1927年,包森考入蒲城县第一高级小学——东槐院学校。当时有抱负的青年,多来这里学习。共产党人也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包森入学后,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在进步教员张子平的教诲和熏陶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各门功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为悼念列宁而写的《哭列宁》等进步书刊,联系社会现实和进步同学一起探讨,逐步懂得了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要拯救中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蒋家王朝,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此,他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壮志。1929年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高点明灯下苦心,十年寒窗有尽期;习成满腹好文章,山河锦绣异彩光。”这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生动地体现了他爱国拯民的思想感情。

包森在蒲城“一高”上学期间,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思想,联系进步师生,抨击时政,参加抗暴活动。毕业前夕,因领头反对校方私扣学生伙食而被开除回家。

1930年,包森考入当时进步的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驱逐吴新田。包森思想进步,积极致力于学生社团活动。常于郭炳坤等进步同学暗中去渭北苏区——三原县武字区进行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千里河山沦陷敌手,几千万同胞被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年轻的包森义愤填膺,激情难抑,踊跃地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三原、泾阳等地街头演讲,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日寇侵占领土,残杀东北同胞的滔天罪行。

他的革命行动,被学校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遂以“触犯校

规”、“不可救药”的罪名，将包森等五名进步同学开除出校。包森激情难遏，想不通爱国怎能有罪，便邀集一些进步同学拦路追打反动教员，从而受到反动军警通缉，只得回到蒲城家中。在家乡，包森到群众中继续宣传抗日救国。

投身革命洪流

193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包森找到了在三原的老同学——当时的中共蒲城县委书记兼宣传干事王培荣，倾诉他在三原因宣传抗日被校方驱逐出校的冤气，表示不愿在家闲居，立志投奔革命。同年春，包森由王培荣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王托西安高中王万成（地下党员）协助，考入西安高中。

包森在西高就学期间，继续从事学生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活跃分子。同年4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打着所谓“视察西北”的幌子，来西安进行反共宣传。为蒋介石的卖国媚外政策辩护，激起了西安教育界广大师生的公愤。

事前，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得知这一消息，秘密召开了各校先进分子会议，布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25日，两三千名学生到民乐园参加教育厅召开的欢迎戴季陶大会。当戴发表反共媚外谬论时，包森及参加大会的学生们怒不可遏，正言厉色地痛斥国民党卖国媚外政策，弄得戴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学生们“打倒狗委员戴季陶！”“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口号声中仓皇逃窜。当时，省政府调来大批军警，企图驱散和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愤怒的学生，用石子、木棍、砖头作武器，对付镇压学生运动的军警，烧毁了戴季陶的汽车。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4月26日下午，各校学生被打伤者十余人，被捕者达一百余人，这便是有名

的四二六惨案。

嗣后,各校学生继续进行顽强斗争,包森所在的西安高中,坚持罢课宣传抗日主张,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答应了治愈负伤学生的要求。随后,包受各校学生公推,代表西安学联赴北平各校求援,不久回陕,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2年8月1日,西安各中等学校,在中山中学礼堂召开庆祝八一南昌起义五周年大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抗日演说。反动当局派大批便衣混入,令军警宪兵包围了会场,当场十多人被打伤,逮捕了包森等32名骨干,关押在陕西省军法处。在狱中,包森一方面刻苦学习《资本论浅说》等革命书刊,一方面宣传革命真理和鼓励难友,并与西安“后援会”、“革命互济会”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团结全市师生联名上书,迫使反动当局于9月16日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经过多次的锻炼,包森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是年10月,在地下党组织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活动中,他和刘庚等同学积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武装保卫苏联!”“欢迎红二十六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西安!”并鼓动女师等校罢课,痛打反动校长黎清岚、教务长唐德元,使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入冬,党组织派包森到泾阳县苗嘉祥游击队,从事扩大红军组织工作。时隔不久,又调三原县武字区,担任政治宣传员,负责渭北游击队的恢复发展工作。包森一到武字区,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活动于敌人的眼皮下,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群众,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组织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团结武字区广大农民开展了抗粮、抗款、抗捐税、打豪绅、搞分粮的斗争。

1933年上半年,三原中心县委又将包森调往心字区,从事心字区的开辟工作,建立游击队,发展党组织,扩大根据地。心字区

位于武字区的西面。党在这里的影响较大,群众觉悟较高,这是开辟心字区的有利条件。但该区完全是白区,地主反动武装猖獗,地下党组织曾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开辟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但包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遵照上级指示,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恶劣环境下,常常在穴洞和坟地里过夜。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斗,终于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立了心字区区委,宋士斌任区委书记,韩学礼任秘书,包森任区委组织委员,负责党的发展建设工作。心字区和武字区连成一片,扩大了渭北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刘映胜任政治委员,谈国帆任参谋长。起义军成立了政治部,中共陕西省委派包森去该部做政治工作。起义的部队,思想复杂,纪律涣散,包森根据省委指示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为后来部队转移到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这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再次被敌破坏,党组织派包森在西安参加重建省委工作,由于特务告密,二次被捕,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关押在西安第一监狱。

在狱中,国民党反动当局用尽各种法西斯酷刑对包森进行审讯、逼供,但他不畏强暴,气宇轩昂地同敌人进行周旋,把敌人审判他的法庭变成了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残害革命的审判台。为了改善监禁条件,包森和赵伯平等同志利用各种机会鼓动难友掀起绝食斗争,包森被反动派视为政治犯中的首乱分子、策划者。因此,对包森镣铐最重、看守最严。以后赵伯平、包森被狱中政治犯推为代表,与监狱当局进行谈判,终于争得了改善伙食、卸掉脚镣手铐、每日放风的权利。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包森等几十名政治犯获释出狱。

包森出狱后到杨虎城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地下党员)第二连任政治指导员。在特务营特别支部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37年初,包森由特别支部派往延安学习。

奔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后,刚从延安红大(抗大前身)毕业的包森,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一师从事抗日,随军挺进平西,任邓华部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两部合编为第四纵队,进入长城,挺进冀东,组成抗关军,支援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包森率40多人的武装留在兴隆县长城沿线、洒河川一带与日军周旋,牵制敌人,掩护大军行动。

兴隆县,地处长城内外,境内多是山川、河谷,物产丰富。日寇铁蹄践踏上这块土地已经5年多了,反动统治极严,到处建立据点、碉堡,岗哨林立。受命后的包森,面对凶恶狡猾的敌人,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采用小股分散的斗争方式,机智灵活,神出鬼没地打击牵制敌人,常常是连连得手。一次,包森让战士们乔装打扮,换上农民服装,趁机潜入佛爷来据点,出其不意地杀向敌人,一举歼灭日伪军80多人。包森这一举动,震惊了周围的日军,随后大批日伪军扑向佛爷来。包森沉着冷静,将计就计,将自己的部队埋伏在佛爷来附近。毫无察觉的敌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包森先放过敌人的先头部队,待大队人马进入伏击圈,只听一声枪响,战士们个个如猛虎扑食般地从树丛中、壕沟内、土丘旁一齐跃

出，杀声震天，众弹齐发，把敌人拦腰斩断。一时间，短兵相接，手刃搏斗，敌人溃不成军。少数顽抗之敌，企图夺路而逃，但是在“缴枪不杀”的大喊声中胆颤魂飞，无力支撑，举手缴械。这次战斗毙俘敌人近百名，缴获枪炮 40 余支，子弹千余发。接着，包森又带所部缴获了被日军利用的龙山口金矿矿警武装。两个月时间里，包森部队就发展到 200 余人，开辟了兴隆东南、遵化东北一带的抗日游击区，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冀东大暴动。

冀东暴动失败后，慑于抗日力量的重新集结，日军投入大量兵力，于 1939 年清明节前后，开始了“春季大扫荡”，疯狂镇压抗日民众，屠杀抗联家属，冀东抗日形势急转直下，斗争极其艰苦。为了保存实力，包森将所部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身背篓子，走村串户，与部队保持着联系，寻找着有利战机，策划着更为巧妙的斗争手段，狠狠打击敌人。

日军为了向冀东游击区大举进攻，派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坐镇遵化县城，设法捉拿包森。包森将计就计，亲自导演了一幕生擒赤本大佐的精彩活剧。一天，赤本得知“被俘”的王振西原是包森警卫班的战士，他欣喜万分。立即叫来王振西，想从王的口中得知包森的下落。可是，王振西不愧是包森教育出来的好战士，被俘后日夜思念着自己的领导。当赤本向他打问包森的下落时，他机警地觉察出逃出虎口的时机来到了。赤本叫他带路去找包森，他满口答应，赤本极为高兴，王振西设法把这消息转告给了包森。4 月 26 日上午，赤本扮成日军司令，率领一支日军守备队，由王振西带路去找包森。途中，王振西告诉赤本，包森看见你的大队人马会提早逃跑的。得意忘形的赤本觉得有道理，就干脆带着翻译和王振西“孤军深入”，把警备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当赤本行至遵化县城北一个叫严家沟的村庄前，包森事先安排化装荫蔽在这里的

五大队副大队长牛焕星和几名战士突然出现在赤本面前，大吼一声，“不许动！”枪口早就对住了赤本一行，赤本束手被擒。王振西立即揭穿了赤本的真实身份，并催促着：“快走，后边有鬼子大队人马！”押着赤本走了几里路，后边枪声乍起，鬼子追了上来。赤本听见枪声，便神气起来，死狗赖猪似地瘫着身子一步不动了，嘴里唧里哇啦地叫嚷着：“我要见包森！”枪声越来越紧，牛焕星他们连拉带推赤本继续前行。越过长城，夜幕降临，出了马蹄峪口，来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庄。虽摆脱了敌人，恐有不测，当即处决了赤本，回到了包森身边。包森紧紧握住牛焕星、王振西他们的手，高兴地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为中国人民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

赤本被活捉，使日本国内朝野大为震惊，包森更是威名远扬了。日军便纠集遵化县城的商会和维持会到处打听赤本的下落。赤本老婆还以优厚的交换条件要求八路军释放赤本。一天，日军派城内商会人员给包森送去一封特殊的信函，信封足有2尺长。上写：“面呈包司令长官。”包森一边拆信，一边风趣地说：“狗日的还给我封官了。”看完信，包森叫部下转告送信人：“告诉他们，讲条件嘛可以，只有一条，那就是日军赶快投降，日本人滚出中国去！”

日本要求释放赤本的希望破灭之后，便气急败坏，纠集大批日伪军，疯狂轰炸、扫荡遵化县城达一个月之久，妄图一举消灭包森和他的游击队。包森却发动群众，大摆迷魂阵，进行反扫荡。他率领27名队员，人称28宿，又巧妙地消灭了敌人一支警备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在1938年7月至1940年初的一年半时间里，包森率部英勇作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以奇袭、奔袭、强攻、伏击等灵活战术手段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枪枝数百支，使部队和游击区日以扩

大,战绩在全冀东游击队中最为出色,显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军事指挥才干。1940年初,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到盘山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建成盘山“肉磨子”

盘山,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屹立在冀东蓟县境内。山势雄伟险峻,层峦秀丽清幽。亭台寺庙,奇泉怪石美不胜收。唐宋以来,成为历代帝王暇游之处。冀东大暴动时,盘山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中心区域和指挥部所在地。从此,盘山成了暴动的山,抗日的山,革命的山。暴动受挫之后,日军恐惧盘山再次成为抗日武装的集结地,便不断出动重兵扫荡,把山中大部分古刹庙宇焚烧成断垣残壁,一股股土匪趁火打劫,为非作歹,扰民害民。

野火烧不尽,火后再生有凤凰。1940年元旦,冀东军分区决定派包森等同志前往盘山开辟根据地,开展蓟(县)、平(谷)、密(云)地区游击抗日斗争,重新点燃盘山的抗日烈火,让抗日的红旗重新飘扬在盘山顶上。

盘山地区,是冀东和平西、平北往来的必经之地,日伪3000之众的武装封锁着这条通道。包森率200多人的精干武装西行,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几路合围、伏击和空中轰炸、扫射,2月到达盘山。

包森率部到达盘山之后,首先收容整顿了游击队,彻底清剿了20多股土匪,处决了大恶霸,成立了八路军政治处,建立了随营学校,开办了军政训练班,迅速稳定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打开了盘山的抗战新局面。随后打了几个漂亮的战斗,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组建起军分区主力第十三团,包森兼任团长。从此,盘山成了一个“肉磨子”,使大批日伪军死伤累累,血肉横飞。

包森进入盘山，日军视为心腹大患，决不善罢甘休，一次又一次集兵扫荡，几乎不到三天就是一次战斗。包森率部与敌斗智斗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7月下旬，正值盛夏时节，酷暑难熬，包森率部活动在盘山西部一带。一天，驻守在遵化、蓟县交界的日军一个老牌骑兵中队趁机突犯盘山，包森留在盘山的二营迅速占领了东西山头，把日军放进了一条沟里。此时，包森率部返回，用军号与二营取得了联系，将沟口堵住，把这支不可一势的骑兵中队全部包围。武士道精神极强的日军见势不妙，顽强抵抗，宁死不降。包森率部以硬对硬，毫不手软，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歼灭了日军这个骑兵中队。这样的战斗在冀东还是首次，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冀东有名的白草洼战斗。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气急败坏，接二连三地对盘山根据地实施狂轰烂炸，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丧胆，草木生悲。包森所部处境相当困难，斗争相当艰苦。在这危难关头，包森总是临危不惧，化险为夷，开辟生路。10月的一天，日军出动5000余众在平谷县北鱼子山向包森所部发起进攻。经过一天激战，黄昏时分，包森主动撤出战斗，利用夜幕掩护，穿过30里地的平川地带，向盘山转移。入秋夜半，凉风习习，绿中泛黄的秋庄稼像大地毯一样覆盖在冀东平原上，五颜六色的野花秋果铺挂在川谷山腰，皎洁的明月率领着晶亮欲垂的繁星为战士们壮胆送行。身披硝烟、泥土和汗水的指战员们刚行进到盘山北坡，就接到侦察员的报告：由山前开来的万余日军已经驻满附近的村庄。包森估摸着部队携带弹药不多，又与地县委机关同行，不好再与敌恋战硬拼，便将部队暂时荫蔽在一个山鞍部，监视敌人的行动，待机再行转移。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敌人没有动静，包森才利用青纱帐的掩护率部南行，直奔田家峪方向。部队刚下到沟底，发现敌人已经占领了通往田家峪的沟底通

路,并控制了两侧的山头,如果率部返回必遭敌人尾追。包森当机立断,下决心带队继续向田家峪冲击,冲乱敌人,乱中突围求生。经过简短动员,冲锋号划破长空。刹那间,在3里多长的路段上形成交臂碰头的肉搏战。刀光血刃,汗洒土扬。手榴弹变成了铁榔头,步枪变成了狼牙棒。拳打,脚踢,口咬,活像一个格斗场。敌我厮杀在一起,两侧山头的敌人有枪不能打,有弹不能发,分明是一群观战者。狭路相逢,勇者为王。在一片气盖山河的喊杀声中,包森率部终于冲到了田家峪。进村翻过一家家院墙,又折回一个山沟,穿过松树林,爬上盘山最高峰——云照寺。这时夜幕笼罩了整个山峦,敌人停止了追击,寺庙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那凉凉的秋风掀起阵阵松波。叮咚的泉水伴奏着秋虫鸣叫。借着明朗的月光,起伏的山峦,蔚秀的林壑隐约可见,盘山的轮廓尽收眼底,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战斗了一天的指战员们迎来了一点安宁,在这里稍事休整,转移回营地。终于保全了部队和县委机关的安全,使日军妄图一口吃掉盘山主力部队的图谋再一次落空。

日本侵略军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冀东一带的敌伪政权、军警、汉奸、特务组织逐渐建立起来。进入1941年,日军便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妄图把华北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在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同时,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此时,以盘山为基地的冀东抗日根据地处于大发展的时期,敌人便先从这里开刀,在盘山周围新建了许多据点,封锁盘山道路,隔绝盘山内外联系。盘山以南的据点周围有3米多高的围墙,墙外挖有两米多深的壕沟,沟底插有稠密的尖头木桩,沟外布满两米多高的铁丝网,四周建有5米多高的炮楼。据点敌人不断外出清乡、扫荡,屠杀抢掠无恶不作。包森望着中国大地上的日军据点,气愤地说:

“真是欺人太甚,不看不知亡国恨!”他下决心要拔除这些插在中国人身上的“铁钉子”。4月下旬的一天,包森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拔除蓟县县城通往邦均镇公路上的一个日军据点的战斗任务。包森和一位营长共同指挥,从夜间11时到第二天拂晓,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攻坚争夺战,终于拔掉了这个据点。这次啃硬骨头是包森第一次组织的夜间攻坚战斗。后来,包森率部或派兵先后拔下双城子、蔡名庄等据点,一度把战场拉到了敌战区的平原地带,弄得敌人昏头转向,吃亏不少。

“治安军”闻风丧胆

时光转到了1941年秋,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军便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伪治安军代替了日军控制的占领区。一时间,日军调入冀东的“伪治安军”达3万之众。于是,冀东军分区决定开展打击伪治安军的战斗行动。

11月14日,包森和军分区其他领导率十二、十三团各一部设伏于遵化县城四十里铺一带的公路两侧。第二天10时左右,前来遵化扫荡的治安军第三集团之第六团全部陷入伏击圈。包森一声令下,枪炮骤起,杀声冲天,正在蠢动的伪治安军遭到突然袭击慌作一团,队形大乱,人马争道,争相脱逃。不到一个小时,伪治安军丢下50余具尸体,300余众俘虏,数百条枪支,两万余发子弹等军用物资。这一仗,对伪治安军当头一棒,大大振奋了人心。接着,又打响了巧袭双城子据点的战斗。包森派他的特务连连长贾子华,带部分战士化装成赶大车嫁娶新娘子的模样,机智勇敢地瞒过双城子据点哨卡,过了吊桥,突然占领了炮楼,毙俘伪治安军200余名,缴获步机枪200余支,终于拔掉了敌人设在长城线上的这个

钉子。

在不断取得战斗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来了1942年元旦，新年伊始，包森又率部歼灭刘备寨伪治安第十团一个营。3天后，这个团另一个营去为被击毙的日军教官收尸，又被包森全歼。这个团余部成了惊弓之鸟，慌忙逃窜，不巧途中又被包森消灭。就这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日军装备伪治安团被包森三天之内三口吃掉。包森所部战斗情绪更加高涨，求战心情愈加迫切。

为了寻机更大规模地歼灭伪治安军。包森集中了7个连，实际只有5个连的兵力，把战场摆在了燕山口的梁河岸边。元月中旬，驻玉田县城的伪治安军第一集团3000余众，仗着日军装备，人多势众，骄横得不可一势，进入燕山口扫荡。包森事先得到情报，连夜急行军，秘密设伏，以逸待劳。伪治安军第四团果然大摇大摆地向前行进，进入了伏击圈。战斗打响，包森首先以3个连对准敌机炮连，很快歼敌200余人。失掉重武器的敌人怯战大乱，夺路溃逃的四五百名敌人全部当了俘虏。其余逃进一座古庙企图负隅顽抗，包森率部把古庙团团围住，伪治安军杀掉日军教官，竖起白旗投降了。当天下午敌第三团前来救援，又被包森击溃。一天之内包森率部歼敌一个团，击溃一个团，毙俘敌中校团级军官以下千余名，缴获一批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重武器，步枪700余支，子弹数万发，军用物资16大卡车。这样辉煌的战果，是以少胜多的典型范例，是包森军事指挥艺术的最为精彩的表演。

乘着胜利的余威，包森又在龙虎峪以西的贾庄子歼灭日军中佐大队70余人，再次给日军一个冷不防的沉重打击，在自己的战斗史上增添了光辉的记录。

打伪治安军战役共进行了3个月，打了23仗，成建制地消灭敌人4个团，瓦解1个团，重创2个团，摧毁敌人一批据点，缴获各

种枪支 3000 多支,重武器数十件,弹药数十万发,还有电台、被装等军用物资,取得了军事政治的双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冀东进行的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保卫了冀东原有的根据地,为开辟滦河以东和北宁铁路以南新区创造了条件。打伪治安军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在全国抗战处于相当困难的时期,冀东却形成了军民痛打伪治安军的运动,掀起了冀东抗日的热潮。更可贵的是妇女、儿童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拿起锄头、木棒追打伪治安军,缴获敌人武器、弹药,伪治安军真正成了“过街的老鼠”。

“打仗不一定都要靠枪炮炸弹”

包森不但具有很强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眼光和政策水平。遵化县城以南 30 里有个朱官屯,村里有个上层人士叫李鸣秋,虽具有爱国心,人缘也好,但常对群众散布一些悲观、失望情绪。说什么日本兵强,武器好,共产党没势力,抗战胜利了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时间,群众对支持八路军抗战顾虑颇多。当时有人建议把李鸣秋逮捕或杀掉,包森坚决反对。他说:“打仗不一定要靠枪炮炸弹,政治炸弹的威力也是很大的”。他认为李鸣秋是黄埔军校出身,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但大敌当前,民族存亡危机之时,只要我们做好工作,是可以激发他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同情心。于是,包森派人给李送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等小册子。果然不出所料,时过几日,李鸣秋主动谈了他的新认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抗日胜利之根本保证。”他还要求参加抗日工作。包森答应了他的要求,李鸣秋此后在本村和附近村屯组织起“保国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后来,在遵化县政府从事一段抗日工作,又先后去蓟

县、三河县、平谷县一带工作，表现相当不错，为当地抗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和包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包森善于做敌伪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打击少数顽固之敌。驻在平谷县的丁吉山警防队，是国民党投降日寇的伪军，队内有个叫康福的大队长表现不太坏，包森用力做他的工作，争取伪警防队同情抗日。包森和康福接上了头，经几次工作，康福答应愿意为抗日做些好事，曾几次送来情报。1941年8月，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夜，康福送来日军进犯的情报，包森分析了敌情，将部队设伏于西葫芦山下一个村庄。当敌人一进村，包森率部出击，终于全歼来犯之敌。

包森胆大心细，会使用人，特别是会使用人之所长。冀东军分区的指战员，有一句称赞包森的顺口溜：“包司令，有三宝，特务连、侦察员和徐司号。”这个特务连很厉害，就连日伪军提起来也怕他三分。可是这特务连有些人原来就是土匪出身，包森却把他们改造了过来，为抗日打仗。大土匪出身的赵玉双手能打枪，但高傲自大，盛气凌人，动辄横眉瞪眼，匪气十足。耿兆江原来也当过土匪，打起仗来很勇敢，一次和敌人拼刺刀，挑死三个鬼子，一次从鬼子手里夺取3挺机枪。但平时爱吵架，凶里凶气，不爱学习，生活散漫。包森认为，这些人的出身往往是因环境所逼而造成的。对这些人，“推不如用、防不如教”。要驾驭控制他们就得使他们从心眼里佩服我们。由于包森的大胆使用和善于使用，在使用中进行精心的教育和培养，这些人都进步不小，始终战斗在抗日的队伍里，成了包森特务连的骨干成员。赵玉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一次战斗中端着机枪射击敌人，为了抗日光荣献身，成为抗日烈士。耿兆江后来被提升为团参谋长，为抗日立了功。

包森是一个具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员，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工

作干部。他那具有火一般热情的政治动员和细心入微的思想工作，足以使你感受到他诗人般的激情和父母般的温爱。包森率部进入盘山后，一天清早，他把部队集合在“人胜”山谷中的迎客松前，他身着灰色军装，精神焕发，英姿勃勃地站在一块大巨石上，指着大巨石上雕刻的11个大字，一字一句地念给指战员们听着，“此地有——丛山峻岭，怪石奇松”。接着话锋一转，音韵像清泉在巨石上奔流。现在应该再添上：“此地有——人民军队，抗日群众”。他引经据典地说：昔日的盘山只供帝王将相游览；今天，我们要叫这淙淙清泉会唱歌，块块巨石都呐喊！”包森这段政治动员像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像一首悠扬动听的抒情歌，回荡在年轻战士的心坎上。从此，盘山上近百处风景点的山石上，必经道路旁，斗大字的抗战标语举目皆是，“抗战必胜”、“抗战到底”、“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伪军弟兄们掉转枪口回到祖国怀抱”。这一条条，一句句，像巨石发出的呐喊声，像清泉倾诉的亡国恨，鼓舞着战士，鼓舞着群众，下破了鬼子的胆，唤起了一些伪军、流散土匪的爱国心。包森在冀东抗战的4年多岁月里，他那出神入画的政治思想工作，象涓涓清泉滋润着指战员的心，也伴随着他那战斗的脚步，奏出一首首胜利的凯歌。

真情给予人民群众

包森之所以能多打胜仗，除了他带领一支过硬的部队外，他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冀东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在8年的抗战年月里，冀东斗争异常残酷，处在铁蹄下的冀东父老乡亲，生活难以言状。每日里高粱玉米面糊汤灌肠，甚至断炊无食；衣着破褴褛，有的难以遮体蔽羞；住房破烂不堪，有的昼不挡日，夜

不透露；三天两头躲避空袭，昼夜不能归宿，有的甚至钻进齐腰深的芦苇池塘浸泡半天不敢露头。包森率部经常和人民群众一起行动，吃住都在群众家里。同群众同甘共苦，命运相依，心心相印，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人民群众视他为“恩人”。一次，房东自己喝糊汤，却想法给包森搞到一碗白面条。包森见此情景，心中一阵酸楚，泪水脱眶而出，再三向房东解释，决不吃“优待”饭，与房东同喝稀糊汤。又有一次，包森带通讯员到一个村庄，逃避鬼子抢掠的群众还未回村，包森只好走进一老乡家里，自己觅食做饭，饭后留下饭钱和便条。不久此事传遍全村，群众赞不绝口。包森智擒赤本大佐后，日军曾调集一万之众扫荡遵化县，在一个村中包围了包森和一个班的游击队员，包森被一位老太太藏在大缸里而得以幸免，可是全村的老百姓和9名游击队员却被鬼子赶到一个广场上，并要全村的妇女出来当场认领谁是自己的丈夫和儿孙，以便从中查出游击队员。一会儿，8个队员先后被“认领”出来。此时，一个年轻妇女想到自己的丈夫出外未归，灵机一动，在鬼子的刺刀下，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拉住最后一位游击队员的手，从容不迫地说：“走，回家吃饭呗，还不给皇军点个头。”就这样，最后一位队员也被认领出去。鬼子空喜一场，无半点收获。事后包森筹办慰问品，慰问了全村老百姓，奖励了那位认领最后一位游击队员的年轻妇女。

日军在蓟县盘山的要道口蔡阁庄建立了一个据点，据点鬼子伺机出来抢掠，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急盼早日拔掉这个钉子。包森理解人民群众的心情，但对拔掉这个据点还没有十分把握，准备待些时日。在人民群众的一再要求下，包森作了周密的部署，虽伤亡较多，但终于拔掉了这个钉子，人民群众欣喜若狂。为了继续发动群众，包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杀一儆百，为群众出口气，他令战士

拾来一把铡刀,把一个作恶多端的鬼子押上会场,放在铡刀下,包森当场宣布了他的种种罪行,一声令下:“开铡!”只听“咔嚓”一声,鬼子身首各异,全场沸腾起来,“打倒日本鬼子”,“抗战到底”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打这以后,“包青天”、“活包公”的赞颂声传遍了冀东大地。

精神与盘山同存

战场,是生与死的决斗场,是死神降临最多的地方,包森是与死神搏斗的强者。他短短的一生,却有上百次地出没在短兵相接的战斗厮杀中。他不止一次地负伤挂彩,他却能从九死一生中脱逃出来,在一次次不幸中求得万幸。包森在战士面前经常讲着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战场可能会夺取我们的生命,但永远夺不去我们的精神。这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民族解放的精神,誓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精神。”包森,就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人。1940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他置身于阵地前沿实施指挥,不幸中弹,子弹从下颚左侧打入,从右太阳穴下方钻出,伤势严重,当场昏倒,不省人事。可是死神并没有夺取他的生命,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个月后,他又重新出现在战斗指挥岗位上。带着伤势未愈的包森对战士们说:“我的伤只能激发我加倍地仇恨敌人,决不会使我有丝毫的胆怯。”正是他这种出生如死,视死如归的战斗指挥作风,带出了能打硬仗,打恶仗,敢拼刺刀见红的战斗团队。

1942年2月16日,包森率十三团一营一部和特务连迎着刺骨的寒风,向遵化县西北沙婆峪口外进发。第二天行至野户山,与疯狂扫荡的日寇田中大队及伪满洲队遭遇,包森果断指挥,先敌开火,挫伤敌人锐气。敌人趁着人多势众,调整队伍发动一次次反

扑。包森冒着浓浓的战火硝烟,不顾个人安危,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立即用手捂住伤口,部署完战斗行动闭上眼睛。在断断续续的话语中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军装。

部队安全撤出了战斗,包森心脏停止了跳动,终于献出了他年仅32岁的生命。噩耗传来,整个冀东沉浸在一片哀悼声中。

死神夺去了包森的生命,却没有夺去他的精神。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包森曾经英勇战斗过、保护过的盘山建造了一座雄伟而庄严的烈士陵园,园内高高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塔上有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的亲笔题词。塔前烈士墓碑林立,包森烈士墓碑位于主位。

包森走了,精神却留下了,留在了冀东的大地上,留在了盘山的松柏上,留在了人民的心田里。他的名字和形象与长城同伟,同盘山齐名,永远崇高。

(发宏)

吉 国 桢

(1899—1932)

吉国桢,又名凤洲,字千卿。陕西华县人。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陕。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1931年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7月在郑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8月在开封就义。

吉国桢,1899年生于陕西省华县西北乡小张南吉家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父亲吉生贵一生务农,在吉国桢七岁那年因病去世。此后,家庭经济逐渐破落。

吉国桢九岁入私塾,1916年入华县教育会附设的高等小学。1920年春,他考入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在进步教师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人的影响下,逐步接受新思想,同潘自力、苏士杰等同学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读书、讲演、演新剧以及体育等活动。

1924年春,吉国桢、潘自力带领同学同侵吞公款、欺压学生的华县劝学所长进行说理斗争。校长多方阻挠,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吉国桢、潘自力等在王懋廷老师的支持下,同校长进行了针锋

相对的斗争,最后带领同班二十多人愤然离开咸林中学,前往北京求学。

吉国桢到京后,加入了旅京陕西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他一面参加共进社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一面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

同年夏,吉国桢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和《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是年秋,经关中哲介绍,吉国桢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他为《共进》半月刊撰写了《警告吾陕名流》一文,历数军阀吴佩孚、刘镇华、吴新田的祸陕罪行,指出:“刘贼多在吾陕一日,吾民则必更痛苦一日”;揭露陕西政客郭毓章、宋联奎之流阻止陕西人民和陕军驱逐刘镇华的阴谋;呼吁陕西人民“急应猛醒,不要受骗”,要“瞅定我们的朋友,认清我们的敌人,刘氏等固在驱逐之列,所谓吾陕名流,我们当然也要同样反对,最低的限度,也要叫他们归里养痍。”^①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吉国桢积极投入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白天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晚上深入到纱厂向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工人、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呼吁工人群众要坚持罢工斗争,还帮助工人组织夜校,给工人讲解革命道理。

同年夏,吉国桢同何尚志、曹趾仁、关中哲、党伯弧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大学陕西同学会,创办了《新群》半月刊,热情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孙传芳的罪行。

1926年夏,吉国桢和张仲实、王友直等数十人,被党团组织派

^① 《共进》第76期,1925年2月16日出版。

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年秋,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批准,吉国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①。

二

吉国桢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后,以省立六中教员的公开身分,开展革命活动。他召开陕北特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根据省委指示和陕北的实际情况,提出继续壮大党团组织,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主持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为陕北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随后,他和特委选派的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相继进入甘肃、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以及王子元部,协助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为了争取陕北的地方武装,特委又先后派10余名党员去驻守在宜川、延长交界处的后九殿山寨的杨庚武部,建立党组织,准备创建陕北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上旬,吉国桢召开特委常委会议,讨论纪念广州暴动二周年的活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公开发宣言和通告,并署名中共陕北特委,以便鼓舞士气;吉国桢则认为榆林白色恐怖严重,城内地域狭小,敌人驻军控制很严重,如公开用特委名义,敌人一定特别注意,可能使党团组织遭到不应有的破坏。他强调革命斗争要讲求策略,主张以“广暴”纪念会的名义秘密发宣言和通告。这个意见和由他起草的宣言及通告,常委们一致拥护,使这次纪念活动起到了宣传革命,鼓动群众斗争的积极作用。

1930年初,陕北特委迁到绥德。吉国桢、苏士杰(特委常委兼

^① 张仲实、方仲如、王友直等人的回忆。

军委书记)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领导特委工作。刘澜涛、常应黎(现名常黎夫)这时也到绥师,以职员作掩护,参加特委的领导工作。

吉国桢在绥师利用上公民课的机会,讲授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近代史和马列主义常识。特别是他对巴黎公社、二月革命、广州起义、毛泽东与朱德领导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的生动讲述,引起了学生的很大兴趣,使他们深受启发和教育。吉国桢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待人诚挚忠厚,对学生关怀备至,深受学生钦佩。

吉国桢还经常具体指导绥师特别支部(书记白如冰)的工作。他指示特支把师生中的党团员分别编组,实行单线联系;对校内外斗争要注意策略,不能盲动;要开展适合学校特点的小型多样的活动,使绥师在政治上成为陕北的红色基地。当时,绥师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全校三百多名师生中就有七八十名党团员。他们利用革命节日在校内举行小型纪念活动,如报告会、座谈会;在绥德县城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吸收贫苦的中青年参加学习,由党团员轮流去讲课,宣传革命思想;假期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作调查,发动农民,在陕北各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与此同时,吉国桢指导绥德县委发动了一次一家工厂工人向厂方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厂主被迫答应增加工资。这对整个陕北的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在吉国桢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至1930年夏,陕北党团组织遍及10余县,党团员共达2000余人。在陕、甘、宁边界驻军苏雨生、王子元部,榆林井岳秀部、高志清旅,都建立了党的秘密军委或支部,党团员发展到百余名。这些党员按照特委的指示,大力做争取士兵群众和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

正当陕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于1930年春末,到陕北巡视工作。他以“左”的面目出现,全盘否定以吉国桢为首的陕北特委的工作成绩,武断地指责吉国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吉国桢对杜衡的指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你就会给人扣大帽子!你好好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作些调查研究再批评人吧!”^①杜衡独断专行,利用职权主持特委扩大会议,指责吉国桢和陕北特委“以往工作路线还拘泥于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他不顾主客观条件,提出了难以实现的十二项任务作为陕北党组织的目前工作去完成。吉国桢受到打击后,仍以党的事业为重,继续努力工作,在“红五月”里,积极组织绥德的学生集会,纪念“五一”、“五四”、“五卅”,请进步教员发表反帝爱国的演说,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

三

1930年6月,吉国桢奉省委电召回西安。7月上旬省委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扩大会议,他当选为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并参加省委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8月,吉国桢作为省委代表去蓝田草坪,指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努力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后,吉国桢深入西安广仁医院调查研究,组织该院职工举行反对院方残酷剥削职工的罢工斗争。这所医院属英帝国主义经办,每次看病,挂号费就要两元,而护士每人每月工资只有1至5元,一天工作时间却长达

^① 张文华的回忆(1980年12月5日)。

16小时之多。1930年9月初，英籍院长李安国侵吞医院经费，经理侯翔虚与其狼狈为奸，使职工生活更加困难，激起了职工群众的强烈不满。9月3日，吉国桢指导该院党支部组织罢工委员会，下设宣传队、纠察队和侦探队，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工友”、“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和“增加月薪12元”、“改良伙食”等要求，并张贴标语，举行记者招待会，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吉国桢还动员印刷局的工人和几所中学的党团员和组织工人与学生进行声援。斗争坚持了几天。后由于院方帝国主义分子与反动当局勾结，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迫使职工复工。

吉国桢继而又发动省印刷厂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提出“要面吃”、“要欠薪”、“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工头剥削工人”等口号。他指导党员通过办工厂小报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全厂职工起来斗争，迫使厂主很快答应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9月16日，是冯玉祥五原誓师的纪念日。冯的部下、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为捞取政治资本，收买军心，借口追悼阵亡将士进行募款，以搜刮民财；还强令西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放假三天，满城张灯结彩，在革命公园演戏三天。为揭露敌人的欺骗，吉国桢根据省委的决定，主持起草了《告民众书》作为传单散发。《告民众书》指出陕西工农兵的痛苦完全是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造成的；“九一六”纪念活动是军阀搞的骗局；群众欲求自己生活的根本改善，只有斗争，工人组织政治罢工，农民和士兵起来暴动，彻底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

10月上旬，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的特务侦破，吉国桢和二十多名省、市委领导同志、基层党团干部被敌人逮捕。吉国桢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1月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混战结束，冯部失败，驻守西安等地的冯军出走，杨

虎城率部入陕,陕军甄寿珊、姚振乾部进入西安。吉国桢和狱中三十多名党团干部利用敌军之间的矛盾和混乱,互相砸断手铐脚镣,机智勇敢地破狱而出。

吉国桢出狱后,省委书记杜衡和省委常委王芾南奉令去北方局参加扩大会议,省委决定由吉国桢负责组织临时省委,吉任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这时省委处境相当困难,工作人员靠借贷度日;机关只有一个秘书处,省委常委、军委和西安市委的干部既无处寄身,也无开会之地。加上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在外地不能立足而到西安的党员干部共30人之多,都向省委要饭吃,要住处,要工作;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侦探通缉和拘寻这批党员干部。临时省委自顾不暇,还必须照顾这些党员的生活并给以教育^①。但吉国桢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迎难而上。他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工作计划,提出继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迅速恢复一些被打散的党组织,把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和在外地站不住脚来到西安的党员干部分别编成10个小组,经过训练,派往中心区域工作,对有叛党行为的党员干部,查清事实后开除党籍。会议通过了由吉国桢起草的《今后一个月的工作计划》。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吉国桢主持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并亲自讲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工作方法等课。经过短期培训,将他们派往关中各地工作;在分配工作前,吉国桢和党员一一进行谈话,考查他们的学习成绩,勉励他们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

吉国桢和省委还先后派了十多名有经验的党员干部打入杨虎城部,同我党在该部的地下组织(军支)接通关系,分别在杨的警卫

^① 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团、宪兵营、炮兵营及西路地方武装中从事兵运工作，教育和争取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站到革命方面来，扩大了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吉国桢在巡视蓝田县的工作时，指示县委要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反豪绅行团^①和反对军阀的斗争，对豪绅操纵的行团和红枪会要派得力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关系打进去，争取群众，逐渐夺取领导。在吉国桢和蓝田县委的领导下，该县南区的党员发动和组织了一千多名群众，赶走了豪绅王老九的行团和唐靖的土匪武装，处决了一批反动的团丁和惯匪，迫使王老九不敢再到南区向群众敲榨勒索。

同年12月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吉国桢在会上报告了临时常委会一个月来的工作情况。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讨论通过了《陕西年关斗争计划》，布置了职工运动、互济会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吉国桢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会后，他和西安市委负责人一起组织和发动了省印刷局、西安日报社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罗章龙等则在党内拉了一部分人成立“力争紧急会议筹备会”，反对四中全会的中央。消息传到陕西省委，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在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为此争论不休，有拥护王明的，也有拥护罗章龙的。吉国桢认为在没有搞清重大是非前，不能轻易表示态度，建议省委派代表去河北省委（代行北方局的职权）和党中央详细了解情况后决定省委的态度。会议接受了吉国桢的建议，并决定派他作为省委的代表执行

^① 行团是农村豪绅地主组织和掌握的反动武装。

这一任务。

2月中旬,吉国桢辗转到天津和上海,向河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了陕西省委的情况。4月20日,他给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四万余字的报告,指出:“在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加上制造的浩大灾害之下,致使政治经济空前的危机,农村破产,城市萧条,群众生活恶化达于极点。”^①在谈到省委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绩和错误、经验与教训时,他指出: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使党的组织削弱,日常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他提出要“在斗争中和实际工作中肃清消沉不动的分子出党,吸收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入党。以根本的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希望党中央“打破万难,给陕西党经济上以必要的接济和工作人员的迅速调动和补助,尤其是政治认识很好,工作经验丰富,能形成政治领导中心的书记必须马上来陕工作。”^②由于报告是在上海期间与党中央负责人谈话后写的,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的一些影响,错误地提出陕西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三

1931年5月初,吉国桢被党中央派赴河南任省委书记。此时河南党组织由于受立三错误的影响,“各地党的工作概多塌台、缩弱,除孝义兵工厂支部能自动的工作外,其他没有一个能以真正自动工作的支部与地方党部,党团还多没有划分,党与群众的组织极其混淆不清。省委以及各地的工作概是虚浮,不实际。”加以当时

^① ^②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

白色恐怖严重,给革命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吉国桢同省委军委书记袁明阶、省委组织部长老曹等中央委派的干部到开封后,立即找原省委领导成员交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吉国桢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通过讨论决定加强巡视工作、整顿各地的党团组织。会后,吉国桢和省委加强了对匪运工作的领导,派党员打入宜阳的土匪部队,成立军支,做争取士兵群众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准备逐渐将这支二千余人的土匪部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同时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打富济贫,准备夺取豪绅的武装。

为了培养干部和加强兵运工作,吉国桢亲自主持开办了两期党员活动训练班和兵运训练班,向学员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斗争策略和国内外形势;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整顿党团组织或开展兵运工作。吉国桢还指导省委宣传和组织部门先后出版了《中州时事》、《中州新闻》、《群众周刊》、《党的建设》、《我们的生活》等刊物,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宣传红军作战的胜利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

1932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为了支援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河南各级党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根据地进攻,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战争,特别指示许昌中心县委要组织与领导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在此前后,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所领导的信阳特委和豫西南特委划归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在信阳设立了交通站,动员数千名农民参加红军,发动各界群众募捐支援红军,不断向苏区运送医药、被服等急需物资,并组织农民到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省委还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南、豫中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还派出不少党员干部,到国民党驻豫西的刘镇华部和驻淮阳、开

封等地的军官教导团以及任应岐部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士兵哗变。这些工作,都牵制了敌人,援助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冬,吉国桢终因多年的劳累而病倒,一度半身瘫痪,卧床不起。经过治疗,病情稍愈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斗争。

经过吉国桢和他的战友们一年多的辛勤工作,被敌人破坏而削弱了的河南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二千三百多人,遍布全省九十多个市、县,成立了开封、郑州两个市委,豫南和豫北两个特委,许昌、洛阳、南阳等五个中心县委,临颖、舞阳、西平等三个县委,孝义、淮阳、鹿邑和军事学校等二十多个特别支部。

吉国桢在河南省委工作期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及其巡视员,曾多次指责以吉国桢为首的河南省委,“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严重的落在机会主义泥坑,对于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执行完全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①吉国桢在受到错误的批评后,仍然努力为党工作,照常向中央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自己认为确实错了的地方,也能勇于自我批评。

1932年6月中旬,吉国桢和团省委书记王伯阳作为河南省委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6月下旬,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及《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会议一结束,吉国桢等立即返回郑州,先后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和省委扩大会议,并指

^① 《河南巡视报告》第1—4号(1932年3月22—5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导郑州市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创建河南的新苏区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初步制定了计划,拟通过发动农民暴动和组织国民党军队哗变以及改造土匪武装来创建新的红军,把工作重点放在豫南和豫中,以便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和取得红四方面军的援助。省委常委会议还决定加强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和宣传工作,以配合新苏区的创建。与此同时,吉国桢还领导出版了《火力》刊物,发表《反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河南新红军新苏区告工农书》,出了“拥红创苏”特刊^①。

1932年7月下旬,由于叛徒张俊等人的告密,吉国桢和省委书记杨斯萍、团省委书记王伯阳等二十多名党团干部在郑州被捕。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刘峙急令押送开封审问。敌人满以为可以从吉国桢等口中得到共产党的重要机密,对他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是,吉国桢(化名周国荣)宁死不屈,使敌人未能得到任何口供。刘峙恼羞成怒,遂下令将吉国桢、杨斯萍、王伯阳等十四名党团干部在8月20日晨5时,秘密杀害于开封郊区^②。临刑前,吉国桢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怒斥敌人的反动行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风亮节。

(张守宪 董建中 王少民)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共进》(1925年)。

^① 《河南省委给中央信》(1932年7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1932年8月21日《河南民报》。

2. 吉国桢:《今后一个月的工作计划》(1930年11月)。
3. 吉国桢:《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及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1931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4.《河南省委(给中央)报告》(1931年5月28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5.《河南报告》(1931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 6.《河南省委关于兵运问题给中央报告》(1931年11月18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7.《河南巡视报告》(1932年3月—5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 8.《中央给河南省委信》(1932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9.《老吉同志关于河南的组织问题给中央报告》(1932年5月10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10.《河南省委给中央报告》(1932年5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 11.《河南省委给中央信》(1932年7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 12.《六大以来》(上)。
- 13.《中央给河南省委指示信》(1932年7月31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14.《河南民报》(1932年8月)。
15.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给国民政府的报告(1932年8月30日)及其附件,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件。
- 16.《振亚关于河南工作报告》(1932年10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 17.《河南省关于全省组织情形给中央报告》(1932年11月),中央档案馆存件。
- 18.《河南豫中(许昌)县委报告》(1932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存件。
- 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 访问刘澜涛、马文瑞、高克林、白如冰、常黎夫、张仲实、方仲如、赵伯平、吴志渊、刘晋、李实、王曙、李赤然、肖璋、陈云樵、关中哲、杜松寿、王立人、杨慰祖、王超北、张文华、曹志麟、艾志清、张字六、冯润璋、党伯弧、马文彦、王芾南、刘依仁、赵和民、张剑石、顾洲三、史卓生、吉炳辰、吉海棠、吉信棠、吉正学、赵西娃等同志记录。

秋步月

(1902—1930)

秋步月，字凌云。陕西礼泉人。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着力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曾当选为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8年4月，为了发动群众配合渭华起义，领导了礼泉起义。起义失败后，任礼泉县委书记、礼泉游击支队司令员。1930年5月9日被敌人杀害。

立志奋进

秋步月，又名捕虐，字凌云。1902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礼泉县李游村一户农民家庭。父亲秋孟龙，秉性耿介，纯厚朴实，克勤克俭。家里耕种着60多亩土地，在县城内还合股兼营一个“五福堂”杂货铺，日子也算得上旧日的小康之家。

1914年，12岁的秋步月，在离家10里路的小寒村大同学校上学时，听了晁天枢先生对学生讲授的孙中山幼时挖倒泥木神像和后来敢于推翻满清王朝的故事，受到极大的感染，反对神权和不畏强暴的思想，在他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1916年，秋步月入县城私立健行小学读书。这年元旦，袁世凯窃国称帝，军阀混战，礼泉驻军到处乱抢车辆、牲口。有一天，驻

军将秋步月家一匹大马抢去了，步月从学校回来，看到父亲犯愁的神情，当即斩钉截铁地说：“军队有何畏惧，我去要马！”说着就走出了家门。父亲只好跟在后边。秋步月在附近的榆村找到了军队，他不和士兵答话，直接去见连长。连长轻蔑地问：“小孩子找部队有何贵干？”步月理直气壮地和连长论理，指责军队大白天抢拉农民的马是非法的。连长见步月气质不凡，遂转身向周围的士兵说：“你们不要看他年纪小，满肚子是文章，快把马拉出来交给他！”父子俩高兴地牵着大马回了家。

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兵燹扰攘，生灵涂炭，祸乱相寻的局面，秋步月深感不安。他从健行小学转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忧国忧民的思想与日俱增，每逢寒暑假，就和同学雒生辉去县南乡纪村、张冉村、云里坊一带贫苦人家访问，了解最底层的民情。当他看到农民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心情焦虑地对雒生辉说，咱们国家啥时候才能将兵荒马乱平息下来，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之中？！

1920年秋，秋步月以优异成绩插班于西安健本高级小学，翌年冬毕业，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时年18岁。他在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国文、算术两科成绩优异。他文思敏捷，才华出众，写文章并不追风趋时，人云亦云，见解往往与众不同。一次，他在《赤壁鏖战》一篇论文中，阐述自己的观点说：“人皆以为东风之变是周瑜之幸，吾以为乃曹操之幸也。如无东风，曹操焉能弃甲而逃，以创帝王之业？”

1922年，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在省立三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秋步月成了一位好演讲、善辩论的非常活跃的人物。此后，他和当时西安负有盛名的革新教育家、爱国社会活动家王授金相识。王授金不仅是秋步月的同乡、恩师，而且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当时，秋步月经常去王授金家聆听教诲，王授金常对

他讲述辛亥革命以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指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各派军阀势力,把持中国政权、压迫劳动大众的道理,并向秋步月介绍他在《陕西实业》杂志上发表的《实业家言》、《美国石油大王洛克兰的历史》等文章,这些文章主张发展近代工业,使中国富强起来,其爱国思想,使秋步月感受很深。这时,王授金结识了魏野畴、吕佑乾等许多共产党人,积极投身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经常让秋步月给一些共产党员传递秘密信件。步月聪明机警,每次都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秋步月还将他在三中和会社会方面获得的重要情报及时报告给王授金,得到王老师的赏识。王授金曾经对人说:“我教了不少学生,秋步月真是个人才。”

1924年春,魏野畴任三中教务主任兼公民课教员,他向学生推荐马克思、列宁、高尔基、鲁迅、瞿秋白等人的著作,给秋步月辅导《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指导阅读《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书刊,并介绍步月参加了共进社。秋步月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下,逐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

这年暑假,魏野畴在共产党员崔孟博家举办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中等学校的数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秋步月积极参加了这次讲习会。翌年经魏野畴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全国民众对这位革命家的哀悼活动,形成了一个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省立三中学生在魏野畴、王授金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秋步月站在最前列。4月15日,西安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王授金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魏野畴代表全市人民宣读了祭文。是日晚,秋步月浮想联翩,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秉笔赋诗《忆七十二烈士》:

黄花冈上土未干，
四面楚歌日益添。
兵燹扰攘无己时，
谁能只手挽狂澜？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秋步月憎恶军阀混战和忧愤民族危难的心情。

4月30日，段祺瑞政府正式任命军阀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到任的第二天，就制造了殴伤西安省立一中学生的五四事件。事件发生，激起了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怒。魏野畴领导团组织 and 市学联，组织西安各中学举行罢课。一个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在全市范围内展开，秋步月和西安学联负责人张含辉、同学张金印在三中召开大会，动员全校学生罢课，要求严惩肇事元凶；组织全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深入街头巷尾，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街头演讲，揭露吴新田纵军行凶的罪恶事实。7月中旬，国民军与陕军在全省学生和各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配合下，分路包围了吴新田的驻地。吴新田率部狼狈逃往汉中，驱吴斗争取得了胜利。

11月，秋步月从省立三中毕业并留校。这时候的秋步月，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26年1月，他经西安党组织批准，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3月下旬，省立三中在中共西安地委书记黄平万的主持下，建立了学生党支部，共产党员有秋步月、张金印、陈子敬、魏福林、李良等十多名，张金印任书记。

当时省立三中校长王藩臣顽固守旧，以封建宗法思想统治学校，坚持陈腐的专制教育制度，对抗新文化运动，把学校办得死气

沉沉。学生对这日退一日的封建教育极力反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校掀起了驱逐王藩臣的学潮。

一天中午，由秋步月、张金印领导，在物理教室门前的广场上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秋步月、张金印都登台讲话，揭露王藩臣以封建宗法思想办学的事实。秋步月说：“王藩臣披着兴办新学的外衣，干着复古专制的陈腐教育。”平日在学生面前指手划脚、“子曰诗云”的王藩臣，气急败坏的窜上讲台，指着秋步月、张金印说：“你俩个都成仙咧！过去你们是怎样来校的？秋步月土里土气，前脑门留了个‘灰猷’头发；张金印是从山沟里来的，后脑门留了个小辫子。我把你们收进来，现在不认我王藩臣了？”

“我们是考来的，怎能说是你收留了我们？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能培养奴才！”秋步月、张金印据理驳斥了王藩臣。王藩臣怒冲冲地指责说：“你们辱骂先生，破坏教育！”张金印将手一拍，秋步月、张含辉带领几名党员冲上讲台，台下的学生一哄而起，高呼口号，一举将王藩臣赶出了会场。王藩臣气势汹汹地去省府告状，省府立即派人将秋步月、张金印、张含辉、魏福林四人传到教育厅准备镣押。在校的共产党员联络了100余名学生去省府营救，据理争辩，省长刘治州才不得不将他们四人放回。他们回校后，继续发动全校师生，终于将王藩臣驱逐出学校。以后，由共产党员雷晋笙担任省立三中校长，聘请吕佑乾、柯仲平等任教员，学校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

4月，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号称10万之众的镇嵩军卷土重来，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过去刘镇华统治陕西数年，残酷压迫劳苦大众，早为陕西人民所痛恨。秋步月在西安党团地委的领导下，又积极参加了反对刘镇华围困西安的斗争。他和张金印、张含辉、陈子敬等组织三中学生上

街游行示威，并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分编成十多个演讲队，分布在南院门、钟楼、东大街一带活动。他和陈子敬在桥梓口演讲，动员市民支援守城部队英勇抗击，痛斥军阀的倒行逆施。他的演讲慷慨激昂，鼓动性强，激发了广大市民支援反围城斗争的情绪。

7月，在刘镇华围困西安的紧要关头，西安党团组织学生进行反围城宣传和做好救济工作。秋步月在党组织的指示下，积极筹措经费，购买各种办公用品，去各中等学校联络学生报名参加暑期学校学习。8月，在陕西党的负责人黄平万、吴化之的主持下，改组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秋步月当选为学生联合会委员。11月下旬，在国民军联军和守城军民的坚决抗击下，围城达8个月之久的刘镇华匪军被赶出潼关，陕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2月，秋步月按照西安党组织的决定，以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回礼泉县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从此，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铲除贪官

礼泉的家乡，对于秋步月来说并不陌生。经过调查，他深知驻军党玉昆（外号党跛子）盘踞礼泉两年，大肆吮吸礼泉民脂民膏，县知事陈钟秀为虎作伥，“置站笼之刑，行炮烙之威”，礼泉民众倾家破产，卖妻鬻子，身死户绝者屡见不鲜。面对这封建恶势力的黑暗统治，和那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秋步月思索着，谋划着，愤怒地写出了反抗封建腐恶势力的诗句，决心“推翻这恶浊的范围！”

秋步月和同伴商量，决计先从铲除贪官陈钟秀下手，为礼泉民众除害。2月7日，他将原筹办国民党县党部的刘清和、教师洪秋

涵和曹右武请进县城，在县公馆召开礼泉县党部“重新整顿”会议，积极筹备建立新的临时县党部，大刀阔斧地开展 work。这时，由于党玉昆军开往凤翔，陈钟秀失去靠山，被冯玉祥驻礼泉部队押在县署警察所。秋步月根据各界民众的要求，将陈钟秀从警察所揪到县署大照壁前示众。他对围观的民众说：“这就是恶贯满盈的县知事陈钟秀。各界民众和他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乡亲们！挺起腰来，不要怕县老爷，大家动手写状子控告陈钟秀！”围观者一时沸腾起来，纷纷质问县知事。陈钟秀汗流满面，点头哈腰，供认了他担任县知事以来的罪恶。不日，陈被解往西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

2月17日，秋步月在县公馆召集行政、教育界40余人参加的会议，正式建立了国民党礼泉临时县党部。大会推选秋步月为常务委员，曹右武、刘清和、吴光华、刘志学、宁中暄、洪秋涵为执行委员，并向全县发出《礼泉县党部为陈案告礼泉民众书》，号召全县“十八里同胞一致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共同努力奋斗”，铲除贪官陈钟秀。要求八区各举几个真正有才干的农民代表，成立“陈案委员会”，清算陈钟秀任内的帐项。

2月20日，秋步月代表礼泉民众，向西安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控诉陈钟秀在“礼泉接篆以来，不苏民困，肆其豺狼之成性，加以鬼蜮之手段，肥己虐民，横征暴敛”的恶迹；控告他草菅人命、浮摊滥派、纵吏殃民、敲骨吸髓、豢养爪牙、拉票索款、藉工索贿等七条罪状。

告全县民众书和陈钟秀七条罪状公布之后，激起了全县民众的极大愤慨。秋步月趁赵镇逢集之日，揭露陈钟秀的恶迹，动员群众反对贪官污吏。那天，赵镇南寺里人群拥挤，秋步月登上戏楼，大声喊着：“农友们，向大家告诉一件大喜事：咱们已把贪官陈钟秀任内的恶迹，控告给冯玉祥总司令！”台下数百双目光注视着秋步

月，倾听着他大气磅礴的演讲：“陈钟秀是咱县民众的大仇敌，大家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咱县除了陈钟秀这个贪官，还有没有污吏呢？”“有！”台下听众情绪哗然。大家议论着，怒吼着。接着秋步月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团，共共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

秋步月从赵镇返回县城，即刻召集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陈案委员会”，全面清算陈钟秀的帐项。陈钟秀任职仅两年，“收粮四次，叠派摊款除征粟粮草不计外，所掠民财不下600余万，均归私囊。”因为陈钟秀作恶多端，吞款甚巨，秋步月曾四次派陈案委员会委员去西安、潼关面见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坚决要求处决陈钟秀。

随后，冯玉祥迫于礼泉民众的呼声，即下令将陈钟秀枪毙在西安。秋步月一心为民众着想，勇于铲除贪官的革命行动，赢得了全县人民的拥戴。

建立农会

在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实践中，秋步月响应“党到农民中去”的号召，深切地感到现在“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而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团，“则宜用全力去做”。因此，他对临时县党部各执行委员说：民众是改造社会的英雄，若乡村有一半人参加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咱们打击地方恶势力，就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1927年春，县东北乡古村有个农民叫郭正芳，曾经带领农民抗粮抗款，打击土豪劣绅。秋步月觉得这个人见义勇为，有胆有识，曾三次写信和派人请郭正芳到县党部。郭正芳见秋步月性情豪爽，胸怀豁达，而又和蔼可亲，十分敬慕。两人促膝谈心，志向相

投。秋步月向他讲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工作方法,鼓励郭正芳积极建立农会,发展自卫团,继续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作斗争。

郭正芳回到县东北乡,先后深入到12个村子,建立农会,成立自卫团。2月中旬,北三区第一区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成立,郭正芳被推选为区农会主席兼任自卫团团头。

北三区第一区农会一成立,即领导自卫团和称霸当地的张世坤展开了斗争。张世坤是赵镇一带的“土皇上”,每年由赵镇向咸阳贩卖粮食,经常抢拉农民车辆、牲口,民愤很大。有一天,赵镇逢集,周尚文、杜思敏等几位学生在街上贴出“打倒张世坤,为民除害”的标语。张世坤发现后恼羞成怒,赤着身子,手持一把短刀,四处追赶学生以图报复。郭正芳闻讯,立即带领几名自卫团员,去南寺当场抓住张世坤游街示众。当天,郭正芳冒着大雨进城,向秋步月汇报了打击张世坤的情况。步月高兴地说:“农民自卫团就要这样干!”

2月下旬,县东乡阡东镇一带农民,在北三区第一区农会的影响下,要求组织农会和自卫团,秋步月亲临指导。不到半月时间,十多个村子建立了村农会和自卫团。3月9日,秋步月在阡东镇街召开东二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那天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农会会员和自卫团整队参加。力士村自卫团扛着长把梭镖,团头雷德田身佩两把利剑,威风凛凛;阡东镇小学60余名师生,打着彩旗,喊着口号也参加了大会。秋步月兴致勃勃地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东二区农民协会成立,是农友们的一件大喜事。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农友们要挺起身来自己解放自己,反对一切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

随后,在秋步月的领导下,阡东镇周围各村的自卫团,又展开了对区绅张伯年的斗争。张伯年在东二区私摊滥派,以肥私囊,横

行乡里，压榨百姓。范寨村自卫团团头高跛子联络力士村、徐家自卫团，将张伯年砍死在阡东镇北的分水岭上。第二天，高跛子带了几十名自卫团员，在阡东镇街上游行，向民众公布张伯年的罪恶。农民高兴地说：“自卫团为咱除了一个不敢惹的大祸害。”

4月，正是青黄不接。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县府还接二连三地向农民摊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秋步月决定发动农会会员抗粮抗款。他以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名义，向县府提交了抗议书。县府劣绅最惧怕农民起来反抗，不敢直接向下派款，假惺惺地采取召开县政会的办法，请农民代表参加，妄图将罪责转嫁给农会。秋步月看穿了县府劣绅的阴谋，将计就计，派出农会和学生代表参加县政会。他向代表说：“你们要代表农民利益，严督县府，不要上他们的当。”

有一次，在有农会和学生代表参加的县政会上，县府除摊派正粮正款外，还摊派了车马捐、枪支费、军用粮、预支款等苛捐杂税。参加会的代表提出抗议，同县府劣绅展开了说理斗争。县府见代表态度强硬，反抗激烈，不得不口头答应取消附加的不合理款项。过了几天，县府劣绅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增加了地亩捐、驮骡费。这下气坏了秋步月，他怒火中烧，立即在健行小学召开农会和学生代表会议，动员同县府劣绅作坚决的斗争。会后农会会员和县城内健行、县立高小、单级师范三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反对私摊滥派，减轻农民困苦”的标语，有的学生涌进县府，将标语贴在县长刘世泽的房门上。迫于农民和学生的压力，县府不得不给农民让步，减少了部分苛捐杂税。

1927年6月1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秋步月、宁中暄、刘光汉作为礼泉农民代表前去西安参加。大会期间，秋步月担任秘书处文书股主任，向大会作了礼泉农民协会筹备处的会

务报告,又以特约代表身份向大会作了演讲,被大会选为省农民协会委员会执行委员。

省农代会结束,他们回到县上,立即召开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传达省农代会精神,会上,秋步月兴奋地对大家说:“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陕西省农民协会,号召全省农民团结起来,向恶势力冲锋,以武装斗争争取幸福和自由。全省农民有了总的指导机关,咱县农民协会也要大力发展”。并当场指派与会各负责人,分赴全县各乡发展农会。

由于秋步月的坚强领导,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截至1927年7月,礼泉县建立了农协会筹备处,还建立了两个区农民协会、60多个村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3500多人;同时建立了90多个村农民自卫团,团员发展到2400多人,为后来的农民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教育

秋步月在担任国民党礼泉临时县党部常务委员期间,在以主要精力发动群众铲除贪官、建立农会的同时,还着力抓了改革教育的工作。1927年2月,王授金从西安回到家乡礼泉,亲自改组他和友人创办的私立健行小学,聘请秋步月担任校长。

当时全县仅有一所公立高级小学,被封建宗法思想统治,学校办的死气沉沉;县立单级师范传习所,是培养乡小学教师的场所,也被思想陈腐、脑筋顽固的所长李蔚之把持。秋步月任健行小学校长以后,深感“欲求教育之进步,非彻底改革不为功”。

为了推动教育改革,秋步月上下求索,内外访贤,决心鼎新革故,激浊扬清。他辞退了思想守旧的教员,聘请思想新颖,学识丰

富的曹右武、洪秋涵、许璞生等人进校任教。他和这些进步的教师办学,大胆地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学校一切重大问题,由教员民主讨论,吸收学生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学校建立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改变学生“死读书”的局面。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知识。白话文体、科学知识深得学生欢迎,课堂内外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气象。

秋步月十分注意培养青年教师,将教师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作为发展共产党员的对象。1927年3月,他介绍政治素质好、品德纯洁、愿为革命献身的曹右武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又介绍洪秋涵入党,在健行小学建立了中共礼泉第一个党小组,秋步月担任党小组长。这时候,他又在学生中做了大量工作,开阔了学生的思想境界,使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学生日益增多。先后接受强光耀、梁兆礼、袁遇端等9人入党,分编了3个学生党小组。健行小学成为当时中共礼泉党组织活动的主要阵地。

这时的礼泉县教育局长刘志学,是一位思想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在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担任执行委员期间,常和秋步月在一起,深受其革命思想的熏陶。他非常拥护健行小学的教育改革,积极提倡新思想、新文化,被秋步月接收为共产党员。从此,礼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被共产党员所掌握,为改革教育创造了条件。

秋步月一面直接抓健行小学的教育改革,一面也帮助抓县立高小的教育改革。这个学校师资雄厚、学生人数多,是礼泉文化荟萃之地,但它却被封建宗法思想严重的校长王太初把持。他千方百计抵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坚持复古,阻碍教育的进行,对学生的革新要求即不屑于听取,还诬为“胡闹”。1927年春,秋步月以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身分,常去县立高小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织学生联合会，推选学生康泰为主席，联络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和王太初的封建宗法思想展开斗争。王太初立即开除了康泰等3名学生代表，激起了县立高小全校学生罢课。秋步月闻讯即赶到学校，大力支持被开除的学生代表，发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驱逐王太初。

王太初被驱逐出校后，秋步月和县教育局长刘志学商议，委派曹右武担任校长，将思想陈腐、立场反动的教员革职，聘请奋发有为的青年段育藩、安廷选、王克敬等人任教。学校建立校务委员会，吸收教员和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师生共同废除了旧课本，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新思想、新知识在学生中广为传播，县立高小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

1927年6月，秋步月根据陕甘区委西路特派员的指示，在健行小学建立了中共礼泉特别支部，并担任特支书记，曹右武任组织委员，洪秋涵任宣传委员。

中共礼泉特支的建立，使这座古老的县城黑暗的夜空升起了一颗灿烂的明星。从此，礼泉教育界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7月，在县立高小，秋步月和曹右武先后介绍段育藩、安廷选等教员入党，成立了教师党小组，曹右武任组长。接着他们又在学生中发展党组织，吸收康泰、郑宗伯、虎学英等学生入党。短短3个月内，全校已发展近20名党员，建立了县立高小党支部。这里成为中共礼泉党组织的又一重要阵地。

为了培养改革乡村教育的骨干，秋步月指示共产党员赵志静，去县立单级师范学生中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接受董佑民、郑朝英、周梦雄等9名学生入党，建立了单级师范学生党小组。秋步月还指示共产党员段培德前往县东乡阡东镇小学，发动学生将反动校

长张含永赶下台,让教育局派共产党员赵志静担任了校长,赵运昌、李培芝等共产党员任教员,教学和学校管理都采用了新学制、新教材。至此,礼泉城乡几所主要学校的教育阵地,都被共产党所占据,为后来礼泉革命斗争的发展培育了人材,积聚了力量。

传播马列

一场接一场的激烈斗争,使秋步月深深地感到:要唤起千百万人的觉醒,必须将马列主义传播到劳苦大众中去,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改造那黑暗的旧世界。

在日常的群众工作中,他利用各种演讲的机会,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农民宣传马列主义,鼓舞他们挺起腰杆闹革命。他以健行小学、县立高小等几所学校为阵地,在教员、学生中广泛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导他们探讨社会问题,研究现实斗争,启迪他们跟上革命新潮流,勿作时代的落伍者。

1927年暑期,秋步月和共产党员、县教育局刘局长刘志学商定,举办一次乡小教师讲习会。确定这次讲习会,以学习马列主义为内容,开拓乡小教师的思想境界,培养一批宣传骨干。暑期教师讲习会开学典礼在县立高小举行。参加大会的有60多人。秋步月作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结合现实斗争联系起来讲解,引起了与会教师的极大兴趣。讲习会的任课教员分科讲授,师生民主讨论,各抒己见,学习气氛十分浓厚。

一天,驻礼泉的冯玉祥部队中一位文质彬彬的军官正在校院里踱步,室内秋步月侃侃而谈的演说,明晰透彻的马列哲理,留住

了他的脚步。他站在窗外静听一会儿，再也不走动了。秋步月的讲授感染了他。讲课刚结束，这位军官便以十分崇敬和钦佩的心情，向着教室内外的人群高喊：“真了不起！你们礼泉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人才。”过了一天，这位军官亲自登门邀请秋步月给他们部队讲课。在县城东门外的广场上，秋步月讲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引起官兵的极大兴趣。

讲习会宣传马列主义的风声越来越大，吹到了县老爷的耳里，县长刘世泽大惊失色，狂叫“秋步月胆大包天，竟敢宣传马列主义邪说，蛊惑人心！”他带领几名绅士，气势汹汹地来到讲习会。这天，秋步月正巧讲授《社会进化史》，刘世泽一听是“猴子变人”，带着嘲讽不解的口吻问道：“你讲授的是马列主义吗？”听了刘世泽的提问，秋步月立刻想到，一个平日只知肥己虐民的人，哪能懂得马列主义，顺口答道：“我讲的是从猿到人的演变史，难道这也错了吗？”刘世泽不学无术，分辨不清，又怕在众人面前丢了丑，便故意卖弄威风，当场向学员说了几句“当官要清廉正直，百姓要听当官人的话……”没等他的话讲完，听讲的学员便你一言我一句的嘀咕了起来：“你口头上讲的是‘清廉正直’，实际是‘掩耳盗铃’！”刘世泽刚走下讲台，秋步月愤然登台，针锋相对地说：“当官要为民众着想，那些利欲熏心，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老百姓绝不能听他们的话！”这一席话，恰好如芒刺背，深深刺痛了刘世泽。刘世泽满面通红，狡黠地说：“当官要随潮流而动，冬天穿棉的，夏天穿单的，不能逆流而进。”说完，尴尬地带着几名绅士溜走了。这场辩论，对参加听讲的学员震动很大。大家敬佩地说：“秋步月真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刀刀见血！”从此，县长刘世泽再也不来讲习会指手划脚了。

1927年，蒋介石、冯玉祥相继叛变反共“清党”后，秋步月不顾个人安危，和其他党员一起，深入广大农村，发展农民党员，扩大党

的组织。10月，城乡已建立了两个基层党支部，3个基层党小组，党员发展到60余人，建立了中共礼泉区委。11月上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秋步月在健行小学召开了10余人参加的党员代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礼泉第一届县委。秋步月被推选为县委书记。委员中有曹右武(兼组织)、刘志学(兼宣传)、曹东山(兼军事)、洪秋涵(兼农民工作)。

中共礼泉县委建立后，秋步月仍以健行小学为中心，秘密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这时候，陕西省委已经作出了反对冯玉祥的总部署，全省人民反蒋讨冯的声浪很高。但是在陕西的冯军仍大肆摊派粮款，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秋步月面对这严酷的斗争现实，怒不可遏，愤慨地写出一首抨击蒋、冯叛变革命的歌谣，这首通俗的歌谣被印成传单，散发到全县各乡。东乡的共产党员杨居智接到传单，和村自卫团团头张福云、杨天春，在泔河沟边一个土窑里开会，连夜将歌谣散发张贴到30多个村子。

随着时局的逆转，礼泉县的反动势力伺机反扑过来。11月间，被礼泉人民斗倒了的政界五大劣绅勾结起来，以“共党嫌疑”为由，联名控告秋步月，攻击健行小学是“共产党活动的秘密机关”。县长刘镜堂下令查封了健行小学，撤销了秋步月的校长职务，学生全部并入县立高小，教职员工听候任用。小小的礼泉县城，白色恐怖已经日甚一日。

这时，年轻的秋步月却十分沉着冷静。他针对反动势力的种种卑劣手法，断然决定将县委机关由健行小学转移到县立高小，将被查封的健行小学党小组，亦并入县立高小党支部统一领导。县立高小的共产党员，由原来的20名增加到30余名，党小组由4个增加到10个，成为当时党组织力量最雄厚的一个学校，也是县委机关新的活动基地。12月，教育界的五大劣绅又联名控告县立高

小校长曹右武，秋步月和教育局长刘志学商定，赶快采取应变措施，派共产党员安廷选担任了县立高小校长。在白色恐怖中，秋步月坚持斗争，又领导礼泉单级师范传习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开展了驱逐反动校长李蔚之的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单师学潮”。

1928年1月，礼泉全县党员发展到90余人。秋步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发出的《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的要求，在县立高小秘密改组了中共礼泉县委，他仍担任县委书记，同时建立了共青团礼泉县委，曹右武任团县委书记。经过调整，党团县委成员中增加了工农先进分子力量，为党到工农中去创造了条件。

发动农暴

1928年，陕西关中年馑已经露头，农村一片荒凉，不少农民处于啼饥号寒之中。军阀、官绅催粮逼款有增无减，高利贷者乘机重利盘剥，民众奋起反抗反动政府黑暗统治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城乡。

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指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的努力于鼓励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省委还把礼泉划为关中西区的暴动中心。2月中旬，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程士诚来礼泉，传达省委二十六号通告精神，要求礼泉县党团县委要配合渭华农民组织暴动。

这时候，秋步月正在乡村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抗

粮、抗税、抗捐。接到省委通知后，他深感责任重大。面对县长朱家骥大肆“肃共”，曹东山叛变，县城内的党团组织随时有遭敌破坏危险的现状，经过一番冷静思索，秋步月决定立即将党团县委机关由县城转移到县东乡阡东镇小学。并将负责宣传的吴光华和县委委员段育藩调去任教员，使领导机关避开敌人的锋芒，成为农民暴动的指挥中心。

接着，秋步月又召集党团会议，决定党团县委委员离开现职，深入到乡村去发展农民协会，扩大自卫团武装力量，为农民暴动作好准备。县城内党团员已暴露的也即刻转入乡村，参加农民暴动。

经过一段艰苦的组织与发动工作，农民中的党团力量发展很快。当时，分布在全县各乡的共产党员已有 110 多名，共青团员 180 多名，村农会会员和自卫团团员达 6000 余人。

3 月下旬，敌人多次在阡东镇小学搜捕秋步月等县委领导人，形势又趋紧张，党团县委急需转移。几经商议，决定将党团县委机关转移到县东北乡山区的东坪里。

东坪里，位于九骊山唐太宗陵南麓，沟壑纵横，山峦迭嶂，绿树蔽野。登上山顶，鸟瞰泔河南北，远近景色尽收眼底。

初到东坪里，秋步月身着蓝布长衫，戴一顶礼帽，俨然一派旧学者的模样。有人问他上山干啥，他总以考古家的口气回答：“考察古迹。”他住在沟畔一户贫苦农民董大的土窑洞里，晚上打着草铺睡觉，白天伏在土炕上工作。董大住的土窑里有一口地窖子，是他在紧急情况下隐蔽藏身的地方。

秋步月在东坪里，含辛茹苦，运筹帷幄，日夜谋划着农民暴动。当时，正值农村缺粮饥馑之际，穷人们听说他为劳苦大众办事，想方设法给他送东西。秋步月就靠着这些农民送来的食物勉强度日。就在这样历尽艰难的严酷环境中，他和县委委员段育藩一起

写出了激励人心的农民《起义歌》：

农民为何不觉悟？
军阀争权利，混战已无时。
豪绅们和悍吏，层层压迫你；
有饭不得吃，有屋不得住。
可怜农友们，只知长嘘气，
痛心疾首，饮泣吞声，为人作奴隶！
快快团结起来，自己靠自己。
勿叹息，勿饮泣，加紧战斗力！
要利你兵器，高举你战旗！
军阀和豪绅，一齐都杀死。
打破铁锁，摆脱压迫，走向光明地！

这首气壮山河、笔势凌厉的起义歌，在发动农民暴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鼓动作用。

同时，秋步月又起草了《礼泉农民起义书》。县委委员赵志静拟写了传单和标语口号。写好后，到山下印刷，然后迅速发到全县各乡。

这时候，秋步月除了组织党团骨干深入各乡村做群众工作外，着重抓了自卫团的发动工作。他和郭正芳、张振域等人，在县东北乡古村保安寺召集各村自卫团骨干千百八人开会。在会上秋步月动员大家说：“眼前渭华农民已经拿起武器，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大杀土豪劣绅，焚烧文约地契，没收地主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咱们也要拿起大刀、梭镖，推翻反动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农民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为了试测民心，秋步月让各村农会采取传递托托馍的办法，作一次发动农民暴动的预演，结果全县东南北各乡农民一齐动手，一夜之间传遍了大小村庄。一切筹备妥当，农民暴动的烈火很快就要燃烧起来了。

4月29日，星光渐隐，曙色微露，秋步月、赵志静和杨居智，经过上半夜的辛劳，还正在熟睡之中。探听消息的韩生辉突然上山来到东坪。他急切地对秋步月说：“郭正芳派我告诉你们，眼下冯玉祥在潼关外军事吃紧，陕军大部出潼关，各县武装去西安守城，县城空虚，听说县府打算调北乡南坊的土匪进入城内。”听了这个消息，一向沉着冷静的秋步月，一下跳了起来，果断地对赵志静、杨居智说：“陕军出关，防务空虚，我们暴动的时候到了，机会难逢。”三人就地研究，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决定立即行动。他们顾不得洗脸，用白布单子将党内文件和办公用品卷起来，匆匆下山。天气突变，风雨交加，道路泥泞，约莫早饭时刻，到达赵镇上堡子，适逢曹右武在他岳父家，四人连忙详细讨论了草拟的《农民暴动决议案》，并发出通知，决定当日晚在县东乡金家寨的万缘寺召开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部署暴动。

是日傍晚，北宁村通往阡东镇大路北边的金家寨，被夜幕笼罩着。万缘寺残垣断壁，殿内神像怒目横视，呈现出一派阴森景象。晚8时左右，荷着长把梭镖的青壮年农民，分路涌向万缘寺，到会80余人，大多是党团或农会、农民自卫团的骨干。罕无人迹的殿堂里，肃穆静谧，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鼓舞着自己的斗志，然后静听着秋步月关于大暴动决议案的演说。只见秋步月神情激昂，挥着两个拳头说：“农友们，暴动的时候到了！当前新旧军阀争权，县上的反动武装调往西安守城。我们赶快团结起来，高举镰刀斧头红旗，扛起你们的大刀、梭镖，英勇地围攻县城，建立苏维埃政

府，坚决地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攻！”

这句句像重锤擂鼓似的语言，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了大暴动决议议案，并议出了六条具体行动方案。

会议决定：秋步月为暴动总指挥，曹右武为副总指挥，县委委员雷德田为农民自卫团总团头，并确定了各乡的带队人。会后，秋步月即刻发出淡红和浅黄两种颜色的鸡毛传帖，通知各乡农民，按预定时间围攻县城。

第二天，党团干部按划分的区域，就地组织暴动力量。秋步月和党团县委委员，辗转奔波在各村庄，动员自卫团磨利大刀梭镖，准备向恶势力来一次勇猛激烈的冲刺。

5月1日，星光微淡，东方慢慢地浮现出鱼肚白，大暴动的烈火在泔河南北燃烧起来了。这天，共有18000多农民，荷着木杈粪耙帚、铁锨棍棒、大刀梭镖，气热磅礴、浩浩荡荡地涌向礼泉县城。早上，县北乡1500多农民，围攻县北门；中午，南乡7000多农民，围攻县南门；下午，秋步月和赵志静、郭政芳带领东乡和东北乡万名农民，由东向西涌来。前面一面镰刀斧头红旗迎风招展，后边人浪滚滚、杀声震天。“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支声势浩大的农民队伍，像春潮似的涌向县东门。县长朱家骥惊慌失措，急令用“九节犁”土炮向城下轰击，南扶村一位老农不幸被弹片击伤，攻城农民怒火倍增，纷纷要求用麦秸烧开门，冲杀贪官污吏。

傍晚，蔚蓝的天空蒙上了一层薄雾，冲杀声、口号声慢慢地缓落下来；时入深夜，月冷露重，四野顿时寂静，远处坟庄的犬吠声，清晰可闻。城内官绅们恐慌万状，叛徒曹东山和李蔚之提心吊胆。

他们在城西北角拴下两条大井绳，以备城破逃跑。县府劣绅晁肃亭、陡松年、康振华登城巡查，以防农民攻城。守城顽兵手执火把，不住地呼喊，巡防着。攻城农民在东门外南北二店、东西马路两旁枕戈待旦，还有人唱着“东吴大报仇”的秦腔戏。

这时，秋步月发现一些人有了松懈情绪，便在东门外南店召开党团县委联席会议，动员大家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一鼓作气，斗争到底。

黎明时分，秋步月派县委委员赵志静去县东乡发动农民，继续壮大围城队伍；派团县委委员袁遇端去县南乡重新组织力量，支援东门攻城；又派自卫团团员去泔河滩砍伐树木，制造云梯，准备晚间攻城。

2日早饭前后，县城附近的男女老少，纷纷给攻城农民送饭、送水，进一步鼓舞了攻城农民的斗争情绪。

攻城持续到中午，县长朱家骥派路过礼泉的冯玉祥部队一名副官出城调解，秋步月在南店的土炕上拟出三项谈判条件：其一豁免粮款；其二惩办劣绅王渭滨、李蔚之；其三交出叛徒曹东山的首级。他派团县委委员张学海出面谈判。那名副官听了谈判条件，进城复命。县长朱家骥暴跳如雷，急令已调进县城的土匪头子陈伯龙、李世龙整饬匪徒，备好枪支、大刀，伺机袭击攻城农民。

日偏过午，秋步月听到有人说县东南乡有一股武装，有枪有人。他觉得这是一个希望，一个念头应运而生，想借用这股武装力量，协助攻城，便和曹右武等四人前往协商，临行将攻城指挥权交县委委员段育藩代理。恰在这时，朱家骥令匪徒陈伯龙、李世龙带人出城来包围南北二店。手持权把、梭镖的农民和手持长枪、大刀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战斗异常激烈。县委委员、自卫团总团头雷德田手持利剑，接连砍倒几个敌人，掩护农民撤退。共产党员、新城

村自卫团头李元生手持梭镖，直刺敌人。短兵相接半个多小时，敌人持长枪、大刀。雷德田、李元生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七名党团骨干和 50 多名攻城农民被俘。这时，秋步月还没有回来。待他听到县城枪声紧急，迅速赶回时，攻城队伍已被打散。敌人于当晚即杀害了北寨村和徐家村农民自卫团头陈天德、徐连宽。数日后，又残杀了县委委员段育藩和共产党员张学海、郑宗伯、虎学英四人。

礼泉农民暴动失败了。作为领导这次暴动的党的县委领导人秋步月，心情无疑是十分悲愤的。但他没有低头，更不会屈服。他和农友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

重 整 旗 鼓

1928 年 5 月 4 日，农民暴动失败后的第二天，秋步月仍然穿着那套被风雨濯得褪了色的蓝衫灰裤。因为劳累而显得消瘦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仍不时地放射出凌厉的光芒。但是，令他困惑不解的许多问题仍日夜缠绕着他，他思索着：礼泉暴动为什么会失败？失败后斗争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在县东乡的沿村小学召开的党团县委会议上，面对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说：“我们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配合了渭华起义，打击了反动势力，锻炼了党团干部和广大民众。鲜血绝不会白流！这鲜血激励着我们，要重新拿起枪杆子继续战斗，他又说：“要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辛亥革命失败之余，困难甚多，一些人气馁了，孙中山先生告诉大家‘一败何足馁’。我们一定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踏破敌人老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县团委委员杨居智接着说：“剩得头颅报死友，凭藉热血战群魔”。

沉闷的气氛驱散了，会场上顿时出现了一片活跃气氛。大家决心振作起来，继续战斗。

5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蒲克敏来礼泉视察，协助党团县委整顿工作。秋步月在沿村和启学家召开党团县委会议，详细汇报了大暴动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健全党团县委，恢复党团基层组织活动，选拔新干部，对反动势力展开新的斗争。

秋步月在县东乡打击劣绅的活动，震惊了县府当局，县长朱家骥以500块大洋悬赏缉拿秋步月的首级。一时，缉拿他的喧嚣声大作。面对这血雨腥风，县委成员和战友们劝他暂时出外隐蔽一段时日。秋步月谢绝他们的劝告。他坚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革命力量必定战胜反动势力。

6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考虑到礼泉的形势和秋步月的处境，决定调秋步月回省委，派吴焕然任中共礼泉县县委书记。后经吴焕然挽留并向省委作了汇报，秋步月仍继续坚持在礼泉帮助工作。他隐蔽在本村战友秋景桂家里。在秋家的楼上，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发展党组织和反对县府的重要部署。他将部署的内容写成文件，让秋景桂的儿子秋宏传递给支部党员。13岁的秋宏，聪明伶俐，机智勇敢，多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秋步月甚为赞赏，对秋景桂说，这孩子日后是个大有作为的人，并留心培养秋宏，给秋宏介绍易懂的进步书刊，讲解革命道理，让他参加社会活动。在秋步月的教诲下，秋宏进步很快，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斗了10多个春秋，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军队领导干部，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在解放豫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不久，秋步月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又转移到纪村岳父家里。这是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妻弟晁汉杰是共产党员，和步月是同窗好友，曾经积极支持他从事革命。二妻弟晁汉琦思想进步，经常

给他传递文件,主动当交通员。秋步月在纪村指导县南各乡村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成立自卫团,打土匪、杀恶差。抗粮抗款的斗争声势,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视,他又不得不转移到阡东镇、西张堡一带继续活动。

求 索 之 路

1928年10月下旬,秋步月听到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的消息,深感处境更加困难。白色恐怖已经使他无法立足。革命向何处去?道路向何处寻觅?一连串的问题,使他感到犹如离群的孤雁,不知飞向何方。

他奋笔疾书:“谁云宇宙扩大,何缘竟无处归宿!”

秋步月反复思索着:国内省内许多起义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当他得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举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时,顿时思绪腾飞,愁云顿消,眼前豁然开朗了。他毅然决定要去井冈山,寻觅革命的真谛。

1928年11月11日,正是农历菊秋九月最后一天。忙碌奔波了一天的秋步月,傍晚才回到家里,一见妻子晴雯就说:“赶快给我拾掇行李,明天我要走了。”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晴雯紧皱着眉头,流露出焦虑和担忧。

秋步月告诉她,反正在礼泉呆不住了。他要妻子照顾好老人、孩子。

他的话说得很轻松,语气也相当缓和,他怕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使她害怕,让她替自己担心。

尽管这样,离愁和担忧一齐袭上晴雯的心头。她的脸庞一下

变得那样的苍白。

秋步月完全知道妻子晴雯对他的忠贞和笃爱。他们婚后数年,没有赌过气,没有红过脸,在他许多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她都能默默相助。为了他的事业和抱负,她在这个家庭含辛茹苦,已经尽到一个农家妇女应尽的一切。她和他的事业已经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

“晴雯,”秋步月轻声地说:“不要怕,没什么要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我一出去,还要比家里更安全,你就放心吧!”

行色匆匆,离怀耿耿。后来,秋步月在旅途中,写下一首饱含眷恋之情的《忆别离夜》诗,是当时他们夫妻离情别绪的真实写照:

为免想别离,相期各早眠。
朗醒先燃灯,移置爱人前;
推醒不相怪,反愿竟夕谈。
归期呐呐问,情意最堪怜;
相爱总不厌,夜短两共嫌。
鸡鸣心转惊,儿啼情益绵;
灯昏乃吹灭,曙光照窗沿。
最是断肠时,影与晨星完。

天亮后,秋步月先去挚友许璞生家,告知自己出外的打算,将他写的《交农记》、《荒年歌》和保存的共产党员名册,都交许璞生保存。许璞生将家里的一头毛驴卖掉,为他资助了路费,还为他换上一套农民装。

两日后,秋步月安步当车,从县南乡出发了。他巧妙地闯过道道戒备森严的关卡,自如地应付了节节车船码头的盘查。多数时

日，他夜行晓宿，经西安，过商州，下武汉，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要凭借他的意志和两条腿找到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山高林密，地势险要。1928年底到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人正在发动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秋步月怎能知道，此行遇到这样不好际遇呢？

1929年1月上旬的一天，秋步月千里迢迢，备受艰辛，由武汉到了南昌，来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北段。当时湘赣两省敌人把井冈山围得水泄不通。秋步月尽管两次三番巧施机关，仍然无法过境。

秋步月住在客栈，十分揪心。最使他不能平静的，是他南去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在简陋的客栈里，有时他心急如焚东访西问；有时，在孤寂中写诗抒怀。后来他得到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撤离井冈山，转移到赣闽边界的消息，万般无奈，只好折回武汉，此时，他几乎身无分文，生活毫无着落，靠每日拉洋车或打日工度日。说来也巧，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出差到武汉的襟弟刘东京。刘见他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当即给了他30块大洋。秋步月就用这笔钱租了一间街房，开了一个小面店谋生。

绝望，不能使人新生；信心，才是开拓新的事业的支柱。身处逆境的秋步月，没有失去斗争的勇气，继续寻找党组织，寻找一条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每日东奔西走，探询消息。他了解到，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差不多都因为敌人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有一次，他听到距武汉三镇不远的湖北黄麻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立即把面店生意停业关闭，返回陕西。

4月中旬，时令已是三春时节，秋步月行踪倥偬，经商州，越秦

岭,艰难地行走在坎坷的道路上。一日,到了蓝田县的兰桥镇,已是夕阳衔山,鸦雀归巢的时候。他精疲力尽,饥渴交加,简直是步履艰难,无法投足了。这时,恰巧遇见了他在西安省立三中上学期间的挚友晁宏道。数年不见,邂逅相逢,两人执手相看恍然若梦,亲热之情,自不待言。此时,晁宏道正在兰桥镇办粮站。他将秋步月拉进了粮站一座僻静的小房里,从头到脚再三把他端详了一番。只见他衣衫破烂,形容消瘦,脸上挂了一道血印,浓眉下,那双聪慧的眸子依然炯炯有神。宏道关切地说:“你家不缺吃穿,又有贤妻爱女,何不享天伦之乐,却要南北飘零,担此风险!”秋步月一听此话,心头一震,语气激昂地答道:“眼前军阀混战,国运危急,蒋介石窃取国民革命权力,大肆屠杀爱国人士和无辜民众,无耻投靠帝国主义。国破家亡就在眼前,天伦之乐从何而享?”

晁宏道频频颌首。

秋步月感慨万端地继续说:“革命道路真是崎岖不平。这次远行,给人拉洋车,打短工,风餐露宿,爬山涉水,才饱尝到人世的艰难,体察到非革命社会不可救药的道理。因此,我才不以为苦,以寻求革命真理而为乐。这苦,强健了筋骨,磨练了意志,开阔了眼界,看到了革命的曙光。”

“外边的工农革命,成功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晁宏道插问。

“不论小县份,还是大城市,我所得到的最重要一着:凡是拿起枪杆子,革命大有成功的希望;否则,皆遭失败。我这次回去,一定要组织革命武装,拿起枪杆子向反动势力挑战。”

两人一直谈到夤夜。东方刚一露白,晁宏道就送他出了兰桥镇。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秋步月急切地踏上奔向家乡的归途。

组 织 武 装

1929年，正是关中农村大灾之年。赤地千里，饿殍时见。官府盘剥有增无减，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4月，秋步月回到久别的家乡，和亲人团聚了。父亲秋孟龙听到儿子半年辛劳奔波的遭遇，看到他形容消瘦，衣衫褴褛的情景，疼爱地抚摩着儿子肩膀说：“咱家骡马庄房都有，你还是回来经营家业，过好日子，再莫到外边受苦了。”

老人的一片良苦心情，秋步月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他心里想的却是怎样组织农民武装的问题。他从几年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深切地体会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他向父亲说：“目前灾荒严重，县府苛逼粮款，买支枪，让我来对付他们，保卫我们的家乡，也保住咱这个家！”

秋步月的话，恰说到父亲的最关切处。孟龙竟然应允了他的要求，并关切地说：“官府耳目甚多，你回来了，还能不引起他们的注视？快把衣服换了，装扮成乡村看病医生。若买到枪，暗藏起来，千万不能露出风声！”

这时，秋步月在礼泉的好友，早期的共产党员陈嘉惠，听说秋步月回来，高兴地来看望他。陈嘉惠见秋步月头戴瓜皮帽，身着蓝长袍，俨然一副乡村看病先生的模样，惊异地说：“怎么这样打扮？”秋步月以目示意说：“眼下敌人盯得紧，不是越灰色越好吗？”

故友重逢，秋步月满怀信心地告诉了他要组织革命武装的想法。陈嘉惠赞同地说：“赤手空拳干不成革命！过去敌人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劳苦大众只有流血。有了枪杆子，我们就会吃掉敌人。”

秋步月说他父亲答应卖掉家里一匹骡子，帮他买枪，请求陈嘉惠助一臂之力。陈嘉惠慨然允诺，将自己家里一头驴卖掉了，资助了他。不久，秋步月买到了一支短枪，这是他组织礼泉革命武装的第一枝枪。

5月，秋步月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接上头，省委指示组织农民武装，积极筹集枪支，开展游击战争。秋步月回到县南乡，在史北村强光耀家里召集参加过农民暴动的共产党员，传达临时省委指示，动员大家设法筹集枪支，以真枪实弹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候，在兴平县灾民暴动中崛起的农民武装朱佐周部，打富济贫，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秋步月对此颇为钦佩，便同共产党员冯世杰去找朱佐周，和他促膝恳谈，要求他帮助筹集枪支，朱佐周慨然拿出两支枪支援给他。

7月，临时省委派往省西区任中共西府区委书记的陈云樵与秋步月取得联系，指示他继续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秋步月便召集陈嘉惠和参加过农民暴动的党团员10余人，研究收缴地方民团枪支和向兴平、乾县一带扩大农民武装问题。不久，共产党员张开选、魏秉荣、晁汉杰、徐朋飞等人，都参加了秋步月领导的武装斗争行列。此后，秋步月想尽一切办法筹款买枪，便到县东北乡的古村，托郭正芳在山后百井村开土特产杂货铺，为购买枪支积累资金。

为了筹集买枪的资金，秋步月东跑西安，西去乾县，南走商州，经过各方奔波，搞到十五六杆枪。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他去县东乡沿村，联络和启学组织的武装，商定联防，若有事情互相调动。他和强光耀、张开选等人，几次去兴平马嵬、界庄，联合那里的农民武装首领张百忍、朱佐周，和他们一起在西府区委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

1930年1月上旬,中共西府区委军事工作会议在礼泉史德镇召开。陈云樵主持会议,秋步月、吴焕然、张辉、张百忍、朱佐周等人参加。会议总结了周至暴动失败的教训,安排了礼泉、兴平等六县的工作,决定继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礼泉支队和张百忍大队。并决定恢复中共礼泉县委,任命秋步月为县委书记,兼任礼泉游击支队司令员。

游击队的建立,使礼泉第一次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和张百忍、朱佐周的武装力量,相互配合,活跃在礼泉、兴平、乾县一带,闹得地方反动当局日夜不安。当时的《新秦日报》曾经报道:秋步月“匪胆包天,醉心赤化。……曾经县府悬赏缉拿有案,后又盘踞县南,宣传共党,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历任县长,多无办法。”

革命武装的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劣绅的反动势力,挫败了官府私摊滥派的势头。

招抚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惯用伎俩。时任千陇游击司令的甄寿珊,派赵特伯来礼泉收编秋步月的武装游击队。

赵特伯是秋步月在西安三中上学时结识的朋友。他曾经先后两次去见秋步月,都被秋步月严词拒绝。他对赵特伯说:“你我相处不止一日,定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情和为人。我是宁为正义献身,断不愿寄人篱下的。”赵特伯无趣,只好怏然而去。

壮烈牺牲

反动当局为了消灭秋步月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惜采取更加卑劣的手法。礼泉新任反动县长谢鸿章一到任,就收买了土匪头子王振邦,委以清乡队队长,派驻县南乡帝尧村,专门对付礼泉游击

支队。秋步月和王振邦是同村人，曾经是孩提之交。怎料王振邦投靠敌人，狼狈为奸，对秋步月暗下毒手。

此时，秋步月的游击队在县东乡沿村一带活动。游击队的指挥中心——张冉村只留下他和强光耀、张开选、徐鹏飞少数几个队员。

1930年5月9日晨，天空，乌云翻滚，大地狂风呼啸。就在这天上午，王振邦秘密武装包围了张冉村，派心腹翟升子，带领30余名匪徒，手握长短枪支向村内猛扑进去。

“由帝尧村方向，上来一排人马，要包围张冉村。”在房顶上瞭望的张开选，急忙跑下来告诉秋步月。秋步月立即决定向纪村方向撤退。

刚撤退到纪村附近，他们就被翟升子带领的匪徒包围。匪徒们面目狰狞，凶相毕露，逼着秋步月缴出游击队的枪支。秋步月镇静自若，定了定神，心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想先将敌人诱进纪村，伺机脱身，遂对匪徒们说：“枪放在纪村我舅家和岳父家，你们跟我走。”

匪徒们信以为真，紧盯着秋步月进了纪村。他们在两家搜了数遍，一枝枪也没有搜查出来。这时候，匪徒们疯狂地暴跳起来，要将秋步月押进县城邀功请赏。

说也奇怪，这时突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半空中一片昏黄的愁云，低低地压了下来，雨点夹杂着沙土，真是天怒人怨。纪村的男女老少，站满了街道，人们惊叹着，议论着，抒发着不平之气：“这样好的小伙子能叫土匪抓走？”

“他为农民办了多少好事，谁伤害他，绝没有好下场。”

“跟上走，不能让土匪暗算他。”

“哗啦”，一群民众，紧紧跟在秋步月的后边。

大烟吸得面色蜡黄的翟升子，声嘶力竭地吼着：“回去，快回去！不然我要开枪！”然而，民众依然紧紧地跟着。

当匪徒们一步步逼着秋步月，走到距纪村半里路的高高庙附近一个麦场时，心情沉如铅块的秋步月，面色铁青，眼神阴郁。他已经感觉到一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了，忽然蹲在场边的碌碡上。一种浩然正气使他义愤填膺，横眉怒视，指着翟升子厉声痛斥道：“你和王振邦都是土匪，残害民众，抢劫财物，贪官劣绅给你们封官许愿，你们就为他们卖命，真是无耻！”

匪徒们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了。翟升子暴跳如雷，枪口对准秋步月的脑门说：“不缴枪，就枪毙你！”秋步月临危不惧，斩钉截铁地说：“你今天枪毙了我，明天就有人枪毙你。我们的枪支岂能交给你们这伙土匪！”他怒火千丈，双目圆睁，直瞪着翟升子。翟升子急令匪徒开枪打死了秋步月，并将他的头割下来，于当日下午送进县城“示众”。

秋步月牺牲了。一个年仅 28 岁满腔热忱的爱国青年，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留给人们的是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他那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顽强奋斗的革命品德和博大胸怀，以及他所闪现出来的一身正气、志气、朝气和才气，将永远成为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

（张彦杰 张世杰 任义长）

张 含 辉

(1902—1933)

张含辉,原名松林,字蕴山,化名光军、英侠。陕西兴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省总工会常委。1929年到北平(今北京)任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1930年到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调回陕西,在邓宝珊部从事兵运工作。1933

年夏入四川为杨虎城部警卫团与红四方面军联络,途中遇难。

—

张含辉,1902年4月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界庄的一个农民家里。张含辉小时在宋村沟私塾和兴平县高等小学读书,勤奋好学。1922年春考入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逐渐接受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同校内外的封建顽固势力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宗教迷信进行斗争。

1924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到三中任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对张含辉勇敢斗争的精神十分赞赏,同时教育他阅读《社会发展简史》、《唯物史观》、《向导》、《共进》等进步书刊。

1924年秋,张含辉经魏野畴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进

步组织——青年生活社。随后，当选为青年生活社和西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并常在进步刊物《青年生活》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

1925年4月15日，张含辉在西安各群众团体联合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上代表市学联讲话，指出：孙中山是世界上伟大的革命家，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1925年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殴伤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慨。根据团组织的决定，张含辉等通过市学联和青年生活社领导学生举行罢课，要求严惩肇事元凶。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讲演，贴标语、散传单，动员群众参加驱吴斗争。军阀吴新田竟下令派重兵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张含辉按照团组织负责人魏野畴的指示，前往三原杨虎城部求得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同当地团组织及学联负责人李子健、张仲实、赵宗润、王云等人一起，领导驱吴运动，还和高克林代表学联去潼关、河南向国民二、三军请愿，吁请援助驱吴斗争。

同年6月中旬，驱吴运动高涨之际，又传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激起了陕西广大人民的愤慨。张含辉协助魏野畴领导青年团和学联立即在三原地区组织各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印刷传单和宣言，成立宣传队、讲演团，动员城乡人民积极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为进一步发挥学生会的作用，西安和三原地区的团组织共同研究决定统一全省的学生组织。7月7日至13日在三原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张含辉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张含辉等人起草的十余

项反帝反封建的议案。张含辉在会上当选为省学联主席^①。

同年7月中旬,军阀吴新田率部向西撤退,逃窜至汉中。下旬,张含辉和战友们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从三原回到西安,根据团组织的指示和学代会的决议,立即投入了同教育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之中。他亲率学生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改良现行教育,并组织学生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一怒之下,把省立一中校长侯良弼(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与其他学校几十个思想陈腐的教职员,赶出学校;还在省议会门前,把一些反动议员责骂一顿。教育厅长郗朝俊怕学潮酿大对自己不利,便满口答应了张含辉等代表省学联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去办;(三)教育人才今后当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格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而感着教育有趣者为合格。”^②但郗朝俊并不准备实行自己的诺言,几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教育经费未曾独立,连本学期的学费也未筹下;不仅没有把品学兼优的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授予佛教徒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康寄遥随时有解散学校的大权。凡此种种,激起了西安学生的强烈不满。张含辉根据团组织的决定,于9月16日组织西安、三原、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省教育厅当面质问郗朝俊。郗朝俊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张含辉便发动各个中小学的学生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把郗朝俊驱逐出教育厅。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郗朝俊教育厅长职务,康寄遥也被女师的学生赶出了学校。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势力,也充分显示了张含辉这个学生领袖的组织才能。

^① 访问张仲实、高克林、王云等同志的记录(1979年)。

^② 张含辉:《陕西学生运动之经过及今后教育当局者应觉悟之点》,载《共进》第96期,1925年12月16日出版。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张含辉经受了斗争的考验,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他由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青年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5年秋末,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成立,经吴化之、魏野畴的介绍,张含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13日,共青团西安地委成立,张含辉当选为团地委委员^①。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

11月中旬,张含辉和张仲实代表省学联去北京出席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及临时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正值英、美等十三个国家在北京召开“关税会议”,段祺瑞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我国的关税自主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张含辉和学联的代表一起参加了由各群众团体在天安门举行的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和国民大会。随后,又参加包围执政府驱逐段祺瑞和捣毁外交部长李思浩等卖国贼的公馆的斗争^②;并在旅京陕西学生主办的《共进》半月刊上发表了《陕西学生运动之经过及今后教育当局者应觉悟之点》,指出陕西的学生要“继续准备自己的实力,坚固自己的团体,努力的完成这一度的政治革命。”希望教职员“团结起来,去和学生立在一个战线上”^③,为反帝反军阀而战。

1926年1月,张含辉回到西安,和张仲实一起在西安党团地委的领导下,积极筹备和主持省学联临时代表大会;并代表省学联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参与起草了一系列决议案和电文。在《致电国民二军前敌总司令部邓宝珊、史可轩》中明确指出:“唯有武力与民众结合成为民众之武力而后方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永立于不

① 访问吴化之同志记录(1979年5月24日)。

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147期(1925年11月20日版)、第154期(1925年11月27日出版);张仲实的回忆(1979年5月)。

③ 《共进》第96期,1925年12月16日出版。

败之地。而成就其保障民众之成功。”^①会议期间,张含辉和他的战友们还代表省学联联合有关团体举行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印刷大批传单,发表宣言,热情赞扬列宁一生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为把大会精神立即传播到西安的广大民众中去,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张含辉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各地学联代表和西安各个中学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扑灭奉系军阀”等口号。游行队伍行至省署门前,张含辉派代表请省长出来答复问题。督署竟派武装士兵镇压,捕去学联代表,学生们在张含辉的指挥下,毫不畏惧,立即向督署提出强烈抗议,再次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经过斗争,被捕代表获得释放,大长了学生的革命志气,挫灭了督署的威风。不久,张含辉又利用寒假,在西安成立两所平民学校,吸收贫苦青年参加学习,组织中学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任教,讲授文化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

二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卷土重来,由潼关进攻西安,企图重霸陕西,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张含辉和西安党团地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坚守西安,积极协助国民二、三军李虎臣、杨虎城将军筹划军需民食,加强军民的政治工作,坚定大家守城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在宣传中,张含辉亲自参加《誓师北伐》、《孔雀东南飞》、《天涯

^① 1926年1月30日《民生日报》。

兄妹》、《木兰词》等新剧的演出。后受党组织的派遣，突围到刘镇华部某旅做策反工作，不幸被捕，押到旅部受审，敌军官问他是干什么的？张含辉回答是教书先生。敌军不相信，请出旅长亲自审问。敌旅长拿出纸和笔，写了几行英文拿到张含辉的面前威胁说：“你若能念下去我放你走，若不会念立即枪毙！”张含辉从容流利地念完并准确的翻译成中文。敌旅长不得不放他回城^①。是年夏，张含辉和侯德朴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出城，到蓝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组织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与刘镇华匪军开战，并夺取了匪军在蓝田孟村镇的粮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还发动当地红枪会的武装力量缴了刘镇华匪军一个营的枪。在当地党团组织的协助下，筹集了一批经费，送往西安城内。

8月下旬，张含辉与曹碧轩一起赴乾县开展工作。抵县后，即在县城东街成立国民党乾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同时开办了民众夜校，吸收学生四十多人。张含辉亲自给学生上课，宣传革命道理。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进步师生为党团员，成立了中共乾县党支部。张含辉任书记，王炳南、曹碧轩任委员^②。后来，张含辉担任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前敌宣传队队长，与队员王炳南、赵伯经、强震义、陈以时、严震五等一道^③，随国民联军孙良诚部从乾县出发，先后经过礼泉、店张、咸阳、三桥、秦渡、斗门、户县、大王镇等地，沿途向群众揭露军阀刘镇华祸陕罪行，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动员群众投入驱刘运动，支援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在此期间，张含辉还将陕西地区的政治形势向中央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汇报材料，提出党组织应该抓紧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军事工作和

① 陈子敬、刘问津、张北海、任致中等同志的回忆。

② 王炳南、曹碧轩的回忆。

③ 王炳南、陈以时等人的回忆。

农民运动,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①。11月下旬,刘镇华匪军在国民军内外夹击之下,逃回河南,张含辉随军进入西安。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西安党团组织的决定,张含辉协助魏野畴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的名义,在西安举办政治训练队,招收学员近二百人,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常识以外,还组织学员在城乡帮助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调查政治经济状况。短短几个月时间,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在陕西的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1月下旬,张含辉出席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不久还兼任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亲自到长安县党组织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班讲授《讲演术》、《宣传煽动问题》、《国民革命概论》等课程^②。并曾到蓝田指导农运工作,指示县农协要积极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要县政府遇事需同农民协会协商;不经农协同意,驻军不得随意向农民摊派粮草和款项。

1927年5月1日,陕西省总工会成立,张含辉当选为常委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张含辉主持起草的接受全国总工会的领导等决议案、致全国总工会和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拥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除蒋介石党籍等电文^③。5月5日,共青团陕甘区委和省学联召开五四运动八周年纪念大会,张含辉应邀到会作报告,他回顾了陕西学生运动的历史,总结了驱吴运动和“五卅”运动中学生深入

① 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上刊登的《张同志报告陕西工作——关于军、农民运动等》,1926年10月13日出版。

② 1927年1月16日陕西《国民日报》;刘友珊、郝晓峰等人的回忆。

③ 1927年5月5日《陕西国民日报》。

到工人农民中去共同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的经验,指出:“现在军阀仍干预政治,我们应努力反对。”^①还要继续联合工农兵共同进行国民革命。

5月中旬,户县驻军师长何经纬勾结土豪劣绅屠杀农民协会会员十余人。张含辉亲赴户县调查,联合其他共产党员以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名义发表通电和宣言,揭露何经纬破坏农民运动的罪行。与此同时,联合各群众团体召开追悼死难农友大会,愤怒声讨何经纬血腥镇压革命的罪行。

1927年6月1日至8日,省农民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含辉报告了省农民协会的筹备经过和今后的任务。会上他当选为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①会后,在张含辉和其他常委的努力下,选派近百名特派员和视察指导员分赴各地指导农协工作;刊印《耕牛》周刊、《陕西农民画报》、《农运》丛书、《农民生活》等宣传品;建立农民自卫军常备军;积极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减租减息的斗争。6月12日,张含辉和王授金、亢维恪、马价人、陈嘉惠等省农协常委在《陕西国民日报》上发表《陕西农协会布告》第一号,揭露敌人破坏农民协会的阴谋,号召各地农协要“抖擞精神,努力整顿会务,严肃纪律,以实力帮助革命军,万勿中敌人的诡计。倘发现造谣分子,立即报告政府,严行惩办,绝不姑息。”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张含辉批准长安县农民协会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刘大汉和张林旺,为民除了一害^②。6月底,全省农民协会遍及60余县,会员达70余万人。^③

① 1927年6月10日《陕西国民日报》。

② 郝晓峰、丁世丰、刘问津等人的回忆。

③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存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1927年关于各地农民协会会员的统计。

6月16日,张含辉和张振海、李仰旭代表陕西省农民协会前往武汉参加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①,准备向国民政府申请发枪两万支,进一步武装陕西的农民自卫军。途经郑州时,遇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当时冯即表示要清党反共,态度十分蛮横。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张含辉立即电告省农协作好应变准备,并与其他代表一起日夜兼程返回西安,向陕甘区党委作了汇报。7月初,张含辉参加区党委召开的紧急扩大会议,报告冯玉祥率部出潼关后在河南清党反共的情况^②。会议在分析研究当时的政治形势后,以区党委的名义,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尽快转入地下斗争。

三

1927年7月15日以后,城乡反动势力,纷纷向革命展开猖狂的进攻,白色恐怖笼罩了渭河两岸。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由陕甘区委改组)召开了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党的八七会议的文件,明确党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发动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进行土地革命上。张含辉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③。由于省委农委书记亢维恪在华阴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省委决定农委工作由张含辉负责。随即张含辉以省委特派员身分去蓝田巡视指导工作,向蓝田县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同县委负责人侯德朴、陈子敬等一起,迅速恢复了农民协会,积极发展壮大了三王村一带的农民武装,领

^① 1927年6月16日陕西《国民日报》。

^② 耿炳光、曹志麟、王苇南、马文彦、杜松寿、张北海等人的回忆。

^③ 《陕西省委通讯》第一期(1927年9月),存陕西省档案馆。

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斗争，惩办地主豪绅。

1928年1月4日，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张含辉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错误地处分了一些负责干部。张含辉被撤销省委候补委员的职务。他受到错误的打击后，不计较个人恩怨，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后因父亲病故，回家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由于敌人的追捕，在同情革命的陕军将领甄寿珊部隐居一些时日。1929年春，张含辉秘密回到家乡，时值关中遭受严重干旱，农民饿殍载道。他和我党西府区委书记陈云樵取得联系后，即以界庄村村长的身分，组织饥民向地主豪绅夺粮，救济群众，参加的人越来越多^①。

是年夏，张含辉离陕北去北平。通过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共产党员侯德朴和中央顺直省委接上了关系，任省委巡视员。先后到大名、邢台、磁县、邯郸、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巡视工作，指导党的地下斗争。

1929年9月下旬，张含辉到冀南的大名县巡视工作。他建议和指导该县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恶，宣传我党“六大”的主张。

1930年12月初，他和汪秋实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到青岛与党中央派的吴亚鲁共同组织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张含辉任省委书记兼负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汪秋实任省委组织部长，吴亚鲁任省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前山东省委军委书记赵友贤继续担任原职^②。

张含辉到山东时，正是党组织处于危难之际。由于白色恐怖

^① 陈云樵、张北海等人的回忆。

^② 《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汪秋实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大纲》（1931年1月13日），存中央档案馆。

严重和党内出现了叛徒,山东省委在8月和12月两次遭受严重破坏,加之党内立三路线的影响,山东的党团组织陷于涣散、近乎瓦解的状态。全省的党团员由“六大”时的千余人,下降到二百余人。张含辉和他的战友知难而进。经过短时间的调查,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始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对山东的影响,制定了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的计划,布置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和开展年关斗争的工作。

张含辉提出山东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反对立三主义的‘左’倾空谈,不做实际工作而盲动冒险地去布置武装暴动、同盟罢工、兵士哗变;同时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悲观失望情绪,屈服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镇压之下……;要抓紧工农兵群众切身最紧迫的要求,去发动领导他们日常的部分的小的政治经济斗争,使群众的一切斗争逐渐扩大汇合起来;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条件,创造山东的苏维埃区域,创造北方的红军。”^①

省委会议后,张含辉派汪秋实、赵友贤分赴外地巡视工作。他同吴亚鲁共同指导青岛市委的改组工作,成立了以颜士彬为书记的新市委;并和新市委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到厂矿、铁路,恢复和建立了四方机厂、大康纱厂、钟渊纱厂、华新纱厂、宝来纱厂等五个党支部,在市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东北海军和胶济铁路也建立了党的关系。还帮助市委成立市政委员会、海产委员会、青岛市工人联合会和失业工人委员会、临时团市委及两个工厂团支部。在张含辉和吴亚鲁的指导与帮助下,青岛市的党员由零星散乱的10人在短期内发展到60多人,至1931年4月,全市共建立三个区委和

^① 《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1931年5月6日),存中央档案馆。

十多个党支部。

张含辉和吴亚鲁在指导青岛市委工作的同时,还先后通知烟台、博山、济南、潍县等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到青岛分别召开工作会议。这些会议在张含辉的主持下,传达上级党组织关于反立三路线的指示,总结工作经验教训,制定工作计划。为了建立健全省委机关和提高工作效率,省委在张含辉的建议下,设立两部(宣传部和组织部)、四委(职工、妇女、军事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三处(秘书、印刷、交通)和机关支部,出版了《山东红旗》(三日刊)、《党内生活》(半月刊)、《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等刊物。还编印了传单、标语、宣言、通告 80 多种,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强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的教育。

1931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临时省委改组,正式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张含辉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省委成立后,在张含辉的主持下,制定了《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作出了《关于党团关系的决议》、《关于征收同志决议案》、《为调动同志及群众打进反动军队决议案》;发出《为“三·一八”纪念告全省工农兵士》。^①在上述文件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党的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及武装组织,加强宣传办好党刊。要继续纠正在立三路线之下被取消了的共青团及青年群众组织的错误。在征收党员中不但要注意到数量上发展,并且要注意到质量上的提高,加强对新同志的教育训练工作,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引导他们过党的生活,使其能担负起党的下层工作任务。

为了深入开展工运和农运,张含辉曾三次主持开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课和作报告,同党员一起讨论如何搞好工人运动和农民

^① 《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1931 年 5 月 6 日),存中央档案馆。

运动。同时,他还在烟台利用社会关系,深入海军同党员个别交谈,调查了解在海军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经过调查研究,就海军支部如何开展经常性的工作向省委和党中央提出了建议:“目前海军工作的进行,应用最大限度的秘密工作方式,……应经常利用海军各种游戏,进行兵士中的群众工作,组织文化团体、体育组等组织。对于每一次革命节,海军不可散发传单,因为一支军舰孤停在水面上,最易被敌人发觉,易遭破坏。”

张含辉从1930年12月初至1931年4月中旬,在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五个多月里,他和战友们“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奋斗,克服一切困难,把一个无生气的山东党推动得活动起来,……有相当的成绩。”全省党组织恢复发展的很快。新成立两个特委、一个市委和八个特别支部,党员由二百人发展到四百多名,共有五十多个党支部。团组织、赤色工会、失业工人委员会、农民协会、儿童团、互济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也都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工人的反帝罢工斗争和农民反豪绅、反军阀的斗争不断发生,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31年4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张含辉到青岛市委的秘密机关准备同即将去博山任特支书记的王萝林谈话并送路费时,在门口被密探捉住。但他临危不惧,以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密探边走边闲谈,从敌人口中得知一些同志已经被捕,他“用许多话把这一密探说软了”,并送了密探十元钱,而被放了。紧接着,他连跑了十几条马路,告诉省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吴亚鲁等负责人关于青岛市委和省委印刷处被破坏以及一些同志被捕的情况,请他们立刻搬家。当天下午3时,他又把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告诉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周铁真。4时左右,他的住处——省委常委开会的地方,也被警察包围,他机警地听到打门的声音与暗号不对,又

从窗孔中看见有四五个凶恶的武装警察，便机智地从后门逃脱。敌人未抓到张含辉，就立即下令通缉。4月15日他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立即发一紧急通知，向各级党组织说明省委遭受部分破坏，一切工作仍应加紧进行；为了提高警惕，省委即刻与各地党组织建立新的关系，各地通讯机关一律变换；青岛市委的工作在书记被捕期间，由王公博、孙振华等人负责。会议还决定立即派张含辉去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省委工作暂由吴亚鲁负责。4月16日，张含辉化装离开青岛赴上海。5月初向党中央写了长达2万余字的《山东省委被破坏的经过及教训》、《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这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山东省委的工作和组织状况，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向中央反映了工作中的困难和要求解决的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对“左”倾领导的党中央及其直属机关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对工作的布置领导上虽有各种文件及大纲，而一般的对山东地方工作的特殊的指示却没有。省委在工作布置上发生的困难，向中央提议请求予以解决，但都未给以正式答复。……互济会、铁总、CY、全总各上级领导机关，对于山东互济会、铁委、CY、青岛工联的指示和帮助不但少，而且不经常，帮助之经费相差四五倍。有时几个月，信也不来了，钱也不给了，关系几乎都断绝了。”报告还对山东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和领导人员的调动提出了建议，体现了张含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坚强的党性和坦荡的胸怀。

1931年6月，党中央派张含辉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不久被派去邓宝珊部教导队作兵运工作。翌年春，杨虎城将军任命邓宝珊为驻甘肃行署主任，张含辉随军到甘肃，积极发展党组织，准备兵变。是年秋末，由于兵变失败，身分暴露，他脱险后暂时隐居在

家中^①。

1932年冬,杨虎城部警卫团长、共产党员张汉民率部经周至县时,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派副官长刘光智请张含辉去陕南执行特种联络使命。张含辉当即随军出发^②。12月到达汉中,与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了联系,同警卫团中的共产党员张汉民、阎揆要、张秉仁、史唯然、魏书林、崔启敬、白景琦等一起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他还常为警卫团办理机要事件。

1933年春,张含辉受党组织的委托,化装成商人,去川北给红四方面军送去急需的军用地图和十几担医药,并提出警卫团准备搞兵变,打出红旗与红军汇合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以公开打起红旗。张含辉回到汉中向党组织传达这些意见。经过陕南特委和警卫团中的党组织研究认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决定按此精神布置工作^③。

1933年初夏,张含辉奉命再次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络,不幸途中遇难^④,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1岁。

(张守宪 王少民)

① 周益三、张北海、任致中等人的回忆(1983年)。

② 阎揆要、张北海等人的回忆。

③ 阎揆要、周益三、雷展如、孟浩:《追念张汉民同志》,载《西安文史资料》第一集(1981年12月编印)。

④ 对于张含辉遇难的时间和地点说法不一。一说在四川返回途中经南郑县西河口东北的南叉河,被当地民团小队长李华元逮捕杀害;二说被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派赴川北收编土匪部队时,被土匪所杀害;三说是在去四川途中在川陕边被国民党三十八军派人暗害。上述说法那种可靠,有待进一步查证。

于右任 (1879—1964)

于右任,原名伯诱,字诱人,化名刘学裕、原春雨,笔名骚心、大风、福州旧主等,号髯翁、太平老人。1879年4月11日(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生于三原县城关。早年加入同盟会,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任交通部次长,不久因袁世凯当国辞职。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

令、国民军副总司令,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逝世。

1918年8月20日,于右任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三原为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与张钫、胡景翼、井勿幕等人一起领导陕西靖国军,反对依附皖系军阀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在陕西的专制统治,进行了长达4年的艰苦斗争。

在于右任等陕西靖国军领导人的支持下,靖国军占领区的进步力量十分活跃。学校师生排演的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列宁生平事迹的《列宁传》曾在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演。五四运动爆发后,各校学生发动校园运动,罢课宣传,唤起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成立了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力争被帝国主义攫取的我国主权,这些活动紧密地配合了当时国

内革命运动的开展。

陕西靖国军解体后,于右任离陕经甘肃、四川沿长江于1922年8月13日到达上海。翌日,孙中山亦由广东到达。于右任通过与孙中山的多次深谈,根据自己及孙中山遭受挫折的沉痛教训,深深感到,“用无知识之队伍革命,成功则自己先受其害,不成功自己亦受其害。”^①他又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撰文指出,要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因此,很想投身教育界,为国家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才。这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原任校长,要求改组学校,拟从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位著名人士中请一人出任校长,经过商议,最后确定请于右任担任。经学生代表恳请和于右任的友人邵力子、柳亚子、杨杏佛等人从旁力促,于遂接受邀请,并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还有一种说法,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名义上是校内外国民党人士公推,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此说见党伯弧回忆录《大革命时期陕籍青年在上海大学》一文,党伯弧是上海大学学生,曾任该校党支部副书记、书记)。为了筹措办学经费,于右任把自己家藏的珍贵善本书出售,所得收入均捐献给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举行成立典礼,于右任到校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讲话,表示尽管任务艰巨,仍决心尽力谋求学校的发展。

为了办好上海大学,于右任向中国共产党人求助。共产党人给上海大学以卓有成效的支持与帮助。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于右任请其帮助支持校务。李大钊因负责中共北方党务,不能长期留在上海,遂推荐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为该校总务长(亦称校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李大钊任该校讲座(客座)教授,先

^① 《于右任之一封信》,载《共进》第22期。

后在该校作过题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的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号召青年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还有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肖楚女、沈雁冰、任弼时、田汉等著名共产党人。孙中山对上海大学也十分关怀，该校筹办时，他即捐助 2000 元，1923 年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后，又亲自批准月拨 1 万元予以资助。

在于右任、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斗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该校学习过的学生中，有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秦邦宪（博古）、邹均、何挺颖、党维蓉、孟芳洲等人；有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卓越贡献的张治中将军，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女作家丁玲；五卅运动中英勇牺牲的工人领导顾正红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支部创办的沪西工人夜校的学生。

1924 年 1 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于右任作为孙中山指派的代表出席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 月 31 日，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由于右任担任，共产党人邓中夏任调查部干事。

于右任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十分赞同并予以支持，他在 1924 年初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国民党与社会党》（即中国共产党）一文，明确申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他指出，“社会党为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吾不能开有厚望于彼等。”^①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深刻认识

^① 《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16 页。

到，“中国政治界之黑暗，可谓极点，爱国之政治家，必须互相结合以自原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尽管当时于右任对列宁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看法尚有不完备之处，但他所提出的“在此革命期间”，“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看法，无疑是很有远见的。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成功。11月，于右任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北上，做国民军诸将领的联络工作。到北京后，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同年12月，孙中山亦应冯玉祥、胡景翼等国民军将领邀请到达北京，命于右任等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这时，李大钊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主要领导人。北京政治委员会成立后，李大钊也是其中的骨干人物，他与于右任既是好友，又共同指导国民党北方党务，关系更为密切。被誉为“西北革命巨子”、“国民党政治家”的于右任与中共的著名领导人物李大钊的友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又一重要见证。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何秉彝在惨案中被枪杀，13名学生受伤，130余人被捕。翌日，上海大学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又有60余人被捕。6月4日，万国商团和英国巡捕受租界帝国主义当局派遣，闯进上海大学，赶走学生。接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强占了该校为驻地，代校长邵力子被驱逐出租界。于右任闻讯，立即从开封赶往上海，6月6日到达的当天就召集上海大学师生举行紧急会议，宣布自己将全力参加斗争，救援本校被捕的学生和广大市民。同日，他接见《热血日报》记者，发表讲话，声明坚决支持上海大学及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他愤怒地谴责说，帝国主义军警搜查上海大学时，“偶见书中马克思相片之插图”或“陈独秀、施存统等名字，即指为共产党证据”，简直是愚蠢得“令人失

笑”；他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前日报载，尚有共产党在英国开大会之消息。即令真属共产党，在英国尚能公开，而在中国则用此名义到处污蔑，英租界当局其何以自解？”^① 上述讲话表现了于右任在五卅运动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及其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的鲜明立场。

五卅惨案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斗争高潮。于右任由上海到北京后，迅速投入到这场革命的洪流中。1925年6月30日，北京群众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雪耻大会。于右任出席大会，与宋庆龄、顾孟余、徐谦等人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同年8月16日，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声援沪、粤、汉等地爱国斗争中殉难的工人，于右任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和发言人。他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五卅运动使于右任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他在河南开封对国民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演，就革命、国民军、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革命》一讲中，于右任指出，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必有的突变现象，是根本解放被压迫阶级和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方法；是要谋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不是谋少数人目前的利益；是要打倒社会上一切压迫别人掠夺别人的寄生阶级，而不是替那一部分寄生阶级去除这一部分寄生阶级。他概括了近代革命的两大潮流，一是资本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被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被迫迫民族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如果成功，便会

^① 1925年6月8日《热血日报》第5号。

放弃帝国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于右任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其任务是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中国革命的朋友,一是印度、埃及、土耳其等被压迫的民族;二是英、美、日、法等国的无产阶级;三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的苏俄。中国革命的敌人,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二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三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四是附属于军阀的官僚政客、地痞劣绅;五是反革命的政客及不革命的政党。对于中国革命应注意的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于右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帝国主义》一讲中,于右任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产生、帝国主义的现状、侵略方式、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帝国主义的将来等问题均有阐述。在《不平等条约》一讲中,于右任对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历史背景、世界各国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原因与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剖析之后尖锐地指出,欲救中国,就必须依靠全国民众,打倒帝国主义者,以革命的手段求得国际平等,向帝国主义哀求,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本国的军阀更靠不住。于右任对帝国主义及中国革命问题能够发表如此系统而深刻的见解,在当时的国民党人士中是不多见的。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右派人物林森、居正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攻击共产党人“自加入本党以来,即不断地诬蔑和挑拨我们的同志,达到他们破坏本党、扩充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会议还通过了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其后又在北京等地设立党部,从事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的阴谋活动,史称其为“西山会议派”。在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于右任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坚人物。他与共产党人李大钊、毛

泽东、瞿秋白等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致电国民党各级党部，要求国民党员拥护和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严斥西山会议派的声明及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决议，要求林森等人“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在把西山会议派清除出国民党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于右任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3月12日，国民党左派人士与共产党人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于右任、李大钊均为主席团成员。在纪念会上，由于右任宣读了《总理遗嘱》。同年3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前，于右任已得到学生将请愿游行的消息，当他与驻北京的国民军一军负责人张之江联系后，分析形势，已估计到段祺瑞政府可能要镇压爱国师生请愿。为了避免学生流血牺牲，于右任不赞成学生请愿游行，但未能如愿。惨案发生后，于右任非常痛心，多方设法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主席郑自毅等人处理善后事宜；北京大学为死难学生召开追悼大会时，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谴责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的罪行。

1926年春，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直、奉军阀互相勾结，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内部却不能统一，争夺权力与地盘，矛盾重重。冯玉祥作为国民军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如此局势，怀着痛楚的心情通电辞职，不久赴苏联考察。于右任与国民军关系密切，遂成为奉军通缉的重点人物，但他并未逃避或就此消沉，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这时，杨虎城等人正率部困守西安，与河南军阀刘镇华的军队进行苦战，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也即将开始。为了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响应北伐，解西安之围，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请于右任赴苏联完成这一使命。于欣然受命，经过秘密准备，由李大钊为于右任办好出国手续，他携俄

文翻译马文彦经上海取海道赴苏联,过黄海时,他在一首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革命军中一战士,巷髯如戟似少年。”^① 这时于右任已年近 50 岁,饱经磨难,然而其为革命奋斗的雄心壮志却一如青年时代。他还在途中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

1926 年 7 月,于右任到莫斯科与冯玉祥会晤。冯欣然接受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意见。^② 在苏联期间,于右任写下了不少颂扬十月革命的诗篇。他也受到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农民学术团体及莫斯科中山大学师生的隆重欢迎,于右任在欢迎大会上就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发表了演讲。莫斯科中山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对于右任进行专访的文章,斯大林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还特地亲自会见了于右任。^③

1926 年 9 月 16 日,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发表由于右任起草的长篇宣言。翌日,举行誓师大会。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接着迅速组成以冯玉祥为总司令、于右任为副总司令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于右任随即指挥军队二万五千余人(号称十万大军),经银川、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大军过三原时,当地群众召开大会,欢迎国民军。于右任发表了热情赞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讲话,号召三原驻军响应北伐。11 月下旬,刘镇华部军队全线溃败,杨虎城等部在西安坚守长达 8 个月之久的苦战宣告结束。于右任率部进驻西安,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1927 年 1 月,冯玉祥率部到西安,以冯为总司令的国民联军

① 于右任:《舟入黄河作歌》。

② 马文彦:《随于右任赴苏敦促冯玉祥回国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的经过》。

③ 屈武先生致本文笔者函。

总司令部及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会、农会陆续成立。于右任以联军副总司令身份主管国民联军党务，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魏野畴、史可轩、邓希贤（小平）、王绶金等人均参加了国民军的工作。陕西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省会西安一度成为北方革命的中心，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誉。史可轩、邓小平等人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成立时，于右任给予大力支持，军校发的枪枝就是由于右任设法解决的。根据于右任的意见，昔日西安的“皇城”改称为“红城”，南城墙上醒目的大幅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亦是于右任亲笔题写的。^① 他与人握手时，口里常说：“赤化！赤化！”还十分自豪地说“人说我们赤化了。这是祖宗坟里的风脉厚，就是说祖宗有德，子孙才能赤化。赤化是时代的演进。”^② 1927年3月，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于右任在西安主持了“革命大祭”，埋葬在西安围城期间殉难的数万名军民的骸骨，为在国民革命中献出生命的仁人志士及苏联友人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会后又修建了西安革命公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于右任对国民党右派屠杀工人与学生的罪行深为不满，后来每次谈及，即愤愤不已，怒形于色。6月上旬，国民联军与北伐军会师郑州，于右任应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由西安赴郑州与邓会晤，不久又接武汉国民政府的通知去武汉。在对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发表讲演时，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一个肩膀挑着中国革命，一个肩膀挑着世界革命，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彻底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于右任坚决执行孙中山

① 庞齐：《于右任先生漫记》，《人物》1984年第4期。

② 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第154页。

③ ③周伯敏：《我所知道的于右任》，《见上海文史资料》，第6辑。

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写下了他一生政治活动中光辉的篇章。

宁汉合流以后,面对反共势力甚嚣尘上的形势,中共陕西省委鉴于于右任一直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希望于右任能回陕西,掩护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①这时,于右任已陷入困境之中,他的女儿于芝秀因在苏联留过学,被人检举是CY(共青团员),在南京被捕拘押。于右任的好友张景秋之侄张宝泉(中共党员)在上海被追捕时,逃到于右任家中,藏到于夫人黄仁爱卧室内,亦被逮捕遭惨杀。在这种环境中,于右任主张年轻人要学西瓜的样子,内中通红,外面则是绿的,^②这些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对付险恶环境的态度。

由于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鉴于他的声望,不得不给他以有其名而无实权的高位。1928年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于右任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还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同年3月,被任命为审计院院长。但在处理公务时,却难以行使职权,常被掣肘。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于右任作为中央执委会常委,提出了一份中央委员名单,结果竟被代表蒋介石审查名单的陈果夫等人全部否定,使于十分生气。蒋介石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后,于右任感慨地说:“过去,我坐着,人家站着。后来,我和人家一起坐着,现在人家坐着,我要站着了!”从1931年春起,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1932年6月,蒋介石向江西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审计部部长茹欲立拒绝核签财政部拨付南昌行营的非常经费。按国家规定,审计部不核签者,国库不得付款。因审计部隶属

^① 陈家珍:《陕西政治军事情况报告》,见《西安党史资料》第1辑。

于监察院，于右任与茹欲立又系同学、同乡、好友，蒋介石遂向于、茹大施压力，迫使二人一度躲到上海。于右任初任监察院院长时，曾满怀信心地宣布，“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他有害于人民，监察院都给他平等的待遇，并不是打了小的，而忘记了大的。”^①然而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上海协定时，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妥协卖国，监察院对汪进行弹劾，受到蒋介石的阻拦。于右任气得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以后不再去南京。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宋子文在重庆负责国家财政，搞得经济混乱，民不聊生。监察院要弹劾孔、宋，于右任把提案送交蒋介石审阅，又碰上了钉子，气得他坚决要求辞职。经过多次碰壁之后，于右任感慨地说：“打苍蝇也要受到限制，更谈不上打老虎了。”事实使他看清了蒋介石让他身居高位的目的。“一是为了使北方不说话，其次是想束缚他的手脚不让乱动。对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于右任甚为不满。他说：“蒋介石的权力大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这样下去，人人自危。”可是，于右任又没有勇气和国民党右派决裂，在有的公开场合还不得不违心地发表一些支持蒋介石国策的讲话。因而心里所想与口头所言，私下与公开谈话有时互相矛盾，他的思想也常处于苦闷之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出于抗日救国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因于右任与杨虎城关系密切，派他以宣慰使名义营救蒋介石。12月17日，于右任致电张、杨，指责他们兵谏扣蒋是“大错已铸”，^②18日他到达潼关，对背叛杨虎城的冯钦哉部进行宣慰。于右任的言行自然引起西安

① 《于右任》，《民初风云人物》，第713页。

② 《西安事变电文选》第110页。

各界人士的不满,12月19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复电于右任,拒绝他人陕宣慰。12月20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西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斥于右任“身居要津,平日与蒋氏一鼻孔出气,未见有一言纠正其失,应同负误国之责。”^①使于右任处境十分尴尬。嗣后宋美龄与宋子文飞赴西安,于右任遂返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于右任到洛阳机场迎接由西安返回的蒋介石,蒋见于后即说:“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部下,竟能出此,实出我之初料。”怨恨之情,溢于言表,说明蒋介石对于右任亦颇不满。

抗日战争爆发前,于右任对地方公益事业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三原民治中学、三原女子中学等学校创办时,他均予以关怀和帮助。他支持创办了武功农业专科学校(今西北农业大学前身),并被推举为第一任校长。为促进农业发展,于右任又在泾阳县斗口村创办了农事试验场,种植良种小麦、棉花、苹果等。为了不使农场成为个人私产,1934年3月,于右任特地立下遗嘱,刻石镶嵌于农场和办公楼外墙上,其中写道:“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②著名的泾惠渠等水利工程修建时,于右任亦予以支持和资助。他还历时20余年,收集东汉至宋辽时代碑石、墓志380余方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全部捐赠给西安碑林,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东汉蔡邕所书的《嘉平石经》残石及北魏时代夫妇七人成双的墓志(于右任为其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藏石”,均为稀世国宝。1938年8月初,鉴于日本空袭轰炸西安,在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等人的主持下,西安碑林的珍贵碑石被

^① 1936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

^② 此碑仍存于原地。

移藏。8月11日,当时在西安的于右任亲自到碑林查看,并对张扶万等人在十分艰苦与危险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坚持保护文物的行动,给予极高的评价。^①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于右任以监察院院长身份,组织了战区巡察团、战区行政工作考察团等,派赴各地视察慰问,对战时医院的伤兵治疗及难民救济安置等工作进行检查。这时他已年近届花甲,仍奔赴各地巡视战况,慰问抗战健儿。有一次到湖北黄陂视察时,尚未天明即乘汽车赶路,在一座桥上行驶时,空中闪电打雷,在刹那间极亮的电光之下,司机突然发现桥已被日军炸断,急忙刹车,在距断毁处一丈多远的地方停住,差点车毁人亡。对于抗日前线请于右任题字留念的将士,他有求必应。这时他已患臂痛病,身边人劝他休息,不必为写字过苦。于右任则说:“壮士前方流血挥戈,已太苦矣,吾尚惜乎流汗挥毫耶?”^②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于右任仍多方设法,解救劳动人民的疾苦。1941年秋他回陕西,鉴于多年来旱灾严重的情况,提倡多挖深井进行灌溉,还提出十年内凿井万口,绿化大西北的宏伟计划。虽因多种原因使此宏图未能实现,但这无疑是深谋远虑且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1943年,河南灾情严重,大批贫苦群众流离失所,生计无着。于右任卖字捐款达80万元,比当时各界给河南的捐款的总数还多40余万元,重庆《新华日报》专就此事作了报导,对于右任进行褒扬。

抗战期间,于右任书写了大量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和诗

① 罗鸿才:《抗战中陕西省会及西安碑林部分文物移藏始末》。

② 张友鸾:《巴山夜话》,1986年5月16日《团结报》。

作者对抗战英雄的敬佩之情，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右任的爱国热情十分重视。朱德和周恩来曾亲自到于家拜访，周恩来不仅高度评价于右任对国共两次合作的贡献，当他得知于右任喜欢吃小米，还特地向延安有关方面转达此事，不久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就由延安给于右任捎去陕北产的小米。《新华日报》创刊时，请于右任题写报名，他欣然应诺，写了194幅报名供选用，并满怀热情地说：“贵党报纸，定能在抗战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希望早日与国人见面。”^①《新华日报》创刊时，又题词祝贺。于右任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来之不易更是非常重视，1940年秋，在接见王南宫等6位赴重庆人员时，除勉励他们关心民瘼、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办事之外，还特别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共御外侮，绝不能有党派成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祸，作民族的罪人。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他的女婿屈武把事变真象告知时，他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说话！”^②1943年1月1日，于右任特地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战后的新中国》，明确表示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和对抗战后建设新中国的期望。他对周恩来在极端复杂与困难的情况下领导《新华日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非常钦佩，赞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伟大！”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特地专程去拜访看望于右任。

解放战争后期，于右任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却对于右任等人的主张非常不满，在1949年1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于右任等人的面恼怒地指

① 庞齐：《于右任诗歌萃编》，第817页。

② 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

责说：“我们的将领是好将领，我们的军队是好军队。我们所以打了败仗，就是由于党内的一些败类暗中与中共勾结，鼓吹什么和谈，尤其是立法院和监察院的一些人，毫不体谅中央的困难。”^①面对蒋介石的压力，于右任仍为和谈尽力。1949年2月15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等地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中共领导协商和谈事宜，2月27日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自到机场迎接。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于4月16日去北平。于欣然受命且做好了动身准备，但正在北平和谈的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接到电报后，认为于右任暂不离开南京，可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遂电告李宗仁，请于暂缓赴北平，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再由于右任赴北平主持签字仪式。周恩来对于右任能到北平表示十分欢迎，同时也估计到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右任的处境甚为担忧。在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去南京复命时，周恩来特别请屈武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和谈协定，解放军渡江攻占南京时，希望于先生不要动，到时候派飞机接他到北平，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先生组织新政协。屈武到南京看望于右任时转达了周恩来的谈话，这时于右任已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当他知道谈判势必破裂，自己将失去赴北平的时机时，痛心地说：“文白先生（张治中文字文白——引者）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在那里不回来了。”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军百万雄狮迅速突破长江防线。

^① 蔡金德：《民革中央委员李世军忆述蒋介石离开南京那一天》，1985年1月26日《团结报》。

国民党当局通知于右任马上离开南京，他以身体不佳为辞打算留下，但这时已身不由己，只好在 71 岁高龄时，被迫到了台湾。

于右任垂暮之年远离故乡热土，一直怀念留在陕西的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人。50 年代中期，他曾辗转托人给高仲林母女汇寄台币 600 元。高仲林母女也托友人给于右任捎去书信及他喜欢穿的布鞋、布袜，收到之后，于右任常常在寂寞时取出来抚摩翻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右任暮年思乡之情甚为关心，1961 年周恩来得知于右任为在西安的夫人高仲林八十寿辰之事焦虑伤心，特派屈武由北京专程赴西安，与其他有关人士为于夫人办了寿宴。事后，屈武写信把祝寿情况告诉于右任并捎上祝寿时的合影，由于右任在香港的好友吴季玉赴台湾面交。当于得知此事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得以圆满办理时，深受感动。

1962 年 1 月，于右任在重病之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诗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首诗歌不仅写出了这位爱国老人痛切的思乡之情，也写出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渴望早日团聚的共同心声，如今已成为在海内外华夏儿女中广为传颂的光辉诗篇。

(张应超)

杨 森

(1909—1936)

杨森,原名杨增凯。陕西乾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陕甘游击队骑兵队政委、第二大队大队长。1933年后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和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八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副军长。1936年任红三十军参谋长等职。1936年4月在东征作战中牺牲。

杨森,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小咸阳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杨森在高小读书的时候,就对家乡同盟会员的革命斗争事迹有所耳闻,并深受影响。1926年,杨森离开家乡,考入陕西省职业学校农林科。不久,镇嵩军刘镇华率部由潼关长驱直入陕西。兵临西安城下,发动了围攻西安城的战争。杨森在西安共产党组织和学联的领导下,投入了历时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学生驱刘反围城的斗争,得到了很好的锻炼。1927年2月,杨森进入由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杨森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一时的嚣张气焰和屠杀政策所吓倒,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和坚决抗击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进行“清党”反共，陕西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这时，杨森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留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1929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举办党务人员训练班，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他去国民党省党部训练班学习，必要时也可加入国民党，以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杨森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结业后担任国民党蓝田县党部政治指导员。他到蓝田后，以公开合法的身分秘密地与中共蓝田地下党负责人杨荫川、张继志、白耀庭等取得了联系，共同领导了蓝田、西安等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②。1929年陕西大旱，灾荒严重，加之蒋冯军阀战争愈演愈烈，冯军治陕，横征暴敛，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除饿死者外，大批老百姓四处逃荒谋生，跑到西安求吃讨饭的饥民就有数千之多。杨森扮作饥民，夹杂其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向广大贫民揭露宋哲元鱼肉陕西人民的罪行，号召饥民们联合起来，抗粮、抗捐、抗征兵，以求自救。并组织领导饥民开展互助合作，向西安的救济会社、粮店及大商号要来了不少衣被和食物，使大批饥民在死亡线上得以生存。与此同时，杨森在蓝田还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共产党的组织。

1930年，冯军留驻关中的刘郁芬部为了扼守蓝田县城东南的武关隘口，委任刘汉三为营长，驻扎在武关附近的蓝桥镇上，招兵买马，并大肆摊派粮款，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广大百姓忍无可忍，便组织起了红枪会，准备斗争。同年6月，中共蓝田党组织负责人杨荫川、白耀庭等即同杨森分析了这一形势，决定争取和利用红枪

^① 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赤胆忠心血染黄河》，1986年5月2日《陕西日报》第2版。

^② 侯天岚、杨树祯：《杨森同志》，1965年版。

会头子曾老三，聚集各地红枪会，发动蓝桥暴动。9月上旬，1000多名红枪会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兵分三路，向蓝桥镇刘汉三部发起攻击，除部分匪兵逃跑外，其余100多人包括匪首刘汉三全部被歼。蓝桥暴动，使国民党陕西当局大为震惊，杨森的共产党员身分也因此暴露而遭通缉。不久，他同杨荫川先后被捕，被解押于西安军事裁判处。在监狱里，杨森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达50余天。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冯军战败退出陕西，杨虎城率部进入西安，杨森和杨荫川等乘城内混乱之机，越狱逃出虎口。而后，他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并担任了团省委委员。

1931年，杨森经地下党员王鹏生介绍，到名义上是国民党的税收机关、实为地下共产党员控制的扶眉善后清查处工作并任稽查长。他与王鹏生、赵庸民、杨国栋、张克俭等人，一方面应付国民党的税收工作，一方面则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印刷文件、传单，四处张贴和散发，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后因发展党员不慎暴露了身分，为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杨森遂返乡乾县，到国民党乾县西区民团，继续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西区民团头子王牛娃，横行乡里，残害百姓，心毒手辣。人民怨声载道，恨之人骨，但又无人敢惹他。杨森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处决了这个为富不仁的家伙，为西区人民除掉了心头之患。他那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革命行动，在乾县西区人民中被传为佳话。

二

1932年4月，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来西安，以“视察西北”为名，宣扬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在中共西安市

委的领导下，西安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发动西安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驱戴的爱国活动，杨森参加了这一斗争。接着，他又到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担任大队政委，并参加队委会的领导工作。9月，刘志丹派杨森率陕甘游击队到三原武字区，帮助渭北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他带领陕甘游击队到达武字区以后，主动和中共渭北特委取得联系，然后在渭北游击队的配合下，给了三原县反动民团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推动了渭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为陕甘游击队筹集了一批军需物资，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33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杨森到渭北革命根据地，担任游击队政委。这时，陕甘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7月，杨虎城的骑兵团团长、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极大地鼓舞了西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渭北游击队在指挥黄子祥、政委杨森的率领下，也来到耀县县城，同王泰吉的抗日义勇军汇合。回到渭北苏区后，渭北游击队正式改编成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杨森任政委。红四团成立后，在渭北苏区周围对敌人展开进攻，消灭了不少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扩大了根据地。王泰吉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由于遭到敌人的严重打击，被迫退到照金苏区。敌人遂集中兵力围攻渭北苏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同强敌拼消耗，杨森和黄子祥率领红四团也转移到了照金苏区。8月，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①，并吸收了红四团、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参加，讨论照金苏区革

^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235页。

命武装的统一指挥事宜。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组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并制订了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在西北红军建军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红二团在终南山失败后陕甘红军主力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家坡会议以后,杨森和黄子祥指挥红四团,在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举行了攻打旬邑张洪镇和柳林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1933年9月中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从终南山回到了照金苏区。陕甘边特委决定刘志丹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接着,特委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红军主力向庆阳、合水、保安等地进军,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地方游击队仍坚守照金苏区的意见,集中主力部队挥师北上。10月18日,打开了合水县城,消灭了城内反动武装,并在毛家沟门一举击溃了陇东军阀赵文治团的围攻。随后,在庆阳的三十里铺又消灭了一支反动民团。杨森在这次战斗中,奋不顾身,指挥战士们英勇杀敌,胸部虽负了重伤,但他仍然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11月,总指挥部党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的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决定成立一、二、三路游击队。另外,还决定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红四团改为骑兵团,杨森任团政委^①。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合编为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这次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由发展走向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杨

^① 1985年访问张秀山谈话记录。

森在这次会议上，积极支持刘志丹的意见。会后，部队开到莲花寺，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随即杨森率骑兵团转战南北，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经讨论，决定由杨森接替高岗任四十二师政委。而后，杨森同刘志丹、王泰吉一起领导了红二十六军的工作。

1934年2月至5月，陕西军阀调集兵力，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当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面临数倍于我的敌人，决定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刘志丹和杨森率红四十二师自南向北，第一仗打姚渠，缴获敌人手枪各20余；第二仗打石板，缴获人枪各10余；第三仗打王雷镇，缴获人枪各40余；第四仗打店头，缴获人枪各20余；第五仗打蒿土耀营，缴获50多支枪；第六仗打张廷芝骑兵连，缴获人马各30余；第七仗打谭世林，消灭敌30余人；第八仗再打谭世林部骑兵连，缴获人枪各20余，马30余匹。特别是第九仗西华池战斗，一举消灭了敌王子义团的两个营和一个团直机炮连，俘敌6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出了军威。在3个月的战斗中，红军在刘志丹和杨森的运筹指挥下，九战九捷，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①。经过这些战斗，解放了陕甘边1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拔掉了敌人的几十个据点，推动了关中和南梁地区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接着刘志丹和杨森率领部队，又在淳化县的三里原，消灭了敌何高候团的两个连。在这次战斗中，杨森身先士卒，手提马刀和手榴弹，亲率战士冲入敌人的火力点，同敌人短兵相接，勇猛拼杀，虽然头部受了重伤，但他仍顽强地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他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深深地感动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并为大家树立了机智勇敢，冲锋陷阵，奋力杀敌的榜样。

^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37页。

同年6月,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不久,陕甘边特委得知中共北方局代表驻西北特派员谢子长回到安定,杨森率骑兵团赴安定会见了谢子长,听取报告后即返南梁地区。7月,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的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南下,杨森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迎接并与其会合。7月2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党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配合陕北游击队和劳动群众创造一师的新红军与巩固陕北新苏区”^①的决定,同时决定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会后不久,杨森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挥戈北上,支援陕北苏区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②。这一年的冬天,敌人调集强大的兵力,又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敌强我弱,红四十二师和郭宝珊的抗日义勇军主动撤退到南线作战。这时,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在黄陵龙坊原驻有一个连。杨森派游击队前往诱敌,敌人果然出动两个排的兵力来追,进入红军预设的伏击圈。杨森一声令下,一举全歼了追兵,红军则无一人伤亡。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1935年1月27日,杨森率领骑兵团深入到外线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长武县城,歼灭了守城的敌人,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并截断了西兰公路。这一仗极大地震动了西北的敌人,就连国民党报纸也不得不发表“共匪刘志丹的骑兵团打开了长武县城”的消

① 西北红军战史编纂委员会编:《西北红军战史》,1965年。

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43—244页。

息^①，这个报道为中央红军在长征北上途中所获悉，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三

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杨森被选为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继续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这时，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出动五六万大军，向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妄图绞杀这块全国仅存的根据地，铲除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赖以生存的基础。3月，红四十二师到达洛河川。西北军委派人送来刘志丹写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并要四十二师主力去陕北作战。但杨森考虑到不给陇东之敌以沉重打击，对二十六军主力北上后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不利。于是他便率领部队到了南梁地区，发动柳村原战斗，重创敌人的一个骑兵团。随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安定，杨森率骑兵继续坚持外线作战，在东起黄河西岸的宜川、韩城，西到甘肃陇东的广大地区，消灭民团武装，摧毁保甲制度和反动政权，起到了牵制南线敌人，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的作用，为粉碎敌人对西北苏区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保卫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9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长征转战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担任师长。这时，蒋介石已令东北军分两路由洛川、富县一带向西北根据地进犯，敌一一〇师、一二九

^① 1985年访问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等谈话记录。

师已进抵延安，一〇七师和六十七军军部也到达洛川一带。新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为了挫伤敌人的锐气，决定南下打击东北军。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以少量部队围困甘泉县城，将主力部署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设伏歼敌。这一战役全歼敌何立中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战斗进行到后期，敌师长何立中带残部退至一个山头固守顽抗。杨森光着膀子，一手拿枪，一手持刀，指挥七十八师发起冲锋，经过激战，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馥州，全歼顽敌，取得了俘敌 3700 多人的重大胜利。

劳山战役以后，“左”倾错误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错误的肃反。他们主观武断地认为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是“右派”、“反革命”，诬蔑这些同志领导的红军是“反动的军队”等等^①。刘志丹、杨森和红二十六军及根据地营、县以上的干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了监狱。正在此时，蒋介石又增调兵力向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内遭错误肃反，外受强敌进攻。在这紧急的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使被抓的同志免遭残害，挽救了西北苏区的危局。杨森出狱后，中央派他到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又调他协助刘志丹把分散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组建红二十八军。而后，中央军委成立黄河游击师，由阎红彦任司令员，蔡树藩任政治委员，杜平任政治部主任，杨森任参谋长。该师在阎红彦、蔡树藩、杨森、杜平领导下，承担了保卫后方的艰巨任务。

瓦窑堡会议以后，为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抗日，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刘志丹、杨森等20人联名发表

^① 张军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发展》，《地方革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对于促进红军党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2月21日，红军东征过黄河后，毛泽东在清涧县的河口东渡黄河前，写信给东征军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对后方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杨森、蔡树藩、赖传珠领导之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1）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2）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3）发动新关、老娃关、清水关、义牒镇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的游击队；（4）保持主要渡口。”^① 这封信还对后方的支前工作，也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杨立三在杨森和蔡树藩、赖传珠的协助下，坚持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保证了东征红军主力的前线作战和回师西渡。4月1日，中央军委宣布成立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②。东征主力红军在西渡回师陕北途中，杨森奉命带领红三十军两个连的兵力断后，在完成了阻击任务退到黄河岸边时，敌人发疯似地追了上来，杨森率领部队顽强狙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杨森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杨森是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将领。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赞扬他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求解放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红军的楷模”^③。

（张军孝 张岗岭 何海峰）

① 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给杨立三的信。

②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③ 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赤胆忠心、血染黄河》。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董纯才：《陕甘宁边区简史》。1953年中宣部编印的《党史资料》第5期。
2. 1981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与省委党校合作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
3. 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张秀山、蔡子伟、王世泰等人的回忆文章。
4. 陕西省档案馆和乾县档案馆、民政局的有关档案资料。
5. 访问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汪锋、贺晋年、张达志、张策、蔡子伟、赵伯平、吴岱峰、郭洪涛、陈学鼎、黄子祥、陈国栋、杨伯伦、刘映胜、陈洁生、刘约三、张文华、戴季英等人的记录及给作者的信。

邹 均

(1900—1930)

邹均，又名邹遵，号复良。陕西富平县人。1923年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共青团西安组织的创建者之一，1924年入上海大学学习。曾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副评议长、国民二军高级参议，在国民二军中从事统战工作，负责国民二军与李大同之间的联系。1926年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后任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驻武汉全权代表、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等职。1930年在河南新乡遇难。

邹均，1900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南社乡师家堡一户贫苦农民家里。邹均原姓师，名守道，早年丧父，过继给姑母师斐为嗣，其姑父姓邹，故改姓邹。邹均的姑父邹炳炎，字子良，原籍甘肃宁州，寓居陕西省三原县，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著名爱国人士。1913年，孙中山、黄兴发动反袁二次革命，邹炳炎、马文明等陕西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后遭失败，邹炳炎、马文明被捕遇害。邹均从小受姑父教养，又受其革命影响，姑父牺牲后，他决心继承姑父遗志，改名复良，刻苦求学，冀图有所作为。1916年，邹均从西安健本学堂（相当于初级小学）毕业后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学习。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西安，邹均出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义愤，效仿北京

学生的爱国行动,约集同学到钟楼、鼓楼、文庙等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宣传,当讲到国贼卖国、国土丧失时,他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为了组织起更多的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邹均和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好友屈武串连各校学生,召开了西安各校学生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举行罢课、游行,支持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决议案。邹均、屈武等被推选为代表到陕西省教育厅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提出立即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严厉惩办卖国贼;抵制日本货物和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要求。省教育厅在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授意下,拒绝学生正义的要求。邹均、屈武即率领请愿代表愤然返回学校,毅然组织各校学生冲出校门,高举上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牺牲一切,为外交作后盾”的大旗,高呼“殊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上街游行示威。5月中旬,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成立,邹均被选为副评议长,他和战友们多次带领学生救国团到鼓楼、西大街、南院门和省议会门前向群众讲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和进行情况,揭露批评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群众运动的罪恶行径。还组织学生检查、焚烧日货。5月30日,陈树藩批示报纸转载军阀政府徐世昌总统对学生运动要“严密稽查,悉力制止”,“不服从制止者依法逮捕”的训令。邹均和他的战友们,不畏强暴,依然义无反顾地带领同学到街头讲演。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省学联会刊《白话报》继续刊登全国各地和本省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往来电讯和对时局的评论,迫于社会舆论和学生运动的压力,省议会于6月下旬发出通电,呼吁政府勿在和约上签字。

是年秋,陕西省长、直系军阀刘镇华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几个月少发或停发学校教职员薪金,致使广大教职员生活陷入困境,

引起教职员罢教索薪斗争，为声援教职员的罢教索薪斗争，邹均、屈武等带领广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到省长公署请愿，和刘镇华展开说理斗争，义正词严地提出，一日不给教职员发薪，学生就一日不上课，不答应要求，坚决不回学校，迫使刘镇华答应给教职员发薪，斗争取得了胜利。火热的革命斗争使邹均不断地得到锤炼，革命意识更加强烈，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被广大师生誉为陕西学生的领袖。

1920年2月，邹均中学未毕业就和屈武一同去北京，不久，赴天津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次年，同武止戈、屈武等陕籍学生发起成立了天津南开中学陕西同乡会，创办进步刊物《贡献》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22年6月，邹均高中毕业后和屈武、武止戈一同到北京，住北京大学附近的三眼井，入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共进》半月刊社举办的专为旅京陕西青年进行高考复习指导的升学补习班学习，受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晓初等人的悉心指导，交流学习心得，谈论国家大事。10月中旬，旅京陕籍学生的进步组织共进社成立，邹均积极参加共进社的活动。不久，经刘天章介绍正式加入共进社，他一边参加升学实习班学习，一边参加共进社活动，为《共进》半月刊撰写社论、评论。他在《时局变化中警刘之言》的社论中，以犀利的笔锋，痛斥刘镇华利用任省长的权力，纵匪助盗，搜刮民脂民膏，“把许许多多有用的金钱，都挪用来养活你们的狗命，饱满你们的私囊，再演吞云吐雾的伎俩。……将使中国人素日不强不富，变成了再弱再贫，辗转至于灭亡。你不是中国人吗？你必要害了陕西，又害了中国，你的良心何在！你真罪不容诛！”在《陕西多匪之原因》的评论中，他分析了陕西多匪是由于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的投机分子，利用窃取的权位，引匪入陕“踏了陕西的地，戴了陕西的天，……吃了陕人的食，穿了陕人的衣，霸占了陕人

的产业”，成了“衣食无愁的享受者”，“变成吃人饮血的土匪！”“前日的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由“一贫如洗而变为千百万巨富，……姬妾满前，金银山积”，这是陕西产生土匪的根本原因。同时“生活落伍的既无衣食，哪能不出来谋生，谋生又无插足之所，怕甚么不敢相率而为匪！这是陕西产生土匪的出发点”。总之，陕西多匪之原因，“一原于辛亥起义，再原于陆建章，三原于陈树藩、刘镇华实集大成”。

1923年，邹均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江苏省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就在这一年，他曾一度回西安同武止戈等一起在西安开展宣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播撒革命火种，组织革命团体，为西安建团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1924年初，邹均赴上海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人创办的学校，邹均在这里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学知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学习期间，他同武止戈、马文彦等陕西学生，创办了《新群》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同年底，邹均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指派再次回西安，与共产党员魏野畴取得联系，发展团员14人，于同年底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二支部，随后，邹均就第二团支部的建立情况、领导成员、团员人数、团员思想状况、组织团员学习、开展活动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与第一团支部的关系等问题向团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并向团中央建议建立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西安团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活动的开展，为在西安建立中共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准备。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影响下，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击败吴佩孚的反扑，将所部改为国民军，成立了国民军总部，冯、胡、孙分任一、二、

三军军长。国民军总部成立后，胡景翼邀请好友暨同乡邹均到京工作，经中共组织批准，邹均于1925年初到北京，负责胡景翼国民二军驻京办事处的对外联络工作，并致力于党的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军武器弹药都很缺乏，冯、胡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援助，邹均、屈武（时任胡景翼的高级参议）等即向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做了汇报，李大钊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转请苏联政府给予援助。苏联答应给国民军提供3个师的武器装备。冯玉祥、胡景翼即派邹均、张允荣（时任国民一军副官长）去蒙古接运苏联援助的武器。邹、张二人奉命北上，在去库伦（今乌兰巴托）的途中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漫天的飞雪，刺骨的寒风，天昏地暗，难以辨认方向，他二人艰难地在茫茫大草原上试探着前进，后来在当地牧人的帮助下才摆脱险境，他们一时同北京失去联系。中共组织和胡景翼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危，即派屈武北上寻找，屈武和邹均、张允荣会合后一同到库伦接运武器，他们三人历尽艰辛，终于把武器安全运到北京，受到了国民一、二军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邹均在北京期间，为加强中共同胡景翼的合作，扩大统一战线，他经常来往于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刘百庄和国民二军领导人胡景翼、岳维峻之间，沟通联络。胡景翼要邹均转告李大钊，再通过李大钊与苏联联系，请苏联给国民二军多派军事顾问，还希望中共派干部帮助国民二军建立陆军训练处，加强政治工作。胡景翼的这些要求都一一得到实现，中共先后派几十名党员到国民二军陆军训练处工作和学习，该处也成为当时中共搞军事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胡景翼更加倾向革命，支持工农运动，拥护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邹均还通过中共豫陕区委负责人王若飞、肖楚女、刘天章、李求实等帮助国民二军选派一大批进步青年军人去苏联和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不少是中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同志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邹均受中共北方区委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夏末，邹均了解到国内革命出现了高潮，坚决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邹均回国后李大钊派他到驻河北省河间县的奉军郑思成部（郑系陕西人，原为国民二军的一个旅长，暂时接受奉军的收编，任军长）作兵运工作。邹均到郑部后，向郑思成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国共合作的政策，希望他待条件成熟时率部起义，重回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经过多次耐心工作，郑思成同意在军、师、团三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邹均利用筹建政治工作机关的机会，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加强了中共在郑部的兵运工作，后来郑思成参加了北伐，同中共保持联系，一直倾向进步。

1926年12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国民党左派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正副司令，一批著名共产党员担任驻陕总部各厅、部、办的负责人，邹均担任民政厅第三科科长兼驻陕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委员和教育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等职。任职期间，邹均同民政厅副厅长、共产党员葛霁云等一起，协助中共组织通过于右任、邓宝珊进行政权的改革工作。“为刷新吏治，对于县长、县佐人选以才能为前提，以革命事业为中心，采公开方式，取严重办法，力矫往日官场恶习”，制定了《检定县长县佐条例》。条例在《陕西国民日报》上公布后，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总部将几十个反动县长撤职查办，选派了一批进步的人士接任县长。民政厅还积极支持农民协会及农民武装的建立与发展。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选派邹均任驻陕总部驻武汉全权代表，负责“所有在外一切交涉事宜”和“向中央报告陕西党

务政治军事政治财政等一切事宜”。同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国民革命，宁汉合流，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群众革命运动，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被解散，邹均根据中共组织指示转入秘密状态，坚持地下工作，接待了许多由陕西到武汉的共产党员。是年秋，邹均因多年工作劳累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中共地下组织便送他到上海养病。邹均到上海一边养病，一边抱病坚持革命工作。

1928年夏，邹均病情好转，中共中央派他再次去苏联学习，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在东大学习一段后，他得知国内党正在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军事人才很缺乏，便申请改学军事，党组织满足了他的要求，先编入东大军事班，不久又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专学军事。紧张的学习使他的肺结核病复发，再加之内急需军事干部，邹均毅然申请回国工作，经组织批准，于1929年初抱病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对同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战友师哲说：“中国军事人才很少，今后武装斗争会显得更重要，党需要的正是军事人才，希望你好好学习，为党多做工作。”“我的身体太坏了，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但回国后一定要好好干，能活几天就干几天革命。”表现了他对革命忠贞不二、无私奉献的彻底革命精神。

1929年春，邹均回到上海，边养病边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同年9月初，党在小沙渡路召开追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彭湃、杨殷烈士大会，邹均参加了大会，当他同共产党员艾志清、张云清散发传单时被英国巡捕逮捕。邹均被捕后受尽酷刑，但他坚持自己是过路人拾到几张传单的口供，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一年后，英巡捕房因查不到其它证据，被迫将其释放。

1930年夏，中共中央派邹均到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

记。他不顾身体虚弱，奔波于开封、郑州、新乡、许昌等城市，调查了解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及敌军内部矛盾。时值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混战，陕甘著名共产党员杨晓初、葛霁云、阎揆要、陈潭六、杨可均等在冯玉祥的第八方面军邓宝珊部作兵运工作。邹均同这些同志是多年老友，交往甚密，便利用他们在邓部的合法身份，帮助河南中共组织为党团干部填发来往护照，接济经费和武器，营救被捕的党团员。如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在郑州被捕后，邹均通过邓宝珊的秘书杨可均转请致电冯玉祥部的参谋长刘骥，使童长荣终于获得释放。经过邹均短期的工作，中共河南省委的兵运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邹均在河南工作期间，中共党内正值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中共中央命令河南省委在城乡立即组织暴动，在城市组织总同盟罢工，赤化河南。邹均对立三“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不顾主客观条件，在城市一律“组织总同盟罢工，是有些同志在吹牛皮。”为此，被指责为“右倾”、“取消主义”，从而受到错误的处理，先撤去军委书记职务，改任军委秘书，继而停止工作，开除党籍。

邹均受到错误的处理后，委屈求全，仍坚信党的事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秋末，他在郑州无法立足，便去许昌邓宝珊部找杨晓初、葛霁云等，到邓部后，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蒋、冯、阎中原混战以冯、阎失败告终，同年冬，邹均随同杨晓初等同志率数百人由许昌向豫北转移，北进途中收编了许多散兵，遂改编为一个团，杨晓初任团长，邹均负责政治工作，该团暂归冯玉祥部参谋长刘骥指挥，继续北进，行至道清铁路清河镇时，邹均和陈潭六提出带一连精兵去黄河南岸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而后南北汇合的建议，得到杨晓初的同意。邹均、陈潭六遂率部南

返,到黄河铁路桥时受阻,未能渡过黄河,便原路返回,打算归建原部队再另定计策。部队返回途经新乡南关休息时,邹均和陈潭六去城内浴池洗澡,所部突遭当地驻军石友三部的围攻,阴谋收编。该连奋起反抗,双方伤亡甚众。邹均、陈潭六闻枪声后急速赶到现场,向石部旅长米振彪进行交涉,再三说明是冯玉祥的部队掉了队,正在追赶大队,路过此地稍事休息。米振彪根本不听申辩,蛮横无理地扣留了邹均、陈潭六,严刑拷打,迫令缴械。邹、陈据理驳斥、坚决不缴械。米振彪气极败坏,最后下了毒手,当晚把邹均、陈潭六活埋在南门外。邹均、陈潭六就义前对敌人骂不绝口,表现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

1957年10月,邹均被迫认为革命烈士,将其遗骨移葬于西安革命烈士陵园。

(张守宪 董建中 梁星亮)

张 仲 良

(1907—1983)

张仲良，陕西耀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政委、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政委、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抗战时期先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关中分区专员、延安教导一旅政委。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调任延安联防军副政委、第一野战军第四

军政委等职。并先后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战役。1949年9月后，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1965年8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工作，历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3年2月27日病逝于南京。

从幼年到少年

张仲良，190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六)出生于陕西省耀

县方巷口村的一个中农家庭。^①方巷口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庄，这里的老百姓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也有一些农民喂养牲畜，利用农闲给商人做些驮脚、贩卖粮食、煤炭、瓷器的营生。张仲良的曾祖父时期曾有过“一砖到顶”的砖瓦房。可是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春节，这幢住宅被土匪放火烧毁，全家老小三代人四处避难，幼小的张仲良也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的父亲十分勤劳，先是到兰州做苦力，挑黄河里的水卖，后又到清军中服兵役。退役后，返回家乡，农忙时节夜以继日地在田里劳作，农闲时节驮脚、贩运煤炭，或到县城掏粪、运肥，在生活上省吃俭用。母亲善良温存，和邻里相处和睦。勤劳俭朴的家风，也铸就了张仲良勤劳的性格。从七八岁开始，他和家人一起种田、打淀。10岁时候，跟着父亲、叔父到县城买粪、运肥，干着又脏又累的活计。同年，入本县石仁庙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学校用的教材“经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审定，商务印务馆印行”。书里讲了许多爱国主义思想，讲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华的大事。在这个学校，他刻苦学习4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小学学业。^②

小学毕业后父辈为了使张仲良继续学习，又能减轻家庭负担，执意让他到离耀县七八十里以外通运坊的一个教会学校读书。按照通常情况，入校前必须加入基督教。对此，十几岁的张仲良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叫我当洋鬼子呀，我才不愿当洋鬼子哩！”不管怎么打他，骂他，就是不肯。甚至领他到教堂作礼拜，他连跪也不跪，以至于教主也不得不表示“实在不愿意不要勉强了。”不久，他入了

^① 张仲良：《回忆耀县起义和耀县游击队》，载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耀县起义》第104页，1990年6月。

^② 《张仲良自述》。

耀县“乙种实业学校”，第一年学习了养蚕，第二年因学校经费短缺，取消了养植业，仅开设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课程，基本是高小的内容。这段时期的学习，使张仲良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不仅知道了中国，而且也知道了世界历史、地理的基本知识。由于他聪明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他在“乙种实业学校”学习的最后阶段，家里连遭不幸。哥哥带病被抓壮丁去当兵，在服役中得了伤寒病，回家后因无钱治病，不久即去世，年仅26岁。父亲重病缠身，叔父是唯一的劳动力，可是不久也患病躺倒在床。张仲良在即将毕业的时刻，不得不辍学回乡，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又因军阀混战，校舍被军队侵占，学校被迫搬迁。张仲良就是在这种纷乱中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活。

小学任教

1924年，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建立。消息传来，张仲良产生了到军校学习的念头。可是这个想法跟母亲一讲立即遭到反对，在母亲看来，这实在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哥哥早亡，母亲期待张仲良长大支撑起门面，但她看到的却是儿子要远走他乡，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不同意张仲良去遥远的广州。张仲良只好服从了母亲的意愿，放弃了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念头。

不久他到了本县南三堡小学，做了一名乡村教师，膳食免费，年薪仅60块银元。此间，母亲患了重病，因无钱医治，于1926年4月病逝，年仅45岁。母亲死后不久，爸爸也死于癌症，年仅50岁，父母双亡，这对于一贯孝敬老人的张仲良在精神上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在该校从教半年，因对这所学校不满意，便回到母校任教。在这所学校，他接受了社会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

响,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经常和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张邦英、曹雯等人以及其他进步青年,谈论社会的黑暗,寻找人生和社会的出路。

1929年,耀县成立了北街小学,张仲良又被邀请到该校任教,年薪80块银元。同年,陕西大旱,地主豪绅催粮催款,农民被迫多次进行反对横征暴敛、反对高利贷的斗争。张仲良同情农民的抗暴义举,反对地主豪绅压迫农民的罪恶行径。此间,他读了许多的进步理论书刊和共产党员王若飞写的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开始萌发了革命斗争的思想。次年,因为灾荒学校被迫停办。张仲良失去了工作。这年正值蒋冯战争,他一度参加了驻耀县县城的“反冯军”。张仲良对这支部队中存在的官兵不平等,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等恶劣作风十分不满,便离开部队返回家乡。

中共耀县县委书记

张仲良返回家乡两个月后,“反冯军”所属雷天一的部队被杨虎城收编。张仲良和同乡青年陈学鼎一起参加了这支部队。张仲良在雷天一营的一个连当上士文书。不久,雷天一叛变了杨虎城,张仲良随部队离陕西去甘肃镇原。同年春,在固原,由他的同乡,时任雷天一营书记官的我党地下组织营党委书记的张邦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31年夏,该部再次被杨虎城收编,接着从甘肃经陕西彬县回到了泾阳,张仲良与张邦英商量后,离开部队返回耀县。他在回家途经三原县武字区陵前村时,通过共产党员王屈贤的介绍,与中共渭北特委接上了党的关系,回到耀县开始党的地下工作。此间,张仲良和该县共产党员杨再泉、曹雯等取得联系,并于1931年发展了革命青年陈学鼎入党,还帮助失掉组织关系的刘

林圃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6月,受武字区党组织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耀县第一支部——阿姑社支部,张仲良任支部书记,以后又在野狐坡和耀县城内建立了党的组织。根据武字区委的指示,中共耀县支部于1931年12月改为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张仲良任特支书记。1932年经人介绍张仲良与本乡女青年杨志兰结婚。

同年经小学同学唐天杰作保,张仲良到小学教书。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的“五抗”斗争。这一年,是继民国18年后关中的又一个干旱之年,广大农民几乎是颗粒未收,而官府照旧催粮索税,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正在蕴酿着一场反官府的斗争。这时,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陕西省十二、三个县的农民开展了反抗官府的斗争,耀县农民也行动起来了,他们用写鸡毛信的形式,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张仲良和他的同学共产党员唐天杰(时任小学教师)等直接领导耀县农民开展斗争,发动数千农民围城“交农(具)”,烧毁了耀县的西城门。在向县政府请愿过程中,他组织农民成立了“自救会”,并推选代表,组成请愿代表团,张仲良是代表团的骨干分子,请愿斗争坚持了几个昼夜,时间之长是当地“交农”斗争空前的。由于斗争得力,迫使县政府与农民代表进行谈判。在这场斗争中,张仲良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和组织才能。

张仲良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目和不满。地方政府勾结反动军官唐子封,将张仲良逮捕,随后,在他工作的地点进行搜查,企图拿到对他治罪的证据。但由于他平时工作严谨,使当局找不到任何说明张仲良是共产党的证据。在狱中,张仲良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时,恰逢他的好友陈学鼎和赵连壁等,从西安杨虎城举办的区长训练班结业返回耀县,他们打通关节,四下活动,由

当地士绅具保，使在狱中关押了 40 多天的张仲良获释。

出狱后，他在张邦英的协助下，继续进行建党工作。同年冬季，中共耀县县委在泥阳堡成立，张仲良任县委书记。在敌人“围剿”渭北三原心字区革命根据地的紧急时刻，他临危不惧，精心安排，成功地掩护了转移到耀县的上级派去工作的领导同志。

此时，张仲良虽然继续以教师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但还是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耀县教育局不准许他继续做教师工作。上级党组织为了避免党的工作遭受损失，便让他离开耀县，到西安参加陕西省建设厅举办的掘井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他曾介绍外县的两人入党。当时，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严重，上级要求张仲良在训练班发动工人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这一活动被当局察觉，当即制止。张仲良不得不离开训练班，由程建文（共产党员，后叛变）介绍到陕西省委另做安排，起初安排他到中共西安市街道支部工作，但因身份已经暴露，便留在市委机关。当时正值马克思逝世 50 周年，张仲良参与了印制、散发传单的活动。不久，程建文被捕。为避免由于程被捕暴露党的机密，张仲良便移居别处，继续在工人、知识分子中进行建党工作。

参与耀县起义

1933 年 7 月 21 日，驻守在耀县的杨虎城骑兵团近千人，在团长王泰吉率领下，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在耀县举行起义。此时尚在西安街道支部工作的张仲良，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指派返回耀县。他回到耀县的当天下午起义爆发。同日晚耀县县委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的参加下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杜衡提出立即成立耀县游击队，曾在耀县工作多年、对耀县实际情况

有较多了解的张仲良认为，成立游击队需要一定的准备工作。杜衡错误地指责张仲良是“右倾机会主义”。张仲良为顾全大局，积极执行尽快成立游击队的会议决定。

会后，张仲良立即到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的阿姑社，与陈学鼎一起对农民进行组织和动员。在群众集会上，张仲良发表讲话，农民群众热烈响应，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很快就达到六七十人。7月22日，耀县游击队在阿姑社正式成立。为了扩大游击队，加强游击队的力量，张仲良等人利用同学朋友关系，取得当时任耀县北区区公所所长兼民团团长的赵连璧同意，由陈学鼎代理民团团团长。随后，把民团和游击队一起调到方巷口，以训话的名义集合起来，由游击队收缴了民团的枪支，处决了反动副团长朱瑞轩，吸收了其中40多名素质较好的团丁加入游击队。王泰吉起义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通过中共耀县县委给游击队拨发了毛瑟枪19支，又从民团中搞了一部分库存的枪支弹药，这时游击队有枪六七十支、战马两匹、人员100多个，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革命武装。

耀县游击队一成立，便积极配合王泰吉起义部队在乡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张仲良的参与下，捉拿了耀县最大的恶霸左善楚、左国鼎等三兄弟。在阿姑社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烧毁了他们的土地契约；把他们的粮食和财物分给群众，由张仲良亲自将左氏三恶霸处死，群众拍手称快。

耀县起义后的第七天，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撤离耀县向三原进发。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同日，县委带领游击队转移到白家庄，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政治委员），曹雯任经济员，下设三个中队。第二天游击队离开白家庄，向西北方向前进，经过墓坳、高山槐等地，转战到照金革命根据地。

1932年7月底,在照金的薛家寨,耀县游击队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部队的部分领导同志,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会议,决定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组成主力部队,协同作战。这支部队组成后,连续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

由于耀县游击队撤离耀县时行动仓促,对撤离后的该县党的工作没有安排。8月张仲良以特派员名义和宋子歧一起到耀县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因为张仲良处死了左氏三兄弟,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工作异常艰难,但他毅然服从组织分配,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在耀县坚持工作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又奉命返回部队。

第三路游击队政委

1933年11月13日,陕甘边党政领导人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个根据地,成立三路游击队,其中第三路游击队,先由张明武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不久张、黄二人因病离队,改由王安民为指挥。王牺牲后,由陈国栋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

第三路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展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仅有平子、旬邑、淳化、照金等4个支队,各支队少者七八人,多者30多人,总共不过近百人枪。人数虽然不多,但因其活动于西北反动统治中心西安附近,象一把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敌人将这支部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每逢春夏之间,都要进行“围剿”,这就给开展游击活动造成很大困难。

张仲良作为这支部队的政委,深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他十分注意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每到一地都把宣传群众作为一项

首要任务,在唤醒农民觉悟的基础上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基干赤卫队,继而扩充发展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使部队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张仲良强调党员和干部要发挥模范作用,同战士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他和游击队其他领导同志在行军中很少骑马,经常与战士一起步行,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张仲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模范作用,深受第三路游击队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在一次战斗中,张仲良带领游击队冲到前沿阵地同敌人拼搏,事后战士们向他提出意见:为了保证整个部队的指挥,请你不要冲在部队最前面。这种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

第三路游击队建立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消灭陕甘宁边区正宁县王朗坡的反动民团。这个民团有三四十人,民团头子的绰号叫高楞娃(关中人把厉害不怕死的人称为楞娃),十分猖獗,对我部队在当地的活动威胁很大。红军四十二师师党委研究决定,必须铲除这一祸患。为了完成师党委下达的任务,张仲良带领十多个游击队员化装成“土匪”,抢了一家富农的财物,又故意把抓来的富农分子放走,让他去向高楞娃报告。这样就把高引出来了,由事先埋伏在有利地形的红军主力部队予以歼灭。这一仗旗开得胜,为当地民众除了一害,又为游击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个障碍。

第三路游击队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始终把发动、组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放在重要地位,积极恢复和建立农村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首先组织农会,帮助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抗捐抗税和打土豪、分衣物、分粮食的斗争,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在建立革命政权时,一般是按照建立革命办事处、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的顺序,循序渐进地进行。这些做法顺应了广大农

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在进行农村土地革命斗争中,还注重利用旧的政治势力和反动武装,对他们分化瓦解,通过工作促其中立或为我所用,从而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对所有这些,张仲良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夏秋之交,张仲良根据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以陕甘边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到甘肃宁县湫头原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年9月,陕甘边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活动地区划为陕甘边南区,在黄陵小石崖成立了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张仲良任陕甘边南区党委委员。

同年冬,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即红一团),作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区的主力部队。该团以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特务连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建立,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共200多人。

1935年4月,敌军马鸿宾向陕甘边发动进攻,进驻金村庙塬。陈国栋、张仲良奉命率红一团奔袭金村庙塬,我军英勇杀敌,占领了梁下的村庄,歼灭了小股敌军。但大部分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事先修筑的工事,使我军进攻山梁时受阻,几十名战士伤亡,红一团被迫转移,在转移中又遭敌军骑兵的攻击,部队被冲散。张仲良机智地躲在沟底的一个洞里得以脱险。金村庙塬战斗失利后,张仲良作为红一团政委,按照上级指示,同指战员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创造条件,再图发展革命力量。

蒙冤被捕

1935年,张仲良经上级批准回到地方,活动于陕甘的宜君、黄陵、富县一带。同年5月被任命为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他领

导当地农民进行土改斗争,在此基础上,于同年7月在富县桃园,以中宜游击队两个连、富甘游击支队一个连为基础,成立中宜独立营。这支武装成立后,与各县游击队配合作战,消灭了当地的民团武装,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革命政权。

张仲良既是一位出色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又是一位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作为一名部队干部,他作战勇敢,决策果断,雷厉风行,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次,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召开分析军事形势的师党委会议,张仲良在会上表明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虽然他对困难估计过于严重,甚至和刘志丹当场争辩起来,但是有不同意见,经过切磋是可以使决策更符合实际的。会上,张仲良接受与会同志的建议,“回去按实际情况办好了。”若干年后,他回忆此事时承认刘志丹的主张是正确的。作为一名地方干部,他注重从当地实际出发,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工作途径,特别是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陕甘地区和红军游击队失去了同上级和党中央的联系,但在一段时间内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得以减少,这为陕甘地区,也为张仲良领导的革命武装能够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环境。

但是,1935年秋,“左”倾错误再度统治陕甘和陕北地区,陕甘晋工委部分人在“左”倾路线统治下,错误地开展了肃反斗争。张仲良这时在陕甘边任中宜革命委员会主席。在此以前的1934年下半年有人向中共北方局汇报,诬称陕甘党组织在有些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35年10月开始的陕北肃反中,错误地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及连以上干部,地方上县以上的许多干部被捕,还有一批怀着满腔革命热情来到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也未能幸免。张仲良被捕后,先关在洛河川一个地方,后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情况时说:“一天晚上,我们已经

睡下了,看守人员突然喊叫:‘起来、起来!’按名字叫出一批就杀一批,最后只剩下我和一个丢了马料袋子而被关押的骑兵战士。”当时,在关押人的窑洞后面已经挖了坑,准备活埋他们。正在此时,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才使肃反中被错误对待的人获得了解放,张仲良也由此避免了被活埋的厄运。张仲良对此深有感慨地说:“这确实要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如果中央迟一步,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

张仲良获释后,和其他大多数干部一样,在一段时间仍被错误地降级使用,派他给郭洪涛当秘书。因他对郭洪涛的“左”倾过火斗争很反感,对秘书一事十分消极。恰在这时,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的张秀山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陈学鼎、习仲勋等来看他。在习仲勋的建议下,他向上级领导提出到中央党校学习的申请,不久获准。在党校学习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多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最使他难忘的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直接听到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同年12月27日,张仲良又参加了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

1936年初,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召见习仲勋和张仲良。周恩来讲了关中的形势,要他们到关中工作。张仲良被分配到淳耀县帮助工作。同年夏,张仲良被派往设在瓦窑堡的红军大学学习,张仲良被编入二科一队。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成立了陕甘省,张仲良被分配到陕甘省军事部任副部长、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后又到关中分区任军事部长。1937年4月至9月间,任中共关中特委执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关中特区司令员,直接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

在抗战时期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把地方武装改成保安团,原来任关中分区军事部长的张仲良,改任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员。对于这一巨大转变,张仲良和红军中许多人一样,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是经过很多教育,才得以顺利转变的。”

1939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地处陕甘南大门的关中军区,成了与国民党顽军斗争的最前线。张仲良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开展反磨擦斗争。国民党为了占领我关中地区,调动预备三师、第八师、保安旅等部队发动了对关中的进攻。在地形、兵力等方面国民党均占优势的形势下,张仲良领导关中军区坚持平原游击战,发展、巩固山区根据地,与敌人对峙和斗争了几年,守住了关中地区,特别是保证了陕北中央机关的安全。

1941年,张仲良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八路军军政学院,成为该校第一批党员中的一员。在这里,他结合自己长期的作战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这对深受“左”倾路线之苦的张仲良来说,尤其理解它的必要性。1942年冬天,张仲良参加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

1943年初,张仲良回到关中地区,任中共关中地委常委。1944年夏调到由杨得志担任旅长的教导一旅任政治委员。1945年3月,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持陇东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仲良所在的教导一旅的第二团调到东北,张仲良被调到延安联防军工作,先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后任联防军副政委。

1947年3月17日,张仲良与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一起参加了在毛泽东住处延安王家坪窑洞里的一次小型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和布置了陇东工作。当时陕北的战局是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开始对陕甘宁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此前,同年2月28日,胡宗南部向陇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达到牵制我军主力于陇东,乘虚占领延安的目的。会间,习仲勋向毛泽东等汇报说:“敌人一旦再进攻陇东,陇东的工作就会瘫痪。由谁主持工作?”话间,国民党飞机飞临延安上空,张仲良毫不畏惧地走出窑洞,察看敌机动向。这时,习仲勋向毛泽东建议,派张仲良到陇东实行一元化领导。当张仲良回到窑洞时,毛泽东对他说,打算派他去陇东工作,张仲良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

陇东地处陕甘宁交界地带,地理位置重要。1947年3月,蒋介石调动胡宗南部和马步芳、马鸿逵部从南、西、北三个方面进攻陕甘宁边区,陇东解放区成为蒋介石进攻陕北的跳板和桥头堡。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后,陇东地区大部分陷入敌手,党政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地方游击队、农民自卫军等武装不能正常活动,生产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群众中弥漫着恐慌情绪。张仲良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张仲良没有忘记毛泽东在做出让他主持陇东工作的决定时对他的叮嘱:“落后连队三个月要改变形势,你到地方(陇东)工作,六个月总要有个转

变呀！有个好的形势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西北局关于加强陇东地委领导的决定》，调整中共陇东地委，由张仲良接任陇东地委书记兼任专员、陇东军分区司令、政委，原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改任第一副书记。《决定》“责成陇东地委严格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和所有干部的工作，凡在战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必须加以解散和撤换，重新配备干部，加强各级领导。”“认真整顿党的组织，继续用大力量发动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与积极支援战争工作。”会后，张仲良来到陇东地委所在地庆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陇东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始了新的工作。陇东地委在张仲良一元化领导下，坚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确指示，立即对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了部署，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有效措施。

争取陇东自卫战争的胜利，是当时工作的中心。在张仲良主持下，1947年4月1日陇东地委作出《地委关于战争工作检讨和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领导分区的地方兵团、各县游击队和各乡镇的民兵小组等基本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是分区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第一任务，也是对于干部检讨工作，实行赏罚（提升或撤换）的第一标准。”为坚定群众对胜利的信心，张仲良通过地委提出“熬过3个月的困难”与“打垮胡宗南”的口号。为适应战争环境的要求，精简了分区机关机构，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国民党军队进犯陇东期间，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新宁、新正八县游击队（约5500余人）、民兵和自卫军（5521）人与军分区步兵团、回民骑兵团和警卫团紧密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敌人。1947年5月21日至7月7日，西北野战军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稳定了西北战局。1947年6月全国解放战

争转入反攻后,国民党抽调甘、青杂牌军队配合其新一旅等对我陇东分区发动新的进攻,陇东地委领导当地军民全面地开展游击战争,重创敌军,为此后西北战场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张仲良上任后大力加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地委关于战争工作的检讨和任务的决议》中强调:组织群众生产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战争中决不可忽视的两项工作。在自卫战争期间发动群众开展复仇清算运动,有力地配合了战争。

张仲良十分重视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建设。在中共陇东地委领导下,普遍开展了赏功罚过运动,提出“3个月见人心,好的忘不了,坏的漏不了”。调整了领导不力的县级领导班子。1947年12月中旬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整顿地方党组织的会议。在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部署全区土改工作的同时,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随后,中共陇东地委从分区各县抽调300多名干部,在进行土改试点的25个乡,同时进行整党试点,接着又根据上级指示在其它县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顿工作,从而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参加兰州战役

1947年9月西北野战军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于同年10月离开陇东,但仍兼任陇东地委书记(至1947年12月)、陇东军分区司令员(至1948年2月)。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后,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政委。

1948年2月,西北战场转入反攻。张仲良领导部队先后参加了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冯原战役、荔北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在扶眉战役中,张仲良对部队进行整训,号召部队要打出威望来。他与部队一起,以一夜行军150里的速度胜利完成了拦截敌人的任务。他所在的第四军受到一野前委的嘉奖,当时我军战报以“四军健儿建立奇功”为题,给予了表扬。特别是兰州战役,第四军再建奇功,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8月的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略决战。青海马步芳妄图借兰州重要的战略位置,固守兰州,将人民解放军聚歼于兰州城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与马步芳部决战于兰州。毛泽东曾在1949年7月6日《解放大西北的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对青(海)宁(夏)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应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解决问题。”当时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分析了敌军有退守青海和固守兰州两种可能,遂根据在兰州战役决战对我有利的情况,确定了力争同马步芳在兰州决战的方针。

野心勃勃的马步芳,调集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八十二军的主力分守兰州的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等3个主阵地,妄图凭借东、南、北三面环山,中夹黄河天险的有利地势和抗战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坚守兰州,准备与一野主力决一死战。敌人扬言“督师南山,抬棺而战”,沈家岭是兰州大门上的一把锁。“有沈家岭在,就有兰州在”,“誓与兰州共存亡”,以壮声势。

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一野参谋长阎揆要把攻占沈家岭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第四军。在接到命令后,张仲良和高锦纯召集师以上干部讨论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地形局限难以展开,只能从正面一处突破,以头对头的顶牛战,一口一口去吃掉敌人,决定由

三十二团担任主攻,并明确了各师作战任务和进攻时间。要求部队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夺取阵地,歼灭敌人。要求部队从各方面作好攻坚战准备。各师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当突击队。野司、二兵团批准四军为突击队,作好攻坚战准备。

8月20日晚,三十二团接近沈家岭阵地,二十八团接近狗娃山阵地。次日,三十二团按规定时间发起总攻,战斗十分激烈,但全线无一处突破。这次进攻虽未成功,但搞清了敌人工事配备和火力配系,发现了我军进攻中的不足之处,为继续进攻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8月23日,张仲良的老战友、第四军军长张达志赶到,他们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和有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总结试攻失利的教训。23日、24日,他们二人分别下到基层,请基层官兵献计献策,针对敌军情况,提出攻击战术。在此基础上,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仲良强调指出马步芳匪军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之一,对他要有足够的估计,力戒轻敌、骄傲、性急,要进一步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不攻则已,攻必奏效。为此决定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并调整了部署,除二十八团箝制性的进攻狗娃山外,沈家岭的主攻任务,改由三十一团担任,在狗娃山组成加强的军炮兵群,更主要的任务是挖壕沟,以壕沟接近敌人阵地。战斗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8月24日,坐镇兰州的马步芳得知一野主力攻占临夏直取青海循化的消息,急令骑兵第八旅和几个骑兵团调回青海。马本人当日傍晚乘飞机仓皇奔赴西宁,把守备兰州的任务交给他的儿子、陇东兵团司令员马继援,让他孤注一掷,“马勺(木瓢)炒大豆,至焦

而了。”^①

第四军和兄弟部队经过三天的认真准备,在彭总的指挥下,几百门大炮全部进入前沿阵地。第四军的将士经过张仲良政委、张达志军长的战斗动员和精心部署,斗志昂扬,决心为攻克兰州作出贡献,为解放大西北再立新功。

25日拂晓,按上级统一时间发起总攻。以准确的炮火,轰击敌军前沿阵地,继以熟练的爆破技术,炸垮敌军层层外壕。接着,步兵排除敌军的地雷、铁丝网等重要障碍,在炮火掩护下,经过猛烈冲锋,在火光弹雨中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反扑。下午5时,全线出击,向敌军发起最后攻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四军把红旗最后插上沈家岭。这时,其他重要阵地也先后被兄弟部队攻占。敌军被迫收缩兵力,退向兰州市区。一野主力咬住不放,发起连续进攻。午夜,在第三军的配合下,第四军又攻占了狗娃山。26日,第四军和兄弟部队分别从东、南、西三面攻入市区,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被一野主力消灭。上午11时,一野主力通过黄河铁桥,攻占城北白塔山,敌前敌总指挥马继援乘吉普车向庙滩子狼狈逃向西宁。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第四军得到一野司令部“四军健儿再建奇功”的表扬,张仲良、张达志受到彭总、西北局和一野总部的多次表彰。

战斗结束后,彭总把肃清兰州残敌、安抚百姓、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交给了四军。受命后,张仲良等迅速组织宣传力量日夜奋斗,赶制布告并张贴到大街小巷,宣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以及党的城市政策。长期受马家军欺骗宣传的兰州市民,亲眼看到了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打消了顾虑,纷纷上街欢

^① 《解放大西北》,第273页。

迎解放军。30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人城式,高原古城兰州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气氛中。

在兰州战役的日子里,张仲良深入部队,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往返于军、师、团指挥所,调查研究,发扬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他和张达志军长一起,出色地指挥了第四军的胜利作战。在这次战役中,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常常顾不上吃饭,眼睛中充满了血丝,身体消瘦了,但心情愉快,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兰州战役结束后不久,又马不停蹄奉命奔赴青海,担任新的领导工作。

剿匪肃特

1949年9月,张仲良由西北野战军第四军调青海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主持青海工作,同时兼任新成立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驰骋疆场的张仲良,改做地方党政工作,而且是负责一个地域辽阔、民族关系复杂、敌特情况严重的青海省的工作,困难自然是很大的。但他深知这是党中央对他的极大信任和殷切希望。他到职视事伊始,通过多种方式认真了解青海的各方面情况,和省委一班人充分研究讨论问题,及时作出并发出了《关于当前工作指示》、《关于当前几个问题的决定》等指导全省工作的文件。他指出:“目前唯一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团结各族人民,开展广泛的清匪肃特运动,这一步做好,以后才可能有步骤地、分别实行其他改革工作。”把清匪肃特工作作为青海解放后的唯一的中心工作,这是根据当时青海的敌特情况决定的。

青海是马步芳反动集团苦心经营40年的家庭式黑暗统治的老巢。他建立了暴君式的反动政权,组织了一套家族式的反革命武装体系,他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镇压人民的祸首。1949年8

月，蒋介石特地两次在台北召见马步芳面授机宜，并授予他陆军上将军衔，给他提供美式装备，使他死心踏地为蒋介石效劳。兰州战役后，马步芳的残兵败将仓皇涌入青海。到青海解放时，全省仍有土匪 100 股左右，总计有 5 万余反动武装。马家父子离逃西宁之前，在青海大通县开会，作了“战马变耕马，枪枝埋地下，分散隐蔽，待机而起”的应变部署，还为其旅以上心腹分别写了 9 封信。马步芳的残余势力，乘我军立足未稳、新生政权刚刚建立之机，先后在大通、门源、湟中、循化等地煽起反革命武装叛乱，各地暴徒还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达万余人，围攻、伏击我驻军部队，袭扰、捣毁新生的县区政府，残酷杀害我军指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一时间，青海境内乌云密布，匪乱四起。

面对青海解放后的特殊时局，张仲良与青海驻军第一军及省委同志积极研究对策，一方面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青海的情况，及时取得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在张仲良主持下于 9 月下旬召开省委会议讨论决定并下发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残余股匪，收容散兵，收集武器，巩固阵地，站稳脚根，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达到长期的生根。”根据当时部队中存在的麻痹轻敌思想，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出：求得在短期内（两三个月内）彻底肃清匪特，这是急躁情绪的反映。马英股匪叛乱的事实教育了我们，说明不熟悉党的政策和当时当地的情况，“就容易发生偏差甚至错误”。同年 11 月省委做出的《关于当前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历史上长期造成的“民族成见不可能短期清除和群众尚未普遍发动的较长时间内马匪残余的挑拨煽动，随时有发生骚动、破坏的可能，因此政治与军事配合的清匪肃特是一个长期严重的政治任

务。”^①这样,就及时纠正了在清匪肃特斗争中的急躁情绪,保证了这一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进行。

由于匪徒残酷杀害我军政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激起我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对匪徒强烈的报复情绪,为防止和克服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发生乱捕乱杀的现象以及忽视党的民族政策的倾向,张仲良经常审阅全省各地上报省委的材料,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当他看到大通县送来的《土匪情况报告》中把马匪反动军官制造的反革命叛乱,说成是“回民造反”时,他在这个报告中指示:“绝不应把反革命叛乱说成是回民造反”。并把这一批示通报全省。当部分干部和群众要求及时杀掉那些已被捕在押的匪特首要分子并说如不及时杀掉就是领导右倾时,张仲良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用党的政策教育广大党员,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他说:“在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些同志认为领导有右的倾向,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当马英股匪骚动后,人心仍有浮动,我们的民族政策和肃特政策,尚未为各族人民所了解;同时所捕获的匪特首要分子,绝大多数虽然是兄弟民族的败类,但群众尚未识破他们的反动本质,这时如果我们立即处决他们,必然更会给匪特以挑拨造谣的机会,因此这里就须去教育和争取群众,提高他们觉悟的问题,在多民族地区惩办匪特,必须等待到‘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所以镇压要从全局观点去看才能掌握时机与达到孤立、打击匪特之目的。”张仲良报告后,许多人都说:还是张书记政策水平高,看得远。

在平息叛乱事件中,青海省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张仲良着重抓了昂拉藏族千户项谦这个青海颇有影响的人物。项谦在马匪残余的煽动挑拨下,在昂

^① 《解放青海资料选编》,第82页。

拉地区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实行反革命武装割据并发动反革命叛乱。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省委曾先后17次派遣省级藏族上层人士和负责干部前往劝说,晓以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他归向人民政府,但他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我军进入昂拉地区,并于1951年12月29日在反动军官马金彪的煽动下,掀起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省委在对项谦争取无效,谈判无望的情况下,经党中央批准,于1952年5月初,对昂拉地区的反动武装实施军事清剿,除项谦等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在我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仍派人项谦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到1952年7月11日,项谦终于向省人民政府投降。张仲良等省政府领导同志及时接见了,向他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让他继续担任昂拉地区千户,项谦非常感动。他在《青海日报》上发了《归向人民后的感想》一文。文中说:“过去政府对我争取了17次之多,我没有回头”,“现在我回到人民方面来,主要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使我受到感动”。当时为了争取项谦,张仲良和青海省还对其家庭展开了强大的攻心战术,不仅对项谦的家眷财产给予照顾保护,就连他病在床上的七、八十岁的老母亲也给予治疗。军事上的剿进与政治上的争取,使项谦终于回头。他表示:“我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立功赎罪报答毛主席、报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救我之恩”。争取项谦的圆满结束,创造了处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成功范例,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志的赞扬。

从1949年9月省委发出清匪肃特指示,到1953年5月消灭青海最后一股政治土匪,历时3年多,共歼灭股匪98股,歼灭反动武装势力15600多人。青海省解放时期的剿匪肃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

执行民族政策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杂居的地区，在这里居住着汉、藏、回、撒拉、蒙古、东乡、维吾尔、羌、土、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各民族都有各自的信仰。仅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就有清真寺、喇嘛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佛教居士林、尼姑庵等大小庙宇达 54 个。马步芳在青海统治的几十年中，对青海实行民族离间政策，蓄意制造民族纠纷，煽动民族和部落之间互相残杀，借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从而造成民族间长期存在着极深的仇视与隔阂。马匪残余利用各民族中存在的“舍命不舍教”的心理，在回、汉、藏等民族中挑拨离间，制造谣言，什么共产党要“灭种灭教”，“共产共妻”等等，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各族群众对我军进军青海大为恐慌，有的则被裹胁归随敌特残余分子与我政府相对抗。而马部残余势力借以顽固地反抗共产党的一张王牌，就是利用复杂的民族矛盾，企图将共产党“赶出青海”。

由于共产党过去在青海既没有党的组织基础又无统战关系，因此团结各族人民建立在党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成为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张仲良主持青海工作后，就敏锐地意识到对于青海来说，民族问题至关重要。针对党在青海毫无工作基础的状况，张仲良指出：“凡做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要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宣传各民族间的友谊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同时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按一般人民的觉悟程度逐渐提高，一个一个解决。1950 年 8 月，他在青海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做了《把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的报告，

强调：民族政策在青海是执行一切政策的中心，是起指导作用的，“如忽视这一问题，就脱离了青海最重要的实际，也必然会犯错误。”针对当时青海民族问题的具体特点，张仲良很有见解地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巩固政权联系起来，努力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与青海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他强调不能机械地照搬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在工作中急于求成，而应制定出适合青海现状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政策和方法来。

青海刚一解放，许多地区先后出现在敌特唆使下有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的暴乱事件。如何区分被迫参与暴乱的一般群众和制造暴乱的反动首领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当时在西宁街头出现了宣传部门张贴的标语，将大通县的反革命暴乱错误地称之为“回民造反”。张仲良当即在各县负责干部会上指出，我军刚解放青海，在人民群众还不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情况下，反革命分子利用民族宗教情绪，煽动胁迫一些群众搞武装叛乱，不能说成是回民造反，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把回族广大人民群众同回族中的反动军官、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回族人民深受蒋马匪帮反动压迫之苦，他们要求翻身解放。共产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我们要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揭穿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种种谣言，要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各族人民的救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争取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在人民政府一边，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

解放初期，进青海工作的汉族干部对民族宗教问题和党的政策不熟悉，曾出现了一些对宗教问题过激过火的言行。张仲良都及时引导大家要正确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要尊重寺院的风俗习惯，不能干涉宗教仪式，要克

服大汉族主义等。这些指示,有力地粉碎了反革命分子的谣言,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张仲良指出:在平息叛乱中,必须积极地将民族、宗教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分开,将外来反革命和本地民族上层分子分开,将在台匪直接指挥之下的武装叛乱与由于对党的政策不满而引起的叛乱分子分开,将首要分子与一般群众分开,将能够低头认错投降人民政府的与死不投降分子分开。对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则以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去解决;对于本民族的上层分子(如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只有对不同性质、不同情况、不同对象的人和事加以区别对待并采取不同的政策,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消灭外来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促进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建立。

1950年10月,青海省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协商会议,张仲良被推选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主席。张仲良兼任这一职务,有利于他直接抓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统一战线的建立原则上,张仲良遵循党的民族政策,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争取上层,团结中下层的政策。之所以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因为他们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他们在当时能维护内部的安定。如对昂拉千户项谦的争取工作,就是成功的典型,不仅争取了项谦及其部落,而且团结教育了青海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使他们积极主动地靠近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青海人民政权,让各族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张仲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十分重视培养青海少数民族干部。在青海建立政权的同时,张仲良就把筹备、推行区域自治和培养青海少数民族干部,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张仲良说:如同一个人

的身体有了完整的骨骼才能站立起来一样,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民族的革命骨干,才能保证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才符合毛主席的长治久安的战略思想。那些在张仲良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都已年逾古稀,但今天回忆起当年张仲良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仍然激动不已。

在张仲良的倡导下,青海省委、省政府于1951年在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筹调了相当的人力、财力,举办了以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为主的干部学校,各地县、各部门选拔、推荐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入校学习,或在本地县、本部门就近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等。到1953年底,仅牧区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796人,占牧区干部总数的30%以上,建立了玉树等五个相当区一级的民族自治区,在各级政权机构和其他机构中,不仅吸收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而且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以张仲良为首的青海省委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干群关系密切,社会稳定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领导土改 倡导商贸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青海省委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3月,成立了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机构——青海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张仲良亲自领导这一翻天覆地的伟大群众活动。1951年9月张仲良在首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代表协商会议上做了《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完成土地改革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只有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当时青海省农村中的土地占有情况与国内其它地区的情况基本相同,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乡村绝大多数的土地,而广大农民却占地很少,他们终年辛苦劳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仅如此,青海的地主在掠夺霸占农牧民土地、牲畜,杀害农民,奸侮妇女方面表现得更加野蛮、残暴。由于青海地主阶级在历史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势力的打击,因此他们被消灭的时候反抗性尤烈,顽固对抗土改。他们处心积虑地破坏土改,威胁、利诱乡村干部和农民,有的地主磨刀霍霍,伺机残杀土改干部,有的积极勾结土匪特务进行反抗。同时由于农村中的民族矛盾十分复杂,地主阶级利用民族、宗教进行挑拨离间,有的地主向阿訇求救,有的把《古兰经》揣在怀里,以此作挡箭牌,企图逃避斗争。回族地主说“咱们回民中虽然地主很多,但绝不允许汉民斗争回民(指地主)”。汉族地主则讲:“我过去领导汉民和回民打官司,这次斗争要对着回民,不能斗争汉民。”据调查,青海地主阶级不仅在解放前无恶不作,解放后有90%以上的人有破坏行为。可见,青海的土改工作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了。

针对青海农村中的特殊情况,张仲良为首的青海省委把土改的首要任务放在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上。张仲良在多次报告和深入农村基层中,反复告诫干部和群众:我们不但要揭露地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来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而且更重要的以具体事实教育农民,使他们懂得任何一个民族地主阶级,不但压迫别的民族的农民,而且首先是压迫本民族的农民。以此树立各族劳动人民是一家的思想。团结起来,消灭地主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翻身解放。在土改中,张仲良经常骑马到农村、基层中去做调查研究,针对农民中存在的不敢斗争地主的思想,他教育干部要启发、开导农民,要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对土改中出现的一些过火行为及

时加以纠正。他在互助县视察土改工作时,在一次斗争地主分子的大会上,见到农民斗争地主有过激行为,为了不挫伤农民斗争的积极性,他并未立即制止,而是让干部暂时休会,再研究这种作法妥当与否。他说,这种简单、鲁莽、过激的斗争方式不好,应侧重于说理斗争,提高农民的觉悟,打击地主的气焰。

为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青海省委颁布了《关于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期的八项纪律》以及《纠正一切思想偏向正确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等文件,有力地保证了土改的健康发展。

在土改中,张仲良善于把党的土改政策与青海省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且运用得很好。他针对青海省宗教、民族问题复杂的特点,强调指出:对清真寺、喇嘛寺、道堂的土地一律不动;对农村中的僧尼、道士、阿訇、有劳动能力的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对牧区土改的具体政策与对农业区的具体政策还有所区别。张仲良指出:“必须明确认识,农业区的土地改革可使生产力向前发展,牧业区的牛羊分散则势必影响畜牧业的发展,甚至导致牲畜的大量减少。因此畜业区的畜群、牧场不予分配,不但现在不分,将来也不分。牧业区约有15%至20%的赤贫户,牧主和各头人应该照顾这些赤贫户的生活,如打猎、挖药材以及运输事业等,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使之逐渐建立家务”。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由于生产关系变化影响生产力的提高,而且发展了生产,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土改后,青海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村气象一新,劳动人民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人的滋味。由于青海省的土改取得圆满的成功,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赞扬和鼓励,并指示要巩固土改成果,发展青海的农业经济。

为尽快提高青海经济发展水平,扩大民族贸易,张仲良上任

后,在抓政治、军事斗争和土改运动的同时,把发展青海经济也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来进行。1950年7月,张仲良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贸易工作》的报告中强调:“今后工作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土产输出上,但对农产品的运输也应有适当的照顾,并应有计划有重点的经营一些生产资料,和工厂(公私)取得更密切的联系,配合政府调整工商业工作。这是国营贸易的重要任务”。在张仲良的大力倡导下,青海开始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民族贸易。一方面将青海的特产——羊毛、茯茶、百货等商品,供应青海各族人民,使青海贸易由萧条走向活跃。在贸易中,实行公平交易,不让各族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解放前在马步芳统治时代,100斤羊毛只能换一块半砖茶,1950年则可换到12块砖茶。解放前各族人民拿出450多万斤羊毛,只能换到大布9100匹,此时同等数量的羊毛,要换到11.94万多匹,增多10.8万多匹。民族贸易的发展,不仅使解放后的青海各族人民得到了实惠,激发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热情,而且为未来青海经济发展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前景。

主持甘肃工作

1951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此时西北局即将撤销,原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中共甘肃省委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年6月,在中共甘肃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仲良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总结全省解放近5年来在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各项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在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简单急躁、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报告着重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业建设的领导,把甘肃建设成为我国新工业基地之一;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进

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所有这些工作能否胜利完成，关键在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次大会后，张仲良带领省委一班人，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甘肃的各项革命事业中去。在工作中，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党的会议上，他多次强调：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要树立认真负责、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反对骄傲自满的思想情绪。他说，工作中有不同意见，就要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来，大家商量，共同决定。在以张仲良为书记的省委领导下，到1956年5月，全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是年底，全省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

对于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张仲良历来十分重视，在甘肃任职期间，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吸收有觉悟的积极分子入党，并根据工作需要，吸收各类干部，充实干部队伍，尤其注意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妇女干部。这对加强甘肃地区的党的政权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56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张仲良同志继续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

1957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甘肃省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大好形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58年5月，张仲良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张仲良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甘肃全省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居于支配地位，甘肃省委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张仲良在工作中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工作方法。他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建设，在“大跃

进”的过程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甘肃省委曾有突出的表现。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甘肃全省很快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年底,全省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一时期,甘肃省委一再开展“反右”倾斗争,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凡是对“左”倾蛮干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则被斥为“促退派”、“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并受到批评或斗争。1959年8月,张仲良参加了庐山会议回到甘肃后,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错误地批判处理了一批干部,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严重地损害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打断了纠正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进程。但是张仲良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1960年5月中共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仍然强调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辉煌的”,要继续高举大跃进的旗帜做好各项工作。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中央西北局,中共甘肃省委属西北局领导。同年12月西北局书记处在兰州召开会议,主要检查甘肃省委的工作,研究解决当时农民因缺粮外逃、疾病、死亡问题。会上,张仲良就粮食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反右倾斗争问题和党内民主生活上的错误等作了检讨。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对省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汪锋任省委第一书记,高健若任第二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

从1961年开始,甘肃省委贯彻执行兰州会议精神,大力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使人口外流、疾病和死亡现象基本得到遏制。同时,省委对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逐步得到克服。

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张仲良并不文过饰非、推诿责任,而

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勇敢地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个人得失事小,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事大”。他以此为鉴,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并且逐个登门拜访受了冤屈的同志,向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公开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多次自我批评,并采取许多措施,尽力挽回损失和不良影响。他还常常恳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批评他的缺点和毛病。他这种为人耿直、襟怀坦白的风度,重新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

1961年后张仲良调中央党校学习,在学习、讨论中,张仲良更加全面地反思了自己的错误,系统地检查了“左”倾急躁思想,写了上万字的检讨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他检查比较深刻,本着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原则,对张仲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不怕别人知道自己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谅解和欢迎。

到 江 苏 工 作

1965年夏,张仲良由甘肃调到江苏省任书记处书记,他说:“我从西北到东南,一切都感到生疏,江苏的情况同甘肃的情况相比,差异是很大的”。他表示要从头学起。他从认人、认门入手,熟悉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到职的头一个星期,就深入到省委办公厅各处室和机关院里的一些单位同大家谈心,并连续召开几次座谈会。随后在20天的时间内,就跑了12个县市。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说:“要先接触实际,再听汇报,印象就深了。”张仲良的豪爽直率,诚挚可亲的性格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都觉得他平易近人,推心置腹。他曾对给他当过秘书的汤天英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组织要交底,对同志要交心。咱们在一起工

作,可不要有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隔阂。你既要在工作上协助我,更应当处处严格监督我。如果见到我有缺点和毛病,你千万不能保持沉默,一定要及时提醒我,批评我”。

在江苏工作期间,张仲良严于律己,勤勤恳恳,敦厚笃实,对同志充满着手足之情,为大家所公认。到江苏工作不久,他说:“我已进入老境,看来我这个老根要扎在江苏了”,“今后应该为江苏多作一些贡献”。

然而,张仲良到江苏工作还不到一年,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遭到冲击、诬陷和迫害,被隔离、管制。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对党没有丧失信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没有动摇。他正气凛然,决不同奸佞为伍,他坚信“党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负,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

粉碎“四人帮”后,江苏省委分配他担任科委主任,他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没有因为担任的职务低而影响革命斗志和工作热情。而是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欣然到职视事。他对拨乱反正后的科技工作极为重视,抓规划,抓选题,抓队伍建设,使沉寂多年的科技战线很快出现了新起色、新成果,并结交了许多科技界的朋友。

1979年,张仲良重新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1981年,党中央提出搞好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对于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张仲良积极响应,第一个申请退出省委领导班子。他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写道:“现在党中央励精图治,为我们祖国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这就需要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担负起我们的事业,使我们的党更加的生气勃

勃”。这体现了张仲良顾全大局、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优良品德。

张仲良因患胃癌,在1981年冬作了手术,此后身体一直十分虚弱。1982年9月,张仲良列席了党的十二大,担任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嗣后又任江苏省委顾问。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同时,他仍关心党的工作,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写了《关于改进卫生工作方面的一些意见》、《关于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建议》,为履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职守尽了最后的努力。

在病重期间,他把撰写革命斗争回忆文章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对自己的亲属说,有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别人不甚了解,我与他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解他们的革命活动,我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正是由于他这种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先烈诚挚的战斗情谊,使张仲良抱病写了纪念刘林圃烈士英勇就义50周年等文章。后期,他病情加重,说话已十分吃力了,但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又要帮助他整理材料的同志讨论撰写关于陕北红军三路游击队的回忆文章。“文武场上英雄汉,与病斗争亦勇士”,这是张仲良的战友廖汉生写诗对他的赞语。的确,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不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张仲良一生从不贪图享受,在生活上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家属也同样严格要求,从不特殊。他常说,我们是党的干部,只有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义务,不应谋求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的生活都很简朴,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建国以后,物质条件逐步好起来,他仍不忘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也不准家属孩子动用组织上给他配备

的汽车,不许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他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1983年2月27日,张仲良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刘殿君 王琳)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张仲良自述(杨志兰同志提供)。
2.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耀县党史专题资料集》。
3. 《中国共产党耀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4. 张邦英著:《片断回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5. 王世泰:《回忆我的红军生涯》,1993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6.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1990年5月。
7. 黄江海、李玉泰编《解放大西北》,1990年9月青海人民出版社。
8. 李敏杰主编《西北将军传》,1993年8月轩辕出版社。
9. 青海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青海省军区政治部编:《解放青海》,1987年10月青海人民出版社。
10.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青海省军区政治部编《解放青海史料选编》,1990年12月。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霍维德》,1994年1月海南出版公司。
12.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史资料(草稿)》。
13.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史资料》。
14.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史资料》。
15. 《中共甘肃省党史(简编)》,待出版。

16. 甘肃省档案馆有关档案。

17. 张仲良给强自修的信(1978年10月)。

18. 《张仲良给中共甘肃省委的信》(1980年3月15日)。

19. 《张仲良同志请习仲勋转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的报告》(1982年6月4日)。

20. 《张仲良同志给中央书记处、中组部的信》(1982年1月15日)。

21. 《中央顾问委员会向中央的工作报告》(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之八)。

22. 张仲良《绿化祖国山河 改善生态环境》，载于1983年2月21日《新华日报》。

23. 《铁骨铮铮 丹心一片》，载于1983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24.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张仲良的悼词：《沉痛悼念张仲良同志》。

25. 彭真、习仲勋、杨尚昆和中顾委、中组部及陕西、青海、甘肃省的唁电，载1983年3月3日《新华日报》。

26. 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一位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载1985年4月27日《新华日报》。

27. 汤天英《深切的怀念 难忘的教诲》，1984年2月24日《新华日报》。

28. 张邦英对《张仲良大事记》和《征求意见稿》的来信。

29. 杨志兰关于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

赵 寿 山

(1894—1965)

赵寿山，原名生龄，号杜亭。陕西户县人。早年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担任军职多年。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曾任第三十八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从河北秘密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并通电反蒋。1948年1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

员兼前委委员。建国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等。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赵寿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从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生；是时时追求进步，不断跟随历史潮流前进的一生。他的生平事迹告诉人们：一个旧军人怎样才能变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能追求进步，不断前进。

少年心事

赵寿山，原名生龄，号杜亭。1894年12月17日（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出生于陕西户县定舟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这是关中平原中部一个古老的小村庄。它位于秦岭北麓，渭河南岸，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一切却不属于穷人。

这是一户贫困的农家。父亲赵端甫是一位勤劳憨厚的农民，母亲曹氏是一位聪慧能干的农妇，两人婚后生有四男二女，赵寿山排行为二。年年岁岁，全家八口人栖身在一间破瓦房中，靠租种地主几亩薄田为生。虽然父母终年辛苦耕织，但还是难以养家糊口。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赵寿山到富人家帮忙上锅（指替人做饭），借以解决母子的吃饭问题，并弥补家用。

赵寿山从小就是一个有志懂事的的孩子。他自知家贫无法入学，便每天提着筐笼在渭河滩上拾柴禾，默默地为父母分担忧愁，过早地品尝着生活的苦涩。

直到九岁那年，在村人张世林的敦促资助下，赵寿山才跨入了本村南庙私塾的大门。他深知此事来之不易，遂刻苦读书，立志成才。

他的刻苦好学精神受到了塾师魏康侯的赏识和器重。魏喜其好学有志，常给他灌输富国强兵的进步思想，并资助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勉励他苦学成才，为国效力。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先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接着，便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人侵。从此，中国便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内受清政府压迫，外受帝国主义侵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救国救民，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开始了以创立民国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增多，赵寿山逐渐产生了救国救民

的爱国主义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小小的书斋关不住一颗爱国的心，赵寿山的目光投向了社会。某次，赵寿山听了进步乡绅张子甲《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说，遂产生了扛洋枪打洋鬼、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立志报效国家。这种笼统模糊的思想，一直继续到大革命前夕。

“少年心事当 云，谁念幽寒坐鸣呃”（李贺《致酒行》）。正当家境贫寒，立志高远的赵寿山报国无门，欲哭无泪的时候，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他 13 岁那年，地主突然收回租给的田地，父亲因此愁病而亡。对这个贫困的家庭和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一声晴天霹雳。

但是，赵寿山并未屈从命运，他要奋起抗争。从此，赵寿山十分痛恨有钱有势的人，甚至主张不与富人结亲。为了改变这一厄运，赵寿山开始了艰辛的耕读生活。白天，他与哥哥和四位弟妹一起，协助母亲耕织为生。晚上，他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读。立志成为一个有用人才，为穷人争一口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9 年夏天，赵寿山抱着报仇雪恨，富国强兵的目的，只身奔赴西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陕西陆军小学。他在校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每年可得奖银 20 多两以补家用。1910 年，因不满当时政治现状，他参加了陆军小学的学生罢课运动，受到了初步锻炼。每逢假日回家，他常到本村私塾演讲列强侵华罪行，勉励大家以身报国。

辛亥革命后，为了继续深造，赵寿山转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为省立西安高级中学）。不久，又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该校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 年）2 月，系陕西军政府创办的军事学校之一。在校期间，赵寿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广交有

志朋友,先后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杨明轩、史可轩和孙蔚如等人。这对于他尔后投身军旅并走上革命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4年夏毕业后,赵寿山在陕西测量局任测量员长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对陕西的城镇村落、山川关隘进行了认真地观察和测绘,这又为他尔后在陕境指挥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四年是陕西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袁世凯的爪牙陆建章和段祺瑞的亲信陈树藩的反动统治下,陕西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于是,陕西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奋起反抗。1817年12月兴起的陕西靖国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翌年7月,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返回陕西三原,统一靖国军各部,“反段讨陈”的护法运动获得了迅猛发展。在此情况下,赵寿山遂将救国拯民的希望寄托在靖国军身上。

投 笔 从 戎

1918年秋,在友人史可轩的邀请下,赵寿山从西安潜赴三原,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一等科员,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然而,由于陕西靖国军政治软弱,组织松散,内部矛盾重重,故数年进展不大。1919年4月,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军以渭水划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1920年春后,陕西靖国军离心离德,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赵寿山知其难有作为,遂于9月北上平津,投入冯玉祥部,出任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

1921年4月,赵寿山随冯玉祥入陕,升任少校参谋,仍兼地形教官。8月,冯玉祥继阎相文之后担任陕西督军。他于消灭陈树藩残部的同时,诱杀郭坚,收编陕西靖国军各部,赵寿山对此则不

以为然。

1922年1月,陕西靖国军司令部宣告解体。在直军的压迫和政治诱骗下,各路靖国军纷纷接受奉直军阀改编。惟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持反对态度,坚持靖国军旗帜。2月,杨率部攻克武功、扶风等县。3月,杨出任第三路总司令。他将于右任迎至武功,重设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不久迁于凤翔,重新举起了陕西靖国军旗帜。对此,赵寿山颇为赞赏。

正在这时,冯玉祥奉命出关参加直奉战争。赵寿山既不愿随冯参加军阀混战,又佩服杨虎城的革命精神。遂决定弃冯投杨,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5月,杨部在武功与直军作战中失利,撤至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防地宁条梁、安边、定边一带休整。正当杨虎城处于危难之时,赵寿山毅然接受杨的邀请,不远千里奔赴陕北安边参加杨部,故深受杨赞赏。从此,赵寿山将自己的命运与杨虎城及杨部联系在一起,成为杨的得力助手。

赵寿山到陕北后,被杨先后任命为教导队排长、队附和军事教官等职。他参与训练学员并讲授地形学,培育出了吴岱峰、孔从周和刘威诚等一批骨干。同时,他还结识了著名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魏野畴、杜斌丞等人,为他以后独当一面并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三军所属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同年冬由陕北南下关中,驱逐陕督吴新田。

1925年7月,为更多地培养下级军官,以便满足部队迅速扩充的要求,杨虎城在耀县举办三民军官学校,而将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以孙蔚如为营长,赵寿山为第二中队队长。10月,复以赵为

营长，率部驻防陇县，独当一面。

1926年春，杨虎城得知刘镇华率镇嵩军西犯，遂率部集于三原、泾阳一带，准备迎敌。赵寿山随同前往。

4月中旬，镇嵩军直逼西安。18日，赵寿山随杨部进驻西安。开始了长达8个多月的坚守西安战役。入城后，赵寿山出任陕军副总司令部副官、三军第三师副参谋长，协助杨虎城将军筹划守城各项事宜，两人无话不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还兼任三民军官学校分校教官，讲授测绘课程。他经常率领学员站岗放哨，侦察敌情，维持治安，在坚守西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解围后，杨虎城就任国民联军第十军军长。赵寿山升任该军二师混成团团长。

1927年5月，杨虎城奉命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为了巩固后方，保障前方供应，杨任命赵寿山为补充团团长，坐镇三原，经营渭北各县。杨对赵之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赵寿山没有辜负杨虎城的信任，他处于冯军四面包围之中，巧妙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之间，不仅保存了杨部的留守部队，而且又为前线杨军输送了大量兵源和物资。1929年秋，赵趁蒋、冯矛盾，率领后方留守部队摆脱冯系控制，在山东单县与杨部主力会师，胜利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时，赵对杨颇为崇拜，故追随杨不遗余力。

10月，蒋介石下令杨虎城部改编为二十一师（后改为新十四师，十七师），赵寿山任七团团长。冬，杨部驻扎临沂，随时准备出动。从此，他率部转战于鲁、皖、豫、陕等省，屡立战功，名声渐著。

1929年2月，赵寿山率部参加了胶东剿灭惯匪刘桂堂等部战斗，荣获“奇袭团”称号。10月，赵率部驻防河南邓县，一举歼灭诸葛寨杨小黑股匪两千余人。1930年秋，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回陕，

赵部随主力下龙门，占洛阳，进军陕西。11月，赵率部攻占潼关，进驻大荔朝邑一带，收编宋哲元余部8000多人。

其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冯部将领刘郁芬已被杨部困于蒲城县孙镇，被迫派人求和。刘云：只要赵团长前来，任何条件都可接受。刘因赵在冯部时私交甚笃，故有此言。于是，赵奉命单刀赴会。他告诉刘：只要刘部缴械投降，保证将刘等高级军官及其眷属财产安全送过黄河。至此，刘部8000多人接受改编，陕西战事和平解决。

杨虎城回陕后，十七路军辖三个师，赵寿山升任十七师五十七旅旅长，驻防三原。从此，赵遂成为杨部重要将领之一。

杨虎城主陕后，与杜斌丞等人秘密制定了经略大西北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1930年12月，杨派赵寿山率部进驻汉中，以便防御川军入侵，收编冯军残部，剿匪安民，统一陕南。

赵寿山赴汉中后，驱赶川军刘存厚、田颂尧出境，收编冯玉祥部独三旅王志远部为陕西警备第一旅。并剿灭了惯匪王三春、罗延辉、袁刚、李纲武等部，迅速统一了汉中地区。赵寿山有功，1931年蒋介石委任赵寿山为汉中绥靖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赵寿山在汉中保境安民，并积极培训抗日骨干，发展抗日力量，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救国。他为所部官兵每人特制筷子一双，上面烙印亲笔题词：“每饭莫忘国难，举箸应念民艰”。这对官兵树立救国救民思想，提高军政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此举曾受到杨虎城将军的称赞。

但是，赵寿山的所作所为，却受到了蒋介石的猜疑和憎恨。他不仅暗中让川军挖走了王志远部，而且还指使南京中央日报攻击汉中治安不佳，致成土匪世界，究其目的，则在于阻止杨虎城部占

领陕甘与自己分庭抗礼。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进入陕南。蒋介石遂施其借刀杀人之计,下令杨虎城派赵寿山部阻截。不久,红四方面军冲破陕军追堵,胜利经城固、西乡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遂派其嫡系胡宗南率部进入陕南围剿红军,监视赵部,收一箭双雕之功。

在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下,赵寿山与蒋介石和胡宗南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方面,他采用各种合法手段与胡宗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胡对赵部不怀好意,赵则积极备战;胡指使宣传队在汉中书写反共标语,赵则让红军之友社散发张贴传单进行揭露痛斥;胡利用各种手段瓦解收买赵部人员,赵则让该部骨干利用胡征兵之际打入胡部;胡下令赵部攻打红军,赵则表示愿为胡部后援。胡宗南既不敢进攻红军,又不能逼赵部就范。遂请示蒋介石撤离汉中,进驻甘肃天水。另一方面,助杨虎城、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统战关系。通过杨部三十八军(1933年5月进驻汉中)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并陆续向红军运送了器材、药品及被服等大量军用物资。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35年春红军发动陕南战役为止。赵寿山在武志平开辟东线西乡至红军四方面军交通线时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撤离汉中挥师北上。7月,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进入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同时,中央红军亦向陕北胜利进军。秋,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他下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围剿红军。8月,蒋令赵寿山旅从汉中调赴陕北黄陵、宜君等地,防御陕北红军,而以嫡系万耀煌师接替汉中防务,与天水的胡宗南部南北监视陕军,迫其与红军作战,

火中取栗。

在此情况下，赵寿山一时陷入苦闷失望之中。他整天借酒浇愁，甚至借抽大烟解闷。这正如他在《自传》中表述的那样：“19年（1930年）杨率部入关。我以为正是发展西北，为救亡图存奠定基础的绝好时机。曾力主之。不想为时未几，备受蒋贼压迫，计划一再受挫，精神既极颓丧，生活的堕落腐化更不用问了。”

赵寿山的这种变化，引起了杨虎城将军的注意和忧虑，他曾十分惋惜地说：“赵寿山腐化了。把身体搞得像鬼一样，还能革命！”然而，赵并未长此下去。10月，他以看病为名，向杨请假北上平津。事实上，他是想乘机赴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访问进步朋友，阅读马列书籍，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寻求救国拯民之路。

西安“兵谏”

1935年10月，赵寿山离开部队，踏上赴平津、上海、武汉、南京考察的旅途。

这时的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赵寿山看来，平津的政治形势似乎比这更令人心寒。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已做好了出兵华北的准备。1935年5月19日，日军以中国军队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调派大批军队由东北进入华北，威胁平津。6月，日军威逼察省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7月，日军又威逼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日军侵占了冀察两省。接着，日军又向华北驻军宋哲元部施加压力，迫其实行“华北自治”。至此，华北局势已岌岌可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架式和华北岌岌可危的形势，赵寿山再也不能沉默了。于是，他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劝说宋哲元、韩复榘等原西北军将领迎回冯玉祥，建立北方政府，经营华北，肃清日军，讨伐蒋介石，挽救国家危亡。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打算，他曾先后拜访过宋哲元、韩复榘及其重要将领，结果发现除张自忠等个别将领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外，大部分人不是安于现状就是准备逆来顺受。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宋韩等人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当年在南苑练兵时的那种革命精神了。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了。

那么，希望在哪里？赵寿山陷入了沉思之中。正在这时，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英勇斗争，使赵心中又萌发了希望。

1936年春，赵寿山又南下宁沪考察。在南京，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党派林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毫无生气，遂谢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毅然南下上海。

赵寿山在上海住了半年。他潜心攻读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国家与革命》三本马列主义著作。与此同时，他又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等人商谈救国之道。在此情况下，他的知识渐增，眼界大开，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初步树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思想。有一次，他与杨明轩、赵葆华等人在杨晓初家中谈心，向大家吐露了自己的这一思想。他说：蒋介石反共降日，祸国殃民，这样下去，中国必然要亡国。只有推翻蒋政权，建立新政权，中国才有希望。听了赵的话，众人均有同感。在谈到蒋介石目前兵力较多、势力很大时，大家询问赵该如何倒蒋。赵胸有成竹地回答：回西安后看情况。必要时，建议杨虎城将军找机会将蒋介石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大家认为言之有理，督

促赵回陕后立即找杨实行。

由此可见，这次平津宁沪之游，使赵寿山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真理，只有联共抗日才是救国之道。而这，正是他积极参与西安事变，要求参加共产党并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基础。

同年10月，赵寿山从上海返回西安。

一到西安，赵寿山便向杨虎城将军提交了《抗日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简述考察概况后指出：“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日，非抗日不足以言救亡”。力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时的杨虎城将军已与红军和东北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反蒋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赵寿山的转变感到十分欣慰。于是，杨多次约见赵详细询问其考察收获，虚心征求其团结抗日的具体意见。有一次，赵直截了当地对杨说：必要时我们可以把蒋介石抓起来，然后联合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杨听罢忙说：此事关系重大，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随后，杨让赵立即返回原部整理部队，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

赵寿山心中一阵高兴，他觉得，杨虎城将军是同意自己主张的。而且，对于当时形势和出路，杨已经胸中有数了。

赵寿山的估计没有错，他回部队不久，便被杨虎城召至西安办训练班，轮训团营连干部。看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将要来临了。

12月4日，蒋介石飞临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他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部开赴陕北“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入陕“剿共”。

8日，在苦谏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这天，张、杨初步商定了联合行动计划：东北军负责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扣押西安城内南京政府军

政要员，解除蒋系各种武装，扣留机场飞机和控制火车站等任务。具体行动日期根据形势发展再最后确定。随后，杨召见赵寿山，指定他为这次行动中十七路军的总指挥，并嘱其秘密作好各种准备工作。

11日晚，杨虎城召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等将领举行紧急会议，宣布兵谏计划。同时，杨任命赵寿山为军事行动总指挥，并让他与李兴中立即拟定一个行动计划。

12日凌晨6点，赵寿山下令各部立即行动。时至8点，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次军事行动，圆满完成了原定任务。10点，蒋介石被东北军孙铭九等人押送到西安。至此，兵谏获得初步胜利。为了维护西安秩序，杨虎城又任命赵寿山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

蒋介石被扣后，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任何问题，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人又力主对西安用兵，这不能不引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疑虑和愤慨。因此，除少数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蒋外，许多官兵，甚至一些高级将领都主张杀蒋或长期囚蒋。赵寿山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为此，大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17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等人应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乘坐张将军的波音飞机从延安飞赴西安。当天，周即向张、杨通报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取得了张杨的赞同。

18日，杨虎城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驻扎三原，统一指挥渭北十七路军，与红军和东北军共同准备反击蒋军。

周恩来深知，赵寿山是杨虎城的左臂右膀，在十七路军中颇有威望。因此，说服他转变态度，对争取十七路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当天晚上，周亲赴西大街甘露巷6号赵宅登门拜访。

赵寿山闻讯，忙将周恩来迎至正房东间，随后，两人开始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赵寿山毫不隐瞒地向周恩来畅谈了自己的思想转变经过，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处置蒋介石的观点，而周则详细地向赵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分析了杀蒋或囚蒋的严重后果，解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意义。

赵寿山似有所悟，但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十七路军长期受蒋介石压迫，我本人也备受蒋介石的迫害，放掉他，大家想不通。

周恩来虽然还是那样温文尔雅，但似乎也有点激动了。他动情地说：从感情上讲，共产党内的许多人也不同意放蒋。自四一二政变以来，蒋介石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欠下了多少血债，应该受到历史的惩罚。但是，从理智上讲，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抗日，则必须释放蒋介石。正是从这一民族大义出发，中国共产党才决定捐弃前嫌，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周恩来晓之以义，动之以情，赵寿山不能不服。然而，他对蒋介石又有点不放心，于是又问：“我们放了蒋介石，他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怎么办？”

周恩来对此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满怀信心地说：当然，我们不会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他必须答应我们三方的条件才能离开西安。他回南京后是否挟嫌报复，这并不能由他一人决定。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团结一致，依靠人民群众，团结抗战，他就不敢报复。即使报复，我们也不怕。

赵寿山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笑容。他彻底折服了。

两人越谈越投机，直至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这次谈话如此动人心弦，给两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赵寿山对其子赵元介说：“周恩来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服了！”1962年，周恩来在首都机场遇到赵氏父子时，特意问赵元介：“你家在西大街的那座房子还在吗？你还住在那儿吗？”

19日，赵寿山主动赶赴三原走马上任。为了迎接南下共同对付南京“讨伐军”的红军，赵风尘仆仆地奔赴渭北各县。他在各县召开群众大会，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积极宣传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革命主张。他还发动军民同心协力，认真做好迎接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彭德怀等人的率领下，红军主力南下渭北地区，分驻三原云阳镇和富平庄里镇，司令部驻扎云阳镇。为了协同作战，赵寿山经常往来于云阳和三原之间。他曾邀请左权等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演游击战，同时，他又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筹集粮草，并派150多辆大车送往陕北。

在与红军将领的交往中，彭德怀给赵寿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赵看来，彭性格直爽，敢说敢做，值得信赖和敬佩。两人经常谈心，几乎无话不谈。赵在《自传》中写到：“曾忆为放蒋事，彭曾不惜费时三日以为说明，忠诚感人，至今难忘。”从此，赵一直将彭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二人关系与日俱深。

在与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的交往中，赵寿山深感获益非浅，思想逐渐发生了飞跃，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早在大革命时期，赵寿山与杨明轩、魏野畴、刘含初等共产党人就有过来往。当时，由于思想认识不够，赵总觉得他们思想过“左”，既不肯随声附和他们的的高论，也不肯接受他们动员入党的要求。但是，经过西安事变，特别是跟周、彭的两次长谈，赵终于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客观真理，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

烈愿望。

某次，赵寿山与彭德怀等人在云阳拍了一张合照。事后，彭笑着对他说：“这下你把‘匪通’的证据弄下了。”赵坦然一笑，认真地说：“我不怕，我还准备上山入伙哩！”党中央十分关心赵，很快派人告诉他：从西安事变后批准他为中共党员。由于他当时不了解入党程序，既未明确表态，又未及时履行手续。故未取得正式组织关系。直至1942年再次申请入党时，赵才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一面扣押张学良；一面又派兵入陕，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

1937年春，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赵寿山赶赴上海送别。由于特务监视严密，赵未能亲自送杨上船。他托杨的秘书转告杨，先生此去前途虽难以预料，但是，“不管天变地变，双十二举义初衷不能变。抗日立场不能变。”他的这番话既是勉人又是自勉。历史证明，他们两人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和立场。杨在抗战爆发后向蒋介石请缨抗战，回国后被蒋扣压，最后以身殉国，不愧为千古功臣。而赵则率领三秦健儿奔赴抗日前线，联共抗日，浴血奋战，成为抗日名将。

八年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战爆发。

7月21日，赵寿山率领十七师从陕西三原出发，奔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2日，该部进驻河北保定，投入了全民族抗日的滚滚洪流。

在八年抗战时期，赵寿山率部参加了坚守保定城、扼守娘子关、大战高平关、血战中条山和保卫黄河桥头堡等著名战役。他指挥有方，身先士卒，战功卓著，声播全国。特别是中条山战役，赵寿山率部与日军周旋两年四个多月，大战十一次，小战数十次。双方经常短兵相接，白刃格斗。仅“六六战役”中，三十八军即伤亡官兵六七千人。其战斗之惨烈悲壮，于此可以概见。

赵寿山毕竟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对于保卫华北，屏障西北，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华北群众赞扬三十八军是“铁的三十八军”，战区司令卫立煌赞誉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甚至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赵部“骁勇善战”，惊呼中条山为日军“盲肠”。

日军的凶残和战争的酷烈并没有难倒赵寿山，但蒋介石“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的恶毒政策却使赵感到头痛。这使赵举步维艰，防不胜防。当时，日军画报上画着这样一幅漫画：在中条山上，一队中国部队穿着破旧衣服，扛着破枪正在前进。在他们的身上，赫然标着“杂牌”两字。在他们的前面，是虎视眈眈、装备精良的日军。在他们身后，则是服装整齐，枪械齐全的“中央军”。这些“中央军”端着刺刀，戳向那些“杂牌军”的脊梁。这虽是一幅敌人的宣传画，但却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蒋介石利用抗日，消灭异己的阴恶用心和丑恶行径。

然而，在这种险恶环境中，使赵寿山感到欣慰的是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全力支持，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给赵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增强了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1937年9月上旬，正当赵寿山率部坚守保定前夕，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亲赴保定看望赵和十七师官兵。

在漕河车站，周恩来受到了赵寿山和十七师官兵的热烈欢迎。

在赵的陪同下,周对十七师排以上的官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勉励全体官兵巩固西安事变成果,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坚持团结抗战,保卫祖国大好河山,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作出新的贡献。周恩来的讲话,为赵及十七师指明了前进方向,坚定了他们坚持抗战的信心。

晚上,周恩来又与赵寿山进行了亲切谈话。周嘱咐赵在部队建立电台,并规定了双方联络密码。他还将十七师中的共产党员名单,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赵。这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赵的信任,也体现了周与赵的友谊。

临行前,周恩来告诉赵寿山:我不久将赴南京军委政治部(周为该部副部长),有事可派人前来联系。

不久,赵寿山派庞志杰(中共党员)乘车去南京面见周恩来,接洽军火并汇报有关情况。周详细询问了赵部防卫保定外围漕河至阜河一线的部署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庞将有关情况电告赵后,被赵任命为十七师驻宁联络员,负责该师与周的联络工作。

10月,保定失守,赵寿山率部退守山西娘子关。娘子关为晋东军事要隘,日军由冀入晋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赵部奉命坚守旧关一带,归第二战区副司令官黄绍 指挥。从12日至24日,赵率部与日军血战13昼夜。敌我反复争夺雪花山阵地,战况至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但赵却临危不乱,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事后,他曾赋诗一首抒怀。诗云:“妖气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作国殇,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由于中央军率先逃跑,十七师被迫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参加太原保卫战。

保定娘子关两次恶战,十七师由原来的13000人减至2700多人。

11月8日,太原失守,中央军与晋军争相溃逃,只有八路军东

进作战。西撤途中，十七师因伤亡过重，失败情绪严重，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赵寿山致电周恩来，要求将部队带到河西岸休整。周立即回电劝阻，建议他：“坚持敌后斗争，不要撤到河西。”赵接受了这一建议，将部队带到山西离石县碛口整训。这儿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部防区。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等来慰问，肖劲光则派人帮助整训。经过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此举既发展壮大了十七师，又避免了蒋介石的诬陷。

在此期间，赵寿山西渡黄河从绥德南下西安，路过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向赵寿山详细介绍了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这对赵寿山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作用。

12月中旬，由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坚决反对赵寿山部回陕，蒋介石遂收回成命，电令赵率部开赴洪洞县集结待命。1938年2月，赵寿山从西安到洪洞，在这儿，见到了闻名已久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参谋长左权等人。朱德等人多次与赵交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部队改造问题。进一步坚定了他在长期抗战的信心。朱德还专程看望了十七师官兵，并对连以上干部进行了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不久，赵寿山又奉命开赴晋东南晋城、高平一带，编入东路军序列，接受朱德、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从此，在彭的指挥下，赵率部在晋东南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半年之久，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军多次围攻，先后攻克晋城、长子、高平、壶关、屯留等19个城镇，稳定了晋东南抗日局势。

但蒋介石却时刻企图割断十七师与八路军的联系，进而消灭十七师。同年夏天，蒋下令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十七师归还十七路军建制，开赴中条山作战。

中条山位于晋东南地区，它东起垣曲，西到永济，北高南低，绵延 300 公里，为西北各省天然屏障。然而，它背靠黄河，面对日军三面包围，补给困难，回旋余地不大，显然是个背水结阵的死地。这种背水结阵历来为兵家大忌，在 20 世纪的现代战争中更是如此。蒋介石下令胡宗南部封锁黄河，不许三十八军后撤，企图让日军将赵寿山部全歼于中条山地区。

然而，蒋介石的企图并没有得逞。

从 1938 年 7 月奉命进驻到 1940 年 10 月奉命撤出。赵寿山率部在中条山抗战长达二年零四个月。他在茅津渡举办干训班，自任班主任，邀请中共党员和社会名流为教官，改造旧军官、培养新干部，提高了该部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1938 年春至 1944 年春，先后培养干部 1500 多人，并发展了大量共产党员。他学习和运用八路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地抗击日军，使日军每战皆败，虽 19 次补充新兵却未能越雷池一步。从而为保卫黄河，保卫陇海线，保卫大西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立功未能赏，反被更猜疑。在此期间，蒋介石对赵寿山送子女赴延安抗大学习、掩护山西牺盟会和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等行动大为恼火，决心割断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联系，进而分化瓦解。1940 年冬，蒋以整补为名，下令将三十八军调往汜水、巩县地区守卫黄河铁桥南端邙山桥头堡阵地，企图将三十八军置于中央军汤恩伯部六个军和日伪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乘机一口吞掉。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出，蒋介石此举系调虎离山之计，企图以整补为名，行分化瓦解之实，希赵寿山提高警惕，作好应变准备。应采取团结进步，联系群众，坚持斗争的策略，千方百计保住部队。赵寿山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一方面，他注意重用共产党员，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培训骨干，联系群众，坚持了三十八军内部的团结

进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他拨款两万元办小学、娃娃连，帮助群众收种庄稼，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他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顶住了蒋撤换调训三十八军党员骨干的压力，驱逐了蒋派来的政工人员张泰祥、罗仁、刘文光、秦怀玺、龙冠军等特务 300 多人，挫败了投降派的袭击、造谣等破坏活动。从而粉碎了蒋对三十八军“抽梁换柱，分编遣撤”的阴谋，保存并发展了这支革命武装。

当时，军部驻在河南巩县东南的巴沟，赵寿山的住所堆满了书籍，挂满了地图，俨然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他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改头换面发给官兵，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以此提高官兵的战斗力和政治觉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赵寿山忘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对自己和三十八军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冬，毛泽东接连两次听取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关于部队情况的汇报。他明确指出：“要做好原十七路军各部的工作，重大问题，工委要同赵寿山同志商量解决。”足见党中央和毛对赵寿山的信任和支持。

与此同时，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还对赵寿山及三十八军的军事行动做过许多具体指导。

1941 年 3 月，蒋介石指名道姓地勒令三十八军的 30 余名中下级军官到劳动营受训，企图分化瓦解三十八军。赵寿山忍无可忍，遂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率部北渡黄河，靠近八路军以图自保。毛闻讯后，立即致电彭德怀，明确指出：“赵寿山若率部北渡，我军应予以援助。”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彭认为把握不大，遂于 4 月 1 日复电毛：“赵寿山北渡无保障，暂缓渡。”并建议赵用应付办法拖延时间。后来，赵寿山采纳了毛泽东等人“忍耐敷衍”的建议，巧妙地应付了这次危机。

10月，日军大举渡河南下，“中央军”一触即溃，惟独赵寿山率部苦战不退，一举收复郑州。在赵部伤亡惨重，形势危急之时，彭德怀一面建议赵寿山迫不得已时率部让开河防，拉到嵩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面下令八路军在黄河北岸武陟一带出击。此举不仅牵制了日军继续南下，而且也减轻了三十八军的压力。

1942年秋，三十八军情报处截获了日蒋勾结、联合反共的文件和联络密码，其内容主要为日蒋合作反共，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归中央军，北归日本。赵寿山立即让地下党组织用电台将有关内容发往延安，由新华社予以揭露。蒋介石闻讯恼羞成怒，以三十八军有“异党”为名，加紧策划消灭这支军队的种种阴谋。

1943年7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等部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对于“通共”的赵寿山部，蒋自然也不肯放过。开始，他向赵部派出许多专干特务勾当的政工干部，进行造谣中伤。后来，干脆下令三十八军集结待命，企图乘机消灭。为此，10月19日，赵致电毛泽东请示方略。他在电报中写道：“忽奉命请我部集结偃师、登封间整训，由八十五军李楚瀛部接防，并限于本月月底接交完毕。估计到该区后三面环敌，尔后行动益险。应如何处理？请指示。”毛立即复电，让赵“遵令调防，谨慎应付环境。”毛泽东的指示又一次为赵解开了疑团，使三十八军化险为夷。

10月，蒋介石决定对赵寿山和三十八军下手了。他先以受训为名，将赵软禁在重庆。接着，又采取明升职务，暗夺军权的故伎，撤销了赵寿山三十八军军长的职务，任命他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驻防甘肃武威；而以亲信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由孙蔚如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何去何从，这对赵寿山又是一次严峻考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赵先去武威，以免给蒋留下口实。毛泽东

还明确指出：“如果有一线之路，官得坐下去，对党有好处。”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赵以交接手续为由，赶赴河南巩县三十八军驻地。他一面安排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返回延安或转移到关中各县隐蔽；一面与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商定待孙蔚如离任后伺机起义事宜。2月20日，赵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弟（赵自称）于删（15日）来前方劝孙行动不果，只得去甘做官。徐图进取。”毛收电后甚为欣慰，复电予以肯定：“隐忍待时，徐图进取，甚为得策。”25日，赵再次致电毛，表示决定西去：“弟已决定寝（26日）忍受西去，容再缓图。”

赵寿山是一位性格倔强的铮铮铁汉，从来不肯委曲求全，寄人篱下。他曾对五十一旅一〇二团政治指导员陈廷琨说过：“我当连长时，箱子常放着纸包好的50元钱，上面写着‘人格保险费’。遇不合时有盘费随时可以走，无须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但是，自从西安事变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后，他却改变了这种性格和态度。这次，为了党和三十八军的利益和前途，他甘愿委曲求全。这正如他在《自传》中写的那样：“为了抗日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前途，只好忍辱再忍辱，忍痛别离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

从河南巩县出发赴任路过西安时，赵寿山协助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在胡宗南部建立了情报组。随后，他即去武威任职，继续与蒋介石斗智。

在武威担任空头总司令期间，赵寿山采取了“多请客，少说话，沉着办事”的斗争策略。习帖练拳，下棋赋诗，并抽空阅读文史书籍，学习外语，借以麻痹敌人，保护自己和革命同志，使特务始终抓不住任何把柄。

这儿，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党中央没有忘记赵寿山。坐阵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指挥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周恩来，常通过王

炳南等人与赵寿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传达党的指示。1945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还选派军医张归仁到赵寿山身边作保健医生，要张归仁好好照顾赵寿山，使他身体健康。周恩来要张归仁转告赵寿山：“虽然他离开了三十八军，但要经常与三十八军的有关军官取得联系，一但形势变化，便于实施指挥，要赵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造成一个灰色的局面，要有意识地与反动头目交往。”并捎去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很想念赵寿山同志！”赵听后十分感动地说：“中央负责同志对我如此关心，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革命到底。”

这儿并非没有战斗，赵寿山也没有停止战斗。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发展党员，安排和保护革命人士。他利用私人关系，做了张治中、陶峙岳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工作，为他们转向中共和平改编奠定了基础。他甚至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了第三集团军的机密文件。派人送往陕北，克尽了一个党员的职责，为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然而，深入虎穴，随时都有危险。因此，赵寿山每次奉命去重庆开会受训时，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常对随身参谋说：“我们此去可能同杨先生一样，有去无回，要做最坏的打算。”

这位被国民党特务称为“杨虎城化身”的赵寿山，一直对杨虎城将军念念不忘。他经常对三十八军官兵讲述杨将军的生平和功绩。每逢去南京或重庆，他都要千方百计打听杨将军的下落，准备营救。后来，他听到杨将军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曾自疚地说：“未能救出杨虎城先生，是我终生憾事。”然而，令赵欣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下，他不但未重蹈杨将军的覆辙，而且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走向新生

赵寿山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从青年时期树立救国拯民志向到中年毅然回归革命阵营的曲折经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赵寿山走向新生的言行由来已久。早在1936年12月，他就向彭德怀等人吐露过准备“上山入伙”的心声。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赵拟将三十八军拉上太行山联共抗日，并让办公室主任温朋久草拟了反蒋通电。后来，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才没有动作。1943年10月，当蒋介石下令将三十八军调往偃师登封一带准备歼灭时，赵又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批准该部战场起义。中央认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统一战线没有破裂，不宜举行起义，还是服从蒋的调动为好。”赵又一次顾全了大局，到武威去做“空头司令”。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准备下山摘桃子了。他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便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这一情况表明，赵寿山走向新生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1943年春天，赵寿山走向新生的时机终于来临了。“为随赤帜开新纪，何惜官禄当土抛。”赵寿山决心走上光明大道。

3月，赵寿山在重庆陆军大学毕业时，蒋介石找他单独谈话，追问三十八军军官来源和训练情况，企图罗织罪名，对赵下手。赵从容对答，蒋无隙可乘，只好干笑几声连说：“好的！好的！”

蒋介石没有抓住赵寿山的把柄，便决定先从三十八军开刀，1945年6月，蒋介石任命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四集团军（原十七路军）的两个军（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缩编为三十八军（辖十七师和五十五师）。

赵寿山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一方面，他致电十七师及五十五师有关领导，孙蔚如不久将要离任，请速作准备，待孙离职之日立即起义。另一方面，他致电周恩来嘱其转告中共中央，孙即将离任，三十八军准备发难，请派人协助十七师和五十五师起义。党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7月17日（孙离任第四天），十七师2000多人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宣布起义，胜利进入八路军豫西第二分区。五十五师因条件不太成熟，仅撤出部分党员骨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消灭中共和其他革命武装，因此，对赵寿山和五十五师防范更严了。

1946年春，蒋介石将赵寿山等人用飞机接到西安，以便就近监视。经中共中央批准，赵开始了走向光明的各项准备工作。

某次，赵寿山借蒋介石召见之机，乘机提出了赴美考察水利的要求，借以麻痹蒋，以便北上延安。蒋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此事可以考虑。

原来，蒋介石考虑的并不是赵寿山出国的事，而是如何消灭十七路军余部的问题。3月，蒋下令将五十五师编为五十五旅，并企图撤换连以上干部，然后彻底消灭。赵从三十八军工委情报人员那儿获得这一信息后，连忙致电周恩来告知有关情况，建议党中央派人协助该师相机起义。党中央同意赵的建议，并采取了相应措施。5月15日，在孔从周领导下，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宣布起义，分批进入晋冀鲁豫边区。至此，十七路军余部全部起义，以实际行动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这支革命军队的阴谋。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嘉勉：“祝贺你们胜利地参加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6月，全面内战爆发，统一战线正式宣告破裂。

为彻底切断赵寿山与中国共产党和三十八军的联系,7月,蒋介石同意赵辞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赴美考察水利。8月,鉴于三十八军已全部进入解放区,赵处境日益危险,党中央批准了赵北上延安的要求。于是,赵采取各种方法迷惑敌人。认真仔细地做好了去延安的各种准备工作。

开始,赵寿山准备从兰州直接去陕北。他在兰州第二新村买了一院新房,在五泉山下置了一些土地,又向银行投资50万元,做出一副在兰州安家落户的样子,借以蒙蔽敌人耳目。9月8日,党中央派黄爱民,蒙定军等人赴兰州面见赵,共同商定了这样一个脱身方案:赵由兰州乘汽车直赴陕西永寿县,趁黄昏进入监军镇,然后穿便衣渡过泾河赴延安。双方约定一个月后再在兰州见面,具体执行这一方案。

然而,黄爱民、蒙定军并未如约前来。原来,黄、蒙二人回西安后,原先联络好的驻守泾河监军镇渡口的董策诚旅已宣布起义,河防改由胡宗南部防守,此路已经不通。加之10月初,黄、蒙二人均感冒发烧无法成行。因此,这一方案只好作罢。

10月12日,赵寿山应黄爱民、蒙定军之约来到西安,共同商定了三个新方案。一是直接由旬邑马栏北上;二是经淳化县北上;三是绕道南京经上海北上平津,进入华北解放区。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按第三个方案办。

12月初,几经周折,赵寿山来到上海。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赵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告诉他:“叶剑英同志在北平等你,你快些去,可能那里的军调部还没有撤,还来得及乘飞机。”

1947年2月,在董必武等人的周密安排下,赵寿山乘“和平轮”由上海北上平津。3月5日,在地下党员段新的带领下,赵与温朋久、姚警尘等人一起,由北京乘火车到天津陈官屯下车,然后

步行穿过运河进入解放区。一进入解放区，赵顿感如释重负，不由高兴地唱起乱弹来，庆幸自己获得了新生。

第二天，赵寿山一行由静海县出发，经河间、南官、邯郸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冶陶村，受到了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等人的热烈欢迎。当晚，军区司令部为赵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闻知赵已进入解放区，深感欣慰。

接着，赵寿山又见到了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并与十七师起义官兵见了面。为了熟悉和适应环境，赵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给他半年时间，先到各战区观察学习，然后再去延安。经党中央同意，赵暂留冶陶参观学习。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赵的夫人黄居仁，儿子赵元介、儿媳罗少岚、女儿赵铭锦、女婿杨力等人也由西安、张北和上海等地辗转进入陕北。后来，赵回到陕北时，曾真诚而激动地对亲人说：“感谢党中央以及为我们的安全费尽了心血的同志们，这个恩不能忘记！”

正当赵寿山在冶陶参观学习时，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陕北，形势顿时紧张起来。6月，为了及早粉碎胡部进攻，党中央令赵立即返回陕北，行前发表通电，公开宣布起义。

7月6日，赵寿山在冶陶发表了《赵寿山致全国各界通电》。通电高举和平、民主、团结大旗，列举了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罪行，分析了蒋军失败，我军必胜的历史趋势，简述了自己走向光明的原因。最后，赵提出今后自己奋斗的目标是：“一、余决以坚决行动，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之卖国独裁内战政策到底。二、迅速召集各民主党派会商，恢复政协路线，组织全国一致之联合政府。三、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同日，新华社晋冀鲁豫分社公布了“前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抵达解放区”的消息，并称“这是一件令人兴奋之消息。”在这一通讯报道中，赵

寿山明确表示,今后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由原三十八军改编)全体将士,决与人民解放军一道,为解放西北与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通电和消息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蒋介石、胡宗南等人闻讯大惊,下令通缉赵寿山,并派军队抄了赵在西安和户县的家。社会舆论则纷纷指责蒋,对赵有功不赏,反而进行陷害,结果将赵逼上梁山。

赵寿山发表通电后取道晋南转赴陕北党中央所在地。9月,赵一行到达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山西临县三交镇。在这儿,赵与杨明轩、李敷仁联合发表了《告三秦父老书》,愤怒揭露了胡宗南在陕西拉夫抓丁、增粮加款、贪污腐化和实行特务统治的罪行,号召陕西人民奋起斗争,“打倒蒋介石,消灭胡贼宗南,实现土地改革、民主政治。”

随后,赵寿山一行又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由于当时毛泽东等人正率部转战陕北,行踪不定,一时难以汇合,于是,赵寿山遂与贺龙等人一起随西北局活动。

11月22日,毛泽东等人率部进入米脂县杨家沟。这时,陕北战局好转,胡宗南败局已定。不久,在贺龙的陪同下,赵寿山应邀前去杨家沟,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

赵寿山一到杨家沟,顾不上休息,便将蒋管区的有关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下午,毛泽东约赵到他的住所吃饭。饭后,两人促膝谈心,直至凌晨4点。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约见赵寿山,商谈其工作安排问题。毛笑着说:“你的品行很好,彭(德怀)、贺(龙)争着向我要你。我要与你商量一下,你愿意在后方,就给贺当副手;愿在前方,就给彭当助手。”赵表示愿在前方给彭德怀当助手。他诚恳地说:“我在前方可

能作用大些。因为我是个当兵的，一切水平很低，仗打了多年，总还有些经验。我们要打西安，我是关中人，人比较熟悉，在情报方面可能还灵通一些。”毛听罢高兴地说：“好！你就到前方去给彭做副司令员。”

12月下旬，赵寿山在杨家沟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彭德怀同志。久别重逢，分外高兴，二人经常挑灯夜话，纵谈西北政局。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前委委员。随后，赵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与彭德怀等人一起拟定了西北野战军作战计划。2月，赵协助彭指挥了围宜（川）打援战役，歼敌5个旅3万余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揭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序幕。

从此，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领导下，赵寿山参与了收复延安、解放西安和进军甘、宁、青的战斗，为打垮胡宗南，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他并没有居功自傲，止步不前，而是在新的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刚刚停息，赵寿山又在新的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了。

解放后，赵寿山先后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和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赵决心按照周恩来的教诲，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思想，过好思想、政治、生活、亲属和社会等五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新贡献。他经常

对原十七路军干部讲：“我一生走了许多弯路才找到真理，‘半路出家’的人，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跟着党走。”

赵寿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忠于党的事业，乐观自信；他努力学习马列，认真改造思想；他敢于坚持真理，不肯随波逐流；他关心经济建设，注意发展农业；他深入群众，关心同志；他谦虚谨慎，节俭朴素；他坚持原则，不为亲属谋取特权。这种追求进步，不断前进的优良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1950年3月6日，赵寿山出任青海省主席伊始，便在西宁市东关操场发表了这样一次乐观自信的讲话。他说：“我是个军人出身，经过了20多年的战场生活，但对行政工作却是个门外汉。这次来青海，就是来向青海人民学习的，来和青海人民一道建设青海，开拓青海，扫除马步芳遗留下来的陈迹污垢，把我们的青海建设成幸福美好的乐园。”

青海长期处于马步芳的反动统治之下，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民族矛盾尖锐。解放后，百废待兴，但敌特散匪活动猖獗，社会秩序很不稳定。针对这一情况，赵寿山根据党制定的“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并举，并且互为侧重”的方针，便很快肃清了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建设新青海扫清了障碍。

1952年11月9日，赵寿山调任陕西省省长。陕西是他的故乡，他对建设陕西更是充满了信心。对于古城西安的建设，他更是十分关心。他说：“西安是我国历史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民的骄傲，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把它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在青海和陕西工作期间，赵寿山十分关心经济建设，特别注意农业生产。在青海工作时，赵寿山在广大农业区大力推行减租、土改、互助工作和爱国丰产运动，使农业生产逐步获得了恢复和发

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截至1952年10月,全省增加耕地63万亩,增收粮食9500万斤。油料1400万斤。另外,畜牧业和工业等也有了较大进步。来到陕西后,赵寿山积极组织领导全省人民执行“一五计划”,对农业生产尤为重视。他经常深入农村检查“三夏”、防止小麦虫病和粮食的供应等工作。特别是在总结推广发展大牲畜和猪羊等家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中央的肯定和表彰。

赵寿山是农民的儿子,官虽大了,但并没有忘记人民。在青海、陕西两省主持工作时,他经常深入群众问寒问暖,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在青海工作期间,有一次,赵与民政厅长陈思恭一起到牧区共和等县视察工作。他爬山涉水,深入帐篷和牧民亲切交谈,问寒问暖。当他看到哈萨克族一些孩子缺吃少穿的情况后,便深有感触地说:“你看马步芳把少数民族压迫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一定要拯救他们。”返回西宁后,赵立即责成民政厅专门给哈萨克族贫困牧民发放了救济粮款,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在陕西工作期间,赵寿山十分注意群众信访工作。他将这一工作看做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的孔道。他曾对秘书姚德怀说:“联系群众不是一般的私人应酬和来往,而是通过群众来信和来访了解情况,传达政策,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通过这一渠道,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里。”与此同时,他还经常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学校,了解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有次,赵回乡探亲,他让司机将车停在村外,自己步行进村。他见老人就拱手,遇到乡亲就问候,并到许多农民家中拉家常,亲热得好像一家人。

赵寿山对党对人民有功,又身居高位,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相反,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节俭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解放战争时,赵去蒲城县马湖镇视察荔北战役准备工作,不肯食用管理

股为他准备的四个小菜(炒土豆片,炒萝卜片,炒鸡蛋和炒粉条),坚持要和战士一样,只吃炒土豆和萝卜片。在青海工作时,虽然成绩显著,有目共睹,但他却往往注视着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他在《三年来的青海工作》一文中写道:“这些成绩还是渺小的,只能说是获得了一个前进的工作阵地。事实上,我们工作还有很多缺点。”他在陕西工作时,总是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从不一个人说了算。许多干部群众由衷地称赞说:“赵省长那么大年纪,还冒着烈日到我们乡下跑,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一点架子也没有,真像我们的亲父兄。”

他后来调到中央工作,每次回陕西视察,总是一再叮咛有关接待人员:“咱们国家不富裕,接待中,一定要贯彻勤俭节约的方针。”

对于熟人和身边的同志,赵寿山更是关怀备至,崔贯一是赵在“西安事变”时认识的老朋友。解放后,赵一直没有忘记他。1952年,崔以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金融处处长长的身份到青海检查工作。赵仔细询问了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并约他共进晚餐,同观舞会,并嘱咐有关方面照顾好他的生活。姚德怀是赵在青海、陕西工作时的秘书,赵对他更是严中有慈,充满爱心。开始当秘书时,姚有点胆怯,连话也不敢多说,生怕出错。赵看出了他的心思,便鼓励他说:“大胆工作,不要害怕,出了问题由我担待。”每逢外出或者开会,赵都让姚随同,以便增长他的知识和才干。

但是,对于亲属,赵寿山却十分严格,他从不以自己的特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他常告诫自己的亲属:“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切不可有一点优越感和特殊化的思想。”他仅有一子一女,但却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过福利和安排过优越工作。在病危时,他仍不忘告诫儿子赵元介:在政治上要向比自己强的同志学习;在生活上要向不如自己的

同志看齐。他还用晚唐诗人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著名诗句，告诫儿子永远保持勤俭节约的精神。

在政治上，赵寿山则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不肯随波逐流的人。1959年他在对待彭德怀同志问题上的光明磊落态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抗战时期，他多次配合彭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主动要求在彭指挥下作战。解放后，他曾多次对人说：彭总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他调赴北京工作之日，正是彭遭受不公平对待之时，许多人避之犹恐不及，他却主动找上门去。某次，他去北京西郊吴家花园探望彭，回来后竟失声痛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彭总是党的功臣，长期领导我工作，我终生难忘。1965年6月，赵寿山在弥留之际，仍以微弱的声音叫喊着“彭总！彭总！”仅此一例，即可见他的为人之道和党性原则。

赵寿山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是因为他能够努力学习马列，认真改造思想。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任何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认识越高，工作本身就会愈搞愈有成绩，工作效率就会更显著；否则，他的工作就会做不好，甚至一事无成。”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光辉榜样。无论在青海还是在陕西，赵寿山总是手不释卷，马、恩、列、斯的许多经典著作他大都看过，并且认真地做了许多日记。他曾对秘书姚德怀说：“一本《共产党宣言》使我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它不仅是我思想转变的钥匙，也是我行动的指南。我学习了几十年，现在还要经常学。”理论指导实践，思想是行动的向导。正是马列主义，使赵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共产党人。

1965年6月20日，赵寿山不幸因患癌症逝世。但是，他的英名、功业和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李庆东)

主要参考资料:

- 1.《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2. 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1—3)部，1987年12月—1990年10月第1版。
- 3.《陕西党史资料丛书》第17、2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及1993年5月第1版。

宣 侠 父

(1899—1938)

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被派往冯玉祥部工作，参与组建中共甘肃特支。1927年11月任中共诸暨县委军事部长。1933年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1934年后在沪、港、桂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2月到西安，协助周恩来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1938年7月31日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宣侠父，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党在白区工作的优秀战士，是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能手。他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善文能武，智勇兼备，是我党忠诚、积极、奋发有为的坚强战士，抗日勇士。是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同志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力助手。

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全名今秋。1899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湄池长澜村。父亲宣铁珊，是位读书识礼、

正直善良的人，一生以小学教员为业。侠父幼时随父读书，17岁时毕业于当地店口觉民小学。他聪明好学，成绩出类拔萃。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渔涝科学习。1920年夏，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并获准公费赴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留学，继续学习水产专业，研究水生物学。

留学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日本，便他在异国他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从此，他就开始从事一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国内革命出现了新局面。身在异国的宣侠父，在被停止官费待遇之后，毅然回国，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结识了宣中华、俞秀松等人，一同投身于革命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1923年宣侠父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台州、温岭、金华等地区发展党的组织。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浙江党组织委派宣侠父去军校学习。在杭州，宣侠父邂逅胡宗南。听了宣侠父一席关于强国必须强军的鼓动，去意彷徨的胡宗南也决心报考军校。宣侠父带领樊嵩华、胡宗南等十多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在黄埔军校，宣侠父不仅理论和军事等各门课程门门优秀，还担任学生会工作和党团小组长的职务，在教官和学员队中影响颇佳。他虽被指定为三中队党小组长，但他认为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违犯国民党章程，遂上书校特别党部，提出应按章程选举党小组长，党、校领导也应各司其职。因之遭到蒋介石“家长”式的

训斥，勒令三日内向他交出悔过书。宣侠父据理反驳，蒋介石恼羞成怒，撤销了宣侠父的党小组长职务，并以开除要挟宣侠父，严令必须限期交出悔过书。宣侠父怒不可遏，愤然离开了黄埔军校。

1925年春，受上海党组织派遣，经李大钊推荐，宣侠父、高克林等人，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来到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冯玉祥委派其为宣传员。他以充沛的精力，旺盛的情绪，进行大量的、具体的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和冯玉祥及其上层军官频繁接触，另一方面在军中办俱乐部、图书室、训练班。通过上课、演讲、游戏、娱乐、教唱进步歌曲等形式，广泛接触下层官兵，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以及苏俄的十月革命，为把这文长期受封建宗法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熏染禁锢的旧军队，改造成为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新军队，做了大量启蒙教育和组织工作。使包括冯玉祥、吉鸿昌、张克侠等在内的许多西北军官佐在政治思想上转变为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无产阶级方面起了直接启发教育相引路作用，为以后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到西北军中领导开展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同年10月，宣侠父随被任命为甘肃代行督办的国民军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兰州，在二师尉以上军官中讲授《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进行革命教育，发展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兰州的张一吾以及钱清泉一起，于1925年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任特支书记，宣、钱任特支委员。

宣侠父在兰州期间，不堪忍受军阀马麒蹂躏的甘肃夏河拉卜楞藏区民众和嘉木样呼图克图五世的代表黄正清等人组成藏民代表团，赴兰州控告青海军阀马麒长期对拉卜楞藏民和寺院的劫掠

和屠杀。宣侠父以充满诚挚、朴实和友爱的态度，接待了黄正清。不几天，他到南关兴盛隆大店看望黄正清，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对黄说：“你们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也应该受到尊重和爱护，现在要讲民族平等。马麒的军队是不应该欺压你们的，你们的反抗是正义行动。”接着他又说：“你们应该明白，光告状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和进步，才能使反抗有力量，才能改变藏民的现状。以后你们可以随时来督办公署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这是黄正清第一次听到“民族平等”，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一直被人们称为“蕃子”的藏民叫作“少数民族”，心中真有难以形容的喜悦，他感动得差一点淌下热泪来。

从此以后，宣侠父便成了黄正清的良师益友。他经常到黄的住处和他们谈话。一天，他对黄说：“你们不懂汉文很不方便，我愿意帮助你们学习汉文；同时我也想学藏文，学好了藏文好了了解你们藏民的情况。”侠父这个意见立即在代表团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同意。随后，侠父又对黄说：“你们住的大店情况复杂，很不方便，这样长期下去不行。我建议兰州成立一个藏民文化促进会，找个地方把牌子挂起来，好进行活动。”代表团成员当然同意宣侠父的意见，便积极奔走，找地方，终于把藏民文化促进会的牌子在浙江会馆挂了出来。

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宣言、藏民文化促进会的组织大纲和有关章程，都是由侠父亲自执笔起草的。为了给藏民伸冤和有力地打击马麒军阀的气焰，宣侠父还亲自给代表团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并亲自负责在兰州石印后向全国散发。

在藏民文化促进会里，有藏民代表团团长黄正清，代表团的翻译三木旦（罗占彪）、邵光宇（秘书兼参谋长）、杨步云（美武士官杨世杰之父）、拉麻加（三木岔头人阿才之父）、宋哲（阿莽

仓管家)、成来热木旦(加木样藏文秘书)、恰热欧强(欧拉大头人)、黄祥、杨真如(杨喇嘛)等人。

宣侠父经常在藏民文化促进会里,教藏民兄弟学汉语、汉文,还虚心向藏民学习藏语、藏文。在学习中,宣侠父为人正直温和,性格开朗而诚恳。他非常留心藏民的文化习俗,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他对代表团成员说:“我很想去你们藏区去,一方面向你们学习,一方面好帮助你们搞搞文化教育建设。”黄正清在他的要求下给他起个藏名,叫“扎西才让”。宣问黄:“扎西才让是什么意思?”黄向他解释说,“扎西”就是汉语中的吉祥;“才让”就是汉语中的如意或成功。宣听了很高兴,欣然采用了这个藏名。从此,代表团就叫他“扎西才让”,反而很少叫他的本名。宣侠父,就是这样和藏民打成一片,成为藏民中的一员了。

为了具体了解情况和便于解决纠纷,在取得刘郁芬同意之后,侠父亲自前往甘南藏区。侠父提出要黄正清派翻译三木旦一同前往,负责路上的安全和生活。事前,黄正清给他父亲黄位中(藏名宫布德主)报告了这一情况,黄的父亲来信欢迎。侠父便于1926年7月的一天,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到了玛曲欧拉,见到黄正清的父亲和嘉木样五世。在甘南,宣侠父召集了一个附近400里路以内的部落头人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我是督办刘郁芬派来看望嘉木样活佛和大家的,也是来支持你们反对马麒军阀的。马麒压迫你们,残杀藏族同胞,他是一个大军阀。这样的军阀在我们中国是很多的,绝不只是马麒一个。要反抗,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有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说到这里,侠父站起来拔了一把草,拧成一捆,然后用手拉,但拉不断。又把草分开,一根一根地拉,草都被拉断

了。然后他又说：“看到了吗？草要是拧在一起，力量就大，拉不断。人也是一样，只要齐心团结在一起，就谁也别想欺负你们。”他接着说：“一定要有文化，有了文化才能有力量。因此，你们要好好学习汉文，我也要学习藏文。我们要互相交流、互相团结，我也有一个藏名，叫扎西才让，你们以后把我叫扎西才让好了，我们是一家人呀。你们的代表黄正清在兰州正在努力学习汉文，并且学得很好，希望你们都要和他一样，努力学习汉文。因为学好汉文就能看很多的书，吸收很多新的知识，来增加我们自己的力量。”

头人们听了他的话都很感动。直到解放以后，老人们还在打听扎西才让的下落，可见宣侠父在藏民中的印象是何等深刻了。

经过两个月的草地之行，宣侠父了解到了纠纷的真实情况，便回到兰州，向刘郁芬作了汇报，反映出马麒在拉卜楞残害、欺压藏民和焚烧寺院的种种不法行为。并向刘郁芬提出了妥善的解决意见。随后，刘郁芬召集双方人员进行谈判，于1926年10月作出了三条决定：一、马麒军队全部撤离拉卜楞地区。二、设拉卜楞总局，归兰山道管辖。三、由甘肃省派遣一个保安大队常驻拉卜楞，以保护藏民生产和生活安全。这个决定于1927年春天，由刘郁芬派其政治处长贾宗周前往拉卜楞西仓，召集各部落头人宣布，大家都无意见。至此，长达七年之久的拉卜楞地区藏民与青海军阀马麒之间的斗争才算结束。而在办理过程中，宣侠父的秉公处理和维藏民正当权益的精神，是拉卜楞地区的藏民群众永世难忘的。

吃水不忘掘井人。黄正清和广大甘南藏民始终没有忘记宣侠父的恩情和教诲。民族团结的种籽深植于拉卜楞地区。在甘肃解放的关键时刻，黄正清深信，共产党、解放军就是宣侠父那样的

人，义无反顾地作了大量配合解放甘肃的善事。解放后，他被党和人民政府任命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他经常将珍藏在墙缝里保存了几十年的宣侠父像片和墨迹拿出来看上几眼慰藉心中的思念之情。拉卜楞藏族人民心中也一直怀念这位救命恩人：

“现在解放了，
共产党来了。
亲爱的扎西才让啊！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

当黄正清获知宣侠父已于 1938 年被敌杀害，仅有一女在北京工作时，他视烈士女儿如己出，过从甚密，交谊日深，谱写了一曲汉藏民族团结的新曲。

二

1926 年 11 月，国民军联军解除西安的之围后，宣侠父从兰州来到西安，在冯玉祥部孙良诚师驻防华县一带的吉鸿昌、梁冠英旅开展工作。

根据援救西安的体会，宣侠父深感提高部队素质和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所以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前的几个月中，宣侠父谢绝了石敬亭委其任潼关县长的任命，专心致志地效力于改造部队的工作。其时，冯玉祥将所有部队改编成十三路军，宣侠父任

孙良诚的第三路军政治处处长。先后在该部驻地华县咸林中学和潼关北门里举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员有当地的，也有外地慕名而来的，有从部队选拔的，也有青年学生中报名的。安子文、张子道、王崇仁、高岚溪等都是这时训练班的学员。宣侠父知识渊博，善于表达，又和霭可亲，平易近人。讲课时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学员们都愿意听他讲课，也愿意向他提问，师生间俨然是亲密的朋友。课余时间，他和学员们一起下棋、打球、议论形势，尤其是他的书法在学员和教师中颇受欢迎。部队东征前，学员们即将分赴部队，依依惜别，纷纷请他挥笔留念。他题书的赠幅，都是略加思索，挥笔成诗，或勉励学员，或抒情寄怀。由于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他勉励张之道的条幅是：

人民渐自梦中回，
革命呼声惊似雷，
同志如今须记取，
自由要用血争来。

当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少人对形势产生疑虑，他高瞻远瞩，勉励大家，历史决不会倒转：

右派诸人亦可怜，
反俄反共自嚣然，
如斯也作胜利想，
历史倒翻一万年。

1927年5月1日，国民联军誓师东征，策应北伐，同时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宣侠父被任命为前敌指挥部政治处处长兼第三军政治处长、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委员兼战地工作团（宣传大队）团长。出征前夕，政治宣传队招收队员，中山军事学校妇运班的谢葆珍热情很高，非要参加不可。宣侠父虽为其热情打动，但又觉得她不足15岁，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后经校、班领导史可轩、王叔振等人说情，方才接收。谢葆珍果然是位不同凡响的姑娘，人小志气大，有一股不甘落后的牛劲，整天问个没完，练个不停，不怕苦，不怕难。在东征连续作战行军的两个多月的接触中，她由衷地佩服宣侠父，在宣侠父的培养和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东征策应北伐虽然胜利了，但是冯玉祥却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拉了过去。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开始在第二集团军中部署“清党”，将1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在开封的一所中学，名为集训，实为“审查”。7月14日晚，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蒋听松、刘贯一等32人，被押上火车，“礼送”出境。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许多人不知所措。宣侠父临危不乱，建议成立党小组，有组织地进行斗争。大伙公推宣侠父为临时党支部书记，他鼓励大家要把目光放远，树立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心，指挥大家在车上唱国际歌。车到武胜关，押车的士兵扬长而去，经过宣侠父和车站交涉，车厢才又挂上南行的列车，驶向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三

1927年8月，根据党中央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精神，
250

宣侠父回到浙江诸暨老家，开展农运工作。宣侠父的归来，给面临白色恐怖的全村革命形势带来了转机，昔日的小同伴和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慕名请他出主意，他给大伙讲宁汉分家、蒋汪合流的形势，讲北伐的故事，讲党发动农民运动的指示，讲农友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便会村的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又振作起来，被周围群众称之为“小莫斯科”。

同年11月，在诸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应代表们要求，宣侠父作了重点发言，分析了低潮和高潮的关系，鼓动大家团结起来一条心，以斗争争取胜利，大大鼓舞了大家士气。他谢绝了大家推举他为县委书记的建议，只担任了军事部长。在随后开展的“二五减租”运动中，他充分发挥农民武装的作用，镇慑了顽固地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诸暨的胜利又带动周近六个县减租运动的胜利。

在领导减租斗争当中，宣侠父与金村农运积极分子金婉琳（金玲）相识相爱，减租斗争胜利后，二人喜结良缘。新婚第二天，敌人闯入金村，搜捕宣侠父。幸得农友及时报信，宣侠父连夜逃走。几经辗转，栖身驻军于山东济宁的梁冠英部队。

不久，冯玉祥知道了，电令梁冠英将宣侠父押送开封第二集团军军法处、旋即转押于潼关监狱。释放后，宣侠父寄居于武汉、镇江的亲属家中。

宣侠父是一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他利用1929年秋到1930年底这一段赋闲的时光，写了两本小说。一部是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一部是创作小说《入伍前后》。并以两本书为契机，与“左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北远征记》记录了作者本人和一批优秀青年，从1925年春到1927年夏，在西北军中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战斗历程。

阳翰笙说这是一部“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的好书。《入伍前后》写的是一个贫苦青年，在军阀部队当兵，受到革命教育，成长为一个革命者，团结士兵兄弟发动兵变，投奔红军的故事。

1931年秋，梁冠英弃冯投蒋，派人请宣侠父担任他的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宣侠父知道梁投蒋是权宜之计，便回到了梁部。与此同时，梁还召回了部分昔日失意军人，他们都很景仰宣侠父。宣侠父利用有利条件，很快在梁部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活动。

春节过后不久，宣侠父在上海见到了阳翰笙，两人一见如故，谈了很久。宣侠父托阳翰笙设法请上级党组织派人到梁部工作，并送上他的新作《入伍前后》，请阳指点。阳翰笙充分肯定了以前已看过的《西北远征记》，十分佩服宣侠父的创作精神和文笔。在谈过“左联”的工作和接二连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困难处境后，为不能出版宣的小说惋惜不已。宣侠父建议说：“我们办自己的小书店，既可卖自己的书，又可赚一点钱为出版进步书刊铺路。”并告诉阳翰笙，他可以想办法搞点钱，作为开办书店的经费。当时，缺少经费是束缚“左联”的又一条绳索，令“左联”的领导人一筹莫展。宣侠父的热情支持，使阳翰笙喜出望外。

嗣后，杜国庠等20多位共产党员潜入二十五路军。宣侠父在军中办起了俱乐部，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做了许多反蒋抗日的宣传工作，鼓动官兵们反对军阀混战，抵制“围剿”红军。

不久，“左联”的又一个出版机关——湖风书店因梁冠英慷慨资助而在七浦路上开张营业。丁玲主编的《北斗》、冯雪峰、楼适夷主编的《文学导报》、鲁迅的《小约翰》、高尔基的《母亲》、《夜话》等很有影响的书刊才因之有幸面世。

宣侠父的第二部小说《入伍前后》也自费印刷出版。《西北远征记》已于1930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经“左联”党团研究决定，接收宣侠父为“左联”的特别盟员，暂不公开他“左联”身份，以利在敌军中隐蔽地开展工作。

四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纷纷结社抗议，请愿抗战。梁冠英听信谗言，拒绝宣侠父的劝阻，右转“剿共”。宣侠父与之决裂。得知昔日相好吉鸿昌、方振武正在鼓动冯玉祥抗日，宣侠父于1932年夏赶到张家口，在特委领导下积极筹划成立抗日同盟军。走过一段弯路之后，冯玉祥再次见到宣侠父，追悔不已。宣侠父不记前嫌，鼓励冯玉祥重整旗鼓，抵抗日寇，再立新功。

由于宣侠父的鼓动组织工作得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很快于1933年5月正式挂旗成立。在随后由中共河北省委组织的中共同盟军前委中，柯庆施任书记，宣侠父、许权中等为委员。由于同盟军成立仓促，人员不足，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而又多年不曾指挥军队的宣侠父也临危请命，兼任吉鸿昌任军长的第二军下辖之第五师师长。6月21日，同盟军北征，抗击日寇，吉鸿昌、宣侠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接着，又乘胜前进，连克康保、宝昌，收复了察哈尔大部分土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就在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却害怕触怒日本和妨碍“剿共”，三番五次下令，逼同盟军放弃抗日。同盟军内部开始分化，8月5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之后，前委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七人常委会，作为常委之一的宣侠父力主顺应民意，抗战到底，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方振武通电宣布代理总司令职务。前委决定挥师南下，“打回北京，过八月十五”。

正当部队攻克怀柔、密云之时，同盟军部队却遭到蒋介石派来的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腹背受敌，终于10月中旬败散。宣侠父怒火中烧，大病一场，躲住在天津吉鸿昌家中。

还在宣侠父带领士兵与日寇浴血奋战的那些日子，一把隐形刀子也向宣侠父捅来——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金玲被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狱。宣侠父来到天津之后，经过党组织的营救，金玲才被保释出狱，来到天津吉鸿昌公馆。不久，生下一个女儿，给沉闷的家庭带来了许多生气。

几度患难相交，宣侠父与吉鸿昌结为挚友。他为中华民族有吉鸿昌这样的民族英雄而骄傲。当吉鸿昌愤感报国无门，讨教宣侠父时，宣侠父启发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吉鸿昌当即表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3月，宣侠父带着吉鸿昌，专程来到上海，介绍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到天津之后，宣侠父积极参与了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工作。4月底，以吉鸿昌为主任，宣侠父、南汉宸、任应歧为委员的中国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天津成立。同时，创办了《民族阵线》，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它对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招来了国民党投降派的破坏以至卑鄙下流的暗杀行动。尽管党组织采取了转移干部的对付措施，吉鸿昌、任应歧还是未能幸免。终于在11月9日被捕，同月24日押到北平杀害。噩耗传来，宣侠父怒不可遏，写下了这样的怀念诗句：

面对敌枪弹，
屹然似泰山。
以死报国家，
名垂宇宙间。

五

1934年夏，在党的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刻，宣侠父奉命调到上海中央特科，以《申报》特派记者身分作掩护，化名杨永清，与王世英、王学文等一起开展工作。宣侠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文化、金融、实业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为上海临时中央局搜集军事情报。夫人金玲也由王世英介绍入党，和金树望一起，担任特科交通。

他很快以记者身分的有利条件和才华横溢的气质，打开了和上海社会各界名流联系的渠道，结识了银行家章乃器、大律师潘震亚、实业家杜重远、毕云程和文化教育界名人邹韬奋、胡愈之、戈公振、田汉、张志让等人。并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具有穿透性的分析能力，使这些人感到，他是一位资深的记者，愿意与他相交、合作。红军长征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谣言到处流传，以致有些进步人士也半信半疑。宣侠父综合各种报纸和情报资料，进行分析鉴别，写出了长达二万三万字的一份戳穿谣言的材料，受到临时中央的赞扬。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将其传播出去，对稳定统战对象的思想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经常处在被盯梢、被暗杀的威胁中，但上海的革命活动依然像冰层下的大河，奔流不息。胡愈之、张仲实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让黑暗中的中国民众

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沙千里、章乃器组织了“苏联之友”社，让民众看到曙光；戈公振、宣侠父携手在《申报》连连发表文章，抨击反动，鼓动民众；阳翰笙、夏衍、田汉等“左联”成员的革命创作活动也从未间断。

由于宣侠父与进步人士联系频繁，尽管他小心谨慎，仍然险情环生。一天晚上，宣侠父去田汉家参加会议，因故误点，在后门巧遇田家保姆，暗示他赶快离开，田家已被包围。当晚，宣侠父匆忙赶到胡愈之家，通知胡告诉其他同志暂停联络，注意安全。有一次，宣侠父约见阳翰笙，被跟踪阳的特务盯上了。他发觉后，在闹市绕了几圈，满以为甩掉了“尾巴”，放心地回了家。谁料，第二天，住所周围还有特务“蹲点”。他让金树望身着他的白色西服，将特务引开，自己迅速转移。金玲和金树望趁夜半无人时，也离开住所。后经几次搬家，才算安定下来。

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字，国民党将华北五省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李济深、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集于香港，拟筹建抗日组织。这时，党组织将宣侠父调到香港，任中共南方工委书记，联络两广上层人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梅龚彬、陈希周等同志了解的情况，李济深、陈济棠、蒋光鼐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在抗日和反蒋两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宣侠父决定，求同存异，以威望最高的李济深为中心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共产党员宣侠父和梅龚彬、陈希周也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后来又联合了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势力。宣侠父说服同盟领导成员放弃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建立民众武装抗日义勇军，缓和了昔日和民众的对立情形。经过宣侠父周旋，陈济棠释放了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何思

敬。

还是在上海时，宣侠父曾联络过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争取他们反蒋抗日。宣侠父到香港后，1935年11月，胡愈之得知张学良有意与中共接触，赶到上海，报告宣侠父。宣侠父无法与党中央联系，便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王明等人反对我党联合地方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方针，污蔑宣侠父是政客，并于随后由刚从莫斯科归来的潘汉年取代了宣侠父南方工委的领导职务。可是，此时，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部署已经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天主教堂会谈过了，开了王明机会主义一个小小的玩笑。

接着，李宗仁、白崇禧于1936年发动了“六一事变”，公开扯旗抗日反蒋，邀请民族革命同盟参加。李济深率宣侠父、蔡廷锴等50多人的民族革命同盟代表团，奔赴南宁，筹划组织联合政府，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在李、白部属内部，右派分子刘隐庐等人依然堂而皇之鼓吹反共。宣侠父感到李、白戏中有戏，他在李、白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即席演讲，指出“国难当头，理应团结各阶层、各党派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阵线。那些至今还坚持一党专制，排斥异党观点的人，和反对抗日实乃异工同曲。”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后经李济深推荐，宣侠父担任了李、白部队的参议。宣侠父利用这个身份，配合李济深，鼓动李、白在原十九路军的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十九路军，翁照垣任军长，丘少琛任师长，宣侠父任军政治部主任兼师参谋长。时值日军以在北海发生了打死日本人中村为借口，将军舰开到北海海面。在宣侠父的鼓动下，丘少琛师开赴北海，严阵以待。

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在调兵威胁的同时，重金收买了余汉

谋、陈济棠，继而又恩威并用，使李、白妥协，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久，丘少琛也被李、白收买了。

“六一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云广英到广西工作。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云广英找到了宣侠父。宣侠父汇报了事变经过，并介绍云广英与李济深进行了会谈，李济深受到极大鼓舞，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亲笔致函毛泽东，托云带回陕北。不久，王世英由陕北来到南宁。当时宣侠父重病住院，便派方可纫与王世英联系。谁知方可纫找到旅馆，没有见到王世英。全国解放后，王世英与金城谈及当时情况，对金城说：“当时在南宁，胡鄂公对我说，‘宣侠父有意称病，不愿见你，这地方不安全，你要赶快离开。对李、白的工作，由我胡某承担。’我便匆匆离开南宁。”至此，真相大白，原是胡鄂公想冒充中央代表，挑拨离间，阻隔了宣侠父与王世英的联络。

宣侠父离开丘少琛部后，同方可纫来到梧州，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成立了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宣任主任委员，方任组织部长。广泛联系学生和工人、市民，宣传抗日救国。梧州的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2月，由市同盟委组织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有3000多名学生和群众参加大会，气氛十分隆重、热烈。大会强烈要求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

六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安骤时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张学良被囚，东北军

群龙无首；“二二”事件，东北军又发生内讧。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十分复杂，亟待有一位得力的同志担此重任。

1937年2月初，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风尘仆仆，来到西安。周恩来风趣地说：“黄埔军校一别，很快就是10年，我们是殊途同归，革命的洪流又把我们涌到一起来了。”接着，他们向宣侠父介绍了西安的情况。

初到西安，宣侠父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很快结识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杜斌丞、杨明轩、车向忱、马德涵、李木庵、曹靖华、侯外庐等人，并和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等人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征求稳定群众情绪、推动救亡运动的建议。同时，他还专门拜会了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抽暇会见了黄埔军校校友、江浙同乡以及原冯玉祥部散落西安的同僚宋希濂、曾扩情、寿子逸、方仲如、张之道、高岚溪、王黎昌等人，为全面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多年深入敌军和白区工作的宣侠父，对红军有另一番情意。到西安不久，他专程到三原住了几天，拜会了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左权、陈正人、肖劲光等红军将领，相互间或知名未谋面，或一别匆匆10多年，他们畅叙同志情怀，胜饮杜康千樽。

4月底，由叶剑英点名，宣侠父北上延安，出席了5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苏区、白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实现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分别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次会议使宣侠父的思想认识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他认真总结了过去多年在敌军和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决心响应党中央“重新学习”的号召，认清新形势的特点，收起反蒋的旗帜，充

分利用国共合作时期“合法斗争”的特点，同“关门主义”、“尾巴主义”、“冒险主义”作斗争，组织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月底，宣侠父从延安回到西安。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将宣侠父介绍给西安的党政军民各族各届代表，把他推到西安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李克农去上海诊治眼病后，宣侠父和李涛共同协助叶剑英，负责红军联络处的工作。这时，夫人金玲也带着女儿由广西辗转来到西安，在香米园安家住下。

七七事变前夕，围绕抗战的领导权问题，西安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和政治争夺。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合作谈判的焦点。顾祝同、曾扩情、宋希濂、贺衷寒等人为蒋介石的“凡事他有最后决定权”的论点鼓吹，拉拢宣侠父回到蒋校长麾下（他们均为黄埔同学），同他们携手并肩，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宣侠父则鼓励他们：放弃门第观念，休争谁高谁低；大敌当前，大家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方是日本鬼子虎视眈眈，后方我们却在争权夺利，我们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四万万父老兄弟姐妹；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谁真正坚持抗战，自然会建立威信，老百姓自然就会拥护谁。针对国民党派出的阵容，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又陆续派陈赓、左权、陈正人、曾希圣等黄埔军校毕业生来到西安，协助宣侠父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国民党方面，也曾指派关麟征、郭紫峻、冯钦哉、董钊等黄埔校友到宣侠父家里游说。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论和争夺十分激烈。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促成了国共合作谈判，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争。宣

侠父被任命为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代表八路军总部出面交涉、协调各等事宜，常驻西安。

1937年9月初，为了解决八路军部队开赴华北抗日的作战战场和与二战区所属部队的协同配合，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带领宣侠父和左权、南汉宸、彭雪枫、程子华等精兵强将，赴山西太原与阎锡山谈判。

表面看来，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次谈判，派出心腹梁化之带专列刮风陵渡迎接，安排到绥署高级招待所食宿。但在具体谈判时，他却处处设障，使谈判举步维艰。平型关大捷对阎锡山触动很大，二战区各部队有的保存实力，有的溃不成军，惟有八路军一一五师孤军奋战，大获胜利，使阎认识到，保卫山西，还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宣侠父作为谈判助手，在出色完成分工谈判论据论点的整理、察哈尔阵地资料的提供外，还穿梭往来于太原西安之间，通报谈判情况和了解全国各地相关情况，资佐太原谈判。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阎锡山终于答应八路军三个师按我方意见布阵，并同意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动委”中进步势力和我方党代表占了较大的优势。

山西谈判结束后，宣侠父又根据中央指示奔赴南京，去争取梁冠英、李宗仁、白崇禧到抗日救亡阵线中来。

宣侠父与梁冠英的谈话是直率的，他分析了抗战形势和蒋介石的态度，劝告梁冠英认清形势，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坚持抗战，不要再作蒋介石的马前卒和牺牲品。梁冠英十分痛快地表示，抗日决无问题，对蒋介石，他心中有数。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服从于蒋乃是权宜之计。

南京沦陷前，国民党政军首脑机关西迁武汉，宣侠父也于1937年11月中旬来到武汉，参与了在中共长江局领导下的对国

民党高级将领和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到武汉不几天，宣侠父会见了张克侠将军，俩人是西北军的老熟人了，谈话是敞开心扉的。分析了延安和武汉的形势以后，宣侠父动员张克侠到延安去，张克侠表示，只要条件许可，机会适当，他一定会去的。岂料张在对既是直接上级，又是“挑担”的冯玉祥谈及此事时，冯玉祥没有许可，因为冯已推荐张克侠等三人作国民党军委会的高参。张克侠只好按下此事不提，在宣侠父返回西安之前再次找宣讨教。宣侠父同意张克侠伺机而动，两种方案，各有各的好处，只要心向革命，选择什么道路是无关重要的。1938年1月下旬，宣侠父再赴武汉时，又两次会见了张克侠，并准备带张拜会周恩来，却因故未能如愿。

在张克侠的精心安排下，1937年11月下旬，宣侠父由武汉“八办”工作人员王梓木陪同，会见了冯玉祥。当时，冯玉祥在丢掉战区司令长官的头衔后，再次体味到蒋介石戏弄之苦，心情十分郁闷。宣侠父和王梓木来到东湖冯玉祥住所时，受到冯玉祥将军倍加热情的招待。宣侠父对冯先生说：“我这次来武汉，毛泽东、周恩来让我代表他们向你问候！”冯先生高兴地直点头道谢。宣侠父对冯先生说：“大敌当前，连蒋委员长都同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战了，冯司令长官更是责无旁贷呀。”不料引起冯先生感慨万端：“我如今是有力无处使啊！空头司令能干啥嘛。”宣侠父告诉冯玉祥，全民抗战并不是全民扛枪。你带兵多年，部属成千上万，鼓动他们抗日，不等于你抗日了吗？冯玉祥茅塞顿开。忙说：“对、对，这一定能办到，一定尽力办到。”下午冯玉祥留宣侠父共进晚餐，并破例将宣侠父送出大门，让汽车送宣回去。临别时，宣侠父对冯玉祥说：“如果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还会再来的。”两人手拉手，久久不分。冯玉祥这位戎马倥偬几十年

的钢铁大汉，禁不住淌下了热泪。

不几天，冯玉祥给宣侠父写信，介绍他的随从副官和随从参谋周茂藩、赵力钧到延安去学习。其实这是宣侠父与张克侠在下面安排好的，但还得由冯允许和出面。一件小事，反映了冯玉祥情绪和认识的重要变化。随后，冯玉祥经常和中共长江局武汉“八办”联系，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周恩来到武汉后，还专程和长江局书记王明拜访了冯玉祥将军。双方的友谊与日俱增，对冯玉祥后期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鼎文升任西安行营主任后，搞裙带关系，安排诸暨老乡杭毅、汪维恒、寿子逸分别担任警察局长、军需局长和随从秘书。他们虽然效忠于蒋鼎文，但都对宣侠父十分亲热和景仰。宣侠父恰好利用这种合法又特殊的关系，对他们渗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全民族团结一致全面抗战的前途和意义，不断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积极性。警察局长杭毅不得不有所收敛；军需局长和“八办”保持着“心照不宣”的良好关系，给予八路军许多力所能及的照顾；寿子逸本来是替蒋鼎文减少麻烦挡客的，但在宣侠父面前却绿灯常开。

身为行营主任的蒋鼎文在别人面前趾高气扬，但对宣侠父却十分头痛，只好在勾结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同时，采用种种手段拉拢宣侠父。他曾以请宣侠父吃饭为名，给宣介绍女朋友，企图拉其下水，遭到宣侠父拒绝。此计落空后，蒋鼎文又施一计，建议宣侠父去“德国留学，深造提高”，想把宣侠父挤出西安。宣侠父谢过这位以“黄埔长辈”自诩的行营主任的关心后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正值用人之际，本人不敢奢求个人的前途，置民族利益于脑后，还是等胜利以后再提此事吧！”心照不宣，

蒋鼎文只好哼哈称是。

胡宗南是宣侠父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他与胡宗南的每次接触都要用电报向中央请示、汇报。

1937年8月下旬，宣侠父由西安到达徐州，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胡二人是浙江同乡，黄埔同窗。胡宗南时任第一军军长，因深知宣侠父是文武全才，亟欲得之，便多次邀请宣侠父，宣侠父乃有此行。在徐州，胡待宣侠父为上宾，朝夕陪伴，视察部队防地，畅叙别来沧桑。应胡宗南请求，宣侠父阐述了以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了对付蓄谋已久、锐气正旺的日本侵略军必须采用游击战争的建议，得到了胡宗南的称赞。

宣侠父还鼓动胡宗南在西安办一所大学，如同阎锡山的“民大”。由胡出面应名，由党组织派人做具体工作，掌握实权，为革命培养干部，积聚力量。胡宗南也想效法蒋介石，为自己培养一帮嫡系帮派，于是接受了宣侠父的意见。不料这件事很快让蒋介石知道了，认为宣侠父拉胡办学，是动摇他的军心，拆他的台。这也是蒋介石后来气急败坏地密令杀害宣侠父的真正原因之一。

1938年1月，胡宗南在徐州举办阅兵式，再次邀请宣侠父前去助兴。胡宗南仍然没有忘记上次宣侠父的远见卓识，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以资教育部队。宣侠父知道胡宗南只以蒋介石之命是听，并无真心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又觉得能让他和他的部下注意这个在中日战争中我方必须采用的战术，于国家民族也是不无好处的，便欣然同意了。宣侠父对游击战争问题思虑已久，因而只用了一个通宵，就交出了《抗日游击战争概述》一稿。胡宗南阅后，当即批准印发部属阅读。后来，西安的《救亡》周刊在第五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稿，引起了军事界的称赞

和文化界的注目。宣侠父在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此行情况之余，特意将《抗日游击战争概述》一文呈送毛主席斧正。

《抗日游击战争概述》一文，使胡宗南赞叹不已，他打内心佩服宣侠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策动宣侠父辅佐他治军，许以高官厚禄。宣侠父婉言谢绝。他对胡宗南说，日寇大举侵犯国土、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自己因为久未领兵，无意当官。他劝胡宗南：“当官就应该像林则徐那样，领兵就应该像关天培那样，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

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后，率部参加上海、南京抗战失败，于同年底退到西安整补。为了扩充势力，胡宗南在西安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又鼓动宣侠父辅助，被宣侠父再次拒绝。胡宗南以为宣侠父看不上“军校”这类单位薄职，便吹嘘他可以向蒋介石推荐让宣侠父出任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宣侠父严峻地指出：“只要不附任何条件，我干什么都乐意，拿枪杆子上前方打仗也可以！”胡宗南碰了个软钉子，从此再不拉宣侠父到国民党去做官了。

倒是宣侠父对胡宗南的抗日宣传鼓动逐渐发挥作用。胡宗南对宣侠父几乎是言听计从，除了办大学一事外，有不少事都来向宣侠父讨教，并多次表示愿和八路军携手合作，打败日寇。因为以他的亲身经历，他已清楚地认识到仅靠蒋介石的部队是无法打败日本的。对于胡宗南的表态，宣侠父并没有轻信，又通过胡身边的人，特别是他的秘书和党派去潜伏在敌部的同志那里，佐证了胡的意向。1937年12月4日宣侠父在致毛（泽东）、周（恩来）、洛（张闻天）、博（古）、林（伯渠）的电报中说：“据周天缪（胡宗南的秘书）等谈，胡宗南、张发奎、陈诚等有团结抗战派的企图。”

不料，胡的这种意向，也被蒋介石获知。蒋介石对宣侠父更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由于周恩来忙于在西安或赴南京、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党联系西安各阶层代表的工作，主要由宣侠父来承担。每逢周恩来经过西安时，他总是详尽地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听取其指示。只要时间许可，他就安排周恩来进行公开讲演或单独会见有关人员。1937年12月16日，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前往武汉，经过西安，宣侠父根据当时西安接连发生两次封闭《解放》周刊分销处事件等情况，建议周恩来结合政治局会议有关精神公开演讲一次。时间紧迫，上午决定，下午就要开会，大家都担心会能不能开成功。宣侠父把准备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所有请柬由他签名，动员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专程去送。对行营、省党部、省政府等重要单位，由他亲自送去。结果，演讲会开得很成功，所请宾客全都到会，会场秩序井然，讲演不时被掌声打断。周恩来和大家都十分满意。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林伯渠来西安工作，担任中共驻陕代表。宣侠父对林老十分敬重，每天都要到七贤庄向林老请示汇报工作，主动取得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领导和支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陕西地方名流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虽然未居执政地位，但在民众中影响很深，能量很大，宣侠父特别注意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他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中认识一些陕籍名流，此时他又以平易的作风，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见解，受到这部分人的敬佩和信任，与他们交成好友。他和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鹗、孔从洲等车界人物，你来我往，过从甚密，共同分析敌情军机，互通情报消

息。他和杜斌丞、杨明轩、张之道、苏资琛、罗明等文人交际，商议抗日救亡运动公务，切磋习文治学之道，吟诗题词，关系更深一层。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一度滞留西安，同宣侠父交为知己。侯外庐接受党中央交给他翻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任务，正在积极准备中。宣侠父这时也在旧书摊上买了一套日文版《资本论》潜心阅读。两个人到一起，除了畅叙抗日救亡的认识外，更多的时间则是探讨《资本论》翻译中的问题。宣侠父鼓励侯外庐说：“《资本论》的翻译，是一件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大有裨益的工作，应当很快搞出来。你如果需要，我当尽微薄之力。”

宣侠父团结了这样的一批知名人士，促进了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异常高涨，救亡团体遍及各行各业及各族各界，救亡工作一呼百应，募捐活动成绩显著。广大民众的救亡热情又促进了上层人士，连顽固分子蒋鼎文等人也表示愿为抗战出钱出力。

在进行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同时，宣侠父还在广大民众中积极开展救亡活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西安有一些过去与宣侠父在冯玉祥部队共事的失意军人。他们虽然不得意而闲居，爱国之心终未泯灭。宣侠父建议他们组织起来，学习座谈，群策群力，共谋报国之计。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抗日问题座谈会。宣侠父给他们送去了学习的书刊，帮他们制订了学习方法，除委托专人代为联络外，他自己也不定期地参加他们的学习讨论，解答疑问。抗日问题座谈会把这些“散兵游勇”团结起来了，重新点燃他们心中的救亡抗日、报效国家的火焰。学习座谈会结束后，他书赠故交高岚溪一首五言诗，表示

了他和大家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胜信念：

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几。
广大战场中，异军看崛起。
奇师出代幽，义旗指辽蓟。
攻敌于不备，出敌于不意。
如虎常闻声，似龙不见尾。
使敌疲奔波，辟易千百里。
胜报频相传，料君闻亦喜。

通过这个座谈会，也进一步增进了他和这些失意军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宣侠父写给当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张之道的词，表现了他们深厚的友谊：

客梦空如许，
笑频年。
买敛秦陇，
倚蓬吴楚。
褴褛人间天亦小，
枯寐唯君可语。

宣侠父很快就以卓越的统一战线宣传者闻名西安，不时有人登门拜访。甘肃的青年军官任谦，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兰州听过宣侠父讲授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十分仰慕。一次途经西安，特意向宣侠父求教。任谦对当时国共合作不时出现摩擦担心，宣侠父对他说：“国共两党好像一家两兄弟，兄弟之间闹点矛盾，老

大欺侮老二是常有的事，但在对外时，还是能够团结一致的。”形象的比喻，寓意十分深刻，任谦听了心扉豁然，茅塞顿开。

青年运动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之一。宣侠父是爱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他的住处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先”西北分队部以及《青年战线》社同在平民坊五号院内，这是他及时指导青年运动的极好条件。青年救亡组织的负责人冯文彬、胡乔木、黄华、陆平、李昌、蒋南翔、严佑民、李连璧等，来来往往，常住在平民坊五号。有时开会，来人多了，就在宣侠父家里铺上几张苇席，席地而睡。宣侠父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而且性格开朗活跃，有青年的特点，常和青年们共同娱乐，促膝谈心。青年干部们对他十分推崇，乐意听取他的意见，请他当他们的工作顾问。

1938年5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西青救”、“民先”的活动被视为非法。这时，宣侠父的家，就成了他们的避护所。他利用自己较高的合法身份，尽力保护这些组织的工作干部。一次，李昌被特务跟踪，情况十分危急，匆忙中躲进宣侠父的家里。宣侠父让李躺在床上，放下蚊帐。特务闯进来时，他镇定自如，周旋了一会，便把特务支走了。

大批有志青年为了救国抗日，纷纷要求到延安去，许多人找宣侠父当介绍人。宣侠父介绍了许多人，陈慕华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1937年8月，陕西省主席孙蔚如的夫人李定荫效法宋美龄，筹建陕西的“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宣侠父深谋远虑，推荐了西安高中的进步女学生曹冠群去当“妇慰会”的常委，又安排金玲和徐彬如的爱人韩钟秀到“妇慰会”中做具体工作。在以“阔太太”、“贵夫人”为主的“妇慰会”机构中，曹冠群等几位实干家，就无形中成为实权派，对改变“妇慰会”的面貌起了很

大作用。金玲在“妇慰会”工作，宣侠父的家也成为“妇慰会”的联络点。

“妇慰会”成立初期，工作局面一时打不开，金玲的情绪有些低沉。宣侠父开导她说：“几千年来形成的妇女无权的陋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不能责怪广大女同胞。她们也是爱国的，只要我们工作得当，方法多样，相信她们是会尽力支援抗战的。”又给她介绍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按照宣侠父的意见，“妇慰会”重新部署了工作，区别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广大妇女很快就发动起来，纷纷投入救亡运动行列，为前方将士捐款捐衣，积极参加妇女战时训练班学习。“妇慰会”将妇女们募捐和慰问的物品，送到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代转前方将士。

国民党西安当局取缔13个救亡团体时，“妇慰会”虽因省主席庇护得以幸免，但活动却受到种种限制。宣侠父指导她们利用合法权利，积极开展救亡活动。1938年夏，朱德来西安时，“妇慰会”派韩钟秀等为代表，把她们亲手绣制的“为国干城”锦旗，敬献给这位人民抗日武装的领袖，表达广大妇女同胞对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的敬慕和慰问。

作为一名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是称职的。他具有超群的交际能力，许多事情，因“八办”工作人员没有经验，无法解决，宣侠父接手总能设法疏通渠道，顺利解决。

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以后，以黄埔军校教官的老资格自居，深居简出，面冷如霜。“八办”一般工作人员前往办事，几句话就给打了回去。宣侠父不理他那一套，仗着是诸暨老乡和黄埔相识，常去“磨菇”，而且总有降伏蒋鼎文的高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常让蒋鼎文挠首抓耳，一筹莫展。

1937年10月26日，根据党中央指示，西安“八办”在通济坊开设了《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开业以后，引起轰动，购书者十分踊跃，成为我党宣传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但开业不到一个月，国民党西安当局接连两次将《解放》周刊分销处查封，没收了7000多份杂志，抓走了工作人员王自励。办事处多次交涉，没有解决。12月初，宣侠父自武汉返回，奉周恩来指示，会见蒋鼎文。强烈要求蒋鼎文，“速开封放人”。蒋鼎文诡称他有难处，第一次封闭事件发生后，他要求下面“不要这样做，以免蒋介石操心”。而“他的下面有小组织”，擅自行动，他也没法控制。并扬言：下面“已把没收的《解放》周刊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张永远查封”。宣侠父看蒋鼎文有意夸大事实，危言耸听，便根据回西安后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当场揭底，“外界传闻，有云此事为蒋主任下的手令，有云蒋主任知道此谋而听之任之。”蒋鼎文吱吱吾吾，如鲠在喉。宣侠父看火候已到，马上给蒋下台阶：“请您告诫部属速启封，以顾全大局”，“以利两党合作，便于解决悬案。”蒋鼎文连忙答应，找有关方面商量解决。不久，当局释放了被捕工作人员，归还了没收的7000多份杂志。《解放》周刊分销处恢复了营业，还扩大了若干订户，终于在西安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占领了一块坚实的统一战线宣传阵地。

除了在西安协助“八办”经理科（前采办委员会）交涉采购重要和困难物资外，宣侠父走到哪里都牢记八路军高级参议的使命，只要是有关八路军的事，他都装在心里。南京武汉之行，他通过故交关系，为我军购买了二火车皮的汽油，又颇费心思地找了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官韩俊生和武汉“八办”的副官一起将汽油押回西安，减少了这种非正道搞来的汽油在途中遇到的麻

烦。这些汽油在当时，可解决了大问题。因为当时西安“八办”和延安都成立了汽车队，运输任务十分繁忙，汽油奇缺，而国民党军需部门又对汽油严加控制。汽油运来犹如雪中送炭。

宣侠父不仅是一位将军，一位卓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位文化战线的勇士。在西安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百忙之暇，他用笔杆作刀枪，写了许多犀利的文章。

他写文章都是在夜深人静时，点一支蜡烛，备两包香烟，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文章不写成，人不离凳子。《抗日游击战争概述》一文就是这样写成的。台儿庄大捷后，他给《秦风日报》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肯定李宗仁将军有准备的阵地战之余，还特意指出根据军力和环境，重视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文章深得编辑和读者好评。

1938年5月，《青年战线》第4期发表了宣侠父《对青年军训的一些意见》，指出组织青年参加军训，是全民抗战的措施之一，但应当把思想动员放在首位，把军训工作坚持下去。同年6月，他又在《救亡》第22期发表了《谈谈政党的排他性》。7月，《西北》周刊第20期刊登了他写的评论文章《目前敌人增进山西的企图》，号召广大民众不懈努力，抗战到底。他还参与了朱德、贺龙、肖克、陈伯钧等29人执笔撰文的重要书籍《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编写行列，成为西北文化出版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938年3月，由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结束了在山西前线的宣传，来到西安演出。战地服务团刚刚住定，宣侠父就赶到住地，看望大家。他是领导，但不像领导，他是丁玲“左联”时的朋友，但也是全团同志可亲近的朋友。谁在团里，他就和谁聊天，团员们都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他是一名不参加演

出的团员。

西战团在西安顺利地宣传演出了一个月，其中公演的两场话剧影响很大，轰动了古城。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惧。1938年四五月，国民党省党部在取缔西安13个救亡团体的同时，也给西战团送去了一纸通令，勒令西战团限期离开西安。中共陕西省委派李初梨同志带丁玲找国民党省党部论理，没有结果。社会上又谣传说西战团犯了错误。正当大家为下一步如何继续开展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宣侠父来到西战团，给丁玲他们出主意。

首先西战团化整为零，深入工厂、学校、伤兵医院、防疫医院。几个人一个小队，又是演出小节目，又是帮助单位训练业余歌咏队，举行小型座谈会。表面上看像是偃旗息鼓了，实际上，宣传工作更紧张、更深入、更扎实。

其次是西战团和西安的抗敌后援会联系携手进行宣传活动。抗敌后援会是国民党包办的抗日群众组织。组建之初，宣侠父做了些工作，使其基本上成为敌人应名，我们务实的群众组织。西战团和他们取得联系，在演出和刷写大标语时，“旧瓶装新酒”，依然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落款却改成“抗敌后援会××分会”。特务们看见“穿靴戴帽”的大标语不舒服，再一看落款，又不敢下手撕毁。

再次，为了使西战团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诬蔑和禁令，在宣侠父的建议、说服和安排下，宣侠父领着丁玲，会见了西安最高两长官——行营主任蒋鼎文和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尽管会见时气氛并不融洽宽松，丁玲似乎觉得收获不大，但是宣侠父却告诉她：“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他们的什么关防护照，你懂吗？蒋鼎文给西战团募捐了二百个大洋，胡宗南请你吃饭，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呀！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的。国民党官场那些势利之

徒会怎么看？这不就等于你既拿到了蒋鼎文的‘护身符’，又拿到了胡宗南的‘关防护照’吗。”果然，西战团此后的活动再也没有受到刁难和威胁。

后来，党中央指示，将西战团由省委领导改为由宣侠父直接领导。

西战团在西安又坚持战斗了四个月，对加强西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经过一番准备，又举行了声势较前更大的第三次公演，演出了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秦腔和京剧，受到了各界同胞和朋友的一致赞扬。西战团圆满地完成了在西安的宣传任务后，凯旋返回延安。

七

宣侠父在西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卓有成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各族各界仁人志士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却深感惶恐不安。军统局秘密指示陕西特务头子张毅夫：“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也感到宣侠父十分棘手，想借“军统”之手，“剪除异端”。

1937年11月初，蒋鼎文对张毅夫说：“宣侠父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随后，张毅夫便苦心布置了一个秘密监视网。

当月，由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主持，吸收西安当局有关部门参加，组织了“特种联席汇报”，定期汇报宣侠父、八路军办

事处和西安地区共产党的活动情况；蒋鼎文的秘书、总务处长等人和警备司令董钊等可以与宣侠父接触的人，都奉密令随时向谷正鼎、张毅夫汇报宣侠父的活动情况。

年底，由警察局出面，在后宰门设立了一个专门监视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派出所。

张毅夫、谷正鼎又秘密指示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侦察宣侠父与杨虎城部属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鹗、孔从洲等人的接触的情况；张毅夫甚至定期与派在胡宗南部的特务组织取得联系，了解胡宗南与宣侠父的来往情况。

此外，张毅夫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军统特务队，对宣侠父进行跟踪监视，掌握宣侠父的活动规律、生活嗜好和特殊动作。

尽管特务组织纪律森严，特务的行动狡猾诡密，但是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警觉灵敏的宣侠父，仍然很快察觉到敌人在暗中监视自己。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得到了军统特务在对宣侠父采取行动的情报。但宣侠父毫无惧色，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次，他在会晤黄埔军校时的老师、时任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时，开玩笑地放了个风：“学生我现在际遇不错，义务保护的人不少哩！”杭毅听了，十分窘迫。过后，他埋怨张毅夫，对宣侠父这样的人物，不该那样露骨地盯梢。

1938年3月，宣侠父为了迎接更复杂的战斗，把金玲和孩子送到延安。

军统特务张毅夫根据各种渠道搜集的情报，给宣侠父罗列了“八条罪状”，汇报给军统局和蒋介石：一、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等“勾结”，唆使其反中央、反蒋；二、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的军政人员来往勾搭，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其思想动摇，部队叛变；三、捏造

八路军的抗日战争果，在西安宣传鼓动；四、公开攻击中央政府腐败，抗战不力，诽谤委员长独裁，限制言论自由；五、散布共产党、八路军和杂牌军队被歧视，待遇不平等，不给补充武器军用品；六、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引起西安各校学生思想混乱，学风败坏；七、向蒋鼎文要挟吵闹，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八、宣侠父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指挥地下党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对于宣侠父这样一个在历次反蒋激流中都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老共产党员，早已仇恨在心，看到这“八条罪状”，更如尖刀扎胸，便恶狠狠地说：“每一次都有他！”遂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军统西北区代区长徐一党即秘密安排暗杀行动。首先由军统西北区直属组（即特务队）派遣三名精干特务埋伏监视，认识“目标”。特务们还以户警查户口为名，闯入宣侠父的住宅，近距离熟悉“目标”。

由于宣侠父行踪无常，特务们屡屡不能得手。特务头子戴笠催得火急，遂又派了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的两名刺客，加强暗杀力量。

我地下工作人员将敌特要谋杀宣侠父的紧急情报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八路军办事处连夜将宣侠父从平民坊五号接回办事处院内居住。不几天，宣侠父觉得住在机关对开展统战工作多有不便，自己尚有高级参议的公开身份，只要注意，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便又迁回平民坊五号，置身于统一战线的繁忙工作之中。

杜斌丞得到敌人欲对宣侠父、侯外庐等人加害的消息，劝侯迅速离开西安。侯外庐找宣侠父商量，问道：“你怎么办呢？”宣

侠父说：“我和你不同，我的战斗岗位在这里，你的战斗岗位在四方，你还是快走吧，你把《资本论》翻译出来就是战斗。”侯外庐激动不已，挥泪向宣侠父告别。

党组织十分关心宣侠父的安全，决定让他暂时回避，同林伯渠一道返回延安。7月30日起程的那天早晨，宣侠父已将行李装上汽车。林伯渠又把他叫过去，十分惋惜而又充满信任地说：“昨天晚上李初梨同志被警方传去，一夜未归。看来西安有情况，这可能是个前兆，以后不知道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还是先留一段时间，主持这里的工作。”既然林老让他留下，那就是工作需要他非留不可。他毫不犹豫地从小车上把行李又搬下来，继续留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西安。

次日下午，八路军办事处与铁路局在革命公园运动场进行篮球比赛，宣侠父担任裁判。6时许，比赛结束，宣侠父骑着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顺崇礼路向西至西京医院门口，被特务暴徒拦住去路，夺走自行车。宣侠父厉声喝斥：“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不等他说完，几个暴徒已经将他推拉到停在路旁的汽车边，其中一个狡诈地说：“知道，蒋主任请你！”说着，便强行将宣侠父架上车。汽车开动后，暴徒们一齐下手，用绳索将宣侠父缩杀。随后，将遗体投入下马陵特务队驻地附近的一口枯井里。由于我党追究得很紧，敌人怕马脚绽露，又于某夜移埋于城郊野外。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一位为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的忠诚战士，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是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第一刀。是可忍，孰不可忍！

宣侠父遇难的最初几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四处寻找。为了扩大影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

丑恶嘴脸，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寻人启事。但始终杳无音讯。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八路军办事处根据种种迹象，很快得知宣侠父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暗杀的。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逼得蒋介石无法，只好招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我有权处置他。”

由于宣侠父是被特务秘密暗杀的，党组织得到他蒙难的确切消息很迟。所以，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才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健如奔马拙如牛，
奋斗卅年未得休，
顾影不禁心忐忑，
居然老气迟横秋。

这是宣侠父在牺牲前的一首自题诗，诚如这首自题诗所写的那样，宣侠父一生像拙牛，忠心耿耿，脚踏实地；更像奔马，驰骋南北，匆匆未休。其足迹遍及江南塞北，将火种引至粤沪秦陇。每到一处，必有建树，尤在陕西，业绩卓著。遂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仇视，惨遭杀害。他在三秦儿女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形象。

(存才 形壁 堡弘)

耿炳光

(1899—1972)

耿炳光，陕西省澄城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陕甘区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后脱离党组织。抗战期间主要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47年后，在上海中华酸碱厂工作。1956年调中央民族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61年调宁夏工作，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后任宁夏大学副教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2年

因病去世。

1899年4月12日，耿炳光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自古村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入私塾，1915年春，耿炳光考入澄城县寺前镇高级小学。该校校长思想进步，这使耿炳光深受影响，小小年纪就立下了报国大志。

1917年秋，耿炳光去西安求学，考入段系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私立成德中学。在此期间，他的爱国思想初步确立，社会活动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他经常领导学生参加爱国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活动。1919年，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西安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耿炳光担任西安学区学生会代表，组

织学生积极参加斗争。1920年冬，西安各省立中学闹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耿炳光等领导成德全体同学积极参加声援活动，并充任向督署请愿学生队伍的前导。此事震怒了陈树藩，学生受到镇压。耿炳光又担任学生代表，秘密赴京控告陈树藩。在他的多方活动和联络下，陕西旅京学生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陈运动。

1921年，耿炳光因反陈不能回陕，遂入天津南开大学补习班。次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入北大后，耿炳光加入了旅京部分陕西同学组织的政治社团——共进社。该社以团结陕西进步青年，抨击陕西黑暗政治，宣传五四新思想为目的，对陕西政治、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宣传作用。其重要成员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在他们的影响下，耿炳光同其他大部分社员都进步很快。

1923年冬，耿炳光参加共进社创办的《共进》半月刊的编辑工作。从此，他同北大进步同学的接触越来越多，社会活动范围逐渐越出了共进社的圈子。尤其是在此阶段，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思想逐渐由单纯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上来。他亲自为该刊撰写了大量的文稿，热情地宣传革命，号召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1923年暑假，耿炳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就在组织的领导下，执著地为着社会主义信念而奋斗。

二

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冯玉祥将军倾向国民革命。

国共两党的北京组织决定合派党团员赴包头冯玉祥国民军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耿炳光是共产党派出的五人代表之一。他们在包头住了一个多月，在部队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对这支部队走向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年冬，耿炳光回到北京，由北大同学何资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经李大钊推荐，耿炳光受国民党左派代表于右任的派遣去陕西向杨虎城、井岳秀、甄寿山等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这次陕北之行，耿炳光还以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身份，肩负北方区委的两项重托：一是路经太原给那儿的党组织送文件；二是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该校的党组织。

经太原到达陕北后，耿炳光先去榆林见井岳秀。井思想反动，毫不为耿的宣传所动。三天后，耿炳光就南下绥德，到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耿炳光按中共北方局组织部的要求，积极协助李子洲（该校校长、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在陕北的第一个支部。绥德师范遂成为陕北党组织的最早诞生地。

同年暑假，耿炳光又去耀县向杨虎城做宣传工作，受到杨的欢迎。随后，他同中共党员魏野畴一起积极筹划，发动民众协助杨虎城驱逐盘据西安的四川军阀吴新田。为了宣传国民革命，他们在三原渭北中学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夏令讲习会”。讲授国民革命的道理和当时广东准备北伐及打倒北洋军阀政府的形势等内容。参加听讲的除了党团同志外，多数是渭北青年社社员和进步学生，共100多人。不少学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推动当地党团工作的开展。

“夏令讲习会”结束后，耿炳光同魏野畴等去西安，具体组织发动“驱吴运动”。他们同刘含初、杨明轩和一些较为进步的

中学教师共同组织了地下“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作为“驱吴运动”的组织机构。不久，耿炳光回北京，魏野畴去耀县与杨虎城商量军事配合问题。经过认真地准备和充分发动，1926年四五月间，杨虎城的陕军在西安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驱逐了吴新田，占领了西安城。

耿炳光回到北京不久，就被组织指定加入国民党，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夏，他又接受党组织的委派，负责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的宣传工作。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浩浩荡荡出师北伐。在中共的推动下，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政府，参加国民革命，旋即向陕甘进军。

面对这一有利革命形势，中共北方区委认为，西北的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加强西北党的组织建设，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遂向中共建议成立党的陕甘区委，统一领导陕甘地区的革命运动，并推荐耿炳光为书记。

1927年1月28日，中央常委讨论同意了北方局的建议，决定派耿炳光担任陕甘区委书记。

肩负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重托，耿炳光回到陕西。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7年3月14日—18日，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任组织部长，魏野畴任宣传部长。陕甘区委成立后，接管了西安、三原、华县等已有的党组织，加强了对陕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根据陕甘的具体情况并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共陕甘区委制定了工作计划，提出了党的工作原则、工作重点和党组织的发展方向及步骤。在以耿炳光为首的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下，陕甘境内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农民运动日益高涨，西北革命形势大步

前进。

1927年4月下旬，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陕甘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5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耿炳光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并于7月初正式成立中共陕西省委。

由于白色恐怖已经笼罩古城西安，陕西省委没有召开成立大会，省委成立后也没有开委员会。但耿炳光连续召集常委会议，讨论陕西的革命形势和省委的工作问题，派指导员分六路赴全省各地指导工作，全力发动农民运动。

1927年夏，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达成反共协议，武汉政府在“宁汉合流”下亦叛变革命，于右任投靠南京，西北最终出现反动局面。陕西当局在西安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反动分子纷纷出场，革命者被驱逐，共产党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团员离开组织。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刚刚出现良好开端的陕西大革命遭到严重摧残。7月19日，耿炳光以省委书记身份就陕西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省委对冯玉祥的政策，向中共作了书面报告，并请示中央下一步对冯的政策。同月下旬，省委又特派李子洲去武汉向中央请示汇报。

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由耿炳光主持并作政治报告。李子洲向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对陕西工作指示，并作党务报告。经过讨论，会议除通过9项决议案件外，为了加强省委工作，又选举了新的省委。耿炳光再次被推选为书记。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由于没有带回中央正式文件，所以只是由李子洲进行了口头传达。为了得到中央的具体指示，后又派刘景桂（志丹）去上海向中央请示。

在当时条件下，由于心情激愤，有许多同志急欲搞大暴动，

有些人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口头上也尽量赞成暴动，至于主观力量，客观形势怎样，如何暴动，结果好歹，都未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省委书记的耿炳光不能不冷静思考。他认为西北经济、文化落后，革命力量薄弱，主客观条件都不容许鲁莽行动。因此，他主张先准备条件，反对立即暴动。为了说服其他同志，12月末，耿炳光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的文件精神，指出“武装暴动”的正确性，同时考虑到陕西的形势，他又指出立即暴动大有困难，必须得先有一个准备阶段。团省委书记张金印接着就指责省委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诬指耿炳光是机会主义分子。他要求必须立即发动起义，还威胁如果省委不组织暴动，团省委将单独行动。其他人怕戴上机会主义帽子，虽存疑虑，但都未公开表示反对暴动。因而只有耿和张二人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耿炳光认为党团不能一致行动危害很大，而他不主张立即暴动则是党团行动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于是，他申请辞去省委书记职务，并建议由李子洲代理，领导暴动，自己仍作为省委委员参加。同时他又把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省委未经中央批准就同意了耿炳光的辞职请求。

辞去省委书记好一段时间，耿炳光没有工作任务，未被指定参加组织生活，也看不到党的文件。即便这样，他还是多次向省委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动请示工作。1928年2月，省委同意耿炳光去陕南开展工作的请求。耿炳光接到文件后，方知省委要求他通知并协助各县发动武装暴动，他反复思考后，向省委写了自己《意见书》，提出了不应该盲目暴动的看法。遗憾的是，省委不仅没有答复他，相反却置《意见书》于不闻不问。耿炳光考虑到自己思想不通，就是到陕南也无法开展工作，便要求省委另派

工作。

3月21日，设在西安莲寿坊的省委秘书处和交通处被敌破获，许多同志被捕。耿炳光知道此事后，立即去找省委，准备向省委提出应急措施。当他赶到时，省委已经搬离原址，没联系上。时值他爱人病重，安顿好爱人后，耿炳光准备去陕南，先设法与省委取得联系。遗憾的是，他中途又折回了西安。

西安此时风声日紧，妻又已病逝，耿炳光最后只得潜回澄城老家隐蔽。后通过在澄城县委工作的张国藩，耿炳光于8月间见到了来澄城视察工作的团省委宣传部长李畅膺。耿炳光问李说明了莲寿坊事件以来自己的经历，并澄清了关于自己行踪的种种流传，打消了李的疑虑。当谈到渭华暴动失败时，耿炳光讲此次暴动是得不偿失，李马上说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点也未改变，对他表示很不满意，没有安排他下一步的工作，天亮就离开了耿家。

9月底，耿炳光到了北平，见到曾是自己部下的肖铭，方知自己已被省委开除党籍。耿炳光感到很吃惊，也不理解。无奈既成事实，他只好要肖帮助他恢复党籍，肖答应了。肖第二次同耿炳光见面时说，恢复党籍要中央决定，劝耿写个报告，他托人带往中央。可是，这次谈话后，耿炳光再未见到肖铭。从此，他就同党组织彻底脱离了关系。

三

离开党组织后，耿炳光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以及陕西省委对自己的处理无法理解，又深感理论认识不够，急欲埋头读书，但最紧迫的是又被生计所困扰，他不得不四处奔走设法谋生，到

年底仍无着落。

正在耿炳光贫困潦倒之际，忽见上海民治新闻学院招生，他突然决定借此机会进入新闻界，作一个自由职业者，这样既无损自己的政治立场，又可以维持生活。于是他改名坚白，前去投考。从此，耿炳光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他先后担任过上海《新闻报》、汉口《扫荡报》、北京《京报》等报记者，目睹了新的军阀混战，也写过不少反映爱国人士英勇壮举的报道。

就在耿炳光任上海《新闻报》社记者驻北平办事处期间，发生了一桩后来他自己都悔恨不已的憾事。由于对盲动冒险主义的不满；党的理论水平不是很深和对陈独秀的崇拜；加之脱党后对党的状况和政策不了解，一度耿炳光加入托派组织。后来认识到该组织的状况，他就毫不犹豫地与该组织断绝了关系。此事，耿炳光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是最痛心的过错。

1935年，红军北上到达陕北，中共瓦窑堡会议召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群众中日益扩大。同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次年，西安发生“双十二”事变。所有这些，使耿炳光对中共的状况和路线逐渐有了了解，他决定重新走到党的旗帜下。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新闻报》社派耿炳光去山西采访战地新闻。9月到达太原，在征得八路军太原办事处的同意后，耿炳光随办事处人员去五台县采访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这次采访，耿炳光以访问记形式在《新闻报》、《扫荡报》和《西北文化日报》上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他采写的访问记很受西安读者欢迎，《西北文化日报》社因此特约他继续为该报采写山西战地通讯。11月中旬，上海沦陷后，《新闻报》社被敌伪占领。耿炳光便专任《西北文化日报》外勤记者。

11月上旬，太原沦陷，耿炳光同另一记者前去临汾采访阎锡山。11月19日，经人介绍，耿炳光采访了此时正在临汾的周恩来，写成《周恩来访问记》。随后，他再一次采访了朱德，写成《朱德访问记》。两篇《访问记》先后都发表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分别对周恩来、朱德的谈话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周、朱谈话给国统区人民，尤其是西北人民的抗战热情以极大的鼓舞。

1938年1月初，风陵渡沦陷，日军炮击潼关。耿炳光去战地采访。期间，他写过一系列通讯，报道山东、平津战场的抗战形势。他还函访过孙殿英，写成《西线风云紧急中》的长篇通讯，对国统区人民的抗战热情进行了尽情讴歌。后耿炳光又去徐州抗战前线采访，写成《津浦战局》和《山东战局》。在这些战地通讯中，耿炳光不仅报道了战争的形势，而且分析了战事的动态，还特别指出该区政府的腐败是造成战事失利的主要原因。

山西沦丧后，耿炳光去榆林采访邓宝珊、高双成等，了解邓部抗敌的准备情况。途经延安时，他特地采访了毛泽东。采访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并对耿炳光的提问作了客观正确的分析。当晚，耿炳光把毛泽东的谈话用电报发给《西北文化日报》社。该文发表时虽然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删去了很多，但毕竟在国统区较为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国统区人民。

《西北文化日报》因发表了不少耿炳光采写的关于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通讯以及中共领袖谈话的报道，逐渐就落得个“异党喉舌”的嫌疑。耿炳光采访时，也屡遭国民党政工人员歧视、冷落。1939年秋，国民党公开抢占了该报。耿炳光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继续以《扫荡报》记者的名义作掩护进行战地采访。后他还任过《工商日报》的外勤记者。

1943年，西安《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合并。受两报负责人之约，耿炳光任两报《联合版》的总编辑。在此期间，耿炳光以主要精力主持社论的写作。因该报的政治方向受民盟陕西组织的指导，而民盟陕西负责人又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有往来，所以共产党的主要方针、政策也通过该报在国统区得以宣传。

1945年日本投降后，《联合版》发表文章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重庆谈判时，该报针对“双十协定”连发9篇社论，表示拥护，产生了积极影响。

《联合版》坚持民主、和平、统一的方向，得到了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周恩来一次路过西安，曾托人转告该报编辑部：“为西北保存这个仅有的进步报纸，希望言论勿太突出，免遭毒手”。^①以耿炳光为主编的编辑部很受感激，耿炳光更是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当报社社长为了自己的财产免遭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而要求《联合版》改变态度时，耿炳光指出：“这同共产党人周恩来希望我们‘言论勿太突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②从而拒绝了社长的要求。国民党特务把《联合版》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机关算尽，使尽手段，最后逼迫《联合版》于1946年5月1日停刊。

在此期间，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加入了民盟。耿炳光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再闹花样，今后只有两条路，不回共产党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事”，^③而未加入。

《联合版》停刊后，耿炳光四处逃避国民党特务的暗算。延安曾有电报到西安，同意他到延安。耿炳光后来知道此事，顾虑到自己有脱党的历史问题，恐有不妥，便托辞谢绝了。

^① ^{②③}耿炳光《自传》

1946年秋，耿炳光到达上海。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曾主动要求与党取得联系，拟得到党对自己工作上的指示，由于共产党代表团很快从上海、南京撤退，约会几次都未能见到。

1947年8月，经农工民主党人连瑞琦介绍，耿炳光到上海私营中华酸碱厂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948年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彻底崩溃已为期不远。

4月间，趁邓宝珊和左协中到南京请训之机，耿炳光和连瑞琦商量后，决定去南京劝邓宝珊起义，以便早日解决榆林问题。到南京后，耿炳光和邓宝珊长谈了两个夜晚。耿向邓分析了局势，解释了中共的政策，消除了他的顾虑。最后邓终于表示：今后决不为“四大家族”服务了，回西北后一定见机行动。后邓宝珊果真率部起义，走向了新生。

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耿炳光所在的中华酸碱厂获得了新生；上海的解放也使耿炳光在人生的旅途中又迈上了一个台阶。从此，他一切听党的指示，无论在沪、京大都市，还是在西北的省会之一银川，党把他安排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真正实现了他那句“不回党就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诺言。

1949年9月，耿炳光请假去北平，专门向党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后得知周恩来总理要自己写个《自传》去京见他时，耿炳光即写成一份万余言的《自传》。在《自传》中，耿炳光较全

面地回顾和总结了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其中，既有奋斗的足迹，也有挫折后的徘徊，更不乏对自己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检讨。最后，他诚恳表示愿接受党的批评和处分，并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就自己的所能为人民服务，一切听党的指示。次年1月，耿炳光带上《自传》，再次去北京，准备把《自传》亲手交给周恩来总理。时值总理不在京，耿炳光留下《自传》，并希望送交总理，别无所求，仍回上海工作。

1956年10月，中央统战部调耿炳光到京工作，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

在民族出版社工作期间，耿炳光善于搞好民族团结，能根据不同性格的人，团结他们一道搞好该社的各项工作。他有较长时间的新闻工作与编辑工作经历，经验丰富，所以经他手出版的若干种有关民族问题的书，没有出现过任何政治和业务问题。由于工作出色，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还得到过奖金。同时他的组织能力受到了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杨静仁的赏识。后来，杨调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耿炳光也随调往宁夏支援工作。

1961年4月20日，耿炳光到宁夏报到，随后被派到宁夏师范学院任副院长。1963年10月，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业学院、宁夏医学院合并为宁夏大学，耿炳光任该校副教务长。

在宁夏师院和宁大工作期间，耿炳光努力工作，注重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一党的教育方针。他根据中央文件精神，针对宁大的实际，亲手制定了《宁夏大学教师进修五年规划》。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前提下，每年都尽可能地多选送中青年教师出去进修学习，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进而推动了教学、科研的健康发展。同时，耿炳光还注重抓教学管理，对学生严格要求，在这方面他同样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耿炳光特别注重个人的思想改造。在实践中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常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谈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方法。1961年5月10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会议小组会上，他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体会，其间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加强思想改造的独到见解，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耿炳光对党交给的一切工作都是尽职尽责地去完成，从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在他任宁夏师院副院长和宁大副教务长期间，他几乎听过每一位老师的课，并作了详细的听课记录。他还努力自学钻研，使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以便在抓教学中切实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如为了搞清楚一个音韵方面的问题，他认真自学了《切韵指掌图》和《洪武正韵》两本很专业的书。

耿炳光还担任了自治区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政府的重要决策和政治协商工作。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在一些问题上他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1965年5月4日，在宁夏自治区政协会议上，耿炳光就如何克服困难，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他说，要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必须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少征多购。能提出这样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耿炳光不仅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作风严谨。他对党分配的工作总是心甘情愿，绝对服从。他从不以自己的职务之名谋一点方便，出差办公事，总是能节约就节约；子女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也是教育子女一切服从组织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思想上把自己交给党。总之，耿炳光的所做所言，真正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尽管他在组织上不是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耿炳光受到迫害，身心受尽折磨和摧残。不幸于1972年5月5日因病去世。

1980年，党和国家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复查，作出了公正的

结论，为他恢复了名誉。

(陈答才 文东升)

曹力如

(1902—1949)

曹力如，陕西省志丹县人，历任中共皖北特委秘书长、陕甘省委秘书长、陕甘工委军事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延属专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城工部副部长、陕北行署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榆林军管会主任。全国解放后，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赴任途中在西安不幸逝世。

—

曹力如，学名崇本，字立如，1902年1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一户农民家庭。

父亲曹儒贤辛勤耕作，伸张正义，率领农民反对贪官污吏，被官府投入狱中。母亲曹袁氏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力如兄弟4人，他为老二，还有两个妹妹。

曹力如9岁上私塾。一年后，在家揽羊放牛有5年之久。15入新开办的保安县高等小学。曹力如学习勤奋刻苦，成为“搥红板”（表示优秀）的优等学生。

1920年7月，曹力如考入榆林中学。榆中是当时陕北进步

的一所中学。校长杜斌丞力主改革校政，设法聘请名师，增设新课，开拓陕北教育事业。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先后任教，李子洲还担任过训育主任。从北京聘来的进步教师王森然、呼延震东、朱璜秋等老师，给榆中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

曹力如在榆中不但学到新知识，而且接受新思想。他阅读《向导》、《新青年》、《共进》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曹力如帮助魏野畴老师抄写翻译书稿《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中获益不浅。力如富有正义感，撰写了反映妇女们的痛苦和不自由的小说《关于她》，在榆中创办的《塞声》杂志上发表后，受到社会好评。

在学生运动中，曹力如和学生自治会会长、高小同学刘志丹积极组织进步团体，开办平民小学，发动罢课斗争，矛头直指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被反动军阀诬蔑为“八大罪魁”之一。

曹力如毕业后，适逢国民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河南督办胡景翼在陕北招收无线电通讯学员。曹力如投笔从戎，1925年3月赴开封，4月到北京，进无线电讲习所学习。1926年1月，曹力如学习结业时，国民二军在豫西大败，他经太原回到陕北，拟南下到杨虎城部队作事。

1926年4月，曹力如随舅父袁成章来到三原。当时被吴佩孚封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围攻西安。曹力如经介绍到驻扎在三原的杨虎城的炮兵营当了中尉文书。

1926年11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后，率部南下援陕，西安城解围。

西安城解围的第四天，曹力如、吴岱峰、张汉民等来到西安，经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介绍，在陕西共产

党组织办的军事政治队工作。力如任秘书，边工作，边学习，有时还积极参加宣传和群众工作。他向魏野畴表示入党愿望。1926年年底，曹力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长。

二

1927年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派力如到杨虎城部队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路（后改为军）任副官。他奉党的指示，在杨虎城部队创建了中共党组织第一个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积极发展新党员，宣传北伐，开展党的工作。

1927年春，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河南。曹力如先后任宣传大队科长、军政治处组织科长、代理政治处处长等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于7月开始清党。白色恐怖笼罩大地。杨虎城采纳魏野畴、曹力如的建议，军部移驻太和县城，一师驻扎河南鹿邑，二师驻扎安徽旧县。杨虎城任命魏野畴为十军政治处长，曹力如为二师政治处长。面对风云突变的局面，中共十军军事委员会成立，魏野畴任军委书记，曹力如任党的特派员。在危机关头，曹力如数次接待中共中央交通马子敬等，传递中央指示，部署应变措施，保持中共皖北特委、十军军委和党中央联络畅通。他及时派人向河南、陕西省委传递中央文件和指示，通报皖北斗争情况。在抄写给陕西省委的信中写道，现在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还把皖北特委武装农民自卫队的事例，也函告陕西省委。1927年冬，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委成立，南汉宸、魏野畴分别担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长。特委开办了政治军事

学校。曹力如不仅第一个完成选派青年军官入校培训和抽调部分枪支任务，而且派军用马车，接送太和县妇联主任谢葆贞带领的宣传队，到旧县周围的集镇演出。他还派军人牵马，帮助老百姓磨面、犁地。曹力如还深入农村调查，帮助创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1928年2月，杨虎城被迫赴日本考察，孙蔚如代理军务。曹力如多次劝告孙蔚如在发生突变时，“要留有后路”。孙蔚如礼送南汉宸等人出太和，又通知魏野畴等人离开部队。

1928年2月9日夜晩，中共皖北特委扩大会议在太和县城召开，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暴动”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以魏野畴为书记的临时特委，曹力如当选为特委委员兼秘书长。

2月中旬，曹力如陪同魏野畴从太和到阜阳，路过行流集积极发展党组织，成立了中共行流集区委。到达阜阳后，特委机关设在县立高等小学，曹力如积极参与革命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20日、3月28日、4月5日、7日，特委召开一系列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听取汇报，制定计划，成立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曹力如筹备会议，起草文件，被同志们称之为“特委的中枢”。

4月9日凌晨，因出现叛徒，皖北暴动提前举行。因天下大雨，看不到信号，未能按计划攻城。起义部队分兵两路转移，曹力如担任赤卫大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李端甫、李力果任正副主席，曹力如任秘书长；昌绍先、杜聿德任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指挥。曹力如根据大会通过的《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带领农民打土豪，分财物，镇压恶霸，扩充红军一个团，赤卫队发展

到近万人。

11日凌晨，敌人分兵几路发动进攻，激战三四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处于平原，无回旋之地，弹尽粮绝，皖北暴动失败。魏野畴、昌绍先、杜聿德等壮烈牺牲。

曹力如机智脱险，在寿县巧遇李力果、王冶秋等，他们起草了皖北暴动小册子，设法转送给党中央及皖豫省委。曹力如化装来到开封，因联络地址变动，没能找到河南省委。急忙赶回西安，从朋友家中借到路费回陕北。

1928年的一天，曹力如走到甘泉县下寺湾，在小学同学张二家中巧遇领导渭年起义失败后回陕北的刘志丹。俩人商定回到家乡保安，重新点燃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第二天，他们登上回保安的路途。

三

保安县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古代为边塞屯兵之地。为躲避匪患，县政府搬到永宁山。

曹力如和刘志丹来到永宁山，找到中小学同学王子宜等，正式成立永宁山党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谢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他们积极发展党团组织，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刘志丹、曹力如到县政府拜见他们的榆中老师崔焕九县长。崔县长设宴款待他们，并任命刘志丹为县教育局督学，曹力如为保安县高小校长。

领导过清涧起义的谢子长，化名李子青，以教书先生的名义在曹力如家中养伤。全家人对谢子长照顾得非常周到。谢子长很

感激地说：“我穿志丹家里的，吃你家的。”

1929年初，刘志丹、谢子长、曹力如、王子宜在家乡秘密开会，传达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武装。

曹力如到绅士家中做工作，揭露民团团总路登高侵吞公款、贪赃枉法的罪行，争得绅士们上书县长，要求改选团总。经过当面讨论，崔县长决定投票选举团总。

选举结果，刘志丹、曹力如得票最多，崔县长立即宣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

刘志丹、曹力如上任后，抓紧时间整顿改造民团，开除了不可救药的痞子，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宣布新的团规，调换了各区民团团总。他们还废除打骂制度，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逐渐把民团改造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29年，刘志丹先后到张廷芝、谭世霖部队搞兵运工作，曹力如兼任民团团总。他积极地为兵运工作筹措经费和枪支弹药。

1930年夏，刘志丹组织的三道川武装起义失败后，曹力如把刘志丹隐藏在山寨，用武力拒绝敌骑兵追捕。当晚，用绳子把刘志丹吊下山寨，找到熟人，借到骏马，刘志丹连夜脱险，直奔绥德、米脂，找陕北特委去了。

1930年冬，刘志丹回到保安，传达陕北特委会议精神。刘志丹说：“曹力如把团总当上，把校长当上是革命的，我钻山沟也是革命的。”他经常和曹力如早出晚归，把打散的骨干力量重新聚集在永宁山。他们从民团抽出10多个带枪的骨干，从警察局调来20多匹马，把藏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军服、军旗找出，化装后由刘志丹率领，借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食名义，出其不意地夺取太白镇民

团枪支 60 多支，缴获马匹 40 多匹。几个月内，兵力扩展到几百人，为创建陕甘边苏区作了准备。刘志丹曾高度评价曹力如的组织联络能力。

1931 年 8 月，因购买枪支的信件被延安稽私队查获，曹力如、王子宜、曹继之等人被捕。敌人派兵武装押送到榆林城，关在监狱。

敌人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接连审问几次。敌人恶狠狠地问：“刘伯达是不是刘志丹？”“薛老板是谁？”曹力如机智应付，假装糊涂，坚不认账。敌人恼羞成怒，把曹力如的手套在椅子上，连续打了 45 下，手指骨头被打碎了，前后只有一层皱皮相连，腿也让“老虎凳”压伤。在严刑拷打下，曹力如坚贞不屈，决不改口。敌人无可奈何，砸上最重的脚镣，把他扔回牢房。难友们用烧酒洗，用黄纸包，用热砂敷。曹力如苏醒后，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决不屈服。

曹力如在狱中发现曹继之要自首偷生时，假装喝醉酒，上去和曹继之拼命，吓得曹继之不敢胡说。敌人利用假枪毙的手段威胁曹力如，他毫不畏惧，只得把他从刑场上拉回来，再次关押起来。陕北团特委书记马文瑞专程代表党组织到监狱看望，并指定保安籍学生曹士荣为联络员。曹力如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接受党的指示和补助费，积极开展监狱斗争。

1934 年 12 月，曹力如听到榆林国民党军队即将换防的消息，用巴豆涂肿颈部，几天不吃不喝，昏昏沉沉。监狱派医生检查，难友们同声说：“四年坐牢，已成废人，押他何用？”经保释，曹力如出狱治病。几天后，曹力如骑上亲戚的马，机智离开榆林城，回家乡养伤。

曹力如回到本村，连忙派人到南梁送信，寻找党组织。刘志

丹率部队赴陕北作战；陕首选特委先后派刘景范、龚逢春、张策看望曹力如，并和他商量如何瓦解金鼎山民团。曹力如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保安县委。

金鼎山是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山，地势险要，山环水绕。1935年8月15日，游击队包围了金鼎山寨。曹力如深入虎穴，上山寨谈判，说服民团投降，并达成协议。游击队和平解放山寨，缴获长短枪支40枝。

不久，曹力如来到陕甘边特委所在地贺家湾。当时正在进行“左”的错误肃反。曹力如只好到印刷厂工作。他坚持真理，努力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甘泉县下寺湾。曹力如书写欢迎标语，为中央红军筹备物品。11月7日，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左”的肃反错误得到纠正。12月25日，经中共陕甘省委副书记李富春批准，曹力如恢复党组织生活，先后任陕甘省委秘书、秘书长。

曹力如筹建陕甘省委工作团，领导县乡两级完成了苏维埃民主选举、扩大红军和筹备粮食工作。当国民党军队入侵苏区时，曹力如认真组织，精心指挥，掩护省委机关安全撤退。在关键时刻，曹力如派刘培植赴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并带回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开展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6年5月，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中央决定将中共陕甘省委改为中共陕甘宁省委，同时在下寺湾成立陕甘工作委员会，欧阳钦任书记，曹力如任军事部长。根据中央部署，在洛河川一带成立了陕甘南路指挥部，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曹力如任总指挥，欧阳钦任政委。

在曹力如的指挥下，南路军在贾曲河村，利用民团团总儿子结婚之际，缴获一个班的枪支。接着，转战到甘肃南才桥子，歼灭敌一个营。8月初，在转移突围中，曹力如不慎失足落崖摔伤，他躺在担架上，忍痛继续指挥作战。8月下旬，在曹力如的指挥下，南路军在和尚源，先歼灭敌炮兵营，后引诱敌人进入埋伏圈，共缴获长枪34枝、轻机枪1枝、迫击炮1门。南路军的活动有力地支援红军西征，巩固了陕甘宁苏区。

西安事变后，曹力如奉命来到志丹县，担任县委书记。在历史转折关头，他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中央对志丹县工作的指示，抓住工作重点，实行群众路线，出色地完成春耕生产、组织妇女支前、抗日救亡宣传等任务。曹力如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县委书记要一人写一篇文章”的号召，先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16篇短文，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志丹县的工作成就和英模事迹，对苏区的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四

1937年8月后，曹力如先后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陕北地区专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科长等职。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曹力如同志有文化，有政治斗争经验，与群众有联系，留下来做边区政府工作。

1938年1月3日，曹力如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指示，从实际出发，不误农时抓紧农业生产，不放过一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接待工作，使边区政府的工作适应抗战的需要。尤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外出谈判或兼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代表，住在西安期间，他协助高自立副主席圆满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及时指导分区和县市的工作，为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月7日，曹力如主持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二周年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专门请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使会场群众抗战热忱倍增。

曹力如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总是尽力为八路军办实事，关心子弟兵建设。1939年10月，曹力如率延安各界慰问团乘车到绥德慰问三五九旅和河防前线指战员。在绥德，曹力如拜会陈奇涵司令员和王震旅长。在欢迎大会上，曹力如代表陕甘边区政府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曹力如介绍了边区的现状和发展规划。他们专程到河防前线宋家川，看望守卫部队，密切军民关系。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曹力如闻风而动，立即组织机关干部参加生产运动。他和谭政、刘景范等担任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延安市分区和边区生产委员会负责人。他把延安附近的地划给中央和边区其他机关。边区政府机关抽调干部到马土川创办农场。一个半月，开荒120晌，播种71晌。他邀请老农指导，聘请农业工作者上课，和大家一起总结种庄稼的经验。马土川农场越办越好，老百姓称赞说：“你们比我们还种得好。”

曹力如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他常说：“没有水利这一着也不行。”他建议光华农场修堤坝蓄水。政府投资4000元，农民自筹2000元，修建了裴庄水渠，1940年4月，举行了裴庄水渠开闸放水仪式，当年可灌溉1500亩地。老乡们都说：“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保护它”。

曹力如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写给延安各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文章，论述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不仅为了自给，不仅为了充实边区的力量……这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仅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情绪，特别对边区以外，给了一个极好的影响和推动”。他特别要求“把生产工作与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即把党中央和总生产委员会给予我们的动员任务，广泛地深入地完全做到了”。

曹力如十分重视边区的粮食工作。他主持召开仓库主任联席会议，举办仓库干部训练班，撰写的《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粮食工作的检讨》，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他用“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比喻粮食工作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地总结边区粮食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了边区粮食工作的发展。

曹力如重视党的统战工作，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党外人士称赞。边区政府交际处是边区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对外联络机构，党的组织关系、经费开支在边区政府，而在政治上、业务上更多地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曹力如深知争取党外朋友的重要性，对交际处的经费，只要是合理的，总是毫不犹豫地签字批准。他总是热情地会见来宾，多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他还登门拜访延安的名医毕光斗，请他参政。他与伊克昭盟蒙古族上层人物和哪素滴勒盖等蒙古族进步人士友好往来。当蒙古族王爷向边区政府赠送骏马和酥油时，他代表政府回赠粮食和食盐，密切汉蒙兄弟民族的情义。他接见边区绅士参观团，参加回民文化促进会筹建工作，接待以张继为团长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和邓宝珊、高双成、高桂滋等国民党将领，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曹力如三次赴榆林作统战工作，与高双成、邓宝

珊、左协中等国民党将领建立了联系。1945年1月30日，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高双成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曹力如以边区政府等的名义送了挽联和挽幛。1945年冬，曹力如奉命到甘肃固原（现属宁夏）会晤杜斌丞先生，邀请他到陕甘宁边区参政，请杜先生作国民党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曹力如在友军、开明绅士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享有崇高威望。正如他赴榆林时说的：“昔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指出：“边区经济建设取得较显著的成绩，是因为有像曹力如同志一样勤恳工作的一批干部。”

1940年10月12日，谢觉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改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审计处处长。他贯彻党的财政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掘财源，提出加强审计工作意见，为渡过财政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1941年8月12日，曹力如任绥德分区副专员，他协助专员王震、地委书记张秀山抓好各项工作。在农村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与开明绅士李鼎铭、安文钦、霍子乐、刘杰三、霍祝三等人建立了肝胆相照的朋友关系。曹力如关心八路军和抗日军属的工作，协助驻军解决粮食和物资供应，发动绥德人民为三五九旅纺毛线2万斤，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3年1月，曹力如调任新成立的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币市长。他和卫戍司令员王震、地委书记张邦英认真贯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拥军优属运动，使延属地区的各项工作呈现新气象。

曹力如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非常尊重和关心。机关从农村收

购生蜂蜜，他亲自熬好，亲自装瓶，并在瓶口加盖印章，派专人给中央领导送去。他常去看望患病治疗的关向应等同志。当王震胃溃疡病发作时，他特地从志丹县调来养麦面，送给关向应、王震补养身体。

曹力如严以律己，对子女和家属要求严格，不让子女到机关小灶吃饭。他关心妇女和儿童工作，帮助办了不少实事，被中央妇联授予模范妇孺工作者称号。他关心警卫战士，冬季送暖火盒，家中有困难，他总是写信请当地政府帮助解决。他带头种菜，精通农活。种的西红柿、南瓜长得又大又鲜艳，摘下后全部送食堂改善生活。他加班加点纺线，在边区纺线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五

1946年，曹力如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2月16日，他代表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向毛泽东献“人民救星”牌匾。他对各分区的粮食生产、灾情匪情、锄奸保卫工作都有详细摘要笔记。西北局一些重要会议他亲自筹备，有时还亲自记录。他的工作认真、负责精神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纠集23万兵力，猖狂进攻陕甘宁边区。西北局常委习仲勋、贾拓夫、张德生、马文瑞奉命到前线工作。中央任命林伯渠、曹力如等7人组成后方委员会，坚持边区后方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为了迷惑敌人，曹力如、王维舟率领西北局、边区政府、陕甘宁联防司令部机关、群众团体和家属队于3月18日晨撤离延安，从另一条路线向北转移。这支转战队伍

代号“第五团”，又称第二梯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向延安东北方向撤退。林伯渠后来奉命过黄河到山西去了。从新疆归来，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马明方和刚从国统区回到陕北的西北民盟负责人杨明轩随第二纵队行动。

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军追击。曹力如通过电台及时和党中央、西北野战军联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和命令。曹力如组织机关游击队，派杨静仁担任队长。行军时，派李万春、张振邦率兵担负后卫任务。在子长县城宿营时，敌机轮番轰炸，曹力如当机立断，命令队伍全部转移到万佛洞。洞外炸弹四处爆炸，洞内安全无恙，当敌军进攻青阳岔时，曹力如指挥警卫班用机关枪这边扫射一阵，那边扫射一阵，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敌人，掩护队伍安全撤退。

5月14日，陕甘宁边区军民5万人在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会后，周恩来副主席专程看望第二纵队，和曹力如、王维舟商议转战和支前工作。周副主席给机关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同意有关伊克昭盟的调查意见，要求起草一个有关统战和城市工作的文件，由西北局下发贯彻。曹力如根据周副主席指示，组织起草了文件，送到前线，由西北局主要领导签发后，发往各地，推动了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和瓦解敌军的工作。

曹力如非常关心中央领导的生活和安全。当中央纵队在靖边县青阳岔宿营时，他派行政处干部方锁柱给中央送去一些干菜，还专门给周副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曹力如派机关运输队和史经理，赶几头骡子，带了一批粮食和蔬菜，送给中央纵队。

曹力如对党的机要工作非常重视。他提出“精通业务，严守机密”八个字，严格要求机要人员做到。对每份电报、每个文件

都要逐字逐句审阅。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工作出色及时表扬，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准确。行军时有马不骑，让给同志们驮行李。白天行军或开会，夜晚在煤油灯下批阅文件，起草报告，鼻孔常常被熏黑。在曹力如的领导和带动下，完成了转战任务。

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开始在王家坪办公。曹力如兼任西北局城工部副部长。他代表西北局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团结与发动一切反蒋胡力量，使之能有力地与野战军行动密切配合，以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西北局接连发出《关于收复区和新区敌伪人员处理方针的指示》、《关于敌区城市秘密工作的决定》等文件，推动了西北地区城市解放工作。

1949年5月5日，陕北行署正式成立，曹力如担任主任。他要求：行署机关“努力提高干部水平，改进思想作风，贯彻群众路线，以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他组织制定了《陕北行署办事暂行简则》，健全工作制度，努力完成生产与支前任务。

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审时度势，提出“争取和平解放榆林，以影响西北其他城市”的方针，并派人联络。国民党二十二军派出参谋长张之因于5月4日到达延安谈判。5月10日，以张经武、曹力如为正副团长，正式开始谈判。曹力如代表西北军区表示：“你们来谈我们欢迎，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谈判过程中，军长左协中来电，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榆林城。

1949年5月20日，曹力如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中共榆林前线临时工委书记。他和朱侠夫、罗明、张汉武等及二十二军谈判代表团一起坐车北上榆林，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城内敌特活动猖獗，住进二十二军招待所的第二天

清晨，发现了谩骂代表团的条子。所谓“陕北各界人士代表”还登门抗议解放榆林。曹力如驳斥说：“解放榆林是人民的大事，不能由少数人的意志而决定。”

5月24日夜晚，左协中陪同代表团到莲花池中山堂看秦腔，返回途中代表团遭到暴徒袭击，罗明被石头砸伤。曹力如说：“敌人是逃不脱人民的法网。”归来后，照样研究工作到深夜。

5月25日，张达志率警二旅，兵临榆林城下。我军在数量上、质量上处于优势。5月29日，双方谈判正式达成协议。曹力如和左协中分别在《榆林局部和谈协议》上签字。曹力如立即将《协议》全文电告贺龙、习仲勋并转中共中央西北局。

6月1日是端午节，塞北古城风和日丽。10时许，曹力如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榆林前线步兵、骑兵、炮兵部队，以三路纵队从飞机场入南门，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榆林人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6月2日，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曹力如任主任，吴岱峰、朱侠夫、张博学任副主任。军管会先后发表了“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号布告；“概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本位币”的第二号布告；宣布取消伪法院，成立榆林分区和榆林市人民法院的第三号布告。同时，还颁布第一号命令，宣布一切机关部队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八项要求。

榆林解放后，曹力如主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秩序。6月3日，他主持召开临时工委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剿匪肃特，派张汉武负责。6月4日、15日，两次出击。奇袭匪巢，逮捕土匪、特务，打击了残敌，榆林城社会治安立即好转，生产和商业恢复正常。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粮食供不应求，军管会手

中没钱。曹力如为此接连几天没能休息好。他签署的催粮电报都加上“火速”二字。当听到有些小单位有钱不往外拿时，曹力如对张汉武说：“我给你撑腰当后台，只要对革命有利，不要怕骂娘！”经过军管会和各级政府的努力，开发地方财源，开展地方贸易，终于解决了粮食问题。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城外流窜的土匪经常骚扰。6月11日，独一师和榆林军分区抽调部队，奔赴内蒙伊克昭盟，剿灭土匪武装2000多人，平息了匪患。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的整编问题。曹力如、张达志、朱侠夫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协商，先后于6月16日、24日、27日三次向西北局、西北军区发电报汇报情况，妥善安排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左协中调任陕西军区副司令员，八十六师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二师，高凌云任师长，黄罗斌任政委。独二师奉命进军宁夏，高凌云担心完不成任务。曹力如耐心做工作，鼓励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这是独二师立功的一次绝好机会。”临行前，曹力如将自己的马鞍赠送给高凌云。

榆林解放后，遇到的第五个问题是如何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6月4日，曹力如召集会议，商议恢复生产、保证供应等紧迫问题。会后，商店开门营业，学校相继复课，城乡贸易开始恢复，榆林贸易公司以平价供应粮食、布匹、食油和日用品，市民们交口称赞。当洪水冲垮榆溪河河堤，淹没农田时，曹力如冒雨察看水情，派人堵塞决口，减少损失。并立即组织生产自救，渡过灾荒。曹力如组织政府拨款，修建长50米、宽1米的榆溪河大渡槽，修通小西门排水洞，消除水灾隐患。当年，保证了650亩地灌溉用水，白菜长势喜人，满足了城市蔬菜

供应。曹力如还倡议恢复了榆林骡马交易大会，蒙古族的“边客”赶来上千匹骡、马、牛，换回他们需要的刀、剪、木器、五金、百货和土毯，促进了蒙汉民族贸易交流，促进榆林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9月中旬，曹力如奉命回到延安。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曹力如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的复电，派干部下乡宣传，调查研究，拟定了陕北建设纲领，提出恢复发展生产规划，扎实抓好生产恢复工作。

1949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曹力如为新疆省政府第一副主席。”

1949年12月初，曹力如离任，坐西北局的专车，由延安到西安，准备乘飞机到新疆。12月8日，在赴任途中，在西安灞桥附近因车祸受重伤，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48岁。

(宋新勇)

王炳南

(1908—1988)

王炳南，陕西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了杨虎城，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过周恩来的助手，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国共两党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他穿梭往返，立下了武仗文打的赫赫战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

的杰出外交家。

青少年时代

王炳南，1908年2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阳洪乡好畤村，小名温故，在国际共运中化名达尼。他的父亲王宝珊，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先驱，在彬县、乾县一带享有盛名，和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私交甚厚，是结有歌血之盟的挚友，任杨的高级参议，人们用“虎不离山”来形容他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为王炳南以后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特殊的机遇。

王炳南少年时代受父亲及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从乾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三原县池阳中学。1925年1月，经同学赵宗润、贾怀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王

炳南和在西安上学的王玺、王子辅回到乾县发动第一高级小学几百名师生，在县城开展了抵制日货和反教会、反洋人的反帝爱国宣传运动。他们上街讲演，揭露外国教会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举行示威游行，并捣毁了县城北街的基督教堂，赶跑了外国传教士。同年暑假，王炳南受上级团组织的委派，又由三原回到乾县，组织领导农民上县“交农”。他联系进步青年李定志、杨慎斋等，采用“鸡毛传帖”的办法，发动县城东南乡的好畲、阳洪、紫石、马连、田晁、双羊、神坊、南冯上官、勃洛坊等村农民2000多人，扛着镢头、锄、木杈、扫帚等农具上县围城。愤怒的农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王炳南等三人和县知事谈判。县知事被迫答应了减免苛捐杂税的要求。这次“交农”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使乾县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党组织十分重视王炳南在乾县的革命活动，1926年8月，中共西安地委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曹碧轩从西安来乾县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并创建中共党组织。他们以第一高小为立足点，成立了国民党乾县县党部筹备处，王炳南任常务委员；在县城上官巷上官克勤家召开的中共党员秘密会议上，王炳南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乾县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张含辉任特支书记，王炳南任组织委员兼团特支书记，曹碧轩任宣传委员。

中共乾县特支成立后，创办了《民声》小报，王炳南任主编，宣传革命。同时，在县城东街关帝庙开办民众夜校，培养农运骨干。

是年11月，国民军联军人陕路经乾县时，张含辉、王炳南组织群众欢迎，并以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名义，成立了“中国国

民党西安前敌宣传队”，他们高举于右任亲笔写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反对军阀混战！铲除卖国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牌，跟随部队沿路宣传，途经礼泉、店张、河南街子、三里桥、咸阳、三桥、秦渡、斗门镇、大王镇等前沿阵地，历时一月左右，对唤起民众、支援北伐战争和西安解围，起到了促进作用。西安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没有粮食和食品，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王炳南从乾县推了一车子“乾县锅盔”送到中共西安地委机关。在此期间，王炳南接任中共乾县特支书记。

1927年4月，乾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王炳南任常务委员。随之，上级调他任西安市国民党党部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进行清党，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组织上派他去淳化一带山区从事建党工作。他受淳化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李仲仁邀请，到该校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先后发展李仲仁等12名党员，建立了淳化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即第一高小党支部，王炳南任支部书记。

淳化一高党支部成立后，向青年学生及群众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学生会，开设图书馆，举办讲演会，增设社会科学课，组织学生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款、反对拉夫拉差等斗争。王炳南还组织师生利用星期日到基督教活动猖狂的地母庄、塔尔寺，向群众揭露基督教的罪行，捣毁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烧毁“马可福音”等经书，砸碎基督门牌，使嚣张一时的基督教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国民党反动当局极端仇视淳化一高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叫喊“淳化县城已经赤化了！”1928年2月，因叛徒告密，反动县长

魏江枫密谋逮捕王炳南，李仲仁闻讯后立即通知王炳南，在几位学生的掩护下，王得以脱险。不久他返回西安，省委李子洲派他去杨虎城部队十军做党的地下工作。

留学德国

1929年，杨虎城将军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临行前，杨将军对王说：“供养儿子求学是父母的责任，而你的父亲为革命两袖清风，没有力量供你出国学习，我今天替你父亲供养你学习，这样，我就是你的父亲。按理说，奉养父亲是作为儿女的责任，儿女今天尚在求学，无力供养你的父亲，今天我来替你供养你的父亲，这样我就是你父亲的儿子。”这番肺腑之言，深刻地表达了杨同王父的深厚世谊及对王炳南的激励。

王炳南先赴日本尚智大学，由于在侨民中开展革命活动暴露了身份，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他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在德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和反对法西斯小组，并接受国际共运的领导，组织“反帝大同盟”，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和“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主席等职，积极领导革命活动。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通读了《列宁全集》，提高理论水平。

王炳南在德国留学和工作的五年期间，广交朋友，其中有科学家、革命家，有产业工人、司机和学生，包括著名的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在柏林，他还结识了一位碧眼金发的女郎——柏林大学学生安娜利泽。她家名义上是王炳南的房东，实际上是他在德国的地下保护人。楼上楼下、进进出出天天见面，她对这位英俊的黑发中国小伙子一见钟

情，反法西斯战线的共同目标和志愿，促使他们很快倾心相爱了。1935年俩人在英国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丈夫姓改名为王安娜，她当时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24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因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曾先后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有一次还和当时在德国留学而被捕的朱德关在一个监狱。

193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利用其特殊身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1936年2月王炳南夫妻俩一同离开柏林。途经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呆了4天，与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讨论了国内政治形势，这对他们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在“西安事变”中

王炳南回国前夕，全国范围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中国共产党分析当时在陕、甘参加“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应该首先同他们合作，在西北地区建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建立。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创建的一支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部队。杨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在北伐战争前后就与共产党人有过交往和合作。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要求参加长城抗战，被蒋介石拒绝。1935年1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托人向杨虎城传达中共《八一宣言》内容，杨对宣言表示赞同。随后，毛泽东、彭德怀和北方局又相继派汪锋、王世英、张文彬到西安同杨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初，中共中央根据王炳南父辈同杨虎城有世谊关系，决定调他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同红军合作的工作，以推动团结抗日，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

王炳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示他：（一）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二）万一杨虎城因与中共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如杨同意中共建议，约定密电当时驻巴黎的吴玉章，暗语是：“我订的杂志请寄来”，如杨不同意，则密电为“杂志不必寄了”。

1936年3月的一天，王炳南夫妇刚回到了西安，杨虎城将军便急切地派人将王炳南夫妇清去皇城他的官邸会见。杨虎城见到王炳南夫妇非常高兴，寒暄之后，便慷慨地拿出很多钱来，让他们住旅馆，王炳南谢绝了。杨虎城对王炳南的正直和廉洁抱有明显的好感。

王炳南回到西安后，杨虎城特地接他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密谈了两天。他向杨分析国内外形势，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强调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是十七路军的惟一前途。杨虎城早就知道王炳南是共产党员，愉快地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经有接触，可是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

无话不谈了。”经过商谈，杨将军毫无保留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和一些具体建议。他们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西北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互派代表；红军在杨处建立秘密电台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人员；双方同时做救援工作等。杨虎城将军还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他改造军队。

杨将军留王炳南在身边工作，担任十七路军总部步兵训练班、军官训练大队、教导营等处的军事政治教官。王炳南受到杨虎城的器重，俩人结成忘年之交。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虽经省立医院医生诊治，病情仍未好转。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博士从美国来到西安访问。斯诺正准备以记者身份进入解放区采访红军生活。马海德也决心去苏区把自己的医学专长献给共产党人。杨将军为这两位美国客人举行茶会，王炳南夫妇应邀出席作杨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生为王炳南诊治。从此，王炳南与他们俩人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由于王炳南生病，杨将军执意让王炳南夫妇搬进他的公馆“止园”居住，王炳南常常同杨虎城促膝长谈，并给杨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杨讨论政治理论问题。

1936年夏，蒋介石命令杨虎城和东北军张学良对红军采取断然行动，新的作战行动要在年底展开。杨为躲避蒋介石“剿共”的威逼，借故暂离西安，以治病为由到上海，一则免得受蒋介石猜疑，二则到上海可以比较容易和思想一致的抗日人士建立联系。杨去上海后接二连三地给王炳南发电报，要他夫妇也一同前往上海。不久，王炳南夫妇去上海，跟杨将军一起住在虹桥疗养院。王炳南和杨虎城经常一起外出，联系调查各种势力的状

况。王炳南在上海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关系，广交朋友。

王炳南在上海还特意去拜访了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当杨以治病为由在上海住院时，杜重远也因病住在虹桥疗养院。杨和杜经常研究抗日救国问题。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张学良参加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以后，也托故到上海，曾多次利用虹桥疗养院和杜重远接触。杜主张西北军和东北军以及红军联合抗日，分别向他们阐述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他们曾多次共商联合抗日大计。杜对来访的王炳南明确建议，要王就联合各军抗日问题直接与张将军联系。有什么情况，彼此可以通个气，相互有个照应。杜重远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介绍信，嘱他回西安后，持此信去见张学良。张知道王炳南是杨的亲信，过去也常见面。这次经杜重远的书面介绍，张对王炳南便由一般认识进而有了新的了解，与王建立了经常联系。从此，王炳南便成为杨、张两位将军中间的联系。王炳南作为杨的代表和张学良的代表李金洲，还到太原去争取阎锡山的支持。

12月11日，西安事变的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张、杨认为蒋介石确实顽固不化，苦谏无效，他们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采取先礼不成而后兵的办法。在交谈中，两位将军内心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先说出来。在谈到如何应付蒋介石时，张将军想到了王炳南，突然对杨提出：“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杨趁机说：“他这个人思想激烈。”张进一步问：“他是什么意思？”杨说：“他主张扣蒋。”张立刻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至此，通过引谈王炳南的话题，两人才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具体商谈了12月12日扣蒋的部署。另外，由于王炳南和杨虎城的高级干部及杨周围进步人士都有密切关系，

他们都是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杨两位将军采取一系列重大的军政措施，除撤销“西北剿总”，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几个由张、杨亲自领导的组织机构，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王炳南在这些工作机构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设计委员会。该会是一个由高崇民为召集人的参议班子，负责研究和处理事变后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诸如政局动向、扣蒋后的放蒋等问题，都须经设计委员会研究。王炳南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二、宣传委员会。王炳南负责通过新闻界、国际友人将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及时地向国外宣传。当时，西安对蒋介石是杀、是放、是留的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新闻界关注的焦点。有几位在西安的国际友人每天都要找王炳南了解第一手新闻材料。

三、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会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在西北的各县党部；负责组织宣传活动；领导和协调社团的救亡活动；接收国民党的《西京日报》；释放政治犯等。由于民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和王炳南的积极运筹，西安当时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提出南京和西安要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肩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巨使命，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立即同张学良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会谈作准备。王炳南汇报了他所了解杨的情况：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王说：“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

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实力派（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杨着重于实行第二个办法。关于“兵谏”，杨将军在决心捉蒋的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破釜沉舟，悲风易水。

关于扣蒋的问题，王炳南说：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妥，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思想准备。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对于王炳南提供的上述重要情况，周恩来非常重视。事实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杨虎城本来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经过周恩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说服工作，他也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但是杨感到苦恼的是如果放了蒋，自己实在太危险。他想来想去，心乱如麻，因此曾向王炳南发过脾气。王炳南把情况向代表团作了汇报。周恩来很注意，认为需要向杨作更多的解释，以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周恩来向杨作了多次解释和说明。

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情报员，同时充当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之间，传达信息意见，帮助处理问题，成为三方面一致重视的人物。有一次，王炳南随同周恩来到新城看杨虎城的途中，周恩来对王炳南说：“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这是一个正确的措施；要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

起来，才能保证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时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方仲如等到民运会分别担任领导职务。王炳南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向国内外说明事变真相，积极宣传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方针及抗日救国主张。在南京政府的部队进驻西安之前，杨虎城派兵护送南汉宸和王炳南到三原，在南和王的陪同下，杨分批别接见参加西安事变的干部。王和南成为杨的左右手。杨虎城在西安会见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贝特朗等国际友人时，都由王炳南牵线安排，并由他们夫妇担任翻译。王炳南以他的智慧、魄力和才干赢得了杨虎城将有王炳南。当时可以不经机要秘书通报直接见杨的，一是王菊人，一是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叶剑英去西安时，专程看望过王炳南夫妇，并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问候说：“毛主席欢迎你们回到中国”。代表团回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亲笔写信，对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

1937年杨虎城被迫出国前，除指定王炳南作为他和中共的联系入外，还将王安排在宋子文主管的财经委员会，从事中共和国内外各方面同杨的联系工作。王同时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他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党的工作和国际宣传。

周恩来的助手 毛泽东的秘书

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周恩来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并当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王炳南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跟随周恩来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担任中共南方局国际宣传小组负责人。1938年在武汉，工作重点是在进行国际宣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了解我们，同情我们。周恩来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战报等。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到国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方合作还比较顺利，外事宣传组的工作在王炳南具体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王炳南率组直接同各国大使馆、军事总部和军事代表团联系，打通了各种关系，尤为重要是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有频繁的交往。另外和一大批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联系。王炳南夫妇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及印度医疗队去延安事宜，这

样便开始了白求恩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中国拍抗战片。开始只拍了国民党的军事会议。王便同伊文思商量，在附近的小学校布置了一个会议室，拍摄了中共代表团召开的军事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明等，叶剑英在地图前分析战局。现在资料片《人民必胜》中的珍贵历史镜头就是这样拍下来的。王安娜回忆在汉口期间，王炳南继续担任周恩来的副官职务，他为周恩来工作忙个不停，许多别人难办的事情，被认为是无计可施的工作，炳南都接受了。同年10月，武汉失守，党的所有机关都相继迁到重庆。

1939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外事组与在重庆的各国使馆、记者、军事机构等都有联系。当时，外事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争取国际援助，其重点是美国。王炳南等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灵活多样的外交活动，广泛接触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在华人物，结识了美国驻华军事总部人员、使馆人员、美国新闻界的记者等。尤其是他和史迪威将军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的友好情谊。史迪威曾在报告中提出：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应分给共产党。王炳南还争取了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材和数目很大的国际捐款，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孙夫人（宋庆龄）之手送到延安的。

1944年，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最先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和阻拦，访问了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报道了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使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一片混乱。不久，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在史迪威将军和王炳南的共同推

动下，美国提出要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蒋介石害怕美国了解真相，多次拒绝这个建议。华莱士在一次和蒋介石的谈话中提出，如果再不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话，美国将会减少军事援助，蒋介石在这种强硬压力下，才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1944年7月，美国派遣由狄克上校筹备组织的，由包瑞德担任组长的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延安等解放区作了实地考察。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周恩来极为高兴，他随即在延安给王炳南写信，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指出：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周恩来有15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王炳南向周及时汇报工作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说：“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称赞王“送来的材料及O. W. 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有一次，周恩来在一封信中加了一个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周恩来在信中两次问及配尼西林的事，后来，经过宋庆龄先生和王炳南夫妇的共同努力，他们把数量不多的医药用品，用美国顾问团的空运补给飞机送到延安，数量虽少，但作用很大。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即召集王炳南及小组成员，商量在外交方面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叮嘱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王安娜立即把事件真相报告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把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接到卡尔报告后，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从国际舆论上使蒋介石受到应

有的压力和谴责。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尽管受到国民党的百般刁难，但还是冲破障碍，打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了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使很多外国驻华人员和记者同情中国革命，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积极揭露国民党的种种弊端。从而也揭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和诬蔑。对此，蒋介石大为恼火。据说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生气地写了张便条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1945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为特使来华，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工作。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国共两党结束战争，用协商的方法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政府。马歇尔是被派来中国执行这个使命的。王炳南在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的消息后，及时报告周恩来，并陪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赶到机场，先于蒋介石亲信宋子文在机场迎接了马歇尔。马歇尔抵华后，国、共、美三方成立了周恩来（共）、张群（国）、马歇尔（美）三人小组，下设以叶剑英为中共代表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王炳南和马歇尔颇有往来，常向其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1946年，他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多的接触，并参与周恩来与马歇尔及司徒雷登的谈判。

王炳南在争取团结影响国民党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乃至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通过这些渠道，及时为周恩来提供了各种重要情报。周恩来称赞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

我的耳朵和嘴巴呢！”事实上，王炳南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也很出色。1937年在上海期间，他以宋子文主持的水利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法政学院教授的公开身份，经常保持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转达中共的主张，了解国民党的重要动态，并精心安排周恩来与他们的会见。1938年在武汉期间，他受党的委托，以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委员的公开身份，与著名的爱国人士沈钧儒等，到前线慰问国民党作战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汤伯恩、张发奎等，并争取与其建立关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7年中，王炳南以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委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一部分中共党员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组建了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王炳南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负责联系并参与领导该同盟的工作。他经常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政策向“小民革”成员“吹风”，也通过他们了解国民党的重要情况。大家都特别重视、特别有兴趣听他的讲话，力求从中领会中共的意见。而且他很善于简单、明了、透彻地向大家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小民革”的活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才由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一次有关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宣告“完成历史任务”。他和一些爱国将领、民主党派人士关系也很要好。冯玉祥将军曾赠给王炳南一幅画，他画的是个大茄子，题曰：“炳南先生同志：大茄子，紫光光，大家都来吃，我们必定打过鸭绿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王炳南又和楚图南、张友渔等一起加入民盟。他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关系，周旋于各种场合，掌握政策，讲究方法，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日夜操劳。由于王炳南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经常与国

民党上层要员接触，出入于外国使馆和美军总部，曾引起内部和外部一些人的特别注意。1943年在重庆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曾决定以“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他。周恩来得悉后，立即委托一位外国友人将王炳南带来红岩村，亲手交给他一张“委任王炳南为周恩来副主席上校秘书”的证件，才使他得以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美国策划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建国，避免内战，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谈判期间，王炳南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负责联络安排并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工作。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王炳南做了大量的具体事务工作。他随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同工人、学生见面，招待各国友好人士、驻华使节、援华团体代表，阐明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当时中共党内一些同志和社会友好人士都担心蒋介石下毒手扣留毛泽东。毛泽东征求王炳南的看法。王炳南说老蒋是背信弃义的老手，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但是他不能不考虑我们有广大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拥护支持这样强大的后盾，也不能不考虑他的美国主子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和压力。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乐天派啊！乐天派好！”后来，王炳南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重庆谈判，还真有点鸿门宴的味道，叫人后怕，你想：我们和主席每天都生活在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之中，我作为主席的贴身秘书，如果稍有闪失，那将会变成千古罪人。”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安然返回延安。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迁都南京，国共两党和谈的中心便由重庆移到南京。王炳南跟随周恩来到南京，住在梅园新村，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兼发言人（书记是周恩来），同国民党蒋介石

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由于国民党 1946 年挑起全面内战，国共和谈遂宣告破裂，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返回延安。王炳南仍继续留在南京任中共联络代表并负责处理善后事宜，一直坚持到 1947 年 3 月撤回延安。随后，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主任是周恩来），继续从事外事活动和统战工作。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即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4 月下旬，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开端。我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

王炳南受周总理委托筹备代表团。在提出成员名单时，他向总理建议，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他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夜以继日地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所需的着装等。为了应付记者招待会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专门召开模拟的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

会前，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总理和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应注意事项。他们在日

内瓦近郊租了一幢备有漂亮花园的大别墅，大家风趣地称它为“华山大别墅”。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王炳南还特地物色了两位有特长的名厨师随团，以便在会议期间请客交朋友。后来，周总理经常宴请各国代表团，苏联的莫洛托夫、英国的艾登等都是座中常客。艾登邀请周总理在当时印的菜单上签名，留作珍贵的纪念。80年代初，艾登的遗孀访华时，还特地带来了那份菜单。周总理还宴请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滑稽电影明星卓别林夫妇，卓别林非常称赞中国菜。总理称赞王炳南为代表团挑选的两位大师傅说：“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举行。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因美国代表团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第二阶段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原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却因莫边府大捷、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加之美国在会议上很孤立，法国不愿完全听从美国，使得印支问题反而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会议期间，苏、中、越、朝始终紧密合作，在印支问题上苏、中、越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了坚决斗争和耐心谈判。王炳南按周总理的指示，经常去找范文同，互相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当时怕被窃听，他们在盥洗室里打开水龙头谈话。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

日内瓦会议上是斗争的场合，会下则是互相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在某些问题上取得默契的渠道。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中，有些人是王炳南在三四十年代就认识的。英国和法国代表团中有些人是40年代在重庆大使馆工作过的。比如法国代表团副团长肖维尔，亚洲司长亚克鲁等，都认识王炳南。英国代表

团也有些人在中国呆过。还有加拿大代表团的朗宁等，都是他过去的老朋友。凡是认识的，他都一一介绍给总理。如法国外长皮杜尔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王炳南介绍与总理认识的。

在美国代表团中，王炳南认识一个在40年代中期曾在北平调处执行部呆过的罗伯逊。日内瓦会议前，鉴于美国统治集团支持蒋介石集团，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侵略朝鲜，中美关系极度恶化。

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找到周恩来总理传递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他们邀请吃饭时，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还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从实际表现看，5月初杜勒斯回国后，史密斯成了美国代表团团长，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全面解决印度支那六点方案后，史密斯作的即席发言中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这表明了美国领导集团中对中国态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会议快结束的一天，很多人聚在酒吧间喝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举动。史密斯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王炳南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立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他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在酒吧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

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却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史密斯又一次赞扬了中国古老的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又在休息时间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

当时国际上流行很广的一种误传，说什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拒绝了。王炳南郑重地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日内瓦会议打开了中美会谈的大门。当时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而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美国受到了公众强烈舆论的压力。它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却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宦乡、柯柏年等参加；美方代表是约翰逊（当时是美国驻捷克大使，他曾参加过朝鲜停战的板门店谈判）。

以王炳南为中方代表的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从6月

5日到21日举行了4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地点由美方选择在国联大厦一间只有几套沙发而没有桌子的会客室，给人感觉是会客而不是会谈。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到达时，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主动迎上来握手，王炳南等也随便寒暄几句。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气氛比较轻松，没有涉及实质问题。

第二次会谈由中方选择在国联大厦摆有一张大长方桌的房间，双方各坐一边，气氛显得严肃些。约翰逊提交了他认为是被中方拘留的美国侨民和军人名单，并要求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王炳南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还说：“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极少数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提出。”

第三次会谈，王炳南首先答复了上次会谈中美方提出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家属也可以给他们邮寄小包裹。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果罪犯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至于约翰逊先生上次会谈中交来的名单，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当与美国约期会谈。

当他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不准他们回国的问

题时，严正指出：中国现有五千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当他们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政府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开，甚至威胁说，谁要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 5000 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五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在美国的一大批爱国的、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去美留学的钱学森、赵忠尧等，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积极筹划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他们不但受到美国的扣留，还受到非法的监禁、逮捕和虐待。新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回国，新中国建设更需要他们。所以王炳南严正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留居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却把扣留中国学者说成是按美国法律行事。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等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王炳南对此多次提出指责和批驳，并坚决强调，这条无理的规定应予废除。

第四次会谈中，王炳南首先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的态度很顽固，它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得到它想得到的，约翰逊拒绝了上述建议。王炳南在和美国初次谈判中，态度始终是积极主动的，提出的要求是通情达理的，既灵活又坚持原则，从而使这次会谈成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当然中国也愿意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上，王炳南协助周恩来总理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争取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在日内瓦谈判的圆满成功。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者

王炳南一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1955年4月，他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同年7月又接外交部来电通知他兼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谈中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开始到1964年的九年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中断，长达15年，1972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告结束。会谈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共进行了136次。谈判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这个时期正是美国当局极端敌视中国，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和互相对立的年代。王炳南作为首任代表的九年会谈中，美方首席代表先后换了三任：先是尤·阿·约翰逊，而后是雅各布·比姆，再后是约·卡伯特。王炳南则是坚持一贯，直到1964年奉调回国为止。

王炳南尽管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最初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再复杂也不过是开几次会罢了，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延续了那么多年！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重

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王炳南的个人历史，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人生活都竞相介绍，他一时成了报刊上被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王炳南于1955年7月底经瑞士首都伯尔尼，由中国驻瑞大使冯铨陪同抵日内瓦，一下火车被蜂拥上来抢新闻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说中美应该用谈判的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双方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实质性问题。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实际上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同意了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第一次中美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举行。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美国首席代表是约翰逊，真是巧合，他和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两个对手，又再次交手了。

会谈正式开始，王炳南首先宣读了我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对方表示了谢意。双方经过商谈，达成了会谈的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

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原来6月间，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一封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见信后立即给了王炳南，他便就钱学森的回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却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进行驳斥。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的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技术的中国是美国的法律了。

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固执地坚守着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所谓原则，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怕造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就始终不同意，生怕这就等于承认中国对居住在美国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等于承认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经过好几个回合的斗争，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见，但不能用“授权”两个字，只能用“邀请”，以减少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所以会谈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却无积极成果。会谈进行了11轮后，到了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3次减少到1次。会谈形成程式化，双方轮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语言攻击对方。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始终彬彬有

礼，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于是出现了有意思的情况，他们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各自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常有些有趣的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首先，约翰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请王炳南他们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还邀请过他们来看中国京剧团在日内瓦的演出。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另外，王炳南从华沙去日内瓦，中途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克换飞机时，也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还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住宿。王炳南和约翰逊好像成了一对旅途伙伴。

经过40天之后，为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我国对在押的美国人进一步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中美双方终于

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项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惟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70年代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联合公报也效仿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前惟一的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对第一阶段的会谈，50年代末，周总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后来中国很快研制出原子弹，打破了世界少数国家垄断核武器的局面，美国为此大为恼火。

1955年9月20日，会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王炳南坚持讨论第二项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而美国采取了敷衍拖延的态度，以致使会谈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在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确是最困难、最复杂、最不易调和、斗争最尖锐的问题。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决问题。王炳南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首先必须迫使美国在关键问题上让步，牵一发而动全局。当时美国侵占台湾，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并且穷凶极恶地支持蒋

帮进犯大陆，气焰嚣张，对新中国之仇恨，已深深地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我们的谈判必须针锋相对，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美国政府的威风。旧中国曾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欺压，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绝不能在他们面前再有任何软弱，如果一味追求谈判的突破，那就会丧失原则，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就会犯毛泽东所说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杜勒斯轻视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指使约翰逊企图绕开实质性问题提出什么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美国士兵的命运问题，以拖延时间。王炳南对此予以拒绝，他说关于在朝鲜的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些。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是美国要求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这个问题虽然具有实质性意义，却是具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性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严正地向约翰逊陈述了两方面重要观点：一是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这种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撤出它在台湾海峡的一切武装力量；二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容混淆。为此，双方争执不下。王炳南多次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以使中美会谈能够成为清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他虽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方无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

会谈进行一年了，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或是王炳南提出美方侵犯我领空、领海的抗议，交锋几句，确定下次会谈日期后即散会。王炳南对会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周恩来却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

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 15 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轰动了。当时美国政府对华实行严格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报道，而且不准任何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然而美国人民渴望了解中国，曾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冲破封锁访问了中国；部分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宁愿回去受罚而集体来到中国。中国的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新闻界接到邀请的记者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的申请。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杜勒斯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尽管还拖了一年时间，直到 1957 年 8 月不得不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 24 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恩来的妙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王炳南在会谈中步步采取主动，始终保持高姿态。1956 年 9 月，他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公然说什么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与杜勒斯生硬拒绝相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与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高度赞赏。9 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 月中旬提出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 月初，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一一被拒绝。面对着王炳南在谈判中的主动架势，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采取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 12 月 12 日第 73 次的会谈中，约翰逊终于表演出了杜勒斯的一个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将撤出会谈，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

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对这种把大使换成参赞，企图使会谈降级的无理作法，是坚决不能同意的。表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判，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就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一方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扩大对中国的威胁，积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一时间，蒋帮“反攻大陆”的叫嚣和破坏活动，甚嚣尘上。同时美国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公然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而使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起来。中国政府为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他们为了应付局面便拼命在这里集结兵力。党中央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1958年8月底的一天，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当天飞回北京。章汉夫告诉他，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你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中央政治局开会，让王炳南在会上汇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是王炳南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面前汇报中美会谈情况。当他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毛泽东笑着插话问他：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王炳南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会上一些政治委员还对中美会谈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答。最后会议商定，指定专人起草一个

中美会谈的新方案。散会时，毛主席握着王炳南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参加会的乔冠华等同志也对他说，你讲得真好。后来陈毅协助周恩来处理中美会谈的工作时，指示王炳南，前一阶段会谈中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陈毅这个指示，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正确的，它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无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在谈判或是使用武力，中国政府的原则是毫不动摇的。有一次陈毅见到王炳南，风趣地说：“好嘛，你这是武戏文唱嘛！”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中美会谈。这种热情使王炳南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很想了解一些内幕和事实。王炳南受周总理指示问政协作了一次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他讲到我们和美国针锋相对的斗争，讲到党中央的决心，十分鼓舞人心。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先生对报告非常满意，他们从报上看到中美会谈的消息非常简单，听报告后知道会谈内容十分丰富，斗争很激烈。他们都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不怕美国佬，中美会谈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从而使王炳南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党中央的决心和人民的感情。

9月6日，周总理发表公开声明，一是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澎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负责全部后果；二是倡议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这个建议。

王炳南在返回华沙前，毛泽东主席特意接见了，他指出会谈中应注意的事项。毛主席告诉他，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

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还谆谆告诫王炳南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对美国人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毛主席还对在座同志说，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周总理也和王炳南详谈了几次，临行前夕又亲笔写信，对他的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指示。他指出：“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会见记者的谈话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可研究的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到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的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美国驻华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重新开始。会谈在马拉松式地进行着，依然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到1960年9月6日，已经是第100次会谈，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让世人了解会谈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认为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在5年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始终是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而美方却毫无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入第二项议程以来，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为谋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可是美国却持截然相反态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把台湾变成美国

的殖民地，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的阴谋已为世人皆知。并着重强调缓和消除台湾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他历述事实，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炳南还就中美互换记者提出一个新方案，照例没有得到通过。为了配合王炳南的发言，《人民日报》特地发了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中国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当时中美会谈和修建鹰厦铁路，是最令人关注的两大问题。有一次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陪同王震到厦门前沿阵地视察，眺望蒋军盘踞的金门岛，他指着游弋在海面上的美国军舰说，“这就是福建的形势，无论于国防、于建设福建都需要有铁路。”又说：“周总理最近说，当前问题要看两王，一个是王炳南大使在华沙跟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将军率领 10 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

1960 年底肯尼迪上台后，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当时中苏严重分歧逐渐公开化，国内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国内正经历 3 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在全球采取逼人的攻势，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会谈中，美方照旧纠缠遣返平民和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若问题外，肯尼迪还搞了一些新花招，如向我方提出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却阻挠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提出以优惠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穷人送救济包，妄图诱使我方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所以理所当然地被王炳南严正拒绝。他郑重指出：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

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尽管会谈上一筹莫展，但王炳南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邀请比姆到中国大使馆喝茶闲聊，而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1961年9月比姆又奉调回国出任新的职务了。

1962年3月，美国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这是与王炳南会谈的第三任大使。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又掀起“反攻大陆”的恶浪，局势空前紧张。王炳南于5月底回国休假期间，周总理要他立即返回华沙，通过会谈了解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王炳南意识到这个任务至关重要，立即赶回华沙。他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便采用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他邀请卡伯特到他的官邸来喝茶，随便聊聊。卡伯特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依然不拘礼节，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表示中国政府为此担心，然后着重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这时卡伯特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听得很认真。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以及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增加“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不管蒋介石军事冒险结果如何，美国都企图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最后

他以警告的口吻说，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他请卡伯特立即把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表示很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卡伯特这个明确表态，达到了王炳南的目的。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他一刻也不迟缓地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及时摸到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非常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王炳南于1964年奉调回国。在长达9年的会谈中，王炳南坚定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维护着我国的利益和尊严，与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阴谋。台湾当局曾查阅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全部资料后，也不得不对中方代表在如此漫长的谈判中始终坚持原则而表示惊叹。同时他又始终积极主动，通情达理，运用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外交斗争艺术，和美国僵硬的固执的外交政策形成鲜明对照。整个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大的实质性成果，但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我国要回了一个钱学森。谈判中还同当时和我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人士作了广泛深入的接触，从而促成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的外交关系。毛泽东赞扬说：“炳南在谈判中打破了他们的篱笆墙，拉过来一个法国，有功呀！”中美大使级会谈，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

派大使进行长期会谈，还能达成某种协议，这是国际关系上一种创举，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当时每次美国飞机、军舰入侵中国领空、领海都由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抗议，表明中国立场，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联系更多。王炳南以坚定的立场在与美国直接谈判与斗争中发挥了卓越的外交才干而闻名中外。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王炳南首次访问美国，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在美国会见了20多年前中美大使会谈中的3位美方代表，他们握手、微笑着审视对方的变化，共同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他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能有今天，同过去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及其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十年“文革”中

1964年10月，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这一次工作和职务的变迁，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上时，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春，他在日记本里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抒写他当时的心境：

疏枝立寒窗，
笑在飞花前，
怎奈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因不胜残，
何须自寻烦，
花谢必有花开时，
需其待来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对他妄加罪名，诬陷他“里通外国”，还说他是大军阀杨虎城的亲信，和事佬朱德的亲信，甚至是王明的亲信等等。1967年，他曾和康生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第二天便被停职反省，造反派把他关进了北京六国饭店的地下室，他失去了自由。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大的悲剧，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他的妻子张裕云，由于受到丈夫的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被造反派剃成了阴阳头，上街游斗，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要她交待丈夫王炳南“里通外国的罪行”，她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情况下，在一个夜晚自缢身亡，年仅38岁，身后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周总理得知不幸消息后，立即通知有关方面，一定要让王炳南去最后见到妻子一面。因此，王炳南才有了看望妻子遗体的权利。他被押着去停尸房看爱妻时，情景十分凄惨，只见亡妻遍体鳞伤，阴阳头，双目圆睁，骨瘦如柴，牙齿紧咬，好像怀着满腔仇恨，对她的死有诉说不完的冤情。他真想抱尸痛哭，但他不能，因为妻子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要划清界限！”他强行忍着巨大悲痛，默默地又被押回到囚禁的地下室，待造反派走后才放声大哭起来。他在阴冷潮湿、空气腥臭的地下室被关一年多，1969年，在林彪所谓“一号命令”下达后，他又被押送到江西上高县“五七”干校实行监督劳动改造。他劳动、吃饭、住宿都不能与其他人在一起，一直被两名造反派专门看管。不允许他叫原来的名字，给他改名叫“王浮”。他从精神到肉体受

到双重的折磨和摧残，使他患上了“心房纤颤”病，直到1972年底，他才被允许回京看病。几个孩子因受父亲株连，被批斗的批斗，关押的关押，尤其是大儿子王黎明，因他母亲是德国人，说他在娘肚子里就里通外国，被关进牛棚。王炳南回到北京后，他一无户口，二无住处，三无工作，成了“游民”。一家七八口人挤在建国门附近的一个小单元房内，只好按性别安排住宿，老头子一间，四个儿子住一间，媳妇和两个小孙子住一间。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王炳南才被安排到全国对外友好协会当会长。然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因他在一次“批判会”上为邓小平讲了几句好话，再一次受到冲击。而他出访日本时间在即，情况很不妙。乔冠华劝他赶紧写个检讨搪塞一下。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嘛！我认为我没有说错，说的都是老实话，所以也没有必要写检讨。如果说我错了，那就算我自己跳出来的吧！”叶剑英知道此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专门为他题赠《远望》诗一首：

“忧患元元忆逝翁，
红旗飘渺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
回雁兼程溯归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
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
旋转还凭革命功。

并特意题请：“炳南同志斧正。”正是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帅的赠诗，使他迅速“解围”，从而躲过了一场灾祸，按期出访日本。

廉洁奉公 鞠躬尽瘁

从1975年到1986年，大约12年，王炳南担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从事对外民间友好交往活动。他亲自接待了上百个官方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又组织许多团体出国访问。他先后率团出访了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9年，他率团出访印度，使隔绝了16年的中印关系出现缓和。通过友好渠道，沟通关系，增加接触，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为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又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为表彰他对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突出贡献，卢森堡大公爵、波兰政府、奥地利维也纳市长都曾授予他勋章。

王炳南第一位妻子王安娜，1936年随他从德国来华后在中国生活了20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她热爱中国，称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由于她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她的特殊身份，尤其是她非凡的才干，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她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邓颖超等，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杨虎城、沈钧儒、鲁迅、茅盾以及在华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等都有密切交往。她和王炳南是在抗战胜利后分手的，分手的原因，20年后她自己这样写道：

“或许，重新恢复夫妇关系确实是没有希望了，那么还是趁着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更大的纠纷，像好朋友似的分手的好，不

管怎样，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须依归他的‘信念’，也就是说，必须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指责我，说我太‘无政府主义’，说我不管是对党有利还是不利，都把坚持己见看成是当然的权利！”“几次长谈之后，我和炳南决定，与重庆的告别之时，也就是我们分离之日。”王安娜随宋庆龄去到上海。1955年她返回德国定居，1987年逝世。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炳南的第二位妻子张裕云被迫害致死后，他强忍悲痛，除了繁忙的工作外，还要照料3个未成年的孩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和相识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潘自力（八届中央委员，前中国驻苏联大使，1972年被迫害致死）的夫人姚淑贤结为伉俪。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公务繁忙，家中无人照料，再加上年纪大了，找一个说话的老伴儿，组成‘合作社’吧！”

王炳南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对外友协工作期间，带头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不以权谋私，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关心群众疾苦，刊登了干部和群众的称赞。他的模范事迹多次刊登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

王炳南力主反腐倡廉，反对干部特殊化，十分重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9年，在中央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下发前，他于同年8月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就他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较深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现在有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大搞特殊化，在人民中威信扫地，他们与群众之间已有一条鸿沟。这样下去，后果极其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

他在信中高度赞扬毛主席、周总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给

全党树立了榜样。他还介绍国外一些领导人在生活上有所节制的事例：如奥地利奥中友协主席、前副总理住在居民区的四楼上；国防部长住二楼只有两间半房子。英国前首相有时不坐汽车，与群众一起排队上公共汽车；许多部长坐地铁上班。荷兰女王有时骑自行车上街买东西，有时也坐电车，并无损女王威信，反受群众爱戴，被称颂为女王生活在人民中间。他说周总理曾经讲过，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物都不如。

1980年，他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会议发言中，尖锐批评某些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如今的高级干部是工资制+供给制+补助制，食有特殊供应，房有深宅大院，行是官升一级车换一辆。可谓是房子越住越大，围墙越修越高，房租越付越少，侍从越来越多，架子越来越大，离群众越来越远。这样怎能联系群众、了解下情呢！”

王炳南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了40年，他处处以总理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一致，从我做起。公家给他配备了小汽车，他却规定：除非下大雨，或有外事活动，平日上下班一般不用接送。他70多岁了，每日上下班往返10华里的路程都是步行。他从来不准家属小孩用公家车，就连他因私事看望朋友用车总是让司机给他开“私用车辆扣款单”，按里程付款。他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带头做到一切礼品自觉交公。他每次出国，既不要出国装备费，也不借出国廉价购置及海关免检物品。他有一双在出国或接见外宾时才穿的皮鞋，一穿就是十多年。他去世后，衣厨里一共只有3套比较像样的衣服和4条领带，其他都是破旧的衬衣、鞋袜等，平时脚上穿的黑布鞋打了3个补丁。王炳南身为党组书记，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由于他密切联系群众，甘当人民勤务员的公仆精神，获得了群众对他的

崇敬和爱戴，大家评选他为全机关的优秀干部。

王炳南自参加革命离家到去世，只回过三次家。1936年从德国回国回家一次；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受周总理派遣回陕西体察民情，看到家乡人民受饿，他当即找省委书记张德生，提出调动库存粮救济饥民的建议，张说地方粮库早已空了，国库有粮但地方无权动用。王炳南说关于中央的事由他回京向总理汇报，当务之急救人要紧。据说后来陕西通过中央动用了国库。1984年76岁高龄的王炳南第三次回家。对外友协要派秘书伴随，他拒绝了，他约好原在海淀区工作的弟弟一同往返。他们老哥俩乘火车硬座到达西安，当即又转公共汽车回乾县老家。他说这样便于接触社会，听到群众声音，体察群众生活。他不顾长途劳顿，繁忙地看望和接待全村的乡亲，他满口家乡土话“秦腔”，大家无不称赞。在乾县他去参观了他少年时常去玩耍的乾陵，在西安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等名胜古迹，晚上去戏院看秦腔。特别是会见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回忆1936年从德国回到西安做争取杨虎城将军的工作，许许多多难忘的战斗岁月，使他更加眷恋故乡。他一生艰苦朴素，生活清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过一部介绍他廉洁奉公的专题片《历史艳阳天》，曾在全国播映。

1988年12月22日，在风雪交加的凌晨，王炳南静静地与世长辞了。他在离世前的1985年12月就写下了必要的话：

西方人作长途旅行时，总要留几句话，当作遗言，这是很科学的，我很赞成。

我是一个长期心脏病患者，一直同疾病坚持斗争。为发展人民友好工作，即将出访伊朗、索马里、伊拉克，临行之际，书此留言：

我从1925年参加党团工作时，没有想到今生能看

到革命的胜利，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这一切伟大的成果我都看到了。尤其难得的是我曾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的身边工作过，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人总是要死的，万一出现不幸，恳切要求组织：
一、一切后事从简，不搞追悼会，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在祖国的原野上。二、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

后来病重住院时，他又提出把他节衣缩食余下的2万多元积蓄资助本乡小学校，以培育人才。按照他的遗言，用这笔钱及社会赞助，在他的故乡乾县好畤村建立了一所小学。习仲勋为其题名“炳公学校”。为了纪念他，家人给塑了一尊石像，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埋在石像下，乾县成立了“王炳南教育基金会”。

符浩写了这样一首悼念王炳南的诗：

岁暮传悲讯，痛哭失炳公。
汗青新史笔，泪眼旧音容。
好畤英才子，八旬倜傥翁。
漂洋寻道义，入穴斗黑熊。
纵横连远域，持节几折冲。
广交天下士，情义自谦躬。
丹心鉴日月，豪气贯长虹。
平生无憾事，但有金石功。

(习琳)

杨明轩

(1891—1967)

杨明轩，名荃骏，字明轩。陕西户县人。早年赴日留学。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西安等地任教。1936年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交际部长。1937年赴欧洲各地考察教育。回国后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1942年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区机构。1946年任民盟西北总部组织部长。同年进入陕甘宁边区。1948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建国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主席等职。1967年8月在北京病逝。

青少年时代

杨明轩，1891年6月13日生于陕西省户县黄堆堡。

杨明轩祖上历代务农。祖父恒仁，靠租种土地、为人佣工、打柴卖草，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至父亲宏寿，“自耘薄田，工于作务，含辛茹苦，仅得温饱”；又因常受土豪劣绅的无端欺凌和勒索，遂立志改换门楣，省吃俭用，送子入学习文。兄荃

骥，长明轩12岁，入学后勤学苦读，为食官粟的“廩生”，崇维新，尚共和，是明轩的第一启蒙老师，也是明轩外出求学和献身于国事的有力支持者。

杨明轩于1897年入私塾，1907年入户县高等小学堂。两年后，杨明轩在其兄荃骥的支持下，考入西安府中学堂。

杨明轩在西安府中学堂上学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杨明轩到西安后，如饥似渴地阅读报刊。对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对同盟会陕西会员1908年重阳节秘祭黄帝陵祭文中的“誓共驱逐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国体”的宗旨，深为赞赏和钦佩。对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甚感新鲜和同情。联系慈禧太后回銮后继续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党的反动行径，以及民不聊生卖儿鬻女的惨状，杨明轩的“思想逐渐倾向于救国必须推翻满清皇朝，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枪声在武昌打响。22日，陕西的革命党人在西安发动武装起义，23日光复西安全城。清政府便从河南、甘肃等调集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陕西起义军——秦陇复汉军。光复后的陕东大门潼关要塞三次失守，西路的清军一度侵犯咸阳。一直打到1912年春清帝退位方宣告结束。在三个多月的战乱中，西安街头一日数惊，学校难以正常上课，师生大多避乱回乡，但已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杨明轩，当陕西刚刚举义时就剪去辫子，臂缠白布，以示响应，并且踊跃报名参加持枪的学生队，站岗放哨，巡逻街头，风餐露宿，坚持不懈，协助起义军维持革命秩序。持枪的学生队实际上是起义军的后备队，为支援东西两路战

役和保卫西安的安全做出贡献。几个月的军旅生活使杨明轩经受了锻炼，也使他认识到革命是艰难的，复杂的。

陕西东西两路的战事结束后，时局出现缓和，学校开始复课。1912年上半年，杨明轩入陕西法政学堂，下半年转秦省第一中学。辛亥革命失败后，杨明轩感到彷徨不解。中国何以富国强民？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进步的知识阶层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杨明轩也不例外。为求救国之道，他报考出国留学，经考试被录取为“官费生”，于1913年下半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但他在日本目击的，无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歧视和侵华野心，遂与同学数人于1914年夏愤然回国，在国内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的群众运动。

经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1915年秋，杨明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

杨明轩在北京高等师范上学的四年期间，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发生的时期。在新的思潮影响下，他积极地参加了新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北京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但它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明轩深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和湖南匡互生、贵州刘熏宇、江苏周为群等同学组织了少年中国会，试图通过教育工作培养青年，改革社会。1918年4月25日，他又和匡、刘、周等同学，成立了同言社，通过讲演会、辩论会等形式，宣传和交流反帝爱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后来又以少年中国会为核心，成立了工学会，

出版《工学》期刊，主张改造社会必须打破劳心与劳力的界限，提倡学生会做工，并帮助劳动者求学。工学会设立了平民学校，吸收校内工友和学校附近的居民参加学习。

1918年，投靠北洋军阀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收买旅京陕籍学生中的少数人，分化旅京陕籍学生的反陈斗争。杨明轩对此深感不安和痛心，挥笔撰写《敬告旅京陕西学生》，提出“学生时代修养高尚之品格为第一要事”，“学生时代宜培养纯正之良心”，“学生时代宜锻炼坚强不挠之意志”，“学生时代宜顾惜名誉”。满怀激情敬言同辈共勉，并旗帜鲜明地抨击陈树藩的卑劣行径。在省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919年的5、6月间，北京爆发了从5月4日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杨明轩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成为斗争中的英勇闯将。5月3日晚，北高师的工学会开会，一致主张发动全校同学参加次日北京学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杨明轩写了遗书，表示愿以鲜血生命“外争国权，内除国贼”。5月4日晨，杨明轩代表北高师参加了北京各校代表会议，决定是日下午上街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中，他不断领队高呼“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口号；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宅院，他和其他同学痛打了尚未逃脱的章宗祥，并同竭力掩护章宗祥的日本人扭打在一起。这一天杨明轩等32人被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方面的营救下，他们于5月7日获释。杨明轩出狱的当晚即出席了北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的会议，会上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6月3日，杨明轩带领讲演团在西城区的街头向群众宣传。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亡国迫近，灭种眉睫，国难当前，我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贪官污吏当道，卖国贼丧权求荣。我们的国，将不成为国；我们的家，将不成为家。同胞们，起

来！用我们的行动收复青岛。”讲者听者的情绪溶为一体，齐声高呼“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这一天，他第二次被捕，至6月7日才同其他被捕者一起出狱。为了迫使北京政府同意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于6月27日在新华门前集会，要求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接见学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已两次坐过牢的杨明轩，再次参加了这次彻夜露宿街头的请愿集会。当他得知学生代表之一屈武血溅总统府，向徐世昌慷慨陈词的壮举后振臂高呼：国之将亡，种之将灭，代表已献躯身，难道我们还能静坐长等？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宁愿血溅新华门。正是在这样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杨明轩参加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经过这次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锻炼，他的“思想更加接近于激进的民主主义”。

从事教育工作

1919年7月，杨明轩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陕从事教育工作。1920年秋以前在西安，1920年冬到三原，1921年秋再回到西安，至1923年夏，任教共四年。

杨明轩在北京求学时就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发表《养成适应之人才》、《人格感化为教育第一要义》、《教育者宜认教育为终身事业》、《爱情在教育上之价值》。阐发“国民之愚昧如故，国步之艰难日甚一日，谓非教育腐败致之欤”的思想，认为救国富民之道首在兴办教育。同时，他躬身自行，抱着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宏图大愿，回陕从事教育工作。他回陕后又撰写了《教育与社会》、《催进户县教育的意

见》等文章，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是造成完美社会的利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先河”，“教育不但在已往的社会演进上占优势，我们也可以断定在将来社会中，教育仍然是有力的原动力”，“决不能使教育成为私人培植势力的工具，而必须使教育出来的人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骨干力量”。大声疾呼各方面重视教育事业，尤其重视师范教育事业。

杨明轩一面阐发“教育救国”的思想，一面在教学中实践“教育救国”之道。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并兼附设小学主任时，联合一批青年教师，在校长王庭萱的支持下，推行白话文，传播新思潮。省教育厅厅长对此视为异端，兼因杨明轩在北京求学时公开反对过陕西督军陈树藩，数事并发，结果同王庭萱一起被迫离职。杨明轩不能在西安立足，于1920年冬到陕西靖国军管辖的中心区域三原，就任渭北中学的教务主任，力聘思想进步的教师，推行学以致用用的学习方法。1921年夏陈树藩垮台，陕西督军易人，杨明轩于同年秋回到西安，先在省立二中任教务主任，一年后任省立一师校长。他尽力聘请进步人士担任教职员，并亲自主讲“社会进化论”、“三民主义”等课程，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学校的面貌大有改变。但新任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扩充其镇嵩军，屡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弄得学校难以维持。杨明轩挺身而出，以省立一师为据点，联系西安教育界人士多次实行罢教，进行斗争。因此，他再次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遭到打击迫害。

1923年学年考试时，省立一师为检验学生真实的学习水平，防止纨绔弟子从中作弊，决定实行一生一桌的考试办法。省教育厅便利用少数同学对此不理解、不满意的情绪，一改反对学潮的常态，指使其亲信煽动一师的少数学生闹事。继以杨明轩不能处

理“学潮”为由，声言要派军队进驻学校维持秩序。在此情势下，杨明轩坚决表示：“我宁愿不当校长，也不能让军队进学校！”1923年夏，毅然辞职离校。

杨明轩1919年秋回陕后，旅京陕籍学生主办的进步刊物《共进》杂志于1921年10月在北京创刊，继于192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共进社。杨明轩负责主持陕西关中的社务工作，联系回省社员，发展新社员，推销《共进》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书刊，宣传共进社“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宗旨，向学生介绍《共进》针砭陕西时弊的激扬文字，为共进社在省内发展作出了贡献。

杨明轩被迫离开陕西教育界后，1923年冬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任讲师兼附设中学部主任。在这里，他经常阅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史》、《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又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受到很大的帮助和影响。

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

1924年7月，杨明轩应李子洲之请从上海回陕，到绥德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李子洲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杨明轩一起参加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回陕在渭北中学任教；是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24年李子洲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同年夏到绥德接任四师校长，他决心将四师办成团和党的干部学校，为陕西的革命培养骨干。

杨明轩在绥德期间，通过参加四师的革命教学实践，联系以往舍政治革命而进行教育改革苦痛，正确理解了革命救国和教育

救国的关系，身体力行，一往无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在绥德四师期间，我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他们都是陕北党组织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逐渐地认识到自己脱离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并且向他们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杨明轩是学校教务主任，首先在教学安排上支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四师的政治空气极为浓厚，每遇大的节日、纪念日和重大政治事件，都要组织纪念和宣传活动，杨明轩多是这些纪念和宣传大会的主要讲演者之一，有时还扮演角色参加戏剧演出，并带领学生到农村进行宣传和调查。学校有共进社的秘密组织，也有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教育会、陕北青年社等进步社团的基层组织。为使这些组织开展积极的活动，又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他协助校长主持召开教务会议，同教师和学生代表一起共商课程的设置和调整；坚持从严办学，按时进行严格的月考、期考，优秀的考卷“贴堂”或传阅，以示鼓励；三门主课不及格者留级；严禁学生吸烟、赌博。杨明轩又是多才的教师，除主授数学，还代临时有事的教师补授其他课程，不因教师有事而使学生误课。他还为平民学校和农村的冬学、夜校编写教材，研究教学方法。

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第三十号通告，要求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国民党员，即速成立国民党的县、市、省党部。此时，国民党中央的右派陕籍人士回陕活动，企图建立并控制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为了限制右派的活动，李子洲考虑到杨明轩在陕西教育界和青年中的影响，建议他参加国民党，南下关中，联合革命同志和其他进步人士组建陕西国民党组织。杨明轩即函托在北京的屈武为他办

理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在暑假期间回到西安开展组建国民党的活动。8月22日，他和刘含初具名，在《新秦日报》刊登启事，宣布陕西中国国民党员俱乐部已经成立，要求回陕的国民党员到俱乐部签到。9月5日，64名国民党员聚会，分推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等为书记，并经杨明轩提议会议决定将省城分为六区，每区设干事二人，进行宣传。9月12日，国民党员谈话会公推杨明轩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9月26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杨明轩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在当选的九名执委和五名候补执委中，绝大多数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革命性质，和坚决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方向。杨明轩并担任了国民党陕北23县的党务特派员。他回绥德后，在李子洲的统一安排下，把四师学生中的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派往各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亲自到榆林、佳县等地推动工作。杨明轩还在筹建陕西国民党组织的期间，于1925年7月参加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在魏野畴主办的《西安评论》发表文章抨击军阀政治，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进一步发展。

杨明轩在世时常说：“第四师范既是哺育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摇篮，也是改造人的思想，树立革命世界观，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熔炉”，并说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也正是这样。杨明轩在第四师范学校的两年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经王懋廷、李子洲介绍，于1926年12月履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手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有胆有识的教育厅长

1926年秋，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步进入高潮。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区委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加强陕甘的工作。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杨明轩于1月从绥德南下到西安，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国民革命在陕西的深入发展努力奋斗。

杨明轩在主政陕西教育的半年里，以革命的政治家、教育家的胆略和勇气，对陕西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教育厅拟订的《整顿陕西教育计划大纲》和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决议案》，训令全省91县公署、县教育局及省立各校遵照执行。其中提出，“按世界潮流与中国目前需要”，改定“教育以发扬民族精神，培植民权基础，增进民生程度，完成国民革命及世界革命为宗旨”。为了实行新的教育宗旨，杨明轩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1) 实行教育革命化。教育厅训令各级学校一律加授三民主义，中等以上学校一律设政治训练科，增设社会科学课程，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论》等为规定教材。不少学校成立了列宁主义研究会，和以孙中山、廖仲凯、李大钊命名的图书室、俱乐部，进行国民革命思想教育。

(2) 收回教育权。禁止教会或外籍人士在陕西境内设任何学校，并不准外籍人士在陕西境内的学校充任校长。

(3) 整顿全省中等教育。由教育厅制订，经驻陕总部命令颁行的《整顿全省中等教育办法》，要求全面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宗

旨。规定学校要辅助学生组织或发展学生会，极力提倡学生为有生产之操作，革除学生的不良习惯。一律组织有校长、主任、专任教员、校内国民党部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每月底露布当月的经费收支，共谋学校之进展。

(4) 整顿全省小学教育。教育厅发布训令，要求全省各小学认真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宗旨。规定各小学一律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一律按照学生程度分级教授，不得沿用私塾式的教学方法。完全革除学校的教会仪式。学校要指导学生组织各种团体，以养成适于社会生活的自治能力。要提倡学校为有生产的操作，以养成劳动习惯。要尽力筹设学校游艺场及有益于儿童的设备。

(5) 引导办好私立学校。教育厅训令私立各中学校长，要求按照新的宗旨增设社会科学课程，支持学生团体的有益社会活动，妥善解决经费困难。

(6) 提倡群众捐资兴学。由教育厅拟订，经驻陕总部核准命令公布实行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凡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得由地方长官开列事实呈请褒奖，其以私财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诸有关于教育事业者，亦得照前项办理”。对于捐资者，依捐资多寡，分别奖给银色褒章、金色褒章或匾额。

(7) 运用行政手段推行平民义务教育。教育厅拟订《强迫义务教育大纲》和《平民教育办法》，平民教育委员会拟订了《平民学校简章》，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

(8) 保障教育经费。教育厅训令各商税局，“全省商税统拨教育经费专款，无论军政各费如何支绌，丝毫不得挪用”，擅自挪付其他机关者，由商税局局长照款赔偿。教育厅还呈报驻陕总部，训令各路军勿再挪用或截收教育专款，如再挪用或截收定予

严惩不贷。

(9) 制订教育行政机关的办事法规。教育厅明令颁布了《教育厅组织法》、《教育厅办事细则》、《教育厅值日规则》、《教育厅会计出纳规则》、《教育厅教育督察员规程》、《县教育局规程》、《学生成绩考核规定》、《小学毕业书查验程序》等，横扫旧教育行政机关的衙门化官僚作风，为学校 and 教学服务。

(10) 整顿提高教师队伍。杨明轩任全陕教育人员讲习委员会委员长，统筹教育人员的培训工作。教育厅拟订了《陕西教育人员考绩条件》，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依条例对县长、教育局长、教育视察员、教育委员、各级学校校长、教员、职员的成绩进行考核，奖优罚劣。教育厅又拟订了《教育人员保障条例》，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规定“教育人员无故不得免职”，“在一学校或一学区办学至二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得按年酌增薪金”，“服务至一年以上的在职病故者，得酌量给予恤金”，“因从事教务受意外伤害病者，由学校支給医药费或残废恤金”。教育厅还发出训令，宣布教职人员“凡有吸食鸦片及沉溺赌博者，立于免职，不许聘用”。为了掌握教育行政领导权，杨明轩还通过合法的途径，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一些地方任县教育局局长、学校校长、教务主任，或到省教育厅及其直属单位任职。

上列改革措施，是杨明轩从多年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取得的，涉及教育工作的各方面。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及其主政陕西教育的时间过短等方面的原因，或其中有些措施难免失之过急，未有完全贯彻实行，但它却有现实的积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充分反映了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杨明轩在教育工作中的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及其励精图治，迎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

杨明轩在大力改革陕西教育的同时，又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群众运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在西安妇女协进会主持的国际妇女节大会上讲话，驳斥“女子要平等只有受教育一条路可走”的片面观点，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惟一的出路只有革命”。他任命吴碧云为教育厅编审科长，时论“吴碧云为陕西女子入政界第一人”，“杨明轩是有胆有识的教育厅长”。他在陕西省学联第二届代表大会、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青年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立“大钊纪念室”大会上发表演说，称颂李大钊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锋，北方革命的领袖，又为忠实的教育家，从事革命的人自当对他尊敬，师范学校为养成革命教育家的场所，尤当以李大钊为模范，号召青年、学生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习。杨明轩还到中山学院院长安农运班、学联组织的暑假讲习会等短期训练班授课，扩大革命的影响。足见他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不辞辛劳的可贵精神。

杨明轩又是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大无畏的勇士。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18日，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4月17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其本兼各职，并令全体将士及革命的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条例惩治。消息传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通电讨蒋，《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蒋，省党部和西安市党部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召开党员大会或群众大会，坚决拥护打倒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杨明轩在反蒋斗争中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从而深遭蒋介石的忌恨，被其非法宣布开除国民

党党籍。但其时陕西为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区域，因此杨明轩继续担任党政各职，积极开展各项革命工作。

正当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继续推进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927年6月，先后在郑州、徐州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会晤，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流。7月18日，反动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代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7月26日，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决议改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左派被排除尽净。此时的杨明轩，虽然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尚未暴露，仍被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委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但已在被怀疑之中，行动受到监视。在此情势下，杨明轩密赴武汉与李子洲相遇。李子洲书面报告中央：“杨明轩同志去年12月在绥德加入，他的个性甚强，但生活很规律，作事很认真”，“现已来此，住在于宅，未带介绍信，故未与兄方发生关系”，“我特此郑重证明并介绍之，请派人谈话，并决定他的工作。”杨明轩在等待中央派人谈话分配工作期间，身染重病，继续住在于右任家大为不便，且在武汉又无其他适当去处，遂在报告李子洲后秘密回陕，隐蔽在户县的亲朋好友家养病，与中共陕西省委保持着联系。

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1927年的秋冬，陕西当局利用法西斯组织“铲共团”四处侦察破坏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捕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地。

1928年1月18日，杨明轩在户县黄堆堡被捕，20日押解到

西安，关押在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狱中。鉴于杨明轩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反动当局也想争取他为己所用，所以将杨明轩单独关押，以示“优待”、“照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多次着人“规劝”杨明轩，要他爱惜个人的名位，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杨明轩明确回答，他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任职期间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训令，以及冯玉祥总司令的训词为依据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为共产党所利用”的问题。

1928年秋冬至1929年春，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等相继被捕，与杨明轩关押在一个狱中。杨明轩利用“放风”的机会与战友互通消息，商议对策。由于杨明轩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反动当局又未抓到真凭实据，战友们便要他继续坚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争取合法出狱，保存党的骨干力量。

杨明轩在狱中生活了一年又八个月。他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一次，监狱长要杨明轩给同狱的政治犯讲解三民主义，妄图借此使杨明轩“反省”、“认罪”。他看透了监狱长的阴谋，便利用这个合法机会，大讲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的三民主义。愚蠢的监狱长始而手足无措，哭笑不得，继而穷凶极恶，拍案狂吠，骂杨明轩胡说八道，蛊惑人心。杨明轩则轻蔑地反问道：“请问狱长先生，我讲的哪一句没有根据？哪一条不对？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宋哲元主席不也是曾经大讲特讲过吗？你们说要拥护三民主义，为什么又要反对提出、解释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及其主张呢？你看，是谁在反对三民主义呀？是我杨某，还

是你监狱长先生？”监狱长被问得无言以对，奈何不得。以后监狱长又要他研读孙中山的文章，并把要点圈点出来，想再从中摸他的思想底子，抓他的话柄。而杨明轩有的是对付的办法，他从文章的头一个字圈点到最后一个字。监狱长问他为什么这样圈点，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孙总理的话都是说得好的，所以我都圈点了。难道你认为孙总理的话还有不对处、不值得圈点的地方吗？监狱长又碰了壁，狼狈不堪。

1929年，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再度混战，控制陕西的冯玉祥系当局又一直未获得杨明轩是共产党人的任何证据和口供，经陕西地方人士的斡旋，由户县王富德等人出面保释，于8月23日释放了杨明轩，还给杨明轩以“陕西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命住西安，监视其行动，妄图控制使用。

寄居上海

1929年冬，杨明轩乘一次大雪之机，摆脱监视羁绊，从西安到潼关。为甩开反动的陕西当局派人沿陇海路追捕，他改道山西，经北京到上海。1930年底，杨虎城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入陕主政，杨明轩于1931年冬回西安在省立女子师范和中山中学任教。1933年夏，他为医治因误会而受的枪伤到上海就医，伤愈留在上海至1936年秋。前后两段都在匡互生办的上海立达学园任教，共五年多。

杨明轩1929年出狱后曾多次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共产党员应具有的条件要求自己，以各种形式为党的事业尽责，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杨明轩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不以政治原则作交易，并不怕祸及自身，多方掩护营救革命同志。1930年，陈顾远介绍他去上海一个大学讲授教育学，但当校方向他是否国民党员时，便毅然辞聘不就。安徽大学训育长以答应加入国民党为条件约荐他出任安徽大学的教育长，他不顾得罪这位多年来的朋友，立即婉言拒绝了。也就在此时，从陕西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性初、彭淑珍夫妇被捕。他奔走于陕西知名人士之间，在于右任的帮助下，彭、张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先后被保释出狱。他去苏州监狱探望了在押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并多次给予资助。魏野畴是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得到南汉宸、王子休等帮助，将魏野畴生前的著作《中国近世史》和翻译的《美国史》出版，并将全部版权费转交烈士家属维持生活。

杨明轩在上海期间同国民党杂牌军队中的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将领多有交往。他们相互间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国共合作，抗日救亡，杂牌部队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和前途等问题割切交谈，以至推介进步书刊，共同阅读研讨。在1933—1934年间，他同邓宝珊在沪的私人秘书葛霁云（共产党员）关系密切，并通过葛与邓保持联系，交换对时局和政治形势的看法。1935年10月，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的赵寿山，借看病为名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观察政治形势。赵在上海数月，和杨明轩一起看书学习，研究国事，并积极联系反蒋抗日人士，商讨开展抗日反蒋救国活动问题。赵回西安曾给杨虎城说，他在上海接触了杨明轩、杨晓初、赵葆华等人，读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受到很大的启示，建议杨虎城派得力人员进一步与红军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将来共同抗日，并提议如果蒋介石再来西安威逼打红军，就逼

他联共抗日。这说明赵寿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思想起了巨大的转变，是与杨明轩的帮助分不开的。”

杨明轩不论什么时候，他的身旁总有一批青年，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成长。1933年夏，青年学生田一明从北京流亡到上海，杨明轩省吃俭用，让田和他同吃同住数月，并帮助田取得陕西的“官费”，在上海继续求学。1934年，原陕西靖国军知名人士彭仲翔的次女彭毓泰到上海借读高中，生活困难，杨明轩领他拜访于右任，并要求于负担了彭在沪求学的费用。1935年，甄寿珊之子甄瑞麟到丹麦留学，甄出国后写信给杨明轩，请求帮助落实陕西当局原来答应提供的“官费”。为此，杨明轩先后五次和于右任商酌，终于由于右任出面，敦促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及时将落实情况函告甄瑞麟，并寄去国内的报刊，嘱其关心国内抗日大事。1936年初，赵寿山离沪时将女儿赵铭锦留沪求学，托杨明轩照管。杨明轩一面辅导赵铭锦学习文化课，一面指导其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鲁迅的著作。杨玉珊、顾红梅、邓惠霖等一批青年学生，也先后在杨明轩的身旁学习或补习功课。还有其他更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同杨明轩保持着师生和友谊的关系。杨明轩还支持旅沪的进步青年成立了陕西旅沪学友会及其所办的刊物《秦声》，指导青年参加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等上海的学生运动。从各方面关心青年，帮助青年，教育青年，不愧为陕西青年的导师和革命教育家。

杨明轩长于数学，在上海时与共产党员杨晓初合编了《初中代数学》、《高中三角学》等课本，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又将他主编的《右任诗存》，征得于右任同意，交世界书局刊印。

杨明轩在上海的五年是艰难的，他主要依靠教书、编书收入

维持生活。他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官职和机遇，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坚决同那些开历史倒车的朋友划清界限。他憎恨那些朝三暮四、奴颜婢膝的人，鄙视那些所谓无怨无悔、逆来顺受的人，也鄙视那种满腹牢骚、若痴若狂的人。他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各种挫折，坚定不移地沿自己认准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他应该做而又可能做的事情。历史证明，杨明轩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西安事变前后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2月9日，北京的数千名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1936年春中共西北特支在西安秘密成立，领导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安的抗日救国活动逐步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6年秋，杨明轩从上海回到西安。此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前，为加强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著名民主运动活动家杜斌丞推荐杨明轩到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西救会”是中共西北特支建立的，由特支书记谢华总负责。杨明轩到后不久，便以交际部部长的名义主持“西救会”的会务工作，总负其责。杨明轩继续坚持同东北民众救亡会紧密团结与合作，通过杜斌丞、赵寿山、车向忱、宋黎等与主持国民党西北和陕西军务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密切联系，推举和邀请社会名流出面或领衔，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分别同中共中央取得联

系，表示愿意联共逼蒋抗日。在张、杨的同情支持下，西安逐步把秘密进行的抗日救国活动转向了半公开或完全公开。10月10日，“西救会”和“东救会”联合召开辛亥革命25周年纪念大会，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号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日寇讨还血债。10月中旬，西安师范学校的十多名爱国学生被地方当局逮捕，“西救会”发表了致省政府主席的公开信，杨明轩奔走于社会名人之间进行疏通，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换了师范学校的校长。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西救会”和“东救会”两次组织追悼鲁迅大会，号召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日救国。为支援绥远抗战，“西救会”等救亡团体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共募捐7000余元，由西安学联派出慰问团携带捐款和慰问品赴绥远前线慰问将士。12月9日，“西救会”联合各救亡团体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号召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战。要求国民党立刻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停止“剿共”，枪口一齐向外，一齐抗敌自卫。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冒着刺骨寒风向临潼进发，要求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促进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发动兵谏，扣留了坚持内战、坚持“剿共”的蒋介石。杨明轩以“西救会”为依托，夜以继日地开展抗日民众运动，拥护西安事变。事变的当晚，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后，“西救会”领衔，18个救国团体发表了

致全国各政党、各将领、各救国团体、各学生救国会、各法团、各学校机关及全国民众的通电；“西救会”领衔，30多个团体发表了《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西救会”又单独连续发表了《拥护张杨救国宣言》《告各党各派书》、《解决目前时局基本条件》等文电。13日，“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巷尾进行宣传，连续多日不断。16日，西安各界在革命公园举行拥护西安事变大会，数十万群众参加。杨明轩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词，痛斥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反动行径。大会结束后，他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用实际行动支持张、杨两将军和兵谏行动所提出的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接到张、杨两将军给红军的电讯后，立即派周恩来等从陕北到西安参加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对于放蒋介石回南京，杨明轩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他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任弼时、彭德怀等晤谈后，完全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并奔走于西安至三原（中共和工农红军领导人驻地）之间，周旋于各群众团体和地方各界代表人士之中，积极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西安事变后，新的陕西省政府组成，杨明轩协同新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李寿亭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抗战教育，并提出在教育界成立抗日救国的团体。此议得到杨虎城、车向忱、杜斌丞、谢华等人的支持，杨明轩即联络进步人士进行筹备。1937年1月，在杨明轩的主持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举行了成立大会，杨明轩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寿亭当选为副主

席。会议通过的“教盟”的宗旨是“团结西北抗日救国教育工作者，实施国难教育，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对盟员的十项信条中，要求盟员“联合前进的教育工作者推行国难教育”，“团结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参加民族抗日阵线”，“使教育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使教育机关成为传授大众救亡智能的场所”。“教盟”成立后，杨明轩多次主持执委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并通过李寿亭主政的省教育厅加以实施。主要是：委任进步人士出任一些重要学校的校长；颁发“教盟”草拟的《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接办国民党CC分子、原省教育厅厅长周学昌任所长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由杨明轩任所长，并且新设立了陕西省教育厅三原初等教育人员训练班，培训小学教师，提高其抗日救国的意识。为了争取“教盟”继续合法地公开活动，杨明轩还会见了新到西安主持国民党西北军务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出国“考察”

1937年初，杨明轩从西安密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这是杨明轩首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谈话给杨明轩以很大的教育和鼓励。

1937年春末，杨明轩从延安回到西安。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进驻关中；东北军已被肢解，分调豫皖等省；杨虎城受迫准备辞职出国，第十七路军指挥部已被迫撤销，所属部队已被迫缩编。杨明轩系西安事变中的群众领袖，他所担任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职务也被免除，他在群众团体中活动更加困难。为不保护杨明轩的安全，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留

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筹安排下，由陕西省政府派他为“考察欧洲教育专员”，出国考察。杨明轩又约胡希仲同往。胡希仲系已故胡景翼将军之子，受工农红军贺龙之命，正在渭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周恩来和贺龙也支持胡陪杨出国“考察”。为使杨明轩赴欧考察顺利，周恩来给法共中央和《人道报》负责人罗歇写了信，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军高级将领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信，托胡希仲交杨明轩。就在此期间，杨虎城已被蒋威逼辞去国民党的一切党政职务，出洋“考察军事”。两人相约，杨虎城先去美国，后到法国巴黎与杨明轩汇合。

1937年6月28日，杨明轩从上海乘轮船出国。途中听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人举行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适逢国民党特务头目贺衷寒也在船上，他是领着一伙青年去德国学习法西斯主义的。大会开始后，贺衷寒抢先发言，翻来覆去讲“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中国”的空言。贺讲毕，杨明轩便站起来发言，大讲只有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抗战，才能打败日本救中国的道理。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8月11日，杨虎城一行抵达法国巴黎。15日，中国旅欧各团体发起举行各界抗日大会，杨虎城和杨明轩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热忱的讲话。随后，杨明轩一行赴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匈牙利等国考察。所到之处，他都尽力设法与各界侨胞和留学生接触，与侨胞中的抗日救国组织联系，说明西安事变的真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他还参加了中国留学生欧洲抗日学联和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中国学生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联年会并发表讲话，表达了中国学生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取得了国际进步青年学生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杨明轩在欧洲考察期间，还访问了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蓬勃朝气，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参观一个小学时，教师提问学生：在中国平型关打败日本鬼子的是哪个部队？学生齐声回答：是八路军。他对此非常兴奋，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已在世界人民中产生了影响。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墓，参观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并约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七七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战开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最高当局继续对日妥协让步，对内限制爱国军队的抗日积极性和爱国人民救国运动，军事连连失利，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对此，杨虎城和杨明轩难于安心继续在欧洲“考察”，于1937年10月28日由巴黎出发，取道马赛乘轮船回国。

11月21日，轮船到西贡。22日，旅越侨胞西提抗敌后援会聚会欢迎杨虎城和杨明轩。杨明轩继杨虎城之后作了讲演。他强调，我们不应因小败而垂头丧气，应该看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的讲演受到与会旅越侨胞的热烈欢迎。

11月26日，轮船抵达香港。杨虎城落入国民党的特务魔网，遂遭囚禁。杨明轩于29日乘飞机回西安，结束了五个月的赴欧“考察教育”。

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1938年春，林伯渠和李初梨在西安通知杨明轩，中共中央

已批准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并指示他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他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肩负起党所赋予的新任务，运用自己的特殊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以多种形式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安进行抗日民主活动。

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陕西逐步形成了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它们在宣传抗日、组织救亡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到了1938年的春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取缔西北青年救国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并逮捕了几个团体的五名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抗日救亡团体同这股逆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杨明轩从自己的特殊条件出发，积极有效地配合了这场斗争。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在赴延安访问途中抵达西安，陕西国民党当局组织隆重的欢迎活动，但却把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视为异己，或排除在接待委员会之外，或取消其欢迎会上发言的资格。杨明轩在巴黎参加世界学联的活动中，同这次赴延的代表团成员何乐满等相识，便从中联系，请代表团出席了由西安学生分会和已被陕西当局下令取缔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代表团听取了关于陕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支援抗战的事迹介绍，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赞赏，并索要有关资料，表示要在国际上宣传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的英勇事迹。1938年暑期，西安学生分会组织了由留校和家住西安的学生参加的学术研究会。杨明轩除自己到会讲课外，还帮助学生分会邀请时在西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会讲话。由于有于右任的支持，学术研究会还公开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大家的收益很大，超出原来的预料。此时，顽固派对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压制也随之而来。杨明轩坚持团结李寿亭等陕西教育界的进步力量，于1938年7月，

主持召开了“教盟”第二届代表大会，1500余名盟员的3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陕西省教育界当前的情况，确定了“教盟”应持的正确态度。杨明轩再次当选为“教盟”的主席。1939年以后，杨明轩等“教盟”的负责人为适应新的形势，把“教盟”的工作由教育界逐步引向其他各界，推进社会抗日民主运动。

1937年11月12日，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为宗旨的《老百姓》周报面世。《老百姓》周报是李敷仁、武伯纶、何寓础等几个在业和失业的教员，拿自己课余时间，剩下的金钱主办的。一开始就在组稿、编辑、校印、发行，特别是经费上遇到很大困难。为了支持和帮助报纸出版，杨明轩在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执委会上提出，在经费上“教盟”要尽可能多津贴《老百姓》周报，在人力上“教盟”盟员凡能帮忙的都应乐于尽义务，并对报纸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他自己解囊把节衣缩食省下的300元接济给报社，并四处奔走为报纸募捐经费，后又同杜斌丞、韩望尘等各界知名人士共17人组成《老百姓》周报董事会，其中12人每人每月捐资报社20元。在大家的支持下，《老百姓》周报愈办愈好，远销英、美、法、苏等国。1940年4月，陕西地方当局无故扣押李敷仁，报纸被迫停刊。在两年五个月中，《老百姓》周报共出刊113期，总发行百万份以上，并发行小丛书15种7万册以上，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宣传团结抗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杨明轩为推动西北军的进步将领靠拢革命，警惕蒋介石分化，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为了做好赵寿山的工作，杨明轩先后担任了国民党第十七师、三十八军的参议，并

长期住在赵寿山在西安的家里，便于多方的工作与活动。七七事变后，十七师参加山西娘子关战斗，后转移到晋西整训。杨明轩专程从西安到绥德与赵寿山会晤，商量坚持抗战问题，并支持赵到延安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杨明轩同南汉宸等建议赵寿山对部队进一步实行政治改造，办教导大队，培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各级干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具体办法后，蒋介石对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三十八军进一步采取渗透、分化、削弱、破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每当三十八军处境危急之时，杨明轩都要到部队驻防地与孙蔚如、赵寿山等共同商讨对策，帮助部队应付环境，渡过难关。1941年，杨明轩同杜斌丞、赵寿山商议，拟在军内吸收进步分子，组织新中国大同盟，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拟订了包括十六条内容的纲领，电呈中共中央，此议虽未获准实现，但充分说明杨、杜等在三十八军是有很好的影响的。1944年春，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赵寿山，调胡宗南的嫡系第三集团军任总司令。赵的处境十分困难。杨明轩亲至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甘肃武威，与赵商议对策，并对随赵在武威坚持工作的原三十八军干部做思想工作，帮助赵克服困难。抗日战争期间，邓宝珊先后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部驻陕西榆林，但邓的家较长时间住在三原。杨明轩多次到三原与邓会晤，分析蒋介石排斥异己的策略，商量与陕甘宁边区处好睦邻关系，与八路军团结抗战的办法。1943年，胡景铎与胡希仲决计率部队从关中北上榆林，在条件成熟后起义参加八路军。为此胡希仲先后分别与习仲勋、杨明轩商议，得到习、杨的积极支持。1945年春，胡部北上榆林，为1946年在横

山起义作了准备。杨明轩还和甘肃的吴鸿宾、王新潮等保持有工作方面的联系，支持他们在地方武装部队中进行活动。为了更广泛地团结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坚持抗战，杨明轩又于1944年底与杜斌丞、屈武、杨晓初等提出组织西北军人大同盟。这些，对于推动西北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抑制蒋介石的瓦解吞并，都起了积极作用。

参与创建民盟西北总支部

杨明轩1937年底回国在西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将近九年间，一直和杜斌丞亲密合作，甘苦与共，为组建民盟西北总支部，领导开展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斗争，呕心沥血，不屈不挠，舍死共生，坚贞不渝，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民盟西北总支部是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准备和细致周密的组织工作而成立的。1939年春，杨明轩去成都广泛接触西南地区的民主人士，商讨了加强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互相声援、呼应的问题。1941年春夏，杜斌丞先后到湖南、广西进行抗日民主活动，同年秋到重庆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任陕西组组长。杜回陕后即介绍杨明轩等加入“小民革”，并与王菊人、武伯纶、张光远、成柏仁、李子健、张性初、马文彦等建立了联系。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1942年，派郭则沉、辛志超、叶笃义等来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秘密联系，商讨建立西北民主运动的组织问题。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0月，派中央委员郭则沉持主席张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邀请杜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与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

等发起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杜为总负责人，杨明轩协助杜做组织工作，并提出了“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6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杨明轩任执委兼组织部部长。民盟西北总支部“对外公开了组织，但盟员中除杜斌丞一人以民盟中常委身份公开出现外，其他同志均仍在半秘密状态中从事民主活动。民盟组织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甘、宁、晋三个特派员办事处，在陕西建立了西安市支部和27个县的分部，共有盟员千余人。民盟还联系和影响了几支地区性的武装组织，有一部分武装盟员。杨明轩在民盟主持组织工作是有特殊作用和贡献的。曾经有人提醒杜斌丞，杨明轩是共产党员，不宜出任盟的组织部长，杜斌丞毫不犹豫地回答：“盟的组织工作就要共产党员来干，你我都没有这个经验嘛！”

在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同时，杜斌丞和杨明轩于1944年冬派王维祺到四川，与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联系，商讨在陕西建立民主青年运动的组织问题。1945年4月，在杜斌丞的支持和杨明轩的具体指导下，西北民主青年社成立，同年秋，“民青社”集体加入了民盟。“民青社”以青年学生为主，并有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和其他职业青年，共约七八百人，同民盟初期发展的“高”（职位）、“老”（年龄）、“大”（名望）相结合，充实和扩大了民盟的组织力量。

杜斌丞、杨明轩在加强民盟组织发展的同时，又特别重视了舆论宣传工作。1945年秋，他们按照周恩来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扩大民主救国思想宣传影响的建议，同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使陕西的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并支持盟员主编的《民众导报》、《经世》、《新妇

女》、《儿童旬刊》、《孩子报》。这些报刊广泛宣传坚持抗日、团结、民主，反对投降、分裂、独裁，广泛宣传反对内战，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民主舆论。1945年冬至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组织反苏反共游行，旨在配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按照中共陕西省工委的指示精神，杨明轩指导“民青社”在学生中做了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使西安反动当局精心策划的两次反动游行遭到可耻的失败。

1946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西安反动当局于4月23日公然杀害了民盟盟员《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法律顾问王任，5月1日绑架暗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5月3日再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乃至全国的“西北血案”。反动派当得知被暗杀的李敷仁未致命而得救的消息后，再次写信威胁杨明轩“必须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将给以李敷仁同样的‘待遇’”。中共中央对杨明轩的安危极为关怀，指示西北局妥善部署，尽快将杨明轩安全接回陕甘宁边区。

进入陕甘宁边区

1946年7月，唐磊（韩夏存）受中共中央西北局之命，负责护送杨明轩回陕甘宁边区。他们原拟从铜川方向进入边区，但上火车后发现的特务跟踪，遂中途在三原下车，去邓宝珊家小住数日，折回西安，住在赵寿山之女赵铭锦的家。7月19日晚，杨明轩由赵寿山的副官袁德启护送，唐磊暗中陪同，乘火车离开

西安，在兴平下车，由唐磊护送北上。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化险为夷，25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马栏。8月7日从马栏出发，13日抵达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

杨明轩到达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关怀。从1946年8月16日到1947年3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李维汉、谢觉哉、刘景范分别会见了杨明轩，其中有些人是多次会见。西北局还邀请他多次向机关干部作报告，讲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他的报告深刻、生动，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

杨明轩脱身虎口，投入党的怀抱，他以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歌颂了党中央和边区人民。说他这次离开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政策逼出来的，也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爱护和同志们的关心才得以脱身出来的。他一进边区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真是“一方面生产工作，一方面荒淫佚乐；一方面安居乐业，一方面民不聊生；一方面夜不闭户，一方面行旅裹足；一方面野无闲人，一方面饥民遍地。一句话，一方面过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的生活，一方面在独裁、暗杀、痛苦、破灭中讨生活。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自杀政策、笨拙政策，使得他的统治区岌岌不可终日，人民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杨明轩说：“借此机会亲眼看看民主模范的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革命设施，看看边区人民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的实际生活，也是我多年的宿愿，也是我的一种幸运。”满腔热忱，溢于言表。

同时，杨明轩提出了他到边区之后的愿望、目的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他“久居虎口”，“十多年来始终只是充当革命战

场上的一个小游击队员”，“很少过正规的革命生活”，“只是初知革命道理，总觉得肤浅”，“这次到边区，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实践革命行动”。他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把重新学习放在首位，虚心地、认真地、系统地进行再学习。

他对抵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开始至10月14日的两个月学习，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中有如下记载。(1) 8月15日阅读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指示；(2) 8月16日至19日，听取西北局负责人的演说，会见中共中央和边区的党政军领导人；(3) 8月20日至21日，听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阅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4) 8月22日至25日，阅读党内文献汇编《六大以前》；(5) 8月26日至9月16日，阅读党内文献汇编《六大以来》；(6) 9月17日至29日，阅读《红军长征记》、《中国政治思想史》；(7) 10月1日至3日，阅读《党建论文集》(一)；(8) 10月4日至14日，阅读马克思的《法兰西的内战》和文艺作品《李有才板话》、《腐蚀》、《前线》。札记的另有一处记载，他还重点反复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1942年编的《整风文献》。做到了他对自己规定的“有计划地学习、挤时间学习、守时间学习、时间无停止、学习无停止”的要求。

杨明轩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未能参加1942年至1943年在边区内进行的整风学习，他的这次重新学习，实际上是他自觉地进行整风补课，自觉地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学习。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干部会上说：“人类也是物质的一

种，也常受惰性定律的支配，加之围于自己的环境，总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对的，是好的，常常想循着旧路走，甚至硬拉着别人也走那条熟路，这都由于有所被而不自知其非。我离革命之群索居于反动之区久矣！错误实多，有的是自己知道，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希望各位同志时加指导，不客气的批评，多给我加些外力，打破我的惰性，校正我主观的错误见解和行为”。他在《共进社与西北革命》的讲演中说：“新旧斗争，从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如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一样，旧的衰退着，新的增长着，去掉旧社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过了时代的陈腐的东西，才能产生出新的社会”。“为使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更合理一点”，“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人”，“便常常起来和旧的一部分人去斗争。斗争的结果，总是新的胜利。即或中途不免有些困难波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就全程来说，旧的总是灭亡掉，让新的来代替它。”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大家很有启发和教育。

杨明轩在认真学习的同时，继续关心西安国民党统治区民盟组织的斗争。他到延安后的第四天，即8月17日，复电王菊人：望告杜斌丞，由王菊人主持武，武伯纶主持文，文武配合，盟共配合，派得力青年学生入国民党部队，以“陕西人民自卫军”的名义作号召，组织武装力量。8月19日再电王菊人：国民党特务注意已进入解放区的赵寿山之女赵铭锦，应同杜斌丞的一群孙子，王菊人的夫人一起统筹，相机进入陕甘宁边区。8月23日再电王菊人：将秘密电台移至乡间，电务人员确保安全送进边区。9月21日，王菊人回电：杜斌丞在西安坚持斗争，暂不进入边区。11月12日，杨明轩再电王菊人，要求相机进入边区。但由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控制，杜、王等已

难以脱身，于次年3月遭敌逮捕。杨明轩对驻防榆林的邓宝珊也甚为关心，于1946年10月、12月两次致函：“抗战期间，吾兄坐镇榆寨，安定边陲，为国为民，功诚不可殒灭。今者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内战祸国，出卖民族利益，举国痛愤，中外唾弃，败局已定”，“吾兄开国勋老，西北物望，量轻重，补救有方”，“环顾陕甘，声望智能，体强力健，能领袖群伦，解倒悬之厄者，舍吾兄其谁属？”规劝老友不失时机率部起义。1946年10月13日，胡景铎率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新编十一旅和保安九团的2000余人，在横山起义。12月，起义部队到达延安，杨明轩多次到官兵中进行思想教育，并协助边区政府对起义军官的家属作了妥善的安置，对进一步稳定这支部队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军进攻陕北。中共中央率中央和边区机关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的战争环境里，杨明轩经常和林伯渠等人一起行动。1948年1月26日在绥德参加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28日赴杨家沟送别毛泽东主席。他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经受酷暑严寒，风餐露宿，历尽苦辛。但他精神矍铄，在战争中实践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正规军”的战斗员的愿望。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48年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4月21日收复了被国民党军侵占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

1948年3月，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

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会上诚恳地表示，愿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一个学生，给同志们当一个学友，给人民当一个忠诚老实的长工，同大家一起努力做好恢复边区生产、支援前线、土地改革等重要工作。3月10日，《群众日报》发表了他就任后对记者的谈话。他号召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为解放家乡而努力，并表示：“我坚决相信：在人民导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强大人民解放军的继续胜利，中共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定能团结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与早先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央工委合并。杨明轩得悉此讯，即于3月15日致函周恩来：“听说中央要走，深有恋恋之感，自觉如婴儿之离母亲也。此次宜川大捷，在这一战场说是空前的一次胜利，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林老说，时局开展，就全国着想，中央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更加我恋恋之感。我已担任了实际工作，跟林老学习，还有西北局、联司诸同志指导，尽我的能力，作人民一个好勤务员，殊觉愉快。”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赤诚之心，对解放大西北和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各机关、单位、学校陆续迁回光复后的延安。4月29日，杨明轩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准备迁回延安的各单位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要求大家在胜利中正视困难，努力学习，掌握政策，永远保持与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更密切地和人民打成一片。边区政府迁回延安后，在杨明轩的主持与具体指导下恢复了延安大学、

延安中学、米脂中学、绥德师范等学校。他还深入到一些学校指导工作，要求各地特别重视加速为解放大西北培养干部的工作。

宜川大捷之后，西北解放战场逐步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打倒胡宗南，解放大西北”，成了西北人民的响亮口号。在解放大西北的斗争中，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明轩，运用自己同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群众的联系，广泛开展反蒋统战工作。早在宜川大捷之前的1948年1月7日，杨明轩再次致函邓宝珊，深刻指出：“世变方亟，蒋亡无日，成败得失，是非功罪，以兄明达谅邀洞鉴，徒以空言无补，犹豫失机，自误晚节，诚足惜耳。”“回忆过去与吾兄叙谈及吾兄革命历史与西北人士对吾兄的期望，总以为吾兄为人民、为国家，必能重返革命道路。年来事实考验，不特使弟渐感失望，即全西北进步人士对吾兄均亦大惑不解”。“日寇投降后，吾兄不特不为全国人民，尤其是西北人民打算，犹复帮凶卖国贼蒋介石，助约为虐，所得结果如何，吾兄清夜自思，当能恍然。”语重心长，痛劝老友悬崖勒马，当机立断率部起义。1949年1月5日，杨明轩在延安的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发表《消灭蒋介石、胡宗南匪帮，建设新西北》的讲话。号召西北各界同胞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干净消灭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争取早日解放大西北、建设繁荣民主的新西北。5月，杨明轩再次在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号召西北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和劳动人民、青年和学生、教职员、公务人员、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以及回民同胞，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最后努力一把，迎接大西北的解放；规劝国民党部队的官兵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作无谓的牺牲，迅速放下武器，立功赎罪，走向光明。同时，杨明轩通过学校中的民盟成员，联系进步人士，发动西安高校学生

进行反迁校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将西安的大专院校迁往陕南、川北的阴谋遭到破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接管广大新解放区的工作提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1949年2月，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和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作的闭幕词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准备新区的接管工作，在进城之后要谦虚谨慎，严肃执行党的政策，要大力发动工人及广大基本群众，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并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社会改革，同时注意争取团结城市中的各界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业家，他还对接管城市工作筹备组的工作给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194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杨明轩为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5月20日西安解放后，杨明轩即从延安出发南下，6月3日、4日在西安相继出席了市军管会讨论接管学校、处理旧机关公教人员办法的会议。6月12日，他在庆祝“西安解放欢迎解放军”的市民集会上讲话，指出西安解放和西北战场的胜利，是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各解放区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斗争的结果。号召大家集中力量，继续努力支前，把胡宗南所部歼灭在陕甘之间。他不辞劳苦，深入到一些学校和文化单位了解情况，登门拜访张凤翔、李虎臣、寇遐、成柏仁等知名人士，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征求他们对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及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具体帮助解决其中一些人在生活上的困难。经充分准备，又由他出面召集了有百余人参加的西安爱国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到会讲话。他还介绍一些知名人士同西北局和

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并根据工作的需要分别同一些民主人士建立和保持经常的联系。他的广泛社会活动和联系，对于消除一部分民主人士的疑虑，对于稳定社会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9年9月，杨明轩以西北解放区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调政务院机关工作，边区政府的工作由杨明轩主持。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杨明轩代表边区政府在渐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主持西北地区的文教工作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杨明轩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1953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杨明轩任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1954年10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正式撤销。杨明轩主持西北地区的文教工作近五年。

西北文教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包括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任务相当繁重。杨明轩献身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愿望，在旧中国的政治制度下，一直遭受排斥和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杨明轩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以教育兴邦”的历史机遇，必须把人民教育工作作为一件国家的根本大事认真来抓，真正抓紧，切实做好。五年期间，他勤奋工作，殚精竭虑，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特别注意采取座谈研究

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发挥他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对一系列有关指导思想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及时有力地指导工作。

(1) 关于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问题。杨明轩于1950年7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和在西北地区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典礼上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及进行改革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新民主主义国家，随着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改变，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改革的方针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改革的内容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旧有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目前只能对学校中某些主要的学习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教学内容改革重点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合理精简现有课程，正确调整文化科学学习与政治学习之间的关系；教育方法的改革重点在于反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同时防止轻视基本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搞好改革的关键是团结和改造新区学校的教师。他还强调指出，西北地区实际工作中已出现的改革要求过急，过分地裁并一些学校，过分地裁减教员和降低教师薪金等现象，必须认真加以纠正，以使改革工作按照正确的方针健康地发展。

(2) 关于开展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问题。杨明轩指出：除了大、中、小学要向工农群众开门，并创办新型的工农速成中学

外，还必须拿出一部分力量注重工农群众的普及教育，推广农村的冬学和城市的业余补习教育，并准备开展识字活动，从80%的人口里扫除文盲。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以后，要在普及的基础上，从识字教育和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到高级技术和政治教育，使工农群众逐步提高政治觉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武器。

(3)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问题。杨明轩指出：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全区的总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必须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逐步提高各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对少数民族原有的学校，应采取保护维持、积极扶助的方针，注重争取少数民族原有的教育工作者，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的新师资。一切工作都须按各民族的特点、各民族的要求和觉悟程度，采取十分谨慎的方针，稳步进行。凡是少数民族人民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难以行得通的事情，都暂时不要做。反对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求成和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倾向。

(4) 关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杨明轩1950年在西安市中学教师学习会上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有高度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教育是被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政治内容，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是为进步的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而不是为腐朽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这一点。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

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培养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的建设人才。

杨明轩指出，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教育；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保护公共财产的道德教育。为此，必须首先加强现有的政治课。他还指出：在不影响正课学习的原则下，应该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使学校生活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仅仅接受教员的讲授和书本知识的灌输，而不使他们同现实生活联系，那就不可能培养成政治上有修养的人。

杨明轩强调指出：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如果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业务知识不够，而要求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以生动的事例，把问题说得很明了，很透彻。

(5)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2年，杨明轩担任了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于同年的4月29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高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同时还在西北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作了《谈思想改造》的讲话，在《西北教育通讯》上发表了《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方针政策、立场态度、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阐明。

杨明轩指出：这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改造思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立场问题。如果不从根本立场入手，而是就事论事，零零碎碎解决某些枝节问题，那

就是“舍本逐末”，就会走弯路，就会使思想改造运动本身缺乏思想性，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他还反复强调指出思想改造方针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本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互相帮助，分析彼此的思想，并在实际行动中改正各自的错误思想；防止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6) 关于学校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杨明轩 1953 年 4 月在西北区高等教学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后学校工作必须贯彻以教学为中心任务的方针。他说，要明确认识，校、院长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教学，教务处和政治辅导处的工作都要面向教学，都要从不同方面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7) 关于科学工作问题。杨明轩 1954 年 7 月 16 日，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科学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政治和经济及阶级的关系是有显著区别的。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它本身就是阶级的科学，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所反映的是自然界固有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它并不是可以不受阶级和政治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求科学家努力提高思想水平，为当前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杨明轩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和生产是直接联系着的。科学的发展是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而科学的进步也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科学与生产经常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指出：正确认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现在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西北的科学工作者应认清自己在研究和解决生产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应有的重大的责任。

杨明轩在上述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对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也是很有研究借鉴价值的。

杨明轩主持西北文教委员会工作的五年期间，在重点抓教育工作的同时，在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改革工作，使其逐步为新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为后来西北地区文教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主持民盟西北区的工作

1946年2月正式成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及其盟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斗争历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下，杨明轩等领导人和一批青年盟员投奔解放区，直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工作与学习；一部分盟员逃亡上海等地；杜斌丞等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留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坚持地下斗争，1947年10月杜斌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其他人分散隐蔽。

1949年5月8日，杨明轩主持，李敷仁、苏资琛、张锋伯等19人参加，在延安成立了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杨明轩当选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盟地下工作人员和与民盟有联系的地方武装，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进行宣传，号召大家各安生业，进行护厂、护校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斗争。西安解放后，由

杨明轩主持，于6月8日在西安召开了有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干部和原在西安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撤销了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杨明轩继续担任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并决定成立了以杨明轩为首的审查委员会，对老盟员进行审查登记。同年11月、12月，民盟举行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和五中全会，杨明轩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解放后，杨明轩主持民盟西北区工作五年多。在此期间，他总结民盟西北组织的历史经验，又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出发，以民盟必须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必须加强盟内外的团结为重点，领导各级盟组织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加强盟内团结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团结，成为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面前的首要问题。在西安解放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杨明轩主持，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十多次委员会议和干部会议，及许多小型的座谈会和学习会，学习文件，交流思想。他还登门拜访，同一些人促膝谈心。从而促进了盟内的团结，改善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为发展盟的组织和加强盟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1950年8月24日至9月2日，民盟西北区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杨明轩致开幕词，并代表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西北民盟在以往八年当中，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曾有不少贡献。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实现《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以往八年我们和中共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合作，才得到今天这样的发

展。今后，我们还必须更加虚心地向中共学习，诚心接受中共的领导，防止并克服个别盟员中存在的‘分庭抗礼’或‘作客思想’，使我们的盟员和中共党员团结得更好，合作得更好。”这次盟员代表大会决议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杨明轩当选为主任委员。大会之后，杨明轩领导盟的组织和盟员，在进行自我教育、推动各种政治运动、发展巩固盟的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2年12月，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题为《为开展经济建设时期盟的工作而奋斗》的报告。他说：从1953年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教育工作的紧密配合，因而文教建设也将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面，民盟必须更好的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以适应祖国的迫切需要。今后民盟的工作方针就是建立和加强盟的经常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服务。他还特别强调：民盟工作必须与党和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密切结合；盟的组织必须与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密切联系，关心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盟内必须团结，而达到团结最根本的方法是从工作出发，为做好工作而正确地开展盟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领导者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推动盟内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领导者更要以身作则，先学一步，学好一点。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后，杨明轩于1953年11月在民盟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广大盟员要认真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用总路线的精神改造思想，认清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引导盟员准备好社会主义关，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1954年10月西北大区撤销，杨明轩奉调到民盟中央工作。1955年1月27日，民盟陕西省支部筹委会和西安市支部联合召开茶话会欢送杨明轩，杨明轩应陕西省支部筹委会负责人成柏仁之请，就盟员的思想修养问题作了长篇的临别讲话。他说：从盟员的思想修养方面讲，第一，要加强革命事业心。革命事业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觉悟的问题。我们国家当前的任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民盟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政党来说，每个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部分，兢兢业业地当做终生的事业去完成。第二，要切实发挥集体主义精神。这就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只有集体的力量才是伟大的。个人在革命事业中不过是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分子。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就要提倡相互爱护、相互督促的优良作风，严格遵守革命法纪和盟的纪律，祛除一切个人偏见，诚恳共事。第三，更要老实和谦虚，反对虚夸和骄傲。有了虚夸和骄傲，就必然容易过高的估计自己，有人也必然发展追求名誉、地位，妄自尊大，甚至陷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杨明轩的这个临别赠言，实际也是对民盟西北组织五年来政治思想建设的总结。

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55年春，杨明轩奉调到北京工作。1956年2月，在民盟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同年5月，在民盟中央常委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1958年12月，在民盟三大和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1963年12月，在民盟三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主

席。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杨明轩在民盟中央工作了13年。民盟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群众都是知识分子，杨明轩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始终把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956年1月，杨明轩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他参与起草了民盟中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参与起草了民盟中央在民盟二大作的《全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改造自己，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是民盟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他在民盟中央监委主任任内，坚持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精神办事。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过去盟的地方组织对盟纪处分多有轻率情形，不重视受处分人的民主权利，不从教育出发，不体谅受处分人在政治上所受的损失，今后应扭转这些偏向。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为了保护一些同志，杨明轩对上级的某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保留，使下边受屈的同志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保护，尽可能缩小“左”的影响。1962年，《光明日报》曾刊发《刘志丹》小说中的一章，内容无问题，而有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杨明轩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保护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张毕来，应约为重印《孽海花》写了前言，对该书的内容作了评介，以后有人在报纸

上发表文章批判《孽海花》，祸及重印时的前言。张毕来受到很大的压力，杨明轩和胡愈之据理直言，明辨是非，保护受屈的同志。

杨明轩主持民盟中央工作的时候，国家经济刚刚渡过困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突出，影响广大盟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波动较大；面对这一情况，杨明轩以一贯稳健持重的思想作风，与民盟中央其他领导人和衷共济，协同努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领导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努力开展工作，并将“推动盟员发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做好岗位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出成果、出人才，做出积极贡献”，列为全盟工作计划，推动盟的工作做出了成绩。1963年1月，他在民盟三届三中全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民盟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并提出了民盟当前要做好的三大工作，即：推动和帮助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推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增产节约号召，做好岗位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继续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充分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要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这就要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协助共产党做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反映合理的意见和正当的要求，协助党调整党和盟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调动盟员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他还要求民盟各级组织不断改进工作，健全和巩固组织，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作用。

杨明轩主持民盟中央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依照盟章总纲“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贯彻集

体领导，实行分工负责，发扬民主协商精神”的要求，在领导形式和方法上作了重要改进。一是在主席的参加下，在京的副主席按月轮流值班；二是两周举行一次主席办公会议；三是主席、副主席分工领导组织、宣传、文教、行政等各部门的工作。这些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增强了团结和领导力量，活跃了民盟中央机关工作，同时也对推动盟的地方组织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杨明轩从1954年起，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多年间，他忠实地履行人民代表的职权，广泛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进行调查，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1955年，他到甘肃进行视察，重点调查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回京后在全国人大一届二中全会上以《我所了解的农村的粮食情况》为题发言，一方面肯定人民群众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指出由于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主观估计，评产偏高。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如期召开，非共产党员的行政领导人有职无权，党委往往代替人大和政府决定应由人大和政府决定的事项。回京后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集中谈了“党政不分”的弊端。他说有些地方的党政不分已经到了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程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的，有法制的，也是讲民主的，但由于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结果干了不少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事情。他还就基层政权的选举问题向内务部负责人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要真正发扬民主，把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选上来；二是要采取可行的措施，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加于民；三是要正确处理党、政、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党支部不要替代政权，把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不一定

好。1962年，他到云南、贵州、四川视察，告诫一些负责同志要注重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说老实话，否则就会失去人心。到云南后，他提出去临沧地区调查，当时正是该地的瘴气和疟疾流行季节，许多人劝他不要去，但他说，正因为“要下临沧坝，先把婆娘嫁”，那里特别困难，我们更应当去。回京后他把亲眼看到的情况反映给卫生部，并多次在人大会议上呼吁关心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民生产和生活。1964年，他再次到云南视察，发现一个乡村小学在语文教学中增设了普通话课，因陋就简开展体育活动，回京后就立即向教育部反映，建议加以宣传和提倡，办好乡村的小学校。他不仅坚持到各地视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还利用其他形式广泛联系社会人士，了解情况。邓宝珊、孙蔚如等民主人士每次到京开会，他都要登门拜访，有时还请到家里便餐聚谈，交换意见，并且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这些人士，替他们服务。

人民公仆 永垂不朽

杨明轩是全国有名的学者，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建国后担任西北行政区、民盟西北区和全国人大的领导职务，功高位显，但他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品德。

杨明轩出身贫寒。他在家乡上学时就半耕半读，出外上学逢假期回家也常随父兄参加田间劳动，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品德。他一生生活艰苦朴素，不忘劳动人民。他的夫人李青俊是家庭妇女，料理家务，克勤克俭，同情革命，辛劳一生。杨明轩在西安工作时夫人在户县农村，他到北京后夫人

大部分时间仍住在农村；他的子孙也全在京外。他在北京的“家”里，个人家产只有一床旧被褥，一条旧毛毯，一只皮箱，几架书籍。“家”里的成员，除了他，就是几个服务人员。他和服务人员一起吃饭，服务人员每人每月交12元伙食费，其余开销全由他包支。他每月工资370元，除了交党费，给夫人寄50元生活费，大都用在这个“家”里了。他没有积蓄。他逝世后，亲戚到京奔丧返回时没有路费，还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借资解决的。他在农村的家也未盖一间新房，陈旧断垣的房子几十年一个样子，看了他那不足十平方米土墙土炕的寝室，真是感人泪下。家乡的父老无一不称赞他清廉直正，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的模式。

杨明轩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安于清贫，一生清白。但对他人则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他追念战友，关心烈士遗属。1931年，他得知魏野畴烈士的母亲及妻、子生活十分困难，立即把魏野畴的孩子接到西安设法安置，并和南汉宸等一起筹集100多块银元，使魏的一家人放下了讨饭的篮子。1949年5月，他由延安到即将解放的西安，途经三原登门拜访了史可轩烈士的夫人，帮助她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他重德重义，世交广而情谊深。胡景翼病逝后，他多方关照其子、孙，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建国前，他在西安长期寓居赵寿山、韩望尘家，在三原住在邓宝珊家，既是同辈的良师益友，又为晚辈人的家庭教师，教书补课，以至为其主婚、证婚，亦师亦友，亲同一家。他爱身边的青年工作人员如子侄，常在繁忙的公务之暇，讲授课程，批改日记，使其努力学习上进，其中有的上速成中学，有的在他资助下读完了大学。他高风亮节，为坚持真理不怕涉嫌受牵连。一个时期，一些老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他一如既

往，逢年过节登门拜访，有事情相托尽力而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1966年，在中国大地全面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就在这灾难临头的时候，可恶的癌细胞，又在杨明轩的肌体内开始作恶了。

杨明轩从1907年参加反清政府的学潮开始，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整整60年的艰苦曲折斗争。他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忧虑，激愤，感到十分痛苦，以致病情日趋严重。

1967年8月22日，杨明轩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破坏，在他逝世后仍遭受了不白之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80年清明节举行庄严的悼念仪式，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杨明轩的骨灰盒上。198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杜斌丞殉难35周年、杨明轩逝世15周年大会上讲话，称颂杨明轩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对杨明轩的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

杨明轩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树德树人，诲人不倦，终生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

(贾自新 朱新民 贺克敬)

时逸之

(1907—1982)

时逸之，山西晋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晋城第一个党支部的委员，中共晋东南特委书记，山西训导院教务主任，新编二师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边区岳南专署专员，太岳行署秘书长，陕南行署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常委、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陕北分院院长、党委书记，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病逝，骨灰撒在韩城禹门口黄河激流中。

时逸之，又名赓昌，1907年4月30日生于山西晋城河西村。其父经商，痛感有钱者为富不仁，无钱者备受欺凌，决意供时逸之读书，顶立门庭，救世济贫。时逸之为人忠实敦厚，学习刻苦勤奋，善于接受新思想。1926年在晋城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上半年，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共产党正在壮大，国民党也在发展，国共合作形势一派大好。因此，时逸之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同时，经党组织批准也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称“跨党”）。1926年8月，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太原开会，时逸之和常琨玉（非党员）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们每天晚上在太原一中附小参加党的训练班，学习共

产主义 A、B、C 等基础课。这使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更加提高。会议经过选举，时逸之当选为山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省学联执委会上又决定他为晋东南特派员。在太原返回晋城途经长治时，时逸之向各中学、女师和农校学生传达了省学生联合会精神，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 年寒假，晋城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初由陈立志任小组长（兼晋东南特派员），后由时逸之接任。1927 年，省委批准建立晋东南特委，陈立志任书记，时逸之为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在地区分工负责晋城南半县。在特委的领导下，县工会、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他们积极开展反对厂主剥削，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的罢工斗争；贴标语，办墙报，和商务会开展斗争。常文郁、常行光、常子善、赵树理等人创办“晋山研究社”，后改名“学社”，时逸之常常到学社大讲北伐战争形势和南方工农革命运动的情况，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和青年学生的觉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 1929 年 4 月 12 日叛变国民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7、8 月间，山西亦开始“清共”，山西全省通缉的共产党人共 72 人，在晋城被通缉的有陈立志、时逸之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一些共产党人出走，时逸之披荆斩棘地坚持到晋东南的陵川、高平、长治、屯留、阳城等地了解党组织被破坏情况，设法进行恢复。同时在知识分子、工人中又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经过一段工作和准备，成立了新的晋东南特委，时逸之任特委书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8 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机关，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时逸之和常文郁前往参加，到了霍州，会议已经结束，会议精神由省委宣传部长王洪钧在兴洞县作

了传达。时逸之回到晋城，传达了会议精神，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以省委代号“唐僧伟”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由于省委通讯机关遭到破坏，报告落于敌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通知晋城县党部加紧侦查，迅速逮捕。1928年4月，时逸之等4人先后被捕。在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和太原特种刑事临时法庭上，时逸之立场坚定，大义凛然，以国民党左派（跨党）身份，怒斥敌人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国民党政纲，背叛总理遗教。后来，他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送山西省第一监狱执行。

时逸之在狱中抓紧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学习和斗争。他先后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李大钊、蔡和森、彭湃、肖楚女的文章，还有《向导》、《中国青年》等。为了改善犯人生活，他们还进行绝食斗争。根据国民政府法令，监狱政治犯刑期过半，可以转到自新院。时逸之于1932年由监狱转往反省院。在反省院，他先后写了《谈谈青年读书问题》、《太平洋问题与中国》、《对国联调查报告的检讨》等文章。特别是《太平洋问题与中国》，他于1935年在天津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时，又经校阅，定名为《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该书共9万字，虽写于60多年前，但至今读起来仍觉观点明确，征引丰富，内容充实，论述精辟，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1933年6月他出反省院，1935年秋到了天津，后经世界日报常驻天津记者殷之平（河北博野人）介绍，接上党的关系，参与经办良友书店，从事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6年，山西政局开始有所转变。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党组织决定，时逸之由天津回到太原，经中共山西省工委同意，1936年10月任山西训导院教务主任。训导院的由来，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阎锡山集结大军堵截，把在

作战中俘虏的一部分小红军先集中在感化院，后来感化院改为训导院。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阎锡山趋于抗日，政治犯开始释放，训导院又成为所谓政治犯出狱释放的过渡地方。这个过渡办法是在山西面临抗战前线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经中共山西省工委研究同意的，由时逸之具体负责进行。这就使一部分同志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走上抗日前线。

为了加强对抗日部队的领导，在训导院结束之后，根据山西省工委指示，通过阎锡山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关系，于1937年以来，时逸之又被派到新编二师，先任党支部书记，又继任政治部主任。新编二师原为孙殿英的部队，先投降日寇，1936年反正，蒋介石收编为新二师。新编二师后来一直活动在定襄、五台等地，曾配合晋察冀军民抗击日寇。1939年山西“十二月政变”（即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新编二师脱离晋察冀边区，开往河北找孙殿英，又走向反动。时逸之随即离开新二师，先到了辽县铜峪镇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向邓小平政委汇报了在新编二师两年多的工作情况和新二师脱离边区经过。时逸之后又到了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总部介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组织部于1940年春分配他到太岳区工作。

1941年5月间，日军调集6万重兵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大部西渡黄河。太岳区党委派史健、行署派时逸之率领两个工作团随太岳南进支队赴岳南开辟工作。在二地委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从二地委辖区划出浮山等县作基地，建立了以焦善民为书记的岳南地委，以时逸之为专员的岳南专署。1942年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抵岳南，指挥了浮（山）冀（城）战役。二地委对浮冀战役进行了有力的配合，时逸之在动员支前民工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5年秋，时逸之调到太岳行署，先任民政

处长，后任行署秘书长。1948年春，洛阳二次解放时，时逸之随陈（赓）谢（富治）大军渡过黄河在豫西做支前工作。当年秋季，时逸之任陕南行署主任，驻湖北郧阳，为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西进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成立，时逸之任秘书长，参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在一切初创，百事待兴的情况下，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对党外民主人士一一进行家访，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他认为，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来自陕西各阶层、各党派和各方面，并且是这些阶层、党派和各方面负有声望的代表人物，这就是人民民主政权所独有和最优良的政治特征，而这个特征是我们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医治战争创伤，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生产的主要基础。作为省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就是要在政权建设中把它发扬广大，把党外民主人士团结好。这一时期，他以很大精力研究总结了统一战线、民主建政、政权建设工作。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称时逸之的工作精神为“黄牛”精神，大家应该学习。1954年3月，时逸之任中共陕西省常委，12月被选为副省长，1956年9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任副省长期间，在参加中共八大之后，他写了《为什么要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一书。该书从理论上说明法律的产生及其阶级性，指出法律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分析了人民的法律和反人民的法律本质上的区别，扼要地讲述了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历史和他的作用。1957年上半年，他在丈八沟参加省委组织的高级干部学习班学习哲学，写了《怎样分析问题》一书。内容主要是依据事物发展的矛盾特殊性（具体矛盾）这一原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应如何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以正确解决事物的矛盾（问题）。1958年，还编著出版了《怎样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书。

中共中央于1958年曾发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说“不仅县区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时逸之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于1959年5月到铁道部西安车辆厂下料车间劳动一个月，后来又开了企业管理、科技人员、工人、炊管人员等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意见，总结经验。他深感这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和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办法。在此前后，1957年7月1日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投产，上午讲话，下午即下井劳动；1958年11月在韩城治户川背过矿石，在宝成铁路坍方现场、陇海复线、西韩铁路工地上，他都在指导工作的同时，和民工一起抬土背石，积极劳动，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1960年10月，中央通知时逸之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在11月召开的中共陕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时逸之以全票当选为省委委员。当时组织上仍安排他为省委常委，但是他提出：“已决定我到西安市工作，市上的张策、刘庚已分别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委常委，自己就没有必要再担任省委常委。”大会主席团采纳了他的意见。时逸之完全从党的事业出发，以豁达的态度对待职务的变动。在任西安市市长时，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暂时的困难。为了安排好职工生活，他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机关农副业生产，召开了西安市级机关农副业生产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安排任务。二是办好职工食堂。曾深入市三中、

新华书店、百货公司，听取汇报，检查访问，和炊管人员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办好食堂。后来，召开了“西安市红食堂、好管家、巧厨师表彰会议”。三是整顿市容卫生。他认为在生活困难时期，人的体质下降，必须大抓卫生工作。他组织万人检查团，深入西安市各个角落，检查督促，使全市的市容卫生和各个单位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提出的“大扫除、大搬家、大清洗”，“把西安建设成为一个整齐清洁，秩序良好，具有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口号，一直鼓舞着人们。

1961年4月，洋河在长安纪扬公社党家桥一带决口，数万亩农田被淹，群众被困。时逸之闻讯后立即前往组织救灾。他察看了灾情，在河滩上席地而坐，与西安市委农工部和市属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商量救灾措施，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又乘木船到受淹农舍慰问灾民，指挥救灾。由于抢救及时，受灾群众全部脱离危险，较快地恢复了生产。

1963年，时逸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党委书记、院长。他深入到研究所，参加劳动，打扫卫生，美化环境，多次访问老科学家，召开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对他们的研究条件、生活困难积极给予照顾。他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他在科学院工作几年，对科技人员真正做到了政治上信任，使用上放手，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至今许多同志提起这些往事，仍激动不已。

在“文化大革命”中，时逸之深受迫害，身心都遭到严重摧残。但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并保护其他受迫害的同志。对1975年从北京“流放”到陕西潼关、澄城、宝鸡的杨献珍（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牛佩琮（原国务院财贸办

公室副主任)、张文昂(原农业机械研究院党委书记)等同志,尽自己的力量,给予物质、精神、医疗上的关照。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政法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废寝忘食,力求精进,以极大的热情为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他以72岁的高龄,身穿警服,于1979年5月9日夜间巡逻,积极贯彻为维护安定团结而发布的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通告;多次深夜到西安建国路省信访办公室,深入到来访者中间了解情况。并指示说:“不管问题怎样,先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兴平桑镇公社的信访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基本做到小事不出队,大事不出社。他听到后,立即驱车专程前往和有关同志座谈,直至深夜。后来,桑镇公社在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对全省信访工作推动很大。

1979年,时逸之被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又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为陕西省的法制建设和省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80年,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患癌症,在动了两次手术之后,于1982年7月29日在西安与世长辞,享年75岁。遵照时逸之遗愿,尸体解剖,骨灰撒在韩城禹门口晋陕交界的黄河激流中。

时逸之一生,平易近人,对同志肝胆相照,有话讲在当面,不结个人恩怨,不使什么“小心眼”。公私分明,严于律己,志洁行廉,高风亮节。生活上十分刻苦,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对待疾病坚强达观,精神感人。

(单修治)

孟 用 潜

(1905—1985)

孟用潜，原名孟广智、孟天培，曾用名孟坚、曹长青、万钧、陈文辉。河北省深县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共满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相继担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兼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孟用潜一生坎坷，但坚

定的革命信念始终如一，他是一位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非常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孟用潜，原名孟广智、孟天培，曾用名孟坚、曹长青、万钧、陈文辉等。1905年生于河北省深县。4岁时，随全家迁居北京。他在北京完成了小学、中学学业，192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次年又从燕京大学研究班毕业。在这段学生时代，他除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功底之外，还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经历了五四运动，大量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和关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接受了一定的革命理论。

孟用潜在结束了学生生涯后，于1926年秋下上海，走广州，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了解了一些中国的现状和革命形势，接受了一定的革命理论，提高了思想觉悟，他于1927年1月毅然在武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受党组织派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政治部工作，该部参加南昌起义。是年11月，孟用潜受党组织派遣，到达厦门，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直至1929年1月。他曾作为共青团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六大。

从莫斯科归国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找孟用潜谈话，派他到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作中沉着机智，勇敢坚定，与省委书记刘少奇等同志密切配合，努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按照当时奉天地下党的工作职责，主要在城市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工人罢工。

1929年8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孟用潜和刘少奇一同在奉天纱厂附近执行任务时被捕，遭敌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与此同时，中共满州省委的同志也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开展营救工作。在押期间，孟用潜机智灵活，与敌人巧妙周旋，使法院得不到任何证据。法院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作出了“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16字判决书。孟用潜和刘少奇先后获释，回到省委，并立即向省委汇报了被捕的经历，并写了详细报告，送党中央并很快得到回复，刘少奇继续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孟用潜任省委委员。1929年9月，孟用潜前往哈尔滨就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管组织工作。1930年11月以后，中共北满特委成立，孟用潜任特委书记和中共满州省委委员。

1930年12月的一个深夜，孟用潜同陈潭秋等人在召开会议时再次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问，遂无所获，却于1931年2月被判处7年徒刑投进监狱。在狱中，孟用潜组织狱中同志不断与敌人进行斗争，迫使敌人许下不再打人的承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孟用潜的三哥孟广礼四处疏通关节，孟用潜及在押

70多名“政治犯”全部获释。1932年6月，孟用潜出狱后，于7月到达上海找中共中央。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会议要求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配合南方苏区反“围剿”斗争，将创建陕甘边苏区和建立红二十六军作为北方党组织的“第一基本任务”。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北方会议决议，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成立红一团。派孟用潜任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同时指示省委重视甘肃党的工作，负责建立甘肃省委，组织兵变，配合农民斗争，建立陕甘边苏区。

孟用潜在赴陕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曾找他谈了话。孟用潜于8月到达西安后，化名曹长青，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中央的“八一指示”，改组了省委。于8月25日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要求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富农路线，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编成红军一个团。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特委，并派干部到陕南领导党的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接着，陕西省委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分赴陕南、渭北、陕甘边，以及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同时，省委在宣传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于8月26日作出《关于九一八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组织抓住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东三省的事实，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日运动，

扩大各界反日救国会，成立反帝大同盟。

渭北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农民运动的高涨地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时起彼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1932年夏秋，省委不断派员到中心区域三原县指导工作。在创建渭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孟用潜作为省委书记，曾亲自到三原县武字区，召开有几十人参加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部署工作，决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渭北革命委员会。渭北游击队、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10月6日，省委发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造渭北新苏区是渭北党组织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同时成立中共渭北特委。在特委和革委会领导下，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掀起了抗粮、抗税、抗捐、抗丁的斗争和分配土地工作。根据地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0月25日，省委作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把兵变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1932年秋，省委派员赴甘肃平凉，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了中共陇东军特委。1932年12月，又派员赴兰州成立了统一领导甘、宁、青工作的甘宁青特委，以在三省建立和发展党组织，进一步开展兵运，建立革命武装。1933年4月，甘宁青特委组建了一支约400人的西北抗日义勇军武装。

1932年冬，陕西省委派干部多人次去陕南加强特委，发展武装斗争工作。1933年1月6日，陕南特委发出《扩大西乡城固边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中共陕南特委整顿和扩编了原来的游击队，于1933年2月13日组建了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在西乡、城固、褒城等县开辟苏区，成立了西乡、城固边新苏区革委会和南郑褒

边区革命委员会。

孟用潜来陕后，省委的工作重心是创造陕甘边根据地和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早在1932年2月陕甘边已正式成立了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部队迅速扩大。3月，省委报请中央批准成立正式红军并得到批复，给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番号”，要求“在积极开展各地游击战争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区”。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陕甘游击队正式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组成第二团，共约200多人，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即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地和扩大红二十六军。1933年3月8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同时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以照金为中心，边区军民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农会等，建立基层政权，分配土地，形成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23日，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对近期的工作作了检查，“认为省委，特别是曹同志在政治领导上和实际工作中犯了严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省委在这一期间是在做立三主义的空谈与官僚主义的领导，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见1932年12月23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基于这样的认识，省委做了较大改组，尽管孟用潜受到较为严厉的批评，但仍担任省委书记。

其实这一时期，在省委的领导下，陕西的革命形势从总体上是较好的，党的工作取得了相当成绩。随着各地武装斗争的日益开展，各地党的组织不断恢复壮大。到1933年7月，省委所辖的党组织有：西安市委、陕甘边区特委、陕南特委、甘宁青特

委、西路临时特委和三原、韩城、澄城 3 个中心县委，及蒲城、渭南、华阴、临潼、户县等直属县委，党员人数达 1300 多人。党也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红二十六军建立起来并有了新发展，渭北根据地俨然一块红色区域，红四方面军已到达陕南，王泰吉骑兵团内也开展了党的工作，省委内外对形势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但是，顺利中也隐含着许多困难。红四方面军再未向北发展；在陕甘边，敌人进攻加紧，敌我兵力悬殊；党的组织力量还相当薄弱。但身为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无视现实情况，四面出击，于 1933 年 1 月在陕甘边区冒险攻打与游击队有统战关系的耀县庙湾夏老么民团，致红二十六军遭受重大损失。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分析红二十六军受挫的教训后，以孟用潜为书记的陕西省委根据当时敌人派军队和五县民团“围剿”红二十六军、形势比较严重，而群众搞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又很激烈的情况，认为弱小的红军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张“化整为零，搞游击战。”根据是 1933 年初收到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文件，提出作战要灵活，‘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等等”，孟用潜认为陕西红军力量并不大（红二十六军实际只有一个团，几百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搞游击战争比较合适。1933 年 2 月 3 日，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申明了上述观点，指出红二十六军不应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应采用游击的战术。所谓的“阵地战”还不是红二十六军今天所能胜任的。而是应在保存红二十六军番号的情况下，将剩余人员编成若干小分队，开展游击活动，更好地发展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进行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工作，逐步恢复红二团。但是，这一符合实际的指示却遭到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激烈反对。他召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

部会议，反对省委来信，认为这是取消红二十六军，是“右倾取消主义”，违背中央北方会议路线。并以部队代表身份回到西安，提出改组省委。经过省委会议的激烈辩论，省委接受了杜衡的意见，由团省委书记袁岳栋任省委书记，孟用潜不再担任书记，而任常委。3月15日，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信称：“省委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检查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的确是同中央和北方会议及过去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决定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省委是犯了最严重的取消主义的错误，是对红二十六军悲观失望”。3月23日，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同样称，给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是错误的。

省委改组后，孟用潜对于杜衡等人的错误主张仍很难接受，被撤销了常委，任省委委员。在这次事关军事路线的大争论中，孟用潜感到很孤立，遂多次提出离开陕西。杜衡等人认为孟用潜“根本政治动摇，即开除省委委员”，并给以口头警告，以决议公布全党，分配他去负责省委训练班教务主任的工作。但孟用潜仍然坚持离开陕西。陕西省委请示中央后，召开全会，同意了孟用潜离陕的要求，孟用潜离陕后赴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这年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

关于这场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经过历史的沉淀与验证，贾拓夫在1959年的回忆中这样写到：“杜衡左倾空谈，实际是右倾；”“曹长青我认为还是比较稳重的，他参加过‘六大’，有地下斗争经验，肯用脑想问题，注意和大家商量问题。曹任书记时，对于红二十六军的指示（分散活动），是较为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孟用潜离陕到沪后，中共中央于9月派他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被错误地认为执行了

“新取消主义”，于1934年5月被开除党籍。离开党组织后，孟用潜先后在北平塔斯社任过翻译，当过编辑，参加苏联情报部门的工作和由宋庆龄、路易·艾黎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先后到兰州、宝鸡、西安等地视察。1938年秋，曾同斯诺一同到延安考察。孟用潜虽不在党组织内，但仍与党组织的上层领导人保持了密切联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支持、协助和保护党的同志。由于他鲜明的政治态度，曾遭国民党特务追捕。在重庆“工合”工作中，孟用潜常就工作中的问题去找周恩来、徐冰等人商谈，曾协助将艾黎经手的国际捐款、医疗器械等物资运往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也对孟用潜的“工合”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1944年5月，孟用潜到设在西安、北平、沈阳等地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任特派员。在西安时，孟用潜通过与其他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对于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宣传人民民主阵线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1月，根据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孟用潜的党籍，得到中央的批准，党龄连续计算，在党内的组织关系上受李克农领导。1946年9月，孟用潜通过李克农介绍到延安后，受中央派遣，到了上海，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此后，孟用潜曾任中共上海局调研部副部长，华北财委委员、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全国解放后，孟用潜担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1956年调到外交部，任外交部党委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并兼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孟用潜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67年被隔离审查，11月被拘留审查，投入监

狱。在身心遭到极度摧残的情况下，他不顾安危，数十次上书否认反革命集团对刘少奇和他本人的诬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的高贵品质。

1978年12月9日，公安部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孟用潜获释，终于结束了11年零7个月的囚禁生活，获得自由。1979年5月30日，中共外交部党组作出《关于孟用潜同志1929年被捕问题的复查结论》，指出：“孟用潜同志被捕后没有问题。”“对孟用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恢复组织生活和原工资级别，补发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孟用潜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85年8月8日，孟用潜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张培林)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三)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4-05968-4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
列传—陕西省 IV. K820.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546 号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ZHONGGONG SHAANXI LISHI RENWU ZHUAN

(第三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 插页 13.5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24-05968-4/K·978

定价: 26.00 元



ZHONGGONGSHANXILISHIRENWUZHUAN

责任编辑 许发宏

封面设计 崔 凯

ISBN 7-224-05968-4



9 787224 059687 >

ISBN 7-224-05968-4/K · 978

定价：26.00元